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走自己的路！

一條台灣左翼工運路徑的回看

A Reflection on my Political Journey in a
Left-Wing Labor Movement in Taiwan

指導教授：黃德北

研究生：賴香伶(M94620001)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月

「反抗」太容易被拿走！

我是一個社運工作者，九〇年代初進到台灣的工會運動場域，十幾年的運動歷程經驗了台灣政治民主化進程中最糾結也最矛盾的「族群」政治，而我所參與的工運陣營—工委會，在二十年的自主運動實踐中與此糾結、矛盾的政治歷史相抗衡，讓我在十幾年的運動生涯中有了辨識台灣左翼運動歷史的回觀條件，省視發生／作用在我及眾多弱勢人民身上的苦、困與承擔，該怎麼說、能怎麼做！

這篇論文是我反省與面對運動困境的行動之一，以二千年政黨輪替後經驗到台灣藍綠政治結叢、族群政治的壓制性，焦慮著工運力量的消退、左翼階級運動的難以突圍，我感受到自己身上帶著一個強烈的情緒包裹，推著我在運動中找一個答案、一個方向。這個答案是什麼？至今我隱約察知是一個運動者與台灣階級運動的歷史根源，不是主流政治詮釋的本土／台灣人意識，也不是民族主義的大中華文化歷史情感，而是一個受壓迫者的生命連帶，在解殖的歷史敘事中應該重新出土與被看現。

受壓迫者從來就不是歷史的主角，我十幾年與多數的底層工人走在一條自主性的運動道路上，清楚看到「反抗」的階級力道，工會幹部拿身家性命與資本家對幹、小市民衝上街頭要求社會正義，即使是統、獨信仰的基本信念支撐著草根人民的行動意志，最後還是被有權有勢者擺佈、甩開。「反抗」太容易被拿走、被截奪，那反抗的歷史也被有心者刻意錯接、糟蹋。我反對這樣的社會景況，在九〇代起參與在社會變革取徑的行動中，六〇年代末出生的我，認識我們的實踐取徑沒有接在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的老同學的政治歷史中，也非受到七〇年代美麗島黨外運動的國族主義獨立運動的感召，而是在運動中一再的被簡單化的統獨、藍綠政治歷史詮釋所困，在偶然的機遇下走進亞洲的地緣政治意覺，一條左翼的反殖、反壓迫的人民抵抗歷史被我循線接起，無關「先統獨再左右」的孰者優先，而是鑽探自身來處後撐持起我與社會變革想望的共振。

在論文書寫過程中，我一路經驗著在階級矛盾與族群對立中說理、論道的難關，因為要對峙藍綠政治結叢的壓制性，闢出「不藍不綠」、「不統不獨」的運動論述與政治空間得有一定的社會基礎，尤其在政治上以二元對立區分敵友的選邊認同邏輯，我自覺沒有這個能力回擊與奪取空間，但躲不過的就是這如影隨形的情緒糾結，不面對無法再往前，看了又不知所措。在歷史的機緣與運動進程的勾連下，2003 年我到工委會工作，展開了一場召喚「人民性」的廢票運動，以階級認同戳破藍綠、統獨、族群的「偽民主」政治，意外引爆了自身客家族群的邊緣性自覺，藍綠政治中的客家人(票)近似是藍營的「囊中物」、綠營福佬沙文主義的小跟班，我是憤怒而不堪的。帶著這個情緒我走進父親〈人生回憶〉的日記文本找一喘息的空間，讀著那一代人在殖民統治下的咬牙求生，即使再苦還是撐

過來了，接著 2005 年我推了〈生命如河流〉的讀書會，循線與亞洲的反殖、反帝的人民革命歷史相遇，這個歷史感知讓我的喘息空間有了解放的意義，是，是這個反抗運動的歷史長河，承載了馬共女性革命者、日治下死裡逃生的父親、受國共內戰轉身逃命的外省人、經濟起飛中卻一再掉落谷底公公，還有寄望獨立建國卻被無情政客、千萬罰單壓死的朱世紀老伯、流浪街頭十幾年的無產者遊民卜派…，太多人了，要平反與正名的就是這些不留名青史卻死命拼搏的底層人民；我們可以無視自身處境卻不能無知自身來處，因為受壓迫者的生命連帶，刻畫出的政治歷史才是人民的運動、人民的歷史。

目 錄

前 言：「反抗」太容易被拿走！.....	1
第一章 社運實踐讓我重新認識自己.....	7
第一節 我的「慢政治」運動視框.....	7
1.1.1 「政治性」的出土探究.....	7
1.1.2 「社會學習過程」與「慢政治」.....	8
第二節 我的社運歷程回觀.....	10
1.2.1 階段一：勞動意識的生成與社會運動的理解.....	11
1.2.2 階段二：體制「內／外」的實踐路徑與權力辨識.....	11
1.2.3 階段三：階級／客家與族群政治歷史的自我解殖.....	12
第三節 問題意識與研究目的.....	13
第四節 章節安排.....	14
第一篇：反身性探究：解讀自身的政治歷史.....	17
第二章 一個運動者的生成與改變.....	17
第一節 引線：親密關係與意識啟蒙.....	17
第二節 看見差異：實踐中認識「自己」.....	19
2.2.1 對勞動關係的另類解讀.....	19
2.2.2 「抗爭是最好的勞工教育」.....	20
2.2.3 與政策交鋒—在貨運站工會初試啼聲.....	22
第三章 政治性出土—權力與體制內／外的歷練.....	29
第一節 在體制中繼續行動.....	29
3.1.1 成為「有機」的行政協同者.....	30
3.1.2 作事有原則，勞工局同仁挺腰桿.....	31
3.1.3 老鄭辭職風波，馬市長也得認.....	32
3.1.4 「可以用但不能靠」，對工會的警語.....	33
3.1.5 權力的兩面性：負責任使用權力的「範型」.....	34
第二節 上到工運前線的挑戰.....	36
3.2.1 政黨輪替後的社運處境.....	36
3.2.2 挑戰藍綠政治—廢票運動的複雜性，超乎我的想像.....	37
3.2.3 在情緒中理解自身的壓抑.....	37
3.2.4 生命如河流！循線接起自身的歷史政治.....	40
3.2.5 再見。父親！.....	41
第四章 女性運動者的家庭經驗.....	43
第一節 佃農／茶園／我的「原生家庭」.....	43
4.1.1 側記百年「茶園」的消失.....	44

4.1.2	茶農們爭到處分的權力.....	45
4.1.3	半農半工的勞動家庭.....	46
4.1.4	種洋菇，全家總動員！.....	47
4.1.5	小城「工業化」來了.....	49
第二節	另一個家／都市無產的「夫家」.....	51
4.2.1	從扛家計的婆婆談起.....	51
4.2.2	第一次與公公爭吵.....	53
4.2.3	公公發病，孩子成禁臠！.....	54
4.2.4	放下纏鬥的怨，我的「悟」與認受.....	55
第二篇：	工運與政黨政治：工委會的轉型(／進)歷程探究.....	57
第五章	工委會的實踐路線.....	57
第一節	從工運自主性談起.....	58
5.1.1	順法鬥爭到工人立法.....	60
5.1.2	階級優先／統獨其次.....	61
5.1.3	抹紅、藍綠二分，民進黨的鬥爭技倆.....	63
5.1.4	「政黨附庸」vs.「等距交外」.....	65
第二節	政黨輪替後「秋鬥」的轉型.....	68
5.2.1	勞動彈性化變本加厲.....	69
5.2.2	公共服務「商品化」.....	70
5.2.3	「垃圾」政府，工人幹譙.....	71
5.2.4	藍綠比爛，公投法被玩爛.....	72
5.2.5	總統投廢票，公投拒領票.....	74
5.2.6	等距斷交、分別算帳.....	75
第六章	召喚藍綠之外的「人民性」運動.....	77
第一節	廢票運動的政治性.....	77
6.1.1	廢票運動的歷史前身.....	79
6.1.2	與「泛紫聯盟」的差異.....	80
6.1.3	工運團體立場各異、越辯越明.....	85
第二節	廢票運動的穿透性.....	87
6.2.1	二種「輪替說」—拉你下台、選比較不爛的.....	87
6.2.2	媒體對廢票的二種定性—罔顧弱勢 or 公民反撲？.....	89
6.2.3	運動的另類嚐試—網路對話、推爛蘋果、登廣告.....	90
第三節	廢票運動的人民性.....	95
6.3.1	開票之夜～33 萬張廢票.....	95
6.3.2	“藍軍” 噙聲了.....	97
6.3.3	「民主不是甚麼」.....	100

第七章	人民老大運動—「直接民代議制」	103
第一節	廢票後～藉選舉、搞組織！	104
7.1.1	研發「直接民權代議制」	105
7.1.2	參選實驗，翻轉「主僕」關係	106
7.1.3	找出「民主頭家」，兩種實驗方法	107
7.1.4	人民老大運動的自我檢討	112
第二節	廢票後～人民對話之「秋鬥」	118
7.2.1	高捷泰勞抗暴，引發七七七行動	119
7.2.2	人民對話之「秋鬥」	121
第三篇	展望「慢政治」：階級性的公民政治運動	126
第八章	公民政治性初探	126
第一節	紅衫軍之役—火大行動之反省	127
8.1.1	暴力路線的兩面刃	127
8.1.2	黨外衝族—遇到朱世紀老前輩	131
8.1.3	群眾：「要搞暴力再來找我！」	133
8.1.4	朱世紀老伯死了！	136
第二節	政客大贏，人民大輸？—論公民自體性((citizenship))	136
8.2.1	步調不一的倒扁指揮系統	137
8.2.2	公民自主性的「實體」再現	138
8.2.3	實質民主的展現	139
第三節	罷免行動—在地公民的組織	141
8.3.1	反貪罷「許」！火大行動的在地經驗	141
8.3.2	「外地人」的在地政治學	146
第九章	「慢政治」的進行式	152
第一節	「慢政治」是的一解放探究	152
9.1.1	「慢政治」行動探究的發現	153
9.1.2	碎片與重組～解殖的歷史「差／撞」	155
第二節	攻佔市民社會的陣地戰省思……	157
9.2.1	勞動意識與分配正義	157
9.2.2	階級性的公民權建置與開創	159
後記	我與論文書寫	162
表 1	香伶家鄉「茶園」記事與三義小城變遷事件整理	50
表 2-1	工委會曾經如何鬥選舉	66
表 2-2	其他勞工團體的行動	67
表 3	2000 年政黨輪替後工委會主辦之「秋鬥」	76

表 4	廢票運動工委會拜會各團體代表人物記錄(2003.9-10 月份)	81
表 5	人民老大的推動過程：從不清楚到有些輪廓.....	114
表 6	2006-2008 火盟舉辦之世代系列論壇.....	186
圖 1	「直接民權代議制」的基本架構.....	106
附錄一	回憶人生—香伶父親的故事.....	165
附錄二	社會變革取徑與有機知識份子的實踐論.	174

第一章 社運實踐讓我重新認識自己

第一節 以「慢政治」運動視框回看

本文是一個社會運動者對「我是誰？」的反身探究，回顧十六年來的工運實踐經驗，我的「政治性」得以出土是在種種社會成因與實踐方法上的衝擊下，行動者在實踐中重新認識自身的階級性，並從理解台灣特有的政治歷史脈絡中逐步認定、想望成爲一個運動者的意識覺知；而會以「政治性」出土的概念來概括此反身探究的實踐意涵，是在運動中我清楚感受到自身受到某種複雜情緒的擠壓，有時是憤怒、不明究理的，有時卻是羞赧不知所措的沮喪；這個情緒性的積壓在 16 年的運動歷程中隨著位置的轉換而越來越重，雖然在我所處的運動社群已儘量創造空間讓運動者能拿起自身感知的矛盾、衝突經驗進行對話，但最終這些矛盾得被置放於運動脈絡及政治歷史中才能逐層剝開。

1.1.1 「政治性」的出土探究

這個層層剝開的自我覺知歷程，不只發生在我身上，我的運動同志王芳萍在他的論文中寫道：「從灰頭土臉的工作經驗，反身連繫沈重的家庭、情感慾望的個人小歷史，再扣回社會政治變化的大歷史…，有時進一步，有時退二步，或進或停的來回擾動自身的階級、性別經驗，乃至拆解、重組，尋找自由，當更有意識的辨識自身的『社會性』及『政治性』時，…對自己負責任的說『底邊階級政治』是我的立場，我從這裡來，要從這裡去」(王芳萍，2009:19)

於 90 年代初大學畢業後因著好奇、不解而踩進社會運動的我，進到團體動力工作室¹的運動社群中參與社會變革的實踐，從模糊懵懂的正義感到深刻體悟自身的政治歷史與社會運動的連結，個人小歷史透過尖銳的社會運動鬥爭，對大歷史的複雜情境有了相應的釐清與辨識的覺知，「政治性」的出土即是一個人在情感認同、政治意識(階級性與自爲的存在)一點一滴形成的過程。再進一步看，個人的小歷史其來有自，得被置放於台灣或亞洲的殖民政治歷史中才得以扣連，在 E.W. Said 的「東方論述」概念中，其所指稱的「地緣政治意覺」(geopolitical

¹ 團體動力工作室成立於 1989 年，鄭村棋、夏林清自美國留學返台後，決定以行動科學的社會變革取徑進行社會運動，他們以培養運動組織者進到工人群眾中以意識啓蒙、公共政策介入或團體動力的自我覺察、反映等方法，展開運動者及工人群眾的意識改造工作。在當時政治剛解嚴的社會氛圍中，工作室以低度開放的方式與進步學者、學生社團、工會幹部等進行交流、互動，直到 1991 年 4 月正式以「女工團結生產線」爲名，對外行動，並擔負工委會秘書處的工作。這個以組織者改造、培養的集體社群，吳永毅以「實驗性的微觀公共領域」稱之，在這個團體中提供給成員一個實驗互相協助改變自己私人習慣的場域。(吳永毅，2009)

awareness)²，不啻是從「西方」的反身性、再解殖看待「東方」的政治論點，我所認定的大歷史敘事因為自身認定、想望成為一社會運動者，在階級意識及踏穩腳步的實作中，以反殖、反壓迫的視角辨識大歷史敘事，並得以認受到在不斷投入社會實踐的歷程中，自身強烈的矛盾與衝突感係來自於對底層人民掙扎求生的強烈共鳴，在書寫行動、一定距離的「回觀」下與此認受感同同行，「政治性」的出土正是行動者面對何以刻意隱身、何以情緒爆衝或「無能」承受的相認過程。

重新回視我的十六年運動經歷，不同實踐位子練就了不同的能力也累積了對現實政治的看法，但出生於六〇年代末台灣經濟起飛時期的我，對六〇年代起採出口導向的經濟政策，無數勞動者從鄉村移動到都市求生、打拼，這些辛苦的勞動年代我沒有參與到，不過，隨著八〇年代末的政治解嚴，社會運動與政治民主化相互扭結前進，我參與其中，看到了多數資源條件相對弱勢的勞動群眾在政治上並未取得相應的權力，仍然飽受資本剝削、貧窮化、就業不穩定的威脅；二〇〇〇年政黨輪替後，社會弱勢者爭取權益保障的聲音更被政黨競爭的「比爛」邏輯所淹沒、忽略，面對社會變革之路漫長無情的考驗，運動者不免在困頓中心生懷疑與無力感，如何在此混雜的政治情勢中找到運動得以往前的方向，使用探究自身「政治性」與「慢政治」運動的實踐回觀，是我試圖為運動困境找尋方向的行動。

1.1.2 「社會學習過程」與「慢政治」

從個人「政治性」出土，提出「慢政治」³的運動視框回看自身，其中介者、方法與實踐路徑的辨析來自於團體動力工作室二十年來以運動社群開展出來的社會學習過程⁴；Axel Honneth所描述的是一個以社群為行動單位的社會變革與發

² Said 的原初使用「地緣政治意覺」(geopolitical awareness)指的是對西方的東方論述是如何「分佈」在不同學門中的覺察，特別是對政治與思想不對等權力關係的覺識。在台灣，由日本殖民到美國冷戰防線控制的歷史裡，“地緣政治意覺”應是十分必要的自我要求。(夏林清，2008)

³ 「慢政治」一詞是筆者跟隨社運前輩鄭村棋、夏林清的社會變革取徑方法，二十幾年來在台灣工運及各式人民草根運動中對行動者意識轉化路徑知識的指稱。在 2007 年火盟參與立法委員選舉時提出〈慢政治—參選，是為了尋找 1000 個自主公民〉的運動號召(王芳萍，2007)，社運觀察者司徒洪彬亦以「第三勢力的新政治能新到哪裡去？」一文中對主流政治以透過動員、媒體操作等快速、粗暴、直接的舊政治，並對比第三勢力中不同運動團體的實踐路徑，他表示「…這種以夏林清的社會心理學的政治操作方式是一種值得觀察的『慢政治』」(司徒洪彬，2007)；他稱的「慢政治」即是對 2007 年火盟與綠黨共同參選立委，火盟所彰顯的政治理念與組織方法的觀察，司徒洪彬使用「慢政治」來界定我們的運動路線，我以 17 年的運動歷程回溯工委會、火盟等不同運動階段開展的實踐方法，進一步提出「慢政治」的認識理論。

⁴ 「社會學習」的概念引用自Axel Honneth。Honneth 指出Habermas 的社會理論裡缺少了行動的團體(acting groups)，此舉將社會性相互整合的團體的實踐納入為個體與社會制度性行動系統間的一個中間界面。夏林清、鄭村棋在台灣的多項社會實踐方案參與經驗的紀錄與分析則均恰是落在Honneth 所言之“伴隨著社會團體之團體特殊經驗的領悟與信念的溝通過程”(Honneth, 1991:284)的範疇中，這一種社會團體之間的溝通過程即社會學習過程。(夏林清，2008)

展的圖像「社會學習過程是指一個社會內部主要進展的動力，不是來自『廣大群眾』的模糊圖像，也不是某種匿名的行動系統，而一定是得依靠特定的社會群體不斷和其他社群對話溝通的過程，而對該特定群體而言在與其他社群對話的過程中，新的認識與社會行動能力也增加。」(Honneth, 1991: 284)，夏林清、鄭村棋多年對社會運動的關切與參與確認了這種社群認識與行動能力的變化，是社會進步的主要功能，也只有當特定社群中的個體與群體實在的發生了意識與情感變化的學習過程後，社會的轉化才得以推進。(夏林清，2002，2004，2006，2007)

此一特定群體間的對話過程即是一社會學習過程，亦是個體得以增生新的認識與行動能力的基座。就以我所認知的特定社群中，不是擁有一定社會資源條件的中產階層或小資產者，更多是社會體制中被排擠的中下階層及受運動召喚的知識份子等，在社群中開放的與他人相互學習，這樣的社群對話發生了人／我、公共／私密、族群／階級等各方面的反省與對照；也因為我身處這樣的屬性社群中，我的「慢政治」運動理論是以階級性的批判視角探究個體的意識轉化與社會轉化間的辯證關係。

因此，我所指的「慢政治」定義是：一個體政治意識的生成脈絡，與集體(社群)意識的階級性力量間緩慢而複雜的接合互生，此一接合互生的過程，有著個體與個體或個體與集體間的相互參看與理解，涵容了我／群、自身／他者的差異，來自不同背景與政治歷史的個體於運動社群中相互碰撞、衝突，看似遲滯、反覆、無序的作用中，轉化自身與社會變革的關係得以被行動者搭連起來，「慢政治」既是行動者得以辨識自身的政治性並與他者建立起一推移社會變革的實踐取徑。

基於從實踐中釐清了「政治性」與「慢政治」的意涵，本文將以回觀我的社運歷程，進行三個主題的探究：一是分析我自身參與在工運中不同位置／階段時所理解的政治性及對我所產生的意識生成與轉化的敘事回觀；二是以我所處的運動陣營—工委會到火盟⁵的轉型歷程，反應在台灣自主工會運動與藍綠／統獨勢力分立下的自主工運陣地戰⁶發生了何種的政治影響，我做為此運動轉型(進)階段的主要工作者，如何理解其中的政治作用。

⁵ 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工委會)是台灣政治解嚴後，以自主性對抗國家統合主義及政經結構上的新自由主義的工人運動組織，於1993年正式成立，由七個發起單位所組成的體制外聯盟，首任召集人是鄭村棋，1998年底改由基客工會王耀梓接任；秘書處工作則由女工團結生產線主責，曾在秘書處專、兼任職的人員有陳素香、吳永毅、郭明珠、顧玉玲、李易昆、何燕堂、莊妙慈，我於2003年起到女線工作即專任工委會總幹事一職至今；人民火大行動聯盟(火盟)則是在2005年的777不滿族—人民火大行動後，由運動者及社群中的積極成員共同組成，主要的目標以推動運動社群的政治化為主。

⁶ 葛蘭西指出要進行霸權的轉變，必須要攻佔市民社會的一切陣地進行長期準備，即是在不同的領域中與資產階級政權展開文化與意識型態的鬥爭，才能進一步使霸權轉移。(Gramsci, 1976)

第三個部份相較於前二者仍未能說的太清楚，但卻是在我上了工委會的運動位置後，時常在「介入」藍綠政治鬥爭的運動局勢中，不時感受到內在高漲的「情緒卡住」，如何理解這個「卡住」的情緒。在緊張又沒自信的 2004 年百萬廢票運動中，屬於我一個客家人追探自身政治歷史斷裂的時機已然到來，之後藉著運動社群中未間斷的「人民老大運動」⁷，透過與不同世代／身份的對話，進一步理解台灣特殊政治歷史中「我／我們」的碎片重組意義，讓具「歷史質」(丘延亮，2008)的人民有清晰的面貌。

這三個主題的交錯構連，讓我更意識到我們的社會學習過程已切／撐開了台灣的平民公共領域⁸；這個領域的撐開與「慢政治」的關係可以用葛蘭西界定的市民社會、有機知識份子的培養及他強調在市民社會中搶奪文化領導權的重要性，來一一檢視我們從介入工會、社區、教育及文化等不同領域進行人的工作，就是認知到要鬆解或翻轉市民社會內部存在的壓迫，必須寄託於有工人階級意識的群體，才能擺脫資本主義國家的宰制，建立新的市民社會(黃德北，2009)，我經過長期的實踐體悟到「慢政治」之於人的意識轉化有重要的作用，不同階段的實踐都累積了改變社會的可能。

第二節 「政治性」的生成—16 年的運動回觀

在近一年多來的論文書寫過程中，不時面臨著運動發展上的困頓無方，幾度想放棄惱人的論文行動，認為只要再次全(身)心投入運動應可脫困往前；但，這種想法的出現正反應了另一種逃避的心態，因為在書寫過程中所勾起之種種回憶，痛苦多過愉悅，困惑多過理解，停筆只能暫時不去想，卻無法解決現實運動遇到的困難；這一停停寫寫的過程倒是給自己奪了一個空間，得以藉此與自己過去的經驗對話，與自己的不足與無能共處，這是書寫本身帶給我的收穫，亦即是「政治性」愈發清晰得以出土的過程。

回觀 16 年的運動經歷，我初分成三個軸線與階段以梳理自身「政治性」生成的軌跡，並於之後的篇章中處理其與「慢政治」理論的關聯性，以描述近年來我所屬的運動社群(從工委會到火盟)於工運實踐中逐步走向「政治還給普通人」的階級性公民運動，其何以發生又受到何種客觀侷限？本論文行動既是過去式亦是未來式，最重要的是運動者的論文行動本身即是一試圖脫困前行的現在進行式

⁷ 參考第七章「人民老大運動」，其主旨在探究人民作主的公民權與選舉制度變革的關係。

⁸ 平民公共領域，在此使用哈伯瑪斯於 1990 年對其著作「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的再版序中回應平民公共領域的論點；雖其未直接敘明被「代表型(資產階級)公共領域」排擠的次文化公共領域或某一階級的公共領域，有對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解放作用，但其已從援引 E.P.Thompson 及 G. Lottes (1992) 以英國、法國的社會黨人、憲章黨人的運動中，將下層階級和城市勞動人民的政治動員過程放到一個不同的角度中加以探討的意義 (哈伯瑪斯，2005)，間接認同了平民公共領域的獨立性。

探究。

1.2.1 階段一：勞動意識的生成與社會運動的理解

我從大學畢業後即進入台北縣勞工教育中心工作，那是在民進黨尤清當選縣長後所新設置的勞工教育部門，他任用的中心主任(勞工局臨編專員)鄭村棋，帶著階級運動的理念紮實的做基層勞工教育，我是在他及一群初出社會卻同樣有心於社會運動的工作者中漸漸被影響與改造的新手，對工運毫無所知更不了解政治解嚴前後衝出的台灣自主工運歷史脈絡，在三年多的工作磨練後，對工會自主性政治意涵多了一些認識，也認識了許多在基層蹲點的工會組織者，這是一個思想啟蒙與改變自身認識的階段。

有了一些對社會實踐的認識圖像後，有機會進到中正機場台北航空貨運站工會擔任秘書，把所學所知運用在一個基層工會的反民營化抗爭運動中，從行政庶務的打理到協助工會幹部擬定抗爭策略，從此一步步進入了 90 年代中末期的台灣自主工會運動的脈絡中，一待就是三年半。

1.2.2 階段二：體制「內／外」的實踐路徑與權力辨識

結束工會秘書的工作後，隨即進到台北市勞工局擔任局長的機要秘書，這個位置的轉換對我來說是相當大的挑戰，應付行政體系的繁重工作事小，如何在官僚體制中與不同層級的公務員發展出協同關係才是最難的部份；首先，工運人士進入體制中辦事本就會被放大檢視，除了原有的藍綠政治勢力虎視眈眈的挑毛病外，最需處理的是行政系統中原已慣存的「揣摩上意」心態，我們進入體制花最大心力處理的就是鬆動固有的官場辦事文化，讓勞工局在法權／行政上發揮保障勞工權益的功能，另一則是建立一種「負責任使用權力」的「範型」。

我在行政角色上是局長的機要，勞工局的權力核心者之一，如何從工運中習得的與體制衝撞經驗「轉身」又處於體制內進行制度性改革的嚐試，在上上下下的工作關係中，我磨練出「使用」權力卻不「濫用」權力的自我監律能耐，有效的協助局長推動體制內改革的實踐。確實，因為鄭老師實事求是、劍及履及、不失原則的政治立場，讓我們這些進入體制內工作的運動者得以認真辦事，不受干擾。

在勞工局四年的磨練後，我主動提出要到工委會工作，這是在我工運歷練十年後清楚作的選擇，期待自己能站上打前鋒的位子、扛運動上的責任。有關工委

會在台灣工運發展脈絡的作用位子已有多篇論文描述過，我不再重複，但從 2003 年至今我在工委會期間所發動的運動，卻很少有人觸及，特別是以 04 年的廢票運動起，有意識的「介入」政黨政治的「人民老大運動」，除了王芳萍於其論文第七章以人民老大底邊優先的妓權政治有清楚的著墨外(王芳萍，2009：128)，社運界對此運動的具體內涵知之不多，而我即是該運動的主事者，更應透過對運動的反省進行論證。從 1999 年到勞工局工作，2003 年到工委會至今，從體制內／外的實踐經驗對照後，我更明白為何我對政治與權力的關係會如此敏感。

1.2.3 階段三：階級／客家與族群政治歷史的自我解殖

說是意外，也許是註定的，因為台灣特殊的政治歷史也因為行走在這支「不藍不綠」的社會運動路隊伍中，我，一個有著客家身份及階級運動認同的知識份子「社會人」，對於政黨輪替後愈形被挑起的族群對立、政治鬥爭有難以自處的憤怒感，這個憤怒的情緒一直跟隨著我，直到紅衫軍運動(2006)甚至是 2007 年的首次國會選舉制度改變的參選行動中。

這個客家身份的意義感在我求學階段並沒有什麼特殊性，頂多是感覺到城鄉學習資源的落差，並以此理解自己的不足；在工會工作時也還好，有時遇到客家籍的工人還能有更多的情感交流(如與新光合織工會幹部吳錦明、勞動黨主席羅美文等前輩)；沒想到在我到工委會工作後，因為台灣政黨政治的發展進程，客家人的邊緣族群意識卻愈發清晰，即使自己清楚階級矛盾與這些被反應在族群衝突的意識霸權，是受到政權私慾／藍綠政治集團所操持耍弄的文化壓迫，可是這個認同計畫(奪權政治)的霸權，卻宰制著多數群眾的認識。我因為身負工委會延續階級運動開展的任務，採取主動迎向挑戰藍綠政治的運動策略時，一再經驗到 2000 政黨輪替後社運力量的快速萎縮及政客藉奪權操弄對底層人民的壓制，台灣社會的主要矛盾似乎只剩下族群議題。

2004 年我們發動廢票運動過程中引發了我對立身於台灣社會，行走在運動中卻無以反抗的痛苦感受，無法言說的淤塞擠壓著我，那是什麼？在廢票運動之後，2004 年底我們發起了「人民老大運動」，透過社群對話與反身探究家內的政治歷史，我才有機會從負擔任務的政治位子中向內觀看自己，放置自身於台灣從殖民統治到藍綠二分的族群政治歷史中，一個客家人／無產勞動家庭的出生背景(參考第四章)，及進入亞洲殖民歷史造成的人民移動／流離歷史被我有意識的帶在身上，接起對自身政治歷史無知的斷裂感，這段重新認識自己的探究歷程至今未停。

第三節 問題意識與研究目的

一個社會運動者有能力轉化挫敗、無序的處境，在行動上持續往前是有其一定的社會條件的，如：智識性掌握與理解客觀外在局勢的變動而得以面對、迴轉的能力，但這個能力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在運動中生命狀態被「有機的」來回振盪後，我體認到自身已能在身處混沌、不確定感的同時與此狀態同處又能往前行動，並且在十幾年的運動中得以逐漸辨析自身的政治性，這個能力的增長來自於運動中不斷的被影響、與弱勢者同行的實踐，這個實踐與吳永毅的自傳式論文中提及的「運動始能有機」⁹：一個基進知識份子的自我改造歷程所獲致的結論(吳永毅，2009)相近。但我所指的「運動讓我有機」不只發生在社運的街頭與政治的公共場域，更大一部份的連結來自於我自身「家／夫家」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壓擠回看。因為在運動中，我得以意識生活中內與外交纏的現實壓迫、公與私的相互勾連，切割處理是一時的，終究得能拿起端詳。

其二，我想要嚴肅面對運動實踐中與文化霸權間的鬥爭關係。社會運動在衝撞既存社會體制(如民主化／政黨政治／統治作用)的戰役中，時而前進有所突破，更多時候是無止境的文化壓制與難以撼動結構，尤其是行動者在其中試圖創造條件進行主體意識、階級認同的意識轉化工作，透過不同階段／層次的行動設計與主宰意識對抗，影響行動者的認知，這是一社會變革取徑的陣地戰攻防戰，「慢政治」理論亦與之緊密相關。

上開二個探究子題，反應了我的關切核心，即是對個體政治性生成的主／客觀、內／外在因素的關聯性探討；而這個關切點源自於我在工委會工作期間，對政黨輪替後的藍綠政治鬥爭，造成社會內部人民之間的分裂／對立情境，工委會有意識的「介入」此鬥爭場域中，除了揭露藍綠統治集團對人民造成的壓制性外，人民的政治權力亦因此被剝奪，社運團體如何透過一次又一次的反抗／抵制性行動，以批判／解放性的立場／論述與之對抗，有鬆動體制而發展出討論或面對另一種社會關係的空間嗎？如果沒有，那是為什麼？

在此提問下又引發了我另一層次的探究軸線——運動實踐過程對人的意識轉化發揮了什麼作用？以我所闡述的「慢政治」來看，個體政治性與集體階級性力量接合互生的過程，包涵了三個層次的系統檢視：(1) 集體意識中涵容了個體性

⁹ 吳永毅界定「運動始能有機」是以其自身投入工運實踐的生涯路徑選擇，在集體生活的「實驗性的微觀公共領域」對知識份子自我改造的道德政治和集體實踐歷程提出的結論。在他以對應於工運的「潛／次政治」關懷中，指出「我們重新界定什麼是政治，什麼是運動和運動的有知識份子」，知識份子的有機性是得動態的看待而非由固定社會係來界定的，知識份子在運動中持續的與群眾生活，才能將知識民主化，才能將各種立身的問題(第一線、第二線；誰該在體制內／外…)成為可協商的選擇，才能發展深刻的互為主體的結盟。(吳永毅，2009)

的分殊差異，得在運動中被尊重與對待的，而意識此差異存在的「政治性」即是慢政治與運動關係接合的必要前提。(2)運動者的主觀能動性受到客觀運動條件的擠壓或反挫，如何與集體施為間進行對話，放置「自身」於集體中的意義，得由行動者就其所處階級位子／處遇中回身探索。(3)朝向階級性力量聚合的整編過程中，「有機知識份子」所感知到的不足／不堪即是與承擔社會變革所起的作用性有關，得與集體中的我／群／他者間進行參照與回觀，「意識」的生成與轉化在其中得以開展。

因此，本文的探究主軸將回觀我個人參與社運十六年的歷程，及政黨輪替後迄今的「工委會」、「人民火大行動聯盟」在介入藍綠政治場域中所推動的政治行動，就文化霸權意識型態鬥爭及對行動者意識轉化、集體力量的聚合等進行探究，「慢政治」的實踐取徑從家內到市民社會間如何作用在我及我所參與的運動歷程中。

第四節 章節安排

本文將分三個篇章處理上該三個層次的關聯性，在第一篇是我的反身探究，從社運實踐中重新認識自己，鋪陳我的不同運動階段，「政治性」如何出土的敘事回觀；第二章以我的工運位置轉變，從自主工運的土壤中提取我的運動意識生成的累積與變化。以台北縣勞工教育中心時，我接觸到大量的關廠工人及協助他們的抗爭，認識到與我同齡的女工，展開了辨識「我／我們」的「差異」處境，之後在進到貨運站工會擔任秘書的階段，以反民營化運動歷程檢視一個國營工會由保守走向自主化的過程，並引發我回頭理解最終的「錢與權」的交換，從當時的運動能量侷限性重新理解這個結果。

第三章則以我對體制內改革的看法，隨著鄭村棋老師進到台北市政府勞工局後，運動者進體制內以社會變革的實踐路線嘗試改革，其中在提升勞工意識及鬆動公務員自我防衛的保守性改革中，我做為權力核心者之一，清楚經驗到權力的兩面性，在過程中有意識的使用權力辦事，卻不被權力所腐蝕，「負責任使用權力」的意識在實踐中被我提取出來。另外，結束四年的體制內工作後，我決定到工委會，上到運動的前線，練習扛起工委會路線的政治責任。

第四章回觀女性運動者的家庭經驗，則是在與夏林清老師進行論文討論，面對我的政治性探究時，女性運動者與一般人有著相同處境的婚姻、家庭等經驗，無法被切割卻極少在運動中被我拿起來仔細咀嚼，特別我的政治性很大一部份是在運動中被喚起的，而其源頭與我選擇一個搞運動的同志結婚、與他的家庭成員共同生活，從兩個家庭經驗的對照中，我對底層家庭內所承載的社會壓擠，有更

深的體悟，也對行走在階級運動所為何事，有紮實的連結感，十幾年看似沈重的心路歷程，其實與多數底層人民共享搏鬥的快感。

第二篇的軸線是以探究工委會與政黨政治交手的運動紀實，稱〈紀實〉是因為我在一個代表群體的位置上行動，對於工委會長期實踐「不藍不綠」的運動自主路線，有意識的「介入」一場場的藍綠政治鬥爭，對組織、參與者都發生了重要的影響，特別在 2003 年廢票運動後，我們提出「走自己的路」的運動期許，面向一般的公民群眾，從工會、勞動關係的鬥爭場域中進入一般人的生活經驗中，並以公民的政治權力解構各式結構性壓迫與人的處境自覺等，以「自主性」觀察我們在政黨輪替後發動的幾波政治行動，因為條件及能力有限只能先以紀實的形式記錄。第五章起，我以工運與政黨政治的關係變化為軸線，檢視工委會在統獨／藍綠及階級主張上的變化歷程，從解嚴後主張「等距外交、等比結盟」，相對於其它工運團體的政治選擇，工委會如何發展工運的自主性力量，而在政黨輪替後，工運在政經情勢及藍綠挾擊中被高度邊緣化，工委會於 2003 年提出「走自己的路」的立場，該如何看待此轉進的意義。透過與政黨關係變化的歷程可以看出工委會從 1992 年起採取「工人立法」運動，在基層工會進行意識啓蒙教育，每年藉「秋鬥」抗爭揭示對資產階級政權及勞動剝削體制的批判，在快速進行的自主工運鬥爭脈絡中，行動者必然與其所處的階級位置產生相應的再理解過程，「慢政治」就是「快鬥爭」下的產物，它代表了階級性的鬥爭讓行動者在運動的愈趨尖銳化中無法迴避面對自身的政治性，工委會的轉型(／進)浮現出的是我們這支運動陣營思索政治前景的重要註腳。

第六章則鎖定 2004 年總統大選時，工委會推動百萬廢票運動，為對峙藍綠政黨以族群認同進行的意識操控，我們提出「罷免藍綠，走自己的路」的政治主張，以投票行為來突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間「主僕錯置」的「偽民主」體制論戰，期間也邀請了工運圈進行策略／立場間的辯論高峰會，從不同的政黨傾向中辨析廢票運動與階級政治間的發展關係；而這些運動過程意外觸發我的客家族群意識，並開啓了我對階級／族群政治的重新認識與再建構過程(部份內文在第四章)。第七章以廢票運動後所撐開的不藍不綠政治空間，我們展開了一系列的「藉選舉，搞組織」的嘗試，從 2004 年底至 2008 年初，工委會以「人民老大」概念參與了幾次選舉行動，這些行動除了增加運動者對主流政治領域的摸索外，大部份思考的主軸是放在工委會找出路的目標上，藉由參選過程摸索出個體政治意識轉變與集體階級力量得以相融共生的方法，

第三篇的主軸是我透過自身的運動實踐及參與在不同民間力量所推進的公民政治行動中，對「慢政治」運動取徑的再回觀，我從 2004 年的藍軍試圖以二次政黨輪替來重新執政卻因二顆子彈而失利，百萬人民上街要真相、藍綠政治衝突不斷的社會行動中，以觀察者的身份進場，對「藍軍」群眾的刻板印象有了改

觀；2006年9月百萬紅衫軍反貪腐倒扁運動，我們高舉「不放棄暴力」的旗幟進場，最後造成組織內部的隱性分裂¹⁰，但參與在內外交戰的過程，我的公民主體意識卻在行動中被辨析出來，映照著我所定義的「政治性」與「慢政治」接合互生的關係；這兩波有關民間力量與政權交手的過程，對我辨析自己行走的運動路徑得以釐清，同時也增長了我對藍綠政黨以社會性議題進行的政治動員的觀察能力，其與階級運動間的差異有了區辨理解的視架，而不致慌了手腳。

「慢政治」的運動視框是運動者意覺自身政治性與參與社會變革的相互作用過程，當自主性的實踐脈絡被「有機」的結合在生活中、社會行動中時，人的狀態可以是清澈而意志堅定的，只是其過程何其漫長，得耐得住孤單與挫折。其實，自主性社運有清楚的方向卻受限於歷史情境與組織動能的不足，行動者必須有意識的長期投入，我走在台灣左翼工運的一條實踐取徑中，與不同領域的運動者的經驗或有不同，關注的軸線略有差異，但透過我的敘事文本希望可以找到接連的引線，即是對立身、來處的反省，從追探自身「主體性」與「政治性」的過程中，結合社會實踐以鬆解壓制的政治社會結叢，朝向階級性力量接合相生的未來發展。

¹⁰ 參考第八章公民政治性初探，紅衫軍之役一火大行動之反省一節。

第一篇：反身性探究—解讀自身的政治歷史

第二章 一個運動者的生成與改變

本章主要描述我從大學畢業後投入工運的 16 年間，一個知識份子在社會運動中如何被改造的歷程。台灣的無產階級運動雖未如資產階級民主化進程得以取得政權並實踐不一樣的道路，但在顛簸難行的道路上許多投身其中的青年確實發生了自我改造的過程，運動前輩吳永毅的自傳論文「運動在他方：一個基進知識份子的工運自傳」，將其投身工運前後至九〇年代末台灣的社會運動如何改造自身的豐厚實踐歷程得以被辨析，同時他強調知識份子的有機是一運動中動態改變的概念（吳永毅，2009）。我認同吳永毅定性的「運動始能有機」的認識論，也清楚知識份子在層層社會向上分流的相對優越位置，然而，在 16 年的社運生涯與集體生活的實踐中，我與許多的弱勢者投身於工人運動中，在組織的培養下成為運動者，回想十六年來走過的歷程有些是生命的偶然，非刻意的選擇，有些則是在「運動」中與他人生命經驗碰撞後的覺知。

第一節 引線：親密關係與意識啟蒙

如果當年沒有與父親的賭氣北上找男友幫忙，1992 年我應該不是留在家鄉做一個輕閒的文職人員就是到美國留學與七姐一同在美國打拼求生存，然而，事實上，兩者都沒有發生，我走上了另一條路！

與父親賭氣而北上找工作自立求生，表面上是留學之路遙不可及（經濟方面的因素），及加上對父親癌症纏身的苦痛無法面對，事實上還有一個內心的衝動當時沒有來得及「理解」，那就是「到底我要做一個什麼樣的人？」。相信多數人在初出社會時都有這樣的疑惑，求職受挫、被評價或是學無致用，自我懷疑起來，我也不例外；但有一點我是清楚的，就是我不想待在家鄉做一個文職人員或就此嫁人生子…。這個簡單的念頭，為何得靠賭氣北上，離開父親／家鄉才能解釋當時的衝動呢？其實，與我交的男友有極大的關係。

大學二年級我認識了男友柯逸民，當時他是輔大新聞社的成員，我則是參加古典吉他社，他同時參加二個社團，彈著拿手的曲子，我深深被他的樂聲神韻所迷戀，暗戀了他一年才敢表露心曲，而他一開始並不太搭理我，之後也就無緣譜續曲，在暗戀的一年中也是我意識有所啟蒙的轉始點。

我始終覺得柯逸民這個男的與我班上的男同學很不一樣，我的同學們多少帶著經商致富的挑戰性格（企管系的氛圍有關），而我的個性及作風在班上又挺強

勢的，經常在系上感到格格不入，與其它同學不一樣的是我的商科成績平平，最感興趣的卻是如國父思想等課程，可以在課上與老師辯論時政、討教社會問題等，有機會認識柯逸民，又加上當時政治氣氛的感染（蔣經國宣佈解嚴、六四事件、野百合等），老跟著柯逸民去參加一些學生會的座談、去學運的秘密場子，讓我覺得一個大學生就應該憂國憂民，做有用的人，不是賺很多的錢，這算是我的政治啓蒙點。

大學畢業後我因為照顧父親的關係而短暫回家鄉住了一年，那一年的自己面臨許多的過程，一是與家庭緊密生活的適應（我從高中就離家求學到大學一共 8 年），一是自己初出社會到底要做什麼？履歷表寄了不少，面試也去了幾次，心裡也沒有放棄有機會出國深造，與男友關係也面臨似斷還存的猶豫（柯逸民自己的狀態也不好），記得在家中住的那段時間柯逸民來過兩次，一次是與冷尚書來家中看我父親，那是柯逸民第一次來我家，父親對他極不滿意，知道他在搞一些有的沒的，更覺得這些人是社會的造反派，不一會功夫把他們打發走了，那次之後父親對我更加嚴格要求，不希望我再上台北，就在家鄉的裕隆公司找工作就好，而我的內心卻不這麼想，唯一讓我覺得該住在家裡的原因是可以就近照顧父親，分攤母親的勞動。

回到家鄉後，有一次接到柯逸民來電說是在新竹有一個小聚會，可以帶朋友去，他邀我到新竹一趟，我也不知那是幹啥的，想辦法騙父親說要去找新竹的同學（我高中在新竹念書）就去赴約了；一到那裡才見到柯逸民提過的工作室成員，女的多男的少，在過程中又分小組又是談話，那叫約會啊！不過我印象中對泡屁／佳君的談話特別深刻，泡屁是因為我在大學就認識他（柯逸民的死黨），他在小組中挑戰我企管知識沒有讀通，我很不以為然；佳君則是談著女性投入運動的某種姿態，讓我覺得女性自主就該如此（義無反顧之類的），過程中似乎也與夏林清老師談過話，好像還問她走運動這條路是不是很辛苦，對老鄭就印象模糊，只覺得有個影子在那裡，男性的出現我沒有太在意，倒是我注意到一個短人留著鬍子的男性—林吉茂（基層教師的組織者），他是唯一讓我感到自在的人（相對於泡屁的咄咄逼人），在休息時還主動來跟我說「很高興認識你」。

那次在新竹的聚會是我與工作室這個組織接觸的第一次，也是更認識柯逸民身上那種頹廢卻又悵然的虛無是什麼，我現在會用政治性來解讀，但當時我自己陷在混亂與無措的生命過程沒多去想他，回家之後心理老想起這群怪異的人還有女性要更自主的內心呼喊。

1994 年在父親過世前一年我與柯逸民結婚，走上了工運這條路，也走進另一個家庭，15 年的婚姻關係走的也不輕鬆，因為同在運動上得各自迎上不同的位置去衝刺打滾，挫折與失落時而有之，加上公婆經常因為經濟上的困頓而爭吵

不休，家中成員的關係距離時遠時近，1999 年我們的孩子出生，有了這個開心果家中氣氛稍有轉變，也讓公婆有了一些希望的出口，雖然公婆對我們搞運動會沒飯吃常有掛念，但因為選擇了運動同志為親密伴侶，這一路面對家庭壓力的承擔可以接力換手，並且因為有運動集體的協同支持，我們與運動的關係才能走下去！

第二節 看見差異：實踐中認識「自己」

1992 年五月一日，工運界為顏坤泉入獄事件，在高雄勞工公園舉辦「光榮入獄」的遊行活動，那是我第一次站在工人遊行的隊伍中，看著顏坤泉直挺挺的站上指揮車發表入獄宣言，他太太在一旁，滿臉是淚都快站不住了，當時有一股衝動想去攙扶她，給她一點支持，那時的我對此情此景同情多過對各方社運派系與政治情勢的理解¹¹。

2.2.1 對勞動關係的另類解讀

1992 年 2 月我離開家鄉北上找工作，因為柯逸民的關係引介到鄭村棋老師的部門工作，在經過電話面試後(柯逸民要我自己打電話給老鄭)我在 3 月份進到台北縣勞工教育工作¹²，開始了我對台灣勞工／工會這個領域的認識，也進入理解工運各派別與政黨政治的鬥爭歷史脈絡，因為有鄭村棋的親自操作，得以在勞教中心接觸到台北縣較自主的工會幹部，學習到從工人角度看法令、勞資關係，這與我在大學受到的教育不同，就以「工資」的概念來說，記得有一次勞教中心要找大學生做問卷調查(勞工家庭生計調查)，當時這個計畫是由夏林清老師督導，她要我先提出一份工作計畫，我很直覺的用人事成本的概念抓預算及設計管理規章，沒想到反被夏老師教訓了一番，當時不覺得有什麼不對，吃人家頭路本就該被計價與管控，夏老師親自操作與實習工讀生之間的督導關係，不是從一份問卷值多少錢談起，而是告訴大家做這個計畫的目的及與每個人的關係如何，我也在其中參與了訪調工作，受他的督導才有機會細緻理解每一個受訪工人家庭背後的擔子。

¹¹ 顏坤泉原是南亞公司工人，於 1987 年主導南亞工會改造，而被王永慶開除(何雪影，1992：64)，之後他成為激進的全職工運份子，協助高雄加工區多起關廠抗爭，被李登輝政府提報「工運流氓」而判刑一年十個月，在當時自主工運初階段的路線競爭中，他的對抗國家機器的激進性受到各方勢力的拉攏。工作室與他以合作多年，1991 年起派駐王芳萍於工聯會工作並協助編輯〈工聯月刊〉；1992 年顏坤泉選擇用五一遊行光榮入獄，各方人馬齊聚高雄街頭，他出獄後決定捨基層經營轉選舉路線，並向勞動黨尋找資源，於 1994 年 12 月代表勞動黨參與高雄小港區市議員，以 1563 票落選，當時工作室分析此時參選對高雄的自主工運發展不利，不支持也未投入其選舉。(王芳萍，2009：31)

¹² 台北縣勞工局勞工教育中心是民進黨籍縣長尤清上任後的臨編單位，主要負責對全縣 300 多家工會提供勞動法令的教育工作，尤縣長找了鄭村棋當中心負責人(當時的勞工局長是郭吉仁—曾任勞支會會長、自主工聯執行長)，鄭村棋找了三件工作室成員進入中心做組織工作，並與工作室的其它組織者協助台北縣的勞工組織工會、擔任勞資爭議的輔佐人等。

新手上路對工會確實無知，對勞教中心的「定位」更是不理解，經過半年的摸索後我已經知道公部門各式行政事務處理的流程，同時在鄭村棋的指導與言談中了解勞教中心的運動性，即是做為鬆動黨國統合體制對工會控制¹³的教育界面，提供不同觀點的勞教內涵，讓工會幹部得以在運動上、政治上自主一些；因此，挾著公部門的資源，我們辦了大量的勞工教育課程，從女性幹部與婚姻家庭、新人工會幹部、運輸業產業結構調整到關廠議題、勞動三法等解析，我自己對法令的解析能力就是在過程中聽工會幹部如何數落管理者的壓榨、運動組織者介入勞資抗爭的實戰經驗中一步步學來的。

2.2.2 「抗爭是最好的勞工教育」

除了在勞教中心快速學到勞動法令的保守性與不足外，下班後有時間就會與同事一起到工作室開會，參與「女工團結生產線」（以下簡稱女線）的讀書會，這個女線是由資深運動者陳素香領軍，我的同事們都是成員，我則是隨班附讀並被組織客觀檢核的關係，在過程中我的工作同事王秋月、龔尤倩及何燕堂不時的會讓我知道工運上的一些變化，但我最好奇的是王秋月。

秋月是從台東北上唸書的建教合作生，在進入新光紡織工廠工作後發生關廠抗爭，她帶著原鄉的姐妹們奮戰到最後，抗爭結束後輾轉一年加入了鄭村棋老師所創立的團體力工作室工作，並被調派到勞教中心工作，我初到勞教中心時因為基本文書及電腦能力略強，常常與她相互補位工作，也發展了姐妹情誼（我比她大個三歲），有一次她問我想不想成為組織者，一同為工運打拼，她堅定的神情我當時是被感動的，但我還是猶豫，因為從北上後暫居勞教中心，只把這個過程常作是階段性的工作，雖然父親要我報考高普考一試，但我卻沒有下決心。後來，會決定加入工作室及試著搞運動，確實是被秋月及接觸到台北縣境更多的關廠爭議案看到與我年紀相仿（當時只有 20 出頭歲）卻已在工廠做了十幾年的女工後，才有了不一樣的念頭，「為何我可以讀書，她們卻只能到工廠作女工，而且…」？

1992 年夏天「女線」阿香、尤倩、秋月及我共同協助嘉隆女工組工會，這群衝出來要求資遣費、加班費、計件工資等的女工因為資方無預警關廠，瞞著工人把機器設備運到印尼，引發這群女工的不滿而到勞工局去申訴，剛好阿香在勞工局爭議課輔佐人櫃檯輪值，接觸到這群女工，我們才有機會協助她們抗爭；我雖然也參與其中卻幫不上太多忙，頂多是與他們聊聊天，知道他們在想什麼，讓我非常驚訝的是她們年紀跟我差不多卻已經在嘉隆成衣廠作了十年以上，有些人是

¹³ 每次代表公部門到工會開大會或受邀參與工會理事會，不時會遇到「某某生產事業黨部」的官員也在場的情況，一開始以為他們是事業單位的代表，後來才知道是國民黨的黨部派來監視工會的控制系統之一，尤其是在大型工會或重要產業的工會，如：電子業、塑化工業的工會。

國小畢業就進工廠從童工做起，大部份都是從南部上來的，對我來說這個「差異」反應的是我如何看待自己，我們家十個姐妹兄弟，只有大姐是國小畢業後就進工廠，她大我二十歲，其它的都念到高中／職以上，為什麼這些年紀與我差不多女工竟也無法繼續就學而不得不隨親友北上工作？他們是自願的嗎？

在籌組工會及抗爭期間我們像姐妹般的無話不談，她們一直說好羨慕我可以念到大學，她們也想再去進修，其中也有一、二位女工利用晚上時間去念高職補校，未來準備找好一點的文職工作；「關廠」對她們不啻是拆解了另一個家庭般的痛苦，她們大部份人都住在宿舍，也都還沒有結婚，從十幾歲就在埋首在縫衣機前從早坐到晚，拼件數賺血汗錢，她們細數公司的苛刻，明明越車越快，薪水卻不增反減，都是單價在搞鬼，與管理者理論還被威脅說不幹就走路，他們說只會車衣服出去要找工作難，學歷又低只好忍氣和吞聲，沒想到老板關廠就關廠，一點都不留才會想到出一口氣，與老板討回血汗錢！

經過女線及自主工聯¹⁴、勞工陣線等團體的協助後，嘉隆女工抗爭把 90 年代製造業資本外移、關廠的問題打上檯面，女工們怨的是遇到惡老板，社會上的理解是台灣勞工太貴，產業升級不少，資本往廉價勞動市去出走是結構使然，運動者能做的是揭露經濟發展犧牲的是工人的權益，而我則在抗爭隊伍中重新認識了「自己」。

從顏坤泉入獄遊行到嘉隆女工關廠抗爭，我也對台灣經濟發展對應到勞動者處境的結構性壓迫多了一些認識，顏坤泉是因為 1989 年跳出來協助安強十全美鞋廠關廠抗爭而被判刑、入獄，在解嚴後的台灣工運界是件大事(王芳萍，2009)；而 1992 年的嘉隆女工抗爭則是對應於製造業為尋找更廉價勞動力而遷移到東南亞，雖然我沒有親自參與到安強十全美的關廠抗爭中，但在嘉隆一役我確實看到產業結構調整對台灣女工帶來的壓迫，賴以為生的飯碗被砸了、生涯發展的夢碎了，最寶貴的求學青春歲月都消磨在工廠中，雖然嘉隆女工在抗爭後期遇到老頭家還是不禁悲從中來、相擁而泣，對於如父親般的老板說了聲「謝謝」，但因為與他們打過這一仗，影響了我這個尚未決定要走什麼路的知識份子，確實「抗爭是最好的勞工教育」，對工人、對參與其中的人，都是。

¹⁴ 1988 年五一，全國自主勞工聯盟成立，當時主要聯盟背後主要的力量是台灣勞工運動支援會，該會的前身是台灣勞工法律支援會於 1984 年成立，其宗旨是：增進勞工尊嚴、團結勞工、協助勞工爭取自己的權利，由知識份子及律師、學者所組成；在自主工聯成立後，於 1988 年 7 月改名為台灣勞工運動支援會。自主工聯在 1992 年協助嘉隆女工關廠抗爭時，勞支會的力量已名存實轉由另一團體—勞工陣線具體承接其政治意識，即是運動團體間以統／獨、不統不獨及基層或選舉路線的優先性，與民進黨的關係等區辨了團體間的路線選則與差異。(何雪影，1992；林子文，2004；吳永毅，2009)

2.2.3 與政策交鋒——在貨運站工會初試啼聲

老鄭常說：「交給你們一個盤，看會不會被你們搞垮？！」

即使在工會當秘書也在老鄭所指的範圍內，大家總是戰戰兢兢的在基層工會拼命固盤，因為解嚴後的自主工運力量得靠眾多的組織者共同編織才能有所突破，這是我到基層工會後最主要的認知。

90年代中後期許多工作室的組織者都陸續進到不同產業的工會擔任會務人員¹⁵，我在1995年3月也到了中正機場台北航空貨運站工會擔任秘書，該工會原本的秘書都是向站方借調不是外聘的，當工會幹部警覺到機場民營化政策已勢不可擋後，主動向鄭村棋老師要人，當時鄭老師身兼勞教中心主任及工委會召集人，他問我想不想到工會去磨練，這個詢問對我而言是重要的，一是經過三年的勞教中心訓練，是得找一個基地自我挑戰一番，從旁觀／協助的政府代表身份走向實際的組織運動中。

2.2.3.1 驚險中打掉 BOT

貨運站工會面對的危機不小，主要是因為1994年連戰擔任行政院長時提出「亞太營運中心」¹⁶計畫，準備打造一「航空貨運轉運中心」，其中公營貨運站將率先以民營化方式被整併入國內首家整合型航空貨運業中，而民營化的方式是以國內尚無任何實作經驗的BOT¹⁷方式進行(1984年的凱悅飯店是從0開始，不是公營轉民營的模式)。我3月份到工會工作，7月就遇到BOT的政策，一時間得生出挑戰政策的運動策略又得與工會原有的保守性格磨合(工會亦有公營體制的官僚性質)，硬著頭皮打仗，本著在工作室集體中認識到的民營化政策分析，

¹⁵ 我在勞教中心工作三年半，期間我的同事龔尤倩決定到基隆台聯貨櫃工會、王秋月到東亞運輸工會，之後晚我半年進入的卓玉梅也決定到中國時報工會；我在1995年3月到中正機場台北航空貨運站工會，當時在桃園地區的組織者有中正機場工會聯誼會董榮福、復興空廚工會的陳怡蘋、桃園勞工教室周祝滿及在新光合纖工會擔任工會幹部的吳錦明、桃勤工會幹部劉自強、希望職工中心柯逸民等人。

¹⁶ 亞太營運中心概念最早是由日本經濟學者大前研一在1993年間提出的，當時的行政院長是連戰、經濟部長是蕭萬長採納其想法，將「推動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作為國民黨接下來幾年的經濟政策主軸與口號。(維基百科)；而國民黨的財經智庫對「亞太營運中心計畫」的研擬則是在民國七十一年台大薛琦教授及理律法律事務所徐小波律師共同孕育的，民國八十三年經前經建會蕭萬長主委請麥肯錫顧問公司深入研究，並在民國八十四年一月行政院院會正式核定通過。(何俊輝，1999)。「亞太營運中心計畫」最主要的精神就是市場自由化，鬆綁法令、吸引外資以台灣做為企業營運總部，經過評估之後，政府提出了製造中心、海運轉運中心、航空轉運中心、金融中心、電信中心、媒體中心等；而航空轉運中心是以貨運站民營化為重要環結。

¹⁷ 「民間興建營運後轉移模式」(BOT) 即 Build (興建)、Operate (營運) 以及 Transfer (轉移) 三個單字的縮寫，意指將政府所規劃的工程交由民間投資興建並經營一段時間後，再由政府回收經營；BOT與貨運站的公營移轉民營模式的差別在於，貨運站已是民航局興建、經營多年的公營棧設施的行政機關，非屬公司型態，從移轉民營的過程是跳過公司化程序，直接把場棧設施、特許經營一併交予民間，引起貨運站工會及其它類似公營機構員工會的不滿與恐慌，如：機場過境旅館的員工。

與當時有台汽、中華電信民營化經驗的淑蘭、妙慈、醒之等研議 BOT 的特殊性，試著在反民營化運動中拉出對抗性的工會論述，另一頭又與在機場工會聯合會的董貓、怡蘋、阿滿等人分析此役對機場工會的影響。

我做為主要的工作者，還得在工會內部試著把幹部及會員的狀態拉到政策性對話的層次，不要被支持公司派的意見阻擾了抗爭的可能性，只在補償金的議題上打轉；不過，這場看似單純的反民營化戰役，內涵卻極其複雜，光以組織者站那一邊、如何不捲入派系鬥爭而得以推動基層往前，就得想辦法與幹部發展協同關係，讓幹部們上位子，在我到工會的第一年除了邊打 BOT 邊調整作戰隊伍外，還得進行密集的會員勞教，這部份當時都請鄭村棋老師介入協助，在 1996 年初工會硬是透過政策辯論與會員抗爭把貨運站的 BOT 政策打掉，代價則是工會保守派選擇退出工會，另組自救會名義抵制工會的運作。

要說工會的自主化與運動化，貨運站工會的體質應屬配合型與體制內改革的溫和性工會，但 BOT 這一仗在工運組織的介入中(以機場工會聯誼會、工委會為名，鄭老師領銜的工作室為實)，來自基層的抵抗性與自主性使得工會得以在政策上與官(資)方對幹，結構性的籌碼就是機場運作不能發生意外，航空貨運站更是在人貨運輸流程中的樞紐位子，工會深諳此點，以噙聲威脅就可取得一些談判的空間，只是敢不敢／要不要付出此代價而已。

2.2.3.2 基層動起來，工會取得政策發言權

「能談的幹嘛用打的？不打能保住工作嗎？」一連十場次的會員勞教，老鄭總是直指核心要會員面對失去工作後，未來如何盤算？這場反民營化之役要付出多少代價才能贏？即使會輸，要不要打？能引進我在這個外聘秘書(組織者)及鄭老師的參與(顧問)，主要是危機已然形成及工會的鷹派勢力聯手推薦(曾榮祥、鄭金龍、李崇瑋等人)，在工會面對官(資)方的立場上：鴿派是以取得代言人的角色，保障會員最基本的權益(如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件的優惠條件)；鷹派則不放棄打掉民營化政策，在路線上朝向整合出一國營的航空貨運業者，就實力來論，敢付出代價或許鷹派的路線可以實現，但現實上該兩種路線間都深知最終妥協點何在，只有我(加一些會員)還天真的以為有一天我們能做到機場罷工、逼官方退讓。

這個「相信」反應了我當時的單純，也是因為有這個單純才讓我敢與政策對峙／與反對派拉扯不休(潛在的張力是鄭村棋工委會路線的激進性)，這是個被局勢挾著跑，不反擊就被決定命運的「介入」姿態，硬是靠著動員基層及挑戰政策，工會才得以在交通部、民航局及經建會中取得發言位子，最終獲得談判的空間。在三年密集的抗爭談判中我成了工會要的策略操盤手，這個位子本不應由會務人

員擔任，但在基本能力及投身運動的緊密關係中，受到工會幹部的信任，也補充了工會幹部的不足，而我這種外來的運動者與會員間沒有利害關係上的牽扯，立場相對清晰，可以在關鍵時刻發揮影響力(鄭老師的角色亦同)，只是這種運動性極易被反對派扣上帽子，把我們說成是有心份子，到工會搞破壞(典型的抹黑說法)，因此在三年間造成貨運站工會二次的分裂與改組。

2.2.3.3 反民營化戰役，工會第一次分裂

首次是因為 BOT 案，1995 年 7 月某天，工會發動二台遊覽車到民航局抗議，過程中工會幹部進到民航局與局長交涉，場外則由我主抓，這場動員的發動到結束不過短短三天，當時的工會主事者還是鴿派在掌控，更是被鷹派架上場去談判，而我初到工會更覺得機不可失而勤跑倉庫動員，此舉引發鴿派幹部的不滿，在行動結束當天下午 3 點工會召開理事會檢討此事，沒想到鴿派常務理事未出席，只叫另一位在場的幹部代為發言，表示他立即辭去常務理事一職，一時全場嘩然，另一位幹部則提案要求檢討秘書做的文宣…等，那是我第一次被點名檢討，確實當天的文宣沒有經過幹部認可就發出去，讓該名常務理事被資方數落了一頓，會後聽其它幹部說在民航局談判後，該名常就在男廁被經理教訓了一頓，才會緊急要求大家開會，但大家都沒想到他頂不住壓力，動了辭去常務的念頭。

另一次的分裂原因就更為複雜，連我都被傷到。

起因是打完 BOT 後，交通部不死心一硬是把 BOT 轉為三種選項(公司化—民營化、OT、員工自營)交由中興大學的柯三吉教授團隊進行研究，政府不堅持特定的民營化型態；面對這個更狡滑的策略，工會只得再找鄭老師討論，是另請一位學者研究與之相抗，還是由工會自己來想對策，在資源不足的情況下，工會決定自己搞，進行密集的會員勞教，一方面召開大會籌募抗爭基金，一方面決定衝撞體制要求維持公營；這一拖又與柯三吉團隊及交通部、民航局交手二年多，過程中政府不時把貨運站的場棧切割給外商，以交換華航、長榮的航權，政府一會兒放出美商 UPS 及聯邦快遞將捨中正機場改到菲律賓蘇比克灣設點，民航局藉此批評工會自私不顧國家利益，一會兒又說爲了取得競爭優勢，硬是把貨運站的場棧撥給 UPS 使用，以交換華航、長榮在日本的航點，我當時沒想到一個貨運站的民營化政策牽連到的是政府在經濟佈局上的「結點」，難怪我們的仗打不完。

在幾經折騰後，最後柯三吉團隊提出的方案是貨運站採 LDO(出租、改建、營運)方式民營，換湯不換藥就是 BOT 的變形而已，對此政策確定後，工會相對也容易擬定策略，記得在辦完場棧分割給 UPS 的抗爭行動後，工會擬出了中、長期的抗爭方案「拒絕加班」¹⁸，界於罷工與怠工之間。

¹⁸ 拒絕加班的抗爭形式，其實是順法抗爭，依勞基法規定正常工時以外的加班應取得工人的同

要做出這個決定不是容易的，記得 1997 年初工會準備醞釀發動拒絕加班的行動，老鄭要我提出總結報告及我對此戰役的看法，一開始我支吾其詞沒有把握，不敢講出真實的感受，被老鄭批了一頓；後來老鄭要我下周再來報告一次，結果我直接就說「…貨運站這場打不掉民營化，就是”錢換權”的性質，敢狠打就會拿到高價，不打就是任人宰割。」，結果老鄭說：「對呀，我看也是，為何不敢面對這個結果？要不要打？」

2.2.3.4 打硬仗，工會第二次分裂

「養兵千日，用在一時」，在 1997 年農曆年前三天，工會發動了無預警的不加班行動，引發交通部、民航局、航警局的各方關注，這個行動持續了二天，會員的狀態興奮中帶有焦慮，但持續下去的動力是強的，可是，撐了二天到第三天一早民航局長張國政就帶著貨運站官員及媒體到工會辦公室，一進門就大罵說：「如果今天再搞，我就調軍隊來接手，你們看著辦…」。工會幹部一時間沒有回應，也沒多交談就趕忙到倉庫去了。而地方上的各種力量也擾和進來了，當天下午三點工會常務理事們開會，個個壓力超大、沈重不堪，「要不要再幹一天？」曾榮祥問道，只見其它三位幹部(二位常務、一位常監)已不敢再試那條紅線，桃園區的五大立委(朱鳳芝、邱垂貞、彭紹謹、賴來焜、鄭寶清)也紛紛到工會勸阻我們，表示他們一定會聯合監督交通部，員工權益絕對有保障，常務理事們於當天下午五時做出決定，提出三個訴求¹⁹後宣佈「為配合年關出貨的壓力，顧及業者權益，工會抗爭行動暫定」。

隔天一早在五大立委的陪同下工會召開記者會，整個抗爭行動到此畫下句點。這個結果我有些意外，因為整個抗爭過程，我們已盡量不找民代介入，想靠基層力量打掉政策，但事實上一直有幹部私下找立委協助，工會的第二次分裂也從這裡而起。

在交通部民航局確定了貨運站採取 LDO 方式民營化後，工會一年內就召開了三次會員代表大會，並提出全台最高的補償金作為談判的條件²⁰，一是咬住其

意，貨運站配合航班作業採 24 小時三班制，正常班是早上八時到下午四時，大部份工人都有機會加班到晚上八時(人力不足及作業型態)，小夜及大夜班人力本來就不多；一旦遇到旺季如：聖誕節、春節等正常班人員更是得加班到十時左右。1997 年初工會決定在春節前以「拒絕加班」進行抗爭，算是激進的手法，工會幹部承受的壓力來自官方、業界及工會的反對派。

¹⁹ 三點訴求是：反對 LDO 的民營化模式、公務員資格喪失的賠償、員工工作權保障。在立場上不再堅持維持公營，只以保障員工工作權為基本訴求。

²⁰ 當時政府只以參照「公營事業移轉民移條例」的內容與工會談判，但貨運站連依據該法的資格都有爭議，而工會也認為 LDO 不是公營轉民營，應另立新法或於招標書中明定標廠商應保障員工工作權及勞動條件不變等；工會要求與貨運站先簽定團體協約並於招標書中載明移轉後得標廠商得同意換約承接所有條件，工會以此策略進行會員的教育及抗爭的準備。

特考取得的公務員身份喪失政府應予賠償，二來是工會的策略是政府要民營化，就得拿錢來換，不然就搞抗爭；工會的底牌已出，就是「錢換權」。但這的策略仍得有作戰的準備，只是經過之前一役的壓力與心理負擔後，有些幹部已意志鬆動了，才會更仰賴立委們的居間協調，而地方上也不時傳出某位立委早已介入其中的風聲。

工會的第二次分裂就是在 1998 年初工會與資方開完會後，有二位幹部沒有進工會直接開車去找邱垂貞立委，把協商破裂的情況向他報告，好巧不巧，他們在服務處被某位會員撞見，直接到工會告訴我們，當場南部的工會幹部李崇瑋建議應直接去找邱委員查證，並了解他們到底談了什麼；果然，我們一到邱委員辦公室，邱說該二位幹部剛走，他也知道了工會的態度，他個人只是了解，不介入勞勞之間的紛爭；這對工會內部來說是不可容許的舉動，而其中一位常務理事是工會中最勤走基層的主力，如何處理成為棘手的難題。

當天下班後，我耐不住低落的心情打電話給該名幹部，電話這頭我流著淚說「你為何要做這樣的事情？」，我不解也不能接受他的行為，他只說抱歉，但絕對沒有出賣工會，只是他說「不認同再這樣抗爭下去，可以談就談吧！」；之後，這名常務理事也辭去工會職務，不再過問工會的事。

2.2.3.5 「權與錢」²¹，面對結構性的侷限與反思

要說在三年的貨運站工會我學到什麼，除了對民營化政策有更多的批判觀點外，最大的學習是見識到「利益(錢)」可以「理直氣壯」的成為工會交涉／談判的抗爭標的；因為貨運站員工屬特考資格的公務員，貨運站亦屬公務機關非國營事業，因此，工會挾著其任用資格被攔腰斬斷的不平，透過政治／集體力量的交相運用，把其被權益剝奪的合理性訴諸公論，又在兩大航空業者的競爭及官(資)方以外交利益交換的不平等對待下，工會在 1997 年初農曆春節前拒絕加班二天(算是工會發動最激烈的一次行動)，終於打下了民營化前工作權談判的空間，這場以「權換錢」的調子也確定下來了，對一個相對保守的工會已是進步了²²。

回到我的「相信」與原初的單純，看到工會幹部挑戰政策得扛的心理壓力，及複雜的政治利益牽連、角力，貨運站工會走到此已是小輸—錢換了權，再思當時抗爭終了我的失落感，是覺得貨運站應該有實力打下「權」的確保，只是整體

²¹ 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時對員工的補償有明文規定，其政治考量及歷史背景參考「解構黨國資本」。(張清溪、陳師孟等著，1991：191)

²² 我在 1999 年初離開貨運站工會到台北市勞工局任職，半年後貨運站既完成了 LDO 民營化，由華航承接桃園機場及高雄小港機場的貨運站經營權 20 年，改名為華儲，原有員工獲得了全台灣民營化案中創天價的優惠補償。其具體條件由工會與華航簽署備忘錄，額外補償金由新資方給付，政府文件中只有依「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的基本條件給予年資結算、勞保補償等。

工運力量 (或機場其它工會的聯合) 的不足，單一工會的抗爭最後以「錢」的爭取被解決心有不甘，尤其工人內部認知(意識)的差距、年資深淺、有無退路都是影響工會是否更激進的因素；雖與鴿派的「不戰即談」有著性質上的差異，但在三年中貨運站工會的反民營化戰役卻沒有如：中華電信、中油等獨／寡佔大型產業被社會輿論重視，主要還是其影響公眾的利益不大，頂多是在航空業的相關產業中被討論，因此，與其它沒落型民營化個案(如台灣機械、公賣局瓶蓋廠)一樣，受影響的工人才成為抗爭的主力，能爭的是補償²³與工作權的保障，這時的「理直氣壯」談「錢／權」是受制於工人運動的政治實力不足，但對比同時期的福昌、聯福成衣工人對關廠抗爭²⁴時「血債血還」訴求，台灣有多少民營產業的工人連「血汗錢」都要不到，以挑戰自由化、民營化政策的國營工會在國家有意的轉型階段中，以法定補償金取代工作權的不保，抗爭的基礎不同，我當時期待的是有條件的工人(工會)應引領工運力量的壯大。

貨運站工會有其先天的抗爭優勢，加上幹部們採取了主動攻擊的姿態，才能在實力不足中還得以時間換取空間、邊打邊談來取得最後的例外戰果。我把這三年多的抗爭經驗定性為貨運站工會從官僚化的保守性中轉為基層民主的自主化改造過程，會員們在工會抗爭組織的編織策略中，面對了選擇「錢與權」的目標取舍，二次工會權力結構的分裂則是激進化與保守性路線的消長／競逐，只是在最後關頭幹部及會員面對到是否要付出更大代價(如罷工、積極性怠工)，集體接受了「錢與權」的交換邏輯。

三年多的過程我最大的學習是透過一個具體案例中發生的官(資)衝突現場，我參與了挑戰／抵制一個既定政策的操演過程，看懂了擠壓在工人群體(工會)身上的結構，在試圖扭轉局勢的行動中，組織者與工會幹部努力的進行反擊，因為客觀條件及力量對比的落差，這個反擊付出的代價是造成工人內部間的磨擦、衝突，我當時以路線差異及個別人利益選擇來界定衝突，尤其我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與功能越來越重，工會秘書與決策幹部成為共負責任的協同關係，因此，當工會幹部間出現關係緊張、相互攻擊以致分裂，在快速的戰鬥中，我只能看著矛盾的發生，盡量尋找對話的可能；但我與幹部不同的是我沒有賭上工作權、補償金的利益，也很難意識到各別幹部在利益盤算與承擔壓力時的權衡考量。

回想在 90 年代中期進到貨運站工會蹲點的磨練，經驗到國家以打造「亞太

²³ 我在 2003 年離開勞工局到工委會後，又接續協助國際機場旅館(過境旅館)工會被 LDO 的民營化個案，其亦屬沒落型產業(機場過境安置的需求已被桃園區其它飯店取代，設備亦老舊不堪)，因此，連適用「公營移轉民營條例」的資格都談不下來，最後只依勞動基準法的資遣費、退休金辦理年資結清。

²⁴ 桃園地區福昌、聯福製衣工人的關廠抗爭發生在 1996 年左右，我白天在貨運站工會工作，晚上就到福昌工會協助抗爭組織工作，看到吳永毅、陳柏偉、周祝滿等組織者的辛苦投入，對比貨運站工人與成衣紡織女工社會處境的差別，對比運動訴求上的尖銳性，更對貨運站工會的激進化有所期待。

營運中心」擘畫的經濟藍圖，準備進行更大的經濟體質轉化（私有化、財團化），我與還有退路、有機會轉換的國營工人協同作戰，以單一工会的實力做到抵擋、承擔的戰力極限了，回想當時的失落感，除了對國家用「權換錢」取得工人的妥協感到憤憤不平外，對民營化後是否還有「工會」，還能以激進草根的實踐挑戰資本的控制、馴化感到悲觀。

第三章 政治性出土—權力與體制內／外的歷練

本章延續運動者的生成與改變探究，進一步處理我在 1999 年進到台北市政府勞工局工作到 2003 年到工委會的運動歷程，我從一個基層工會的運動基地進入政府體制中試圖改變、影響行政體制，及之後再上到運動前線(對比基層工會會務人員)必須快速回應政治局勢，運動者在位置轉換的歷程中，如何辨析不同階段政治性出土的意涵。

我所指的政治性，是運動者的實踐經驗被放置於社會與政治文化變遷／轉向的歷史脈絡中，鑲嵌在體制／結構中的自己如何建構出行動的意義。這是主體與客體間來回撞擊的「政治化歷程」，因此脈絡化自身的處境反映在我們的運動基座在 90 年代末期轉進不同的底層人民組織工作²⁵上，而我在貨運站工會工作的末期(1998)感受到的工運政勢²⁶的轉變，民營關廠工人抗爭拉出的政治能量已漸入尾聲、李登輝政權治理中黑金結構與地方派系的把持，社會弱勢普遍有強烈的失業威脅、貧窮感，再加區域經濟的資本移動(西進、南進)、台灣加入 WTO 的擴大市場開放、去管制化等，勞動性彈性化使得民營工人的就業更趨不穩，大大影響了工委會以民營工人(工會)為主的運動力量；此間考驗著組織者的是如何擴大社會影響力，發展與之對抗的運動論述與新的組織形式，在如此不利的結構中，工委會召集人鄭村棋考量「團體動力工作室」的組織轉進與撐住工運空間的可能，接受了台北市長馬英九的邀請，進到體制內工作，在體制內搞運動。

第一節 在體制中繼續行動

1999 年 1 月我離開貨運站工會的職務，隨即與鄭村棋老師進到台北市勞工局工作，不同於工會的運動基盤，勞工局是政府部門與勞資雙方進行法定權益交涉與管理的界面，從政治上來看就是公權力對私部門的作為，對北市百萬勞工而

²⁵ 當時「團體動力工作室」的組織者李易昆身兼工委會執行長但已著手籌備蘆荻社區大學、在大眾傳播業工會聯合會的王芳萍雖在工會工作，但亦全力協助公娼自救會的抗爭、龔尤倩在桃園希望職工中心工作，也在台北準備成立台灣國際勞工協會；這些組織的增生與工運基礎的連結是在工委會面對工運發展中如何往基層民眾的意識啟蒙與擴大戰線的思考框架上形成的轉進／化過程。

²⁶ 90 年代中後期，工運上出現的等組各區域的產業總工會，亦屬工會自主運動力量的累積；1994 年台北縣產業總工會成立，1999 年全國產業工會亦在各運動團體的支持下成立，2000 年五一勞動節受到即將上任的民進黨政府勞委會的認可，授予官方同意的證書，工會自主化運動進到了與體制內政府資源、與藍綠政黨保持承服、統合的鬥爭形式中(林子文，2004:82-84)。而在全產總等組階段，工委會等體制外運動團體曾積極參與初期的籌組，試圖介入、影響其走向，但其組合體質是以各地產業總工會及國營、大型工會為主，在政治上走取得協商代表權的體制內路線，加上民進黨政府上台，全產總的主要募僚機關勞工陣線以支持執政治黨的協商替代抗爭路線，工委會則退出並採取與之制衡的對抗立場。

言，勞工局是落實法令保護的守門員，對資方的不當行徑進行法制面的介入。

但鄭老師帶著我們這些搞運動的人進到體制，想做的不只是這些，除了最基本的依法行政外，鄭老師在公開及勞工局內部的會議中都表示他來是希望提升勞工的地位，在行政上要做到「中間偏勞工」，在體制上要改變公務員的辦事心態，讓勞工局在執法／行政上得以發揮應有的效能。

我在勞工局工作四年，在行政角色上是局長的機要，勞工局的權力核心者之一，沒有太多過度期的摸索空間，馬上就得從工運中習得的衝撞體制²⁷經驗「轉身」又得在體制內成為協助官署辦事的行動者，處理大量的人民陳情、議會要求及市府內上層的交辦事宜，擔任著高度協調性的政治工作，過程中清楚意識到我與「權力」的關係，在勞工局我幾乎等於是局身的分身，我的言行有著傳達局長意志的意涵，因此，初到勞工局就知道「使用」權力辦事是必要的(過去對掌權者有著負面的預設而自身是否被視為同質的人有著戒慎恐懼的自覺)，才能有效的協助老鄭在體制內推動改革的實踐。

3.1.1 成為「有機」²⁸的行政協同者

擔任鄭村棋老師的機要秘書四年二個月，在勞工局的心路歷程只有一句話「隨時備戰」。鄭村棋老師在社運中的衝撞／不妥協性格及對事務處理的縝密堅持，沒有貼身工作過，不會知道他如何讓體制內的公務員願意接受他的指導，在思維上進行一定程度的改變，我做為他的學徒(運動上)及公部門中的左右手(頂多是左手而已)，確實學得最多也壓力極大。

進到勞工局，面對龐大、複雜的官僚系統運作還是有些招架不住，特別是得抬出局長的名義去交涉科室主管以完成局長的交辦事項，或是要求基層同仁在繁重的事務性工作中處理各式突發的民眾陳情事件。起初覺得公部門好神奇，每件事都看似沒有效率，但不見幾天公文都層層上報，局長室公文一天比天多，首長批示／見文辦事才算數，公文往來成為局室長與各科室間的溝通模式，這讓我對公部門的處事習性非常不能適應，更不要說許多哀哀無告的勞工可能就在這些公文往返的流程中受到更不利益的對待，怎麼辦？做為權力核心者之一該如何行動？

走出去。用腳行動，用嘴巴說話。我不是局長室算公文數量的文書員，而是

²⁷ 以貨運站工會為例，我們對民航局的依法行政、執法僵化等態度，工會以抗爭方式進行政策批判等直接衝撞的形式。

²⁸ 使用「有機」的概念，是以區別在行政官僚系統中不被慣常的照章辦事及分層授權的體系所限制，將個人的主動性及學習作為使用權力時的一種態度，發揮行政中橫向的支援與合作的效益，解決行政體系內部的本位／自保生存策略。

得對局長交辦事項及重大政策執行的協調交涉者，讓基層同仁一起動起來，讓科室主管敢主動提出政策上的建議，與局長一同發展出有效能、敢負責的分層負責的有機體系，在綿密的業務推動下，局長室成為各科室同仁開會討論事務的中心。

把自己定位在「有機」的協同角色後，我對勞工行政的地方政府責任與作用有了更深的認識，從預算編列、工作計畫提出到執行檢討，每一個環節都得在局長室定奪，我也第一時間知道老鄭的想法，可以在接續的工作中督促同仁完成任務，只是老鄭對事處理非常明快不拖泥帶水，但對人的處理卻花了他最多的時間，有許多同仁對此感到不解為何老是要開會，「長官說了就算啊！」，每次討論完都有同仁私下找我說「局長的標準好嚴格」、「局長說的很難做到啦！」、「上面的不動，底下很難作事」…，而我不是把同仁的反應告訴老鄭，而是觀察老鄭花這麼多力氣搞「人」到底到幹嘛？

經過一年多的內部改革，期間也找了夏林清老師義務進行「自主學習」²⁹的行動研究訓練，我才意識到老鄭在做的事情就是要改變行政者的自我認知。一個局處的行政作為或政策指向，不是靠一個英明的領導說了算，而是得破除公務員「不做不錯、少做少錯」的自保哲學，及將他們身上豐富的實務經驗轉化成專業實踐上有用的知識。老鄭以集體學習式的場中反映與指導，讓同仁得以從工作經驗中提升認識而在工作上多一些自主思考的空間。

3.1.2 作事有原則，勞工局同仁挺腰桿

就以政府官員最怕又不得不服從的議員關說為例，過去勞工局被戲稱為「弱勢」局處，很容易被議員拿來作秀、修理官員，而勞工局在業務上又是與工人權益最直接的部門，有時即使不同意義員的要求也不敢違抗，在府內的協調會上亦經常吃社會局的悶虧（如弱勢婦女就業問題，社會局管安置、發社福金，勞工局得協助就業安置）；老鄭總會在適當場合要求同仁報告自己的處理過程，記得有一次勞檢處報告議員王世堅要求不處份某家營造業違法的協調會案，府會連絡人³⁰被議員修理、勞檢處同仁也不敢吭聲，鄭老師知道後先問副局長、主秘該如何處理，他們二人都說不能退讓，「這家營造業者太可惡了」，之後只見老鄭要我撥電話到王議員辦公室，他要直接與王議員對話。

²⁹ 台北市政府對公務員的訓練有許多不同的方案，其中研考會的「自主學習」是要求各局處公務員提出改進工作品質的方案，類似研究案的競賽，由各局處同仁自行提出；當時鄭老師覺得可以用行動研究讓同仁的自主研究發揮改進勞動決策的實務需求上，而非成就個人的研究，因此，特別邀請夏林清老師義務指導，由主秘蕭淑燕負責、我與另一名同事鄒子廉擔任執行秘書，就身心障礙就業服務中心、勞動檢查處、職業訓練中心到勞工教育中心要求二級以上主管提出研究主題，此研究歷時近二年。

³⁰ 市府各局處都有一位門負責與議會協調的人，主要是處理議會開會期間的質詢案、預算審查等，更多的業務平時的議員關說或民眾陳情案等。

沒想到電話一通老鄭原先客氣告知他「無法撤消處份」，王世堅竟然「見笑轉生氣」(台語)在電話上要狠，二人就槓了起來，在場的同仁都嚇了一跳，最後只聽老鄭拉高嗓門說「你還要扯，我就發布媒體」電話就掛了，這個過程在局內被傳開了，同仁們也清楚老鄭的作風，有一天府會連絡人到局長室找鄭老師，老鄭剛好不在，他就跟我說「嘿，局長那招真有效，王議員看到我很客氣喲」。挺起腰杆，錯的要認，沒錯不能讓，勞工局同仁作事有所依歸了。

3.1.3 老鄭辭職風波，馬市長也得認

另一次更大的政治風波則來自於對上億元的身心障礙就業基金責任權歸屬的爭議，勞工局除了管理一般勞工事務外，有關身障者就業輔助的業務在「身心障礙保護法」通過後也畫歸勞工局管轄，按月向未足額進用身障者的企業收取差額補助費，這個基金由府內／外委員組織管理委員會，而局長是主任委員，負有政治責任；但這個基金委員會在民進黨執政期間³¹引進許多大型社福團體的代表，而這些社團界的大老級委員也自認該基金應由民間掌控。

老鄭上任後發現許多小型社福團體根本無法用到這筆資源，就開始把業務重心導向進用有心於協助弱勢的就服員培訓上，擴充勞工局在此業務上的效能，我的運動同志田淑蘭、常建國也都被要求在此業務上承擔責任。沒想到這樣的改革引發了社福界的反對，並結合民進黨議員等輪番挑釁，最後演變成身障基金委員會的責任歸屬的政治事件。

我在業務上沒有直處理爭辯內容的性質，但在職責上卻得盯緊議員動態、府會反應及讓社會大眾知道事件發展的新聞工作等，記得老鄭在議會中被質詢時，與民進黨蓋健康三人組(江蓋世、李建昌、段宜康)等議員大小聲一步都不讓，議員們以刪減局長特支費來要脅，市長室長官也有些不諒解，要新聞處長金溥聰來溝通，市長辦公室主任廖理也到局長室來找老鄭，希望他對議會的態度可以軟一些，老鄭是不可能退讓的，才刻意迴避他們，市府遍尋不著他的蹤跡還動用廣播系統找人。

老鄭自始至終不同意大型社福團體把持資源的老大心態，在策略上還要反打一把，硬是要勞工局吞下去，在法理勞工局長本就負有政治責任，委員會是募僚機關不是獨立行使職權的單位，這是可以辯論的，因此，老鄭認為應該把道理辯清楚，不該妥協；有一天在議會備詢時，老鄭主動表示願意與段宜康議員進行政

³¹ 陳水扁擔任台北市長任內(1994-1998)，勞工局長是郭吉仁，身障基金委員會的組成一直是大型社福機構代表擔任，如：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心路文教基金會、喜憨兒基金會等。在政治上有些團體代表與民進黨較為親近、友好，在 1999 年馬市府上台後，此基金的政治責任歸屬不全是法理上的爭議，更多的政治背景是民進黨籍議員的策略挑定工運出身的鄭村棋進行的一種政治攻防，以抹黑的技倆強化老鄭的鬥爭性格。

策辯論，如果他辯輸了就下台走人，如果段議員輸了就退出政壇，這個主／客、攻／防互異的策略，讓局內同仁都綑緊了神經，當天下午老鄭就擬好了辭職書，第二天一早要我帶著文件親自交給馬市長，隔天是行政院院會，馬市長一早就到行政院開會，我一早八點就到了行政院，把文件交給馬市長的隨阜，在確認市長有收到辭職書並批示完成後才回到勞工局。

這個政治風暴最後在辯論議題未能對焦及社福團體退縮的情況中，沒有進一步發展下去；之後的發展，勞工局在議員的強力監督及社福團體不時的記者會隔空交手中，身障就服業務做的一天比一天紮實，許多身障朋友的就業輔導及小型社福團體的逐步上軌道，媒體及市府官員有目共睹。

3.1.4 「可以用但不能靠」，對工會的警語

“朝中有人好辦事”，既然鄭老師是社運出身更應替工人討公道，可是老鄭上任後在對應工會的立場上卻讓有些幹部不甚滿意。

我的工作除了對內的協調、溝通外，經常會與台北市的工會幹部接觸，過去在體制外時與工會的協同關係，多半是協助他們對抗官方、要求官方表態來取得助力，但弱勢者常常也被官方耍著玩，對官僚即期待又不信任。老鄭到勞工局後許多工會幹部都會想找老鄭幫忙，特別是與公共服務相關的部門，希望以政治力化解紛爭。

記得 1999 年中有一次環保局工會因為一名員工涉及收了未以專用垃圾袋而被解僱的案例³²，工會幹部來找鄭老師商量如何解決，雖然在勞工行政上能介入協調、調解，但在政治上是涉及勞工局與環保局的關係，以法論法之外，工會當然希望勞工局能助一臂之力，會中老鄭一再提醒他們說：「我來勞工局是被你們用不是被你們靠的，除非工會還能在工會內部進行組織與教育，否則勞工局的行政裁量權無法解決你們的勞資不平等，你們要靠自己搞。」。

老鄭的回應讓工會幹部有些意外，直呼老鄭是不是變了，但這個「反靠為用」的原則還是呼應我們在運動中堅持工會自主的想法，不因為身在衙門就可以放棄原則，而且一旦工會認知「靠官」可以解決爭議，那一旦改朝換代工會又該如何自立自強呢？此案，最終在工會進行基層教育及勞工局的爭議調解中取得了勝利，該名員工也復職了。

³² 1999 年台北市環保局職工詹君，於環保局實施垃圾專用袋政策初期，因載運未使用專用袋垃圾，遭環保局處以解僱。工會認為處份過當，主動提請勞資爭議，並由北市產總王醒之秘書及勞工局鄭前局長村棋先生協助，終使詹君復職。在工會的強力爭取下終於得以參加員工的獎懲會議，進一步健全人事考評制度。(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網站 http://www.cttu.org.tw/a_4_4.html)

還有一次則是台北市民營公車工會聯誼會的幹部來找老鄭談票價調漲與福利縮水的問題，老鄭花了五個小時與他們分析結構上應注意的事情，討論結束時已是下午一時，幹部們說要請老鄭吃飯，老鄭認為工會應儘速回到工會做說明，吃飯事小而以另有行程婉拒，結果幹部卻說老鄭不賞臉，最後竟有些不歡而散；老鄭說：「我花了五個小時與你們談問題，不與你們吃飯就說我看不起你們，少來這一套」，幹部覺得老鄭不給面子，悻悻然離開。後來，這個案子，勞工局主動找交通局召開工作權與票價調整的討論會，邀請九大工會的幹部全程參與，老鄭在事務上已往前推了一把，不是在人情上回應關係，他在會後與工會幹部再對話時重申了他到公部門任事的原則。

所謂的「中間偏勞工」，不是在個案上偏袒一方，而是在執法上儘量找出對勞工有利的空間，以落實制度上的保達到實質的效果，老鄭花在工會的心力或許無法如過去擔任工會顧問時多，但在總體勞動法令、政策落實部份則有立即的改善，如：對未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的企業予以公佈週知、祭出罰鍰警告等，對拖欠勞健保的企業主動進行勞動條件的檢查，對營造業的工地安全檢查則結合工會進行無預警巡防、要求企業建立自主管理等。

3.1.5 權力的兩面性：負責任使用權力的「範型」

到勞工局雖然工作負荷量大，老鄭從不放棄對同仁們做意識轉化的工作，而我在行政角色上又與同仁們接觸最多，最有機會辨識「權力」的兩面性——權力本身有著「順服／馴化」的宰制關係又得以讓行動者意識其自身主體的政治性，這是老鄭對勞工局同仁採取「行動研究」過程所企圖發生「認知轉化」的基本認識。

放在我的身上同樣受用，其一是我本身即使自認不是局長的分身，在同仁的對待上就能感受到「順服權力」的關係張力，從主管或同仁們對我與淑蘭的認知差別，就可以理解體制（例）的「權力順服」基礎：我是所謂的「編制內」秘書職，淑蘭是身障基金聘用的組員，雖然同處局長室中，同仁們也都以秘書稱呼我們，但在科室主管的眼裡，體制內／編制外的位階是不同級的，直接反應在對待關係上³³；四年來許多長官們對我與淑蘭的差別對待我們瞭然於胸，不會因此造成之間關係的衝突或緊張。

在科室中的上下層級間的對待關係就更清楚了，基層同仁等著長官交付工作，而不太主動接額外的工作，主因是基層同仁認為主管們總是有權無責，出事小官員在扛，長官都不用負責；而有些主管若要與局長見面時（有些是局長主動

³³ 比如在公文處理上，我負責身障業務以外的所有科室，但在局長室內的分工與討論我與淑蘭是相互協同的，長官們即使知道我們的分工及補位、協助關係，還是會在重要事情上以我為主要窗口，這個差別對待讓我更理解在公部門中「權力」的物質基礎，他們視權力與責任的相稱，是在官階的基本認同下發生的。而這也讓我在使用「權力」（如局長交辦事項）時特別謹慎。

找他們)都會先來問我到底是什事情,或著帶著一群同仁一起來,免得一問三不知或說不清楚而被「K」,久而久之有些主管採取報喜藏憂、揣摩上意的心態。在勞工局四年,此類視權力為依歸的官僚文化,不是只發生在主管與局長室間的磨擦,小到收發室的同仁們因為勞逸不均造成勞工局的公文處理時效全市府倒數第一,而數次被研考會點名列管,老鄭要人事室主任調查清楚,才知道是某科科長處事鄉愿,喜歡用利益、交情做事情,對幾位收發室的同仁差別對待,惹毛了某位送公文的公友,造成故意拖延、公文不見等狀況。這種事用懲處記過難收改進之效,怎麼辦?要改變這些現況,從面對議會爭取預算到協助科室建立有效的作業模式、解決同仁間勞逸不均的問題,老鄭及我們花了極大的心力改變公務員的「不作不錯、少做少錯」的消極心態。

在體制內的運動者如何在行動中有效「使用」權力辦事,老鄭在官僚體制中不改社運時的衝撞本性,對資方/議員等以不侵犯其基本權力但亦不受其政治要脅為原則,讓同仁可以挺起腰桿辦事;對弱勢者(勞工/身障者)積極維護其應有權力,以制度性的方案改變弱勢者的地位;其實在國民黨主政下的市政府官員及國民黨籍議員中,一開始對鄭老師的行事作風不太同意、私下有所批評,老鄭在此期間以基本友善關係對待,在事務處理上不因人/黨而異³⁴,讓市政官員、議員們改變對勞工局的看法,這是我認知到老鄭以「負責任使用權力」所達到的體制內「運動」的一種範型。而身在權力核心中的我,因為有過基層勞工行政人員的經歷(勞工教育中心)及在貨運站與政策交鋒的經驗,對政府官員握有權力時被外界批評的專業(有時是一種偏見)傲慢,有對照性的認知,因此,在勞工局時特別對權力的運用、掌握小心翼翼(不想成為那種官員),用權力壓人難以服眾,想做的事卻得有相稱的權力才辦得到,體制的力量本來就應服務於公共的利益,只是官場中複雜多重的利益爭奪(升官、卡位),政府體制有時被高度扭曲變形,甚至與人民為敵。

我們進體制內想做的是對內改變勞工局同仁的辦事心態及官場保守的習/慣性,與他們發展出共同協作的信任關係,提升勞工局在市府內的弱勢地位;對外則是讓產業界更認知其應依法守份的社會責任感,在勞工意識及權益保障上有實質的進步,這是我看到老鄭在四年局長任內不一樣的政治實踐,對我有很大的影響,尤其是認識到掌權者面對一般人民的權益保障,如果有其它政治考量或以選擇性心態對待不同事件,受害者更是難以之抗衡³⁵,因此,要翻轉結構還是得

³⁴ 就以 2001 年的跨年晚會前,市府新聞處找了國內知名舞台搭建公司一鼎益鑫,在市府門前搭建舞台,其工作人員因未配戴安全帽、安全索、設置安全網而被勞檢處勒命停工,該業者找國民黨籍議員來關說,老鄭表示要改善後才可再施工,該業者得知後揚言要讓跨年晚會開天窗,還說隔日要開記者會,老鄭對勞檢處長說「不可讓,要開記者會,我們也開」;最後,在新聞局的介入下,該業者只好配合勞動檢查的要求,讓工人配有基本安全措施後才開工。

³⁵ 民間批評政府濫權的案例有所聞,台北市政府停車管理處在 2007 年底解僱四名工會幹部,因為他們反對市府的停車收費業務外包、挑戰郝龍斌市長的政策;在停管處工會及工運團體的協助下進行二年多的抗爭,而此時的勞工局長蘇盈貴竟違反勞工權益基金委員會議做出的同

有相應的社會衝撞力道，我們在 2003 年初結束四年任期後返回工運線上，鄭老師擔任工委會顧問，我則到工委會工作。

第二節 上到工運前線的挑戰

2003 年初離開勞工局後，3 月份就到工委會任職，這個位置不像過去在基層工會擔任會務人員，以個別廠場中的勞資關係進行基層組織的工作，帶著困惑還是可以前進；也不同于公部門在龐大的行政體系中有一定的辦事依歸，經過勞工局四年的磨練，在 2002 年底一次工作室內部的年度檢討會中我主動提出要到工委會，理由很簡單，在勞工局四年看到其它同志苦命的撐著運動，自己比其它人有更多的學習歷練，更應該站出來一起扛運動上的責任。

3.2.1 政黨輪替後的社運處境

我在 2003 年初到工委會，當時的台灣社會因為 2000 的政黨輪替，藍綠政治集團主導了各式奪取／保衛政權的政治動員戲碼，2004 年的總統大選相較於以往的選舉都更為複雜，工委會雖曾因應不同階段的統治陣勢提出過與選舉有關的主張，多半是以當時工運鬥爭的脈絡為主軸，提出工人與政黨政治的對應關係，如：1995 年的「不修健保、不給選票」、「1996 年與總統有約——工辦政見會」，而台灣的自主工運在 2000 年政輪替後因為民進黨政府有意識的收編各式運動力量，吸納了部份運動菁英進體制內，台灣的社運也面臨了消弱／萎縮的命運，工委會是少數在政黨輪替後還能以群眾的力量反應出階級性論述與行動的團體，我在 2003 年初到工委會也延續這樣的立場與方向，一開始面對的壓力就是 2004 年的總統大選，工運界該如何行動。

在工委會工作最困難的部份就是面對外在政治局勢要想出辦法／策略迎上去，最實質的組織及運動目標就是籌辦一年一次的「秋鬥」。工委會在台灣工運歷史發展的脈絡及路線有多篇論文描述過(林子文，2005；王芳萍，2009；吳永毅，2009)，不特別說明，基本上是以人民民主的左翼思維，在解嚴後的工運陣營中主張「與政黨等距外交」、「不藍不綠」的實踐路線与其它向統／獨意識的團體有所區別；在 90 年代中期工運仍處高峰時期工委會與勞工陣線(民進黨新潮流系脈)、勞動人權協會(勞動黨，支持一國兩制路線)並列為三大工運團體(林子文，2004)，從 1993 年起工委會即以每年的 11 月 12 日舉辦「秋鬥」進行其對政治經濟總體批判的群眾性運動，而勞工陣線、勞權會則以五一勞動節為動員時點，三個團體在議題上偶有合作，但在路線選擇與群眾組成性質的差異中，漸漸分立旗

意補助決議，至今不予補助他們第 2 審的訴訟費及生活費等，況且該案已訴願成功，勞工局仍以行政手段卡住補助金的發放，這是近年來行政權介入工會自主及打壓工人最惡質的行徑。(朱嘉英等，2009)

幟。

3.2.2 挑戰藍綠政治—廢票運動的複雜性，超乎我的想像

2003 年「秋鬥」是我到工委會的第一個挑戰，當時我與同事何燕堂每天都在傷腦筋，再搞工運單一訴求式的行動已難以回應政黨政治鬥爭的變化，工運界也受到藍綠政治力的介入，全國總工會力挺國親聯盟(全總理事林惠官就出任親民黨不分區立委)，2000 年五一勞動節甫受民進黨政府同意認可的全國產業總工會則力挺新政府(其第一任理事長黃清賢，還出任總統府策顧問)，在藍綠之外的運動力量相對得花更多的力氣與他們拼搏。

也就是說，「秋鬥」即使談勞工權益亦不再是以勞資關係下的單一性訴求可以引起政治上的關切(如：2000 年的四 0 工時)；更不能坐視運動陣營受藍綠政治勢力介入的事實，秋鬥只有轉進／型才能繼續在運動中存活。記得有一天下午我與燕堂在辦公室討論秋鬥，我靈機一閃「來投廢票好了，這麼爛的政府加上爛政客，誰執政都一樣，幹嘛投票給他們！」，燕堂也覺得這是一個可以殺出重圍的點子，我們徵詢了吳永毅的意見後就開始在社群內發動討論廢票了。

這個點子起初是爲了突破工運的困境，沒想到之後的變化遠遠超過我當時的政治認知，對我產生了極大的衝擊：第一個衝擊是，透過「廢票」我看到一般人與政治關係的實質內容(許多幹部不是擔任某競選總部勞工後援會的召集人，就是私下爲某黨某人拉票)，不是以倡議民主價值與挑戰藍綠政權就可以被說服的。其二則是，在運動上工委會過去主張與政黨保持「等距外交、等比結盟」(林子文，2005；吳永毅，2009)的策略，現在卻轉而要「罷免藍綠，走自己的路」，有心於護衛其主的社運人心跳來明批暗鬥，認爲我們過去是投機派，現在台灣工人的實力還不夠，還是應該與主流政黨合作(林惠官，2003)；最讓我難以理解的是明明藍綠政黨都在操弄族群議題，爲奪權私利製造人民之間的分裂，社運界及弱勢者的聲音、訴求在政治上完全被漠視，爲何還有這麼多人支持他們？引發我對藍綠政治的反感，更想搞懂自己被壓抑情緒的內涵。

3.2.3 在情緒中理解自身的壓抑

不過，雖然廢票運動超過我能力及認知所能承擔的限度，因爲位子的關係，還是得代表工委會到各處去說明廢票，一再與這個族群政治的反感相處，才有機會面對壓在心頭上的感覺；記得 2003 年底有機會回到苗栗家鄉推動廢票運動，心想「人不親土親」，與客家地區的工會幹部交流，總更能說得上話吧！沒想到一進到說明會會場，就看到好幾位工會幹部載著宋楚瑜競選總部的帽子來開會，交換名片時也拿到好幾張印有 x x 競選辦公室助理的頭銜；當會議要開始進行時，

只見石油工會苗栗分會的一位幹部噙聲說：「文宣留下來，不用報告了，我們自己看」，那時我漲紅了臉，不知該如何行動，想主動說明自己的立場卻還是被擋下了，在一陣吵鬧中有一位幹部出面緩頰說：「就讓她報告完，大家不要發表意見，人家都來了。」

那次的經驗讓我非常挫折，一直想不透他們對廢票的反彈與不安的是什麼？事後也沒有機會再對話，但大大刺激了我的客家人政治敏感神經，到底我與他們的差異性在那裡？2004 年的總統大選，「國親聯盟」採取過往拉攏客家鄉親的策略，從地方派系及人民社團中(包括工會)撒資源固票、綁樁，走一趟家鄉我看到了，也清楚那是歷史政治中原本就存在的事實，可是我對藍綠兩黨這樣使用權力／操弄族群的作風是不同意的，再者，看到電視上民進黨使用「二二八」的政治悲劇為其奪權服務、失去政權的國親聯盟把農民／勞工當競選道具，大開記者會，但在掌握國會多數的實力中還是與財團一家親、犧牲勞工權益，我做為階級政治的運動者，對兩黨排山倒海的政治操弄束手無策，「廢票」是我唯一可以制衡政客的工具，只是廢票未能解開壓在我身上，難以言說的情緒。

這個情緒說來複雜，因為那涉及我這一代五年級生在國民黨主政下對自身政治歷史的斷裂式教育洗腦的不甘願，也牽連出一個客家人在主流政治中被刻意忽視、掌控又極力排除的「附屬性」地位，看到作用在我身上的二重「不平」，讓我意識到在運動中與這麼多無聲卻想反抗的弱勢者同行是有著相同的意義的，那就是搞清楚「自己是誰」，在階級的認同中得認真面對台灣社會中即存的族群差異，其政治歷史的內涵不是兩黨政治論述說了算，還有從人民之間的對話中理解／看見差異的政治歷史性，這就是「廢票」運動中壓著我不得不回過看看自身的政治歷史情緒，我得自己去面對的。

2000 年總統大選，民進黨以本土政權及深化民主等理念，在國民黨備受指控的黑金政體及派系分裂的鬥爭下(連／宋分裂)，民進黨成功了取得政權。政黨輪替後國家主權意識在民進黨有意識的混用「反威權、反外來政權、反殖民統治、反共產主義、反大中國」等文化論述，吸納著大量的知識菁英投入其國／民族主義的「台灣人意識」建國運動中，有效的截奪了自解嚴前反威權、反壓迫的社會民主運動詮釋權，所謂的自主工運亦在此強大的文化論述中逐漸邊緣化。

在此結構中，我被台灣社會長期糾纏未解的族群矛盾、殖民歷史等內部關係壓抑著，在統治集團有意挑起族群對立以獲取政治權力的操弄下，更深層內隱的社會性壓迫，引發我對自身政治歷史斷裂與空白的恐懼與憤怒：

「…賴香伶表示，他們這一批從 1990 年代初投入到學生運動到如今的社會運動，十多年的社運生涯一直在跟某種很隱晦的東西作抵抗，… “無法說清的

東西”是臺灣現今更大的問題——分裂的意識形態對立；其次，這樣的模糊不清是源自於臺灣的社運和歷史的斷裂」³⁶（房怡諒,2008）

“無法說清的東西” 是我在經歷過廢票運動(2004)、與馬來西亞年輕運動者對話(2005)³⁷及主辦人民老大參選行動時的世代政治系列論壇(2007)後才漸漸清晰得以言說。而這個時序正是台灣社會經歷了激烈的藍綠政爭、族群對立與文化壓迫，我得以回視台灣殖民政治歷史中底層人民的生存記憶，在社會運動的鬥爭脈絡中開啓了我的反身性探究歷程，往內咀嚼著內在爆烈的壓抑感。

在 2004 年 3 月廢票運動落幕後，我與工作伙伴燕堂又開始緊鑼密鼓推動著人民老大運動，但我的內心世界被廢票運動衝擊著沒有動力往前，直到七月底的運動社群會議中我向同志們報告了自己內在狀態的壓抑情緒，記得當時我說不清楚是什麼「卡住」了我，大伙也難以理解，只記得我一直啜泣低頭，突然，夏林清老師說了一句「很不堪嗎？」，「香伶，你要面對」。

隔天我寫了一封信給運動同志們。那是我第一次在運動中面對自己的政治歷史斷裂感。是，是不堪的、痛苦的。其中有一段文字我是這樣定性自己在台灣政治歷史中的「身份面貌」：

我，用客家人身份所展開的理解似乎找到了一種座標看自己——台灣社會中的客家人、無產階級、反壓迫份子的後代，有了一種安全感，可以把這種空白感安置在複雜糾結的歷史中看待，成為「漸有知覺的階級運動者」，這個座標的意義，就好比老鄭常掛在嘴邊的藍綠「基本教義派」，被安上一種可辨識的樣貌，我所謂的個人政治歷史就是這個意思！（賴香伶，2004a）³⁸

這個安置與面貌的浮現若不是在運動中翻滾體悟，我的「不堪」不會如此強烈，因為在文中我的起頭是這樣寫著：

透過我們自身的運動觀點，對政治上藍綠價值混亂總引發某種憤怒，讓我對所謂的閩南人、外省人的愛台灣政治論述有所不滿，引發更深層想平反什麼的慾望，從而距離感的出現更甚於平常，看到電視媒體的報導就想開罵，卻又不敢看下去。這種不滿我把他放置在歷史中開始理解，追溯自己對族群的、階級的、弱勢的反壓迫生命經驗中的片斷。（賴香伶，2004b）

10.2008 年 11 月 29 日火盟與世新社發所舉辦「青春之歌@馬來亞—生命如河流!看見～五 0 年代東南亞反殖運動女戰士—林梅」座談會，就亞洲反殖運動的政治歷史觀、馬共之反帝國主義戰鬥，接起台灣歷經殖民、戰後五 0 年代的白色恐怖及女性運動者如何經驗自身的選擇等進行跨國界及世代間的討論。會中我再次以政治歷史的斷裂感敘說在運動中面對自身政治性出土的痛苦歷程。（房怡諒, 2008）

³⁷ 參見第九章第一節 9.1.2 碎片與重組～解殖的歷史「差／撞」。

³⁸ 我在 2004 年廢票運動後以「香伶父親—人生之回憶」—分享予我親愛的同志們」一文與運動同志們談起自身在族群壓擠的社會氛圍中的複雜難解情緒。（賴香伶，2004）

尋線探究以族群的、階級的、弱勢的反壓迫經驗片斷，如此清晰可辨的歷史場景沒有發生在我成長的歲月，我們這一代（六〇年代末出生）享受著經濟起飛後衣食豐富、社會力奔放的年代，我在家人的辛勤勞動中(參考第四章)讀到大學、衣食無虞，編織著人生美好的遠景；但因為參與社會運動，才得以認識到工業發展犧牲了多少工人的性命、失業工人攜子自殺、被黑道逼債不得不逃回家鄉的家人，還有不時提醒我要注意鄭村棋這個「壞人」的公公（第四章第二節）；他們都在這個「吃人」的社會中付出了代價，而我有幸在運動中與他們的生命經驗交流、相遇、同行，是運動，讓我得以正視生命中的不堪。

3.2.4 生命如河流！循線接起身身的歷史政治

廢票運動讓我開始探究內在的壓抑情緒，我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2005 年年初，文化研究學會舉辦「去國·汶化·華文祭：2005 年華文文化研究會議」，其中邀請了幾位年輕的馬來西亞社運工作者，針對馬國的種族政治與社會運動等方面的報告，期間透過夏林清老師的引介，我們社運工作者有機會與他們交流，由我負責主持。在過程中我充滿著焦慮，因為我對自身的衝突、矛盾情結都未能釐清，根本難入不了他們對馬國人民中壁壘分明的種族主義、政治打壓及社會運動內容，自己頂多扮演司儀串場的角色，無法從場中豐富的對話內容拉出與自己或參與者的關係，不是不理解他們以社運角度介入政治的理論、方法，而是對他們清楚敘說做為馬華人的歷史感知，相較於我自己，若不是進入社運、不是推動廢票，不是把自己鑲嵌進台灣現實政治爭鬥的現場，我不認為自己有機會與這樣的複雜政治歷史相遇。

會後的某天我與工作小組開檢討會，夏林清老師直指他觀察到我作為主持人時的遲滯與空白，對於場中豐厚的歷史政治完全沒有接，「到底是怎麼回事？」她問。當時我真的答不上來。直到 2005 年 6 月，有機會藉著推動《生命如河流》(邱依虹譯著)一書的讀書會，才又再次碰觸自己身上的政治歷史斷裂感，透過生命一書內有關馬華、共產黨、女性運動者的口述歷史，我看到了亞洲人民在三〇、四〇年代被殖民統治下的反抗紀實，深深的敲撞著我的內心，因為這些小人物的故事都與亞洲的大政治歷史環環相扣，台灣自然不在話下，而我自小聽著父親說著他在二次大戰時被日軍徵召到菲律賓當軍伕，之後不堪被日軍虐待而帶著五十幾位台灣同胞逃跑，最後又被日軍抓回受軍法審判，準備槍決，不料意外的被另一名日籍軍官營救而保住了小命，這個救命恩人的故事，我聽了好多遍，對戰爭下受苦的被殖民者有很多的想像，這些一點一滴印在我的腦海中的記憶，我不曾把他連結在我的政治歷史中，直到在運動中站在被壓迫者的角度理解這個世界，才驚覺我自小受父母兄長保護下的生命是如此稚嫩與空白。

在《生命如河流》繁體字中文版發表會中，我第一次敘說了這個驚覺與難受，

因為一翻開父親自傳中受盡壓迫的生命滄桑史，就像在面對自己身上原本看不見也不以為意的無產家庭在戰後的政治歷史中獨自搏鬥的求生痛苦，那是出生在六〇年代末台灣經濟起飛、生活改善、歷史空白斷裂的世代，不會理解也不用多看的歷史。

當我面對這段自己原生家庭的辛酸血淚過程，許多過往被壓抑的記憶一片片被喚起，在運動中感受到的壓抑終於得以釋放，似乎找到了新生的出口，也找到了走在運動上的接引實線，屬於我父母親一代的階級鬥爭刻痕得被不同世代看見，更不容被藍綠政客的操弄族群策略挪移、錯接。

3.2.5 再見。父親！

我父親勞動一生，在六十五歲時因為罹患癌症，向工廠申請退休，之後就是長達九年的病魔纏鬥，在他過世前二年，他開始每日寫日記，民國八十年我大學畢業，面對父親的身體病痛，我決定先留在家中照顧、陪伴他一年，那一年是我們父女最親近也是最痛苦的一年，無數的夜晚，他因癌症的痛苦而偷偷自殺、哭潑，我心目中無比堅毅、不向病魔低頭的父親已被擊垮，好幾次我與母親搶下他自殺的剪刀，只能看著他強忍痛苦的流淚，後來他的身體已不勘折磨，日漸消瘦，最後連坐起來的力氣都沒有。八十二後我離家北上，心中還是掛念著父親，最後他到台北長庚醫院住院，我下班後天天到醫院住並與母親作伴，後來我想讓父親生前能了結一樁心願，在他去世前半年決定結婚(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但他最不放心的就是我選擇的婚姻與社運這條路（他曾說與資本家作對是很不利的）。

在我婚後的第一個農曆年前父親過世了，那年的春節我們十個兄妹再次團聚，哀傷與不捨的為父親辦法會，在告別式前的那一夜，二姐為大家寫了一篇送給偉大父親的信，我心中滿是委屈與難過，因為我掛念著父親不了解我走進社運的遺憾，我是家中唯一念到大學的孩子，但沒能讓父親覺得有所驕傲，在法會結束後隔天，二姐發給大家每人一本影印的本子，是父親親筆寫下的自傳—「回憶人生」，我拿到後不敢多看，就帶回台北了。

這本自傳一擺就是十三年，期間我段段續續的讀，每次都因為無法面對父親的遺憾而讀不下去，直到有一次我直接跳到最後，其中有二行字是提到我的部份，他說：「尪女香伶得天獨厚、加上天資聰穎，從出生到大學無憂無慮，…可惜非生在富人之家，可靠能力有限，希望么兒養成刻苦奮鬥、自力更生的精神，向自己的理想目標邁進，吃得苦中苦，…預祝她前途光明，得到最後的成功也。回憶至此擱筆。」(參閱附錄一)

這是父親生命終點前對我的期許與祝福，這個「期許」在他過世十五年後的

今天我一直放在心中，因為每次再讀他的「回憶人生」，我更清楚自己走進社會運動的意義，不只是因為理念感召而是因為情感與階級出生，從父親臨終前留下的回憶手稿中我看到一個日據時期的青年，一個赤貧家庭的長子被徵召到菲律賓當軍伕(種菜、養雞鴨供日軍後勤之用³⁹)，過程中被日人毒打、歧視，之後他帶頭反抗逃跑，一行人被抓回後，他與另一位同袍被軍法審判，最後又經隊上軍需部上將所長伍間謙太郎求情而救回小命的驚險歷程；在二戰結束日本投降後，他們一行人被遣送回台灣，卻又被國民政府當作日本人關進大牢，後經得鄉親指認才又得以倖免於難。接下來的苦日子與貧苦家庭的咬牙過日，好不容易熬出頭把十個孩子養大…。

這一路的辛勤勞動與挫折經歷，我參與的不多，因為有父母、兄姐的拼命投入，才得以讓我出生到大學過得無憂無慮，這是我得清楚面對與感佩的；而至今在社運的場域中，我看到許多與我父母一樣辛勤、受苦的底層人民，能與他們一同前進、反抗與改變這個壓迫的體制，是我的理想與選擇，希望如父親對我的「期許」一般，這個運動能有成功的一天。

「政治性出土」是我用來辨識自身因為參與社運看到了政治力操弄人民而許多受結構壓迫的底層人民仍然只能以支持或順服取得生存空間的再理解。運動者比工人有更多的機會介入公共政策、理解主流政治的遊戲規則，如：在貨運站工會我經驗了民營化過程中官資利益間的交相結合，工人權益被政府拿來做為擺平矛盾或取得特殊利益的折衝工具；在勞工局我看到權力的兩面性作用在“改變”人的可能性上；在工委會更是得時時刻刻關注政治，對公共政策進行群眾的教育工作，才有條件在政治上揭露其剝削的本質。這些行動中的認識內化成我在運動中的一種知識、信仰，但有些作用我還未能清楚辨明，如：廢票運動中勾起的客家邊緣身份意識，在後續的運動中我才更意識到運動讓我“有機”——不只是運動改變了知識份子的腦袋、思想，是實踐中更多與生命中的階級性相認有關。

³⁹昭和十七年中期日本政府對台灣發佈徵兵令，父親當年十八歲，在戰事中被徵召到菲律賓當軍伕，先在新竹州立農業試驗所「台灣總督府立熱地農業技術員鍛鍊所」培訓農業專技教育，然後派遣海外經營軍屬農場，因戰爭緊迫，訓不到十個月奉命派赴菲律賓馬尼拉，一段時間後又被轉派到離馬尼拉約三百多公里山上的碧瑤市盆地，以先鋒隊接收西班牙人養雞場，開墾為蔬菜農場。(參見附錄人生之回憶—香伶父親心生回憶文本)

第四章 女性運動者的家庭經驗

論文書寫的過程彷彿拿了一個探照燈，照向過去自己的成長歲月，每一段歷程都與自己的原生家庭、在運動中遇到的人事務有關，這個照見的過程好像把自己走進運動中察覺到的某些「理應如此」鏡射出一些蛛絲馬跡，為近年來的運動低沈找出路／口，像是「悟」出什麼一般，總之，運動者對外在發生的政治變化總是敏感的，而這些敏感的牽引也在不同時刻敲開了積壓在內心未解的記憶。

本章，想跳離運動線上的我，把探燈照向我的原生家庭，接起前一章對父親的感念，將六〇年代末在我有記憶的成長過程中，一個有十個孩子的勞動家庭如何在半農半工的集體勞動分工中走入小康，並以家中百年茶園的消失為素材，記錄台灣一個小村落走向工業化的變遷歷程。大學畢業後我進入社會運動，看到許多如我父母、兄姐一般的勞動者，在與他們相互鬥陣、打拼的運動中，讓我更意識到我的無憂求學發展之夢是因為父母兄姐們的辛勤付出；民國 83 年我嫁給柯逸民，進到不同的家庭關係時，才真實經驗到先生一家人七〇年代起在都會求生的辛苦。

民國 56 年底公婆生下柯逸民後就從苗栗的後龍漁港北上打拼，民國 68 年初台灣退出聯合國導致北部許多營建工地停擺，公公正在發展中的水電生意因此被朋友拖累，倒致週轉不靈而負債，從此公婆家歷經了二十幾年的經濟困境，公公面對龐大的債務及人生從高峰跌到谷底，自此在家中接一些小工地的水電，民國七十幾年起就潛心研發他的抽氣式(負壓式)馬桶，無奈資金不足及孩子們未成年，身心壓力大，整個家的經濟都是靠婆婆賣早點、做家庭便當二十幾年才讓四個兒子讀到大學畢業。我在民國 83 進到這個家庭中，15 年的婚姻生活中我與這樣的底層家庭共同生活著，在關係中經歷了爭吵、拉扯的痛苦，婆婆的咬牙韌性撐住了一家人的溫飽，我們孩子的出生帶來了一些家庭的歡樂，只是五年前公公患了精神方面的疾病，一家子人又得與他相互折磨，我的二種家庭經驗是對階級處境感知的肉身「溶混」，亦是增生階級反抗力道的泉源。

第一節 我的「原生家庭」／佃農與茶園

「佃農」，是從地主的權力位子中被稱喚的底層人民，我家是佃農的後代，記得小時候看父親的身份證，背後記載著「佃農」兩個字，國中時又改記為「永森食品公司農場主任」的職業，只是小時候不解的是「佃農」到底是身份還是職業？

上山採茶、撿松枝葉還是撿茶仔(茶樹的菓子)是我小學(民國 63 年)放學後不可少的勞動之一，除了到自家後面的茶園採茶外，有時還會到遠一點的地方採茶，聽大人講都會知道這片是誰家的茶園，那又是誰家的地。那家的地被買走，

在村子蓋起了三層洋房，過年時村子的人會到洋樓去逛逛，其實村子裡有錢的就是那幾戶，不是很多人；我們家也有地、有菜園，小學時我也到過台中縣后里的田裡幫忙割稻子，父親也曾在我家菜園旁邊的空地種松樹，我們家沒有自己的地嗎？我們家很窮嗎？

4.1.1 側記百年「茶園」的消失

其實，小孩時期不太懂得土地與人生存之間的關係，直到有一年(約民國六十八年)颱風來襲，大甲溪河床犯大水，把后里番社仔（客語翻譯）一帶的大片稻田都沖散了，父母親望著水淹及膝的河川地，找不到去田梗的路，家中唯一的一畝田就這樣毀了，曾經是我第一次在水田中看過水蛇的田，就這樣不見了，之後父親沒有多餘心力重整田地，就把它賣了，這是我印象中(民國六十八年以前)家中僅有的一份私有地。

那我家後面那一大片茶園是誰的呢？不是我們種茶人家的嗎？不是，是台灣農林公司⁴⁰的地，我們及其它村子裡的人都只是這大片茶園地上的佃農，從日據時期就耕作至今，應該有百年以上的歷史了。從小就聽祖母講過阿祖(阿公的父親)種植茶樹的事，幾代人都是靠這些茶園耕作來養家活口，種茶之外也曾套種甘蔗、梨樹、牧草等。

2008 年底某一天，我三姐打電話給我說三義家中的茶園地被農林公司收回去了，聽說是賣給了新光集團，每塊地有分到一些補償金，村子中大部份人家都有耕一小塊茶園，當然也都拿到一些錢，只是這大片茶園以後就不會再是茶園「地目」了，好像是要作建地、蓋商辦住宅混合的開發或是遊樂區等。果不其然，2009 年 3 月初，媽媽參加的客家山歌社被三義鄉公所及建商邀到西湖渡假村表演，說是為了慶祝茶園地的動土開發儀式。

這個茶園被農林公司收回並開發為渡假中心的訊息對我來說是振驚的，一直也不太相信，因為雖然大家是佃農，可是百年來不同世代在耕作養護這片茶地，

⁴⁰ 台灣農林公司成立於民國三十九年六月十五日，民國三十五年台灣光復後，接管日本三井物產株式會社等在台灣所經營之大小 107 個農、林、漁、牧業等單位，合併成台灣農林公司，轄有鳳梨、水產、畜牧及茶葉四個分公司。民國四十一年政府為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將公營農林公司開放移轉民營，經政府輔導辦理分售分營，將鳳梨、畜產、水產等三分公司分售獨立經營。茶葉分公司及高雄冷凍廠沿用農林公司名義，繼續經營；於民國七十五年，除延續傳統農林事業轉而拓展新興事業，辦理進出口貿易。近年來又增加通路市場及建材行銷，內裝工程、生物科技、食品飲料、宅配物流、及投資代理比雅久機車等，採取多元化經營方式。目前公司擁有 3900 多公頃之龐大土地資產，現正積極規劃開發各項遊樂休閒設施及購物工商綜合區，期使土地資源有效利用。(DJ 財經知識庫，www.funddj.com)

每到春分、秋冬都還能看到一山坡上一雙雙採茶的手，近十年來因為年輕一代出外就業，村子裡人力銳減也多半使用剪茶刀取代，但茶樹還好好的在滋長換葉，怎麼這個大地主——農林公司一聲不響，說賣就賣。我國中時曾翻看過父親拍過的一些照片，是父親與村子裡的一些長輩及其它縣市的茶農們串聯到立法院陳情，希望取得購買茶園的權力，一晃眼二十年過去了，佃農還是佃農；然而，一夕之間，農林公司這個大地主爲了更大的利益，轉眼間茶園就落到大財團手中，真是諷刺。父親如果還在世肯定是捶胸夜泣，因為這一小片茶園是從我的曾祖父手中開始栽種的，即使不是自己的地，但百年來就像是家中唯一擁有的祖產。

從小我就是茶園裡混大的，特別是到採春茶時，茶園上真是熱鬧，大人們靠平常的換工來分配不同的採茶日，一區換過一區，稱斤兩來取代工錢；小孩子採的就是補重量差額而已，有時小孩採的還被大人嫌，要求很嚴格。這些茶葉好的部份賣給茶廠，茶枝多的就留在家裡自己喝。村子裡有二戶人家有製茶機，我們採的茶都請他們代製，自己喝的茶不要求品質，挑完的茶骨還可以作枕頭，可用的茶葉就整包放到大鋁罐中(可以容下二個小孩)，要喝了就拿來沖泡。我記得家中很少用老人茶具泡茶，什麼品茗、茶道，我一概不知，只知道家中都是用大茶壺泡茶，媽媽也在六十幾年起就在家門口路邊放一壺水，供過往的鄰居路人解渴。

高中之後到上大學、出社會、結婚都在外，茶園已成為我對家鄉的重要回憶，每次回家總會一個人到茶園走走看看，結婚生子後與孩子說的故事也多半圍繞在採茶的趣事——在採茶時偷偷跑到草叢中捉兔子、竟然找不到回來的山路；採茶時不小心摸到一大群的蟲，全身癢到爆還差點嚇暈過去，還有在採茶時偷懶，跑到大樹下睡覺睡到天黑，稱茶時重量不夠還偷放小石塊進去…，說不完的故事，盡是家鄉的那片茶園。

去年春節前(2008/12)我特定回娘家一趟與母親聊起茶園被收回去的事情，她老人家悶著聲說祖先們留下的地竟在她手上沒了，眼中有些淚水是在對自己沒能守住而感到的遺憾，對茶園的情感更是盡在不言中，父親走後的十幾年來，每次回娘家，母親都會順手塞幾包茶葉給我，說是春茶還是秋冬茶，總之這一包、二包的茶葉，代表著我們這些嫁出去女兒與娘家間最直接的情感，因為這片茶園從大姐到我，十個孩子每個人都在她的土壤上渡過兒時、青春的歲月。

4.1.2 茶農們爭到處分的權力

今年(2009/7)暑假帶孩子回娘家，又到茶園看看，整片茶樹已被砍光，紅土一片、黃沙飛舞，到處被挖了深淺不一的坑，問了叔父才知道，這一大片茶園地

(全數約三百甲)是要做貨櫃轉運站，不是遊樂區，叔父也透露說「大家(佃農)最後可以拿到一些補償金是我去法院作證二次，講給法官聽，農林公司才答應分的」。

叔父說，這片茶園是他祖父(我的曾曾祖父)在日據時代種的茶樹。那時也不是日本人的地，是村子裡的人自己開墾的，後來日本人來了，給了一些茶樹苗要大家種，就這麼開始種茶樹了。國民政府來台後，這片茶園直接被農林公司接收，續以收茶租的方式讓佃農繼續種茶，每年茶農要採摘二次茶葉給茶廠，好一些的茶葉要交更多斤，平時採的茶葉則可以自由賣給收購商，或作成茶葉賣。民國四十二年實施「耕者有其田」時，這片茶地因為屬農林公司資產，所以佃農們什麼也分不到，一直到 2008 年底農林公司決定處份資產才把她賣給新光集團。

而佃農們為何最後可以拿一些補償金呢？

叔父說在民國 73 年左右，就聽說農林公司要賣地，那時大家與其它縣市的佃農們想買，可是農林公司不願意，造成佃農反彈，紛紛走向立委陳情、抗議，最後不了了之；之後民國 80 年左右，農林公司決定賣地要向農民取回用地，大家又再串聯一次，三義鄉農會也協助茶農抗爭，並選出幾位老茶農代表向行政法院爭訟，叔父還被選為證人到法院說明這片茶園的來歷，不是日本人開墾的，為何農林公司可以專斷獨攔？最後法院判定茶農的使用權及在處份時得徵得茶農們的同意等。

4.1.3 半農半工的勞動家庭

在我年歲漸長的二、三十幾年內，我的家鄉—三義，確實變化很大，從原本是以種植香茅、樟樹來提煉油的山林作坊(我父親那一代的經濟勞動主業)到我生出後即已時興出口的雕刻手工藝術，那時稍有辦法的家戶都想做些雕刻的生意，但是得有相當的資本與技術的，我記得父親也曾與三五好友合作過雕刻木業，但以失敗收場，家中剩了好多半成品，都被拿來當材燒；小學三年級父親與原班友人又轉作雕刻周邊產品—木絲作坊，利用雕刻用剩的木材，以高達一樓半的重型刨刀機進行截切、刨絲、曝曬、捆壓等工序，之後再交給雕刻包裝廠，把木絲襯在雕刻品底下(防撞)出口，這是我國小到國中二年級時所了解到的木業相關作坊。

民國六十四年左右，家中除了以作木絲、採茶之外，父親早已從鄉裡的永森食品廠的守衛室調到永森企業的西湖農場，這個農場就在我們村子—西湖村，主要種植橘子(椪柑、桶柑、溫州蜜柑)、百香菓等，而這些柑橘採收後就運到鄉裡的食品廠作罐頭出口到日本、美國。記得我從小學二年級起，只要是週日或寒暑

假都會跟著父母親到農場幫忙採收柑橘，雖然年紀小對於打工沒有什麼概念，只知道週末應該是要出去玩，怎麼都要去山上工作，但如果不跟著父母親去，家中也只有我跟祖母二人，不是看電視就是跟鄰居玩…。在父親的要求下我週末大多是在農場度過，是有些心不甘情不願，但能拿到一些零用錢，又能被大人們稱讚，心裡也覺得蠻驕傲的，特別在學校向同學炫耀採橘子的功夫，爬到橘樹上用剪刀偷吃橘子只要幾秒鐘就搞定又不會被逮到等有趣的事情。

除了週末到農場打工外，平常下課後的工作就是去採茶了。國小五年級開始，每天下午約四點半左右，聽到父親的摩拖車聲音響起，還在看卡通的我趕忙關上電視、躲進房間假裝在寫功課，或是立即到廚房去燒洗澡水…，看能不能躲過去採茶的工作。父親通常四點半回來，換了衣服就會到茶園去除草砍木材，當然他一定會要我一起去茶園採茶，我和七姐二人一起採，每次都採到天黑，冬天更慘，在霧茫茫的山坡上採茶，直到父親說可以回家時才下山。

4.1.4 種洋菇，全家總動員！

說到我們家作過的農務還真不少，從我五歲左右記得的就是種植木耳，後來種洋菇、甘蔗、養了廿幾頭豬、廿幾頭乳牛、還有木絲作坊等，從未間斷的農事，維持著全家十幾口人的生計與一個個孩子們唸書的學費。種洋菇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事，參與的機會也較多，整個生產流程到現在還記得很清楚。首先，得先把菌種從綠色的玻璃瓶中挖出來，再在把堆成山的稻穗切成小斷，之後一直澆水悶到腐爛(這個澆水的工作幾乎是我們小孩子的工作)，最後靠著人力的協作，把爛腐的稻穗疊框成正方立體形狀，幾乎超過一個成人以上的高度，這些方正立體的稻穗疊，就是小子玩迷宮的好地方，但沒隔幾天，這些個立方體稻穗，就得一鏟鏟的挖鬆，由一群大人、小孩們接力搬運，把這些腐爛的稻穗上架到菇舍的鐵架床上。

菇舍通常是用茅草搭建的，幾乎有二層樓高，裡面則是由鐵架架起的培養床格，上下間約有十格左右；這些腐爛的稻穗培土就鋪在格子中，最後再把菌菇種灑在上面，如此就算完成一半了，接下來的工作就是加溫的工作了，菇舍門窗要緊閉，從外頭燒熱水，用管子把水蒸氣灌進去裡面，讓菌菇快點成長。之後要天天定時澆水，這個工作也是我經常在做的，因為我個子小爬得快，父親就叫我爬到最上面一層，再一層層往下澆水，這個工作不輕鬆，光是牽水管繞道就得花上吃奶的力氣，不過做久了技巧也純熟了。

當時村子裡大多數人家都種洋菇，主要是因為農會在推廣、收購，對農家來說種植經濟作物主要是為了收入，而要讓洋菇長得快又好，一定得細心照料，工

作也都靠人力無法用機器取代，我們家因為人多，到洋菇大出的時節，洋菇含苞未開時就得開始採收如果開過頭就沒有人要買了，所以半夜二、三點，父母親與四姐(老三以上的都嫁出去了)負責採洋菇、四點左右五姐以下的我們就開始到菇舍切洋菇，我大約早上五時起床，是最晚出動的人，常常得摸黑(沒有小燈)跑到家後面的菇舍找大家，一起切洋菇到早上六時半，而媽媽採完洋菇後會先回家煮泡麵等大家，早上七點左右父親就把一袋袋切好的洋菇送到收購場去，這時大伙回家吃泡麵準備上學了。

雖說我們是佃農之家，但家中主要的經濟來源並非靠著這片茶園，還是靠著父母親的多樣化勞動、與鄰居換工、到農場上班來賺取現金，特別是買米、飼料等。記得母親最常說的就是她去米店賒帳，家中沒有水田，靠山林作物是很難吃得飽的，種菜、養雞鴨豬都是為了賣錢去買米，知道家中有一畝田是在我國小四年級左右，村子的幾畝水田都是比較有錢人家的，我們家的則在后里地區，靠茶園、種田也不夠，還得靠勞力去換工或到工廠工作才是比較可靠的收入來源。所以，自我有記憶以來父親起就已在永森企業工作⁴¹了，從守衛開始做到西湖農場、枕頭山農場的主任，早年因為守衛有輪三班，父親與母親協調分工，日夜都有人可以照顧木耳、採洋菇等農務，後來姐姐們紛紛到加工區工作後，就不再以種植洋菇為主，父親才請調到農場工作，那時家中還養了幾頭乳牛，平常母親負責種牧草、切飼料，大哥負責擠牛奶，我們則幫忙清牛糞等；母親身上好像永遠裝著三顆馬達，一會到茶園種菜、澆水；一會又在廚房煮食準備晚餐、一轉眼人又跑到茶園採個二公斤茶去賣，忙個不停的習慣到現在即使高齡八十一歲，還是可以同時作三件事以上，春節前又是蒸年糕、醃酸菜、拜祖先還順便去菜園澆水，只是近來膝蓋有些退化不能走太多路，但精神抖擻，令我十分佩服。

從「茶園」沒了，憶起這些兒時的生活點滴，其實感觸良多，每次回娘家看到農村生活形態變化之大，總有些失落，大財團的觸角不時探向美麗的丘陵地區，我的家鄉一個小小的客家村落，在開發商與政府的文化建設產業思維下，變化頗多。三義的地形就是山多田少，無法以農作經濟維生，山林資源是早期農家生存的基礎，在經濟起飛的年代中，農村土地取得相對便宜，工業化、加工業的設施也進到了小村落，早年三義除了永森企業的食品加工廠、在地世家開設的高污染皮革廠、陶磁廠外，民國七十二左右在高速公路三義交流道開通後，裕隆汽車及周邊衛星廠、大型休閒渡假村等都吹向了這個小城。

⁴¹ 民國五十五年苗栗縣農會經營不善，決定農場土地，一百五十甲，出售給台中財團永豐（何永）集團，何頭家買土地後托中人葉昌海（歿）要我父親轉職到他公司專管理土地並開發農場，父親喜出望外的接受了，主因是辭職縣農會可領到互助費約三萬元，一來得還清兄弟分家帶來的債務二萬多元，二來天天可在家鄉上下班對以負責家庭責任、子女教育等方便有加，父親於民國五十五年，六月進入永豐關係企業（永森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的西湖農場服務，在會見董事長何永後正式成為半工半農的勞動者，當年父親四十歲，我還沒出生。（參見附錄一）

4.1.5 小城「工業化」來了

丘陵地中貫穿著一條高速公路，向來三義的霧區因為高速公路三義段常發生連環車禍，還有在我要升國二時的暑假（民國七十年）期間，遠東航空發生飛機失事墜毀在三義的山坡上，國人對三義這是小鄉村應該不陌生。

民國六十七年高速公路通車後，五年後三義就開設了交流道，一部份的茶園丘陵地面改成環狀的泊油路面，主要是為了裕隆公司從新店南遷到三義設廠的需求。民國七十年（1981）裕隆汽車廠開工啓用，一大片白色的廠房就設在我家茶園區對面的山坡上，從茶園一望過去就看到連棟的尖型廠房，而鄉裡也多了許多從台北南下的外來技師，一條通連苗栗到豐原的尖豐公路三義段，上下班時間開始塞車了，一個小鄉村突然成了小市鎮，路邊小吃店生意興旺起來，住宅公寓也一排排蓋起，家中有人在裕隆公司工作的也多少成了新貴階級，以車代步的年輕工人走路都有風；汽車零件周邊的衛星工廠一家家興建，工業化的汽笛就這麼在山林間吹奏著。

當然除了裕隆公司的汽車主業外，周邊的衛星廠一個接一個的開張，從苗栗、台中各地招募了不少工人，有做汽車皮椅套的、做安全帶的、做避震器的、…，村子裡每家多多少少都有人在這些工廠工作，我七姐高職畢業後就到裕隆公司工作，一開始做生產線擦車的作業員，她說擦一台車又要限時、又得用特殊溶劑，搞得她身體不堪負荷，但外人看來能在裕隆上班肯定有好將來，她做了二年後決定考夜大，白天在工廠工作晚上與一群同事到聯合工專進修，那時她也調到會計部，常常點著數千萬的薪水發工資，而我也已到新竹女中念書了。

裕隆公司三義廠有工會是我進入工運之後才知道的事。民國八十三年左右裕隆公司小開嚴凱泰實施廠辦合一政策，把研發中心、新店廠、台北廠辦公室集體遷到三義，以節省相關成本；在當時引起員工極大的反彈與抗爭，期間大台北地區密集的關、遷廠抗爭權益運動也一波接著一波，如：台塑關渡廠、卡林塑膠廠、正大尼龍廠、嘉隆成衣廠、五大成衣廠、三洋電機廠、中興紡織廠、勤益紡織廠…；裕隆汽車因為在產業上是國家特定保護、發展的工業，因而在運動上也與傳統產業工人面對關廠、遷廠的命運略有不同，在權益談判上較快取得協議，至於在三義廠的抗爭行動，九十年代能聽到零星的抗議大都是為年終獎金或無薪休假停工所引發爭議。

每次回娘家總會聽到一些商機的動態，一會兒是西湖農場將開闢為亞洲的迪斯奈樂園，與隔壁村的另一座永森企業農場一枕頭山農場拉一條纜車相連，成為森林遊憩度假中心，或是傳聞某大佛教廟堂要到三義蓋大型朝聖中心，還有聽說

慈濟要來蓋醫院…等。確實，隨著西湖渡假村的興建帶來了工作機會與周邊商機，沒幾年，在車亭休息站對面還開了一家麥當勞；我們家茶園區的小路也因為九華山大興善寺的興建、啓用，週末有大批早朝聖的佛教徒開車經過，爲了擴寬馬路，不得不挖掉一些茶樹；最後，2008 年末，整片的茶園成了工商綜合開發區的預定地，在政府、財團與觀光轉型的商機刺激下，百年茶園終不敵市場化的進攻與佔領。

從一片茶園消失，我看到了百年前殖民歷史中一個無產的貧農家庭如何走過辛勤打拼的歲月，我的原生家庭從半農半工，到工業化的帶動刺激下，姐姐們很早就進到台中潭子加工區工作或北上求職，只有我在高中就出外求學一直到大學畢業，成長過程中在父母兄姐的努力下，家裡的經濟雖非富裕但不愁吃穿，進到運動後才有機會思考台灣的經濟發展與土地、人民之間的關係，透過追溯家中的百年茶園歷史，我得以照見這片曾經孕育底層人民的土地，走過殖民墾荒到茶樹青蔥再又回到黃沙滾滾，水泥化是它的下一個面貌，但那曾經美麗、充滿笑聲與汗水的勞動記憶並未消失在我的心裡！

表 1 香伶家鄉「茶園」記事與三義小城變遷事件整理

年代	事件	結果
1983 年 1 月	中山高速公路為台灣第一條國道。1971 年開工，1978 年通車，三義交流道通車日為民國七十二年一月，我當時就讀國三。	
1976~1981.5 月	政府以關稅保護汽車產業的政策下，裕隆的汽車銷售量屢創新高，嚴慶齡趁勢擴建新店廠區，直到民國 60 年（西元 1971 年）台灣能源危機時造成汽車滯銷。但嚴慶齡仍計畫繼續擴廠，在民國 65 年（1976 年）選定三義為新廠區。1981.5 裕隆三義工廠竣工啟用	1988 年裕隆汽車公司自行設計開發之「飛羚一〇二」上市。（這就是我所指的生產秘密基地）
1989~	西湖渡假村創立於 1989 年，是一強調歐式花園景觀及親子遊樂設施的遊樂區。西湖渡假村位於苗栗縣三義鄉，從國道一號三義交流道下不久即可到達。	三義交流道周邊，西湖渡假村、渡假飯店、木雕街、火炎山、勝興車站等景點把三義西湖村這個小村落搞的交通經常打結，村民出入十分不便。但也因為週末湧入的觀光人潮，許多村民做起糕點生意、手工藝品，失業問題稍有緩解。
1895@1952~2009	台灣農林公司在全台灣土地資產高達 3,888 公頃，是上市公司大地主之一，雖多為茶園與山坡地，但近年在政府積極投資交通建設，使得多數農林的茶區受惠，該公司的中長期規畫，是結合原有茶廠，開發為觀光渡假園區，目前至少已規畫將開闢 6 家五星級飯店的構想。近期則有包括苗栗三義工商綜合區，與結合苗栗銅鑼科技園區的生活圈規畫。（2008/11/17 工商時報）	農林董事長林金燕表示，去年底獲准開發的三義工商綜合區，預計明年（2009）上半年前可取得開發執照；同時，配合未來工商綜合區的繁榮，月前與美國 Atman-歸真集團（Gaia Hotel Group），簽訂在三義工商綜合區，合作發展環保旅館事業備忘錄。2008/11/17 工商時報
2005~	慈濟基金會茶園位於苗栗三義地區，原名為廣聖茶園，茶園面積有 30 公頃，目前與茶改場合作建立有機茶園栽培管理模式，生產有機烏龍茶、有機紅茶及東方美人茶等產品，該茶園為	慈濟中部院區則另於 2006 年設立於台中縣潭子鄉。

	當地人士捐給慈濟供做慈濟醫療文教預定地，後因地目變更未過而仍以茶園區耕作，稱作慈濟茶園山	
2005. 11. 11	九華山大興善寺從苗栗縣銅鑼鄉九湖村遷往三義鄉西湖村，在近千民信眾虔誠護送下長達數公里的車隊，浩浩蕩蕩，把南下車道照得燈火通明，沿途佛像臉部也有燈光投射十分搶眼，彷彿大佛夜行軍。	從三義交流道通往大興善寺的遊覽車專用道就是將原本農林公司的茶園區小徑予以擴寬，但部份路因屬私人茶地，段不願提供更多土地出來，造成不少糾紛。
2009. 7. 4-12. 30	高速公路三義交流道支線通車，週末大批往大興善寺的交通對西湖村村民出入的影響略為改善，新光集團的貨櫃轉運中心正式動工。	暑假帶小孩回娘家，家中茶園區已開始開挖，原本綠油油的茶園已挖去大半茶樹，露出三義特有紅土。媽媽說，前陣子大家都去把茶仔撿完了，現在被挖了好多洞，不知道這塊地的用途！

第二節 另一個家／都市無產的「夫家」

從我的原生家庭走入另一個家，中間我已投入工人運動五、六年的時間，要說幸運，補社會學分也可，因為在運動中我讀懂了「階級」的政治意義，但真要理解自己的階級處境、在生活中實踐，進入婚姻讓我真正體悟了階級的社會真實，擠壓在家內不可承受之重。

民國 83 年 11 月我嫁到柯逸民家中，多了老婆、媳婦這個社會角色，民國 88 年生下一個男孩後我又成為母親，多了這三個吃重的角色，我還是待在運動線上，主因是我與老公—柯逸民都是運動中的一份子，這是公婆在之前就得認受的現實，而間接的原因是我們在做運動就是這個「家」處境結構的反映，或許表面上公婆並不支持我們搞運動，但骨子裡他們都非常反國民黨，有一種素樸的反抗意識，他們理解我們在做是反國民黨政府（二千年後我們反民進黨更多，他們卻不太談）；越了解這個家的掉落與痛苦的歷史，越可以理解公婆這一代人之所以會認同民進黨的原因，只是我不太同意他們的反國民黨只剩支持民進黨／台灣人這條路，沒有其它的想像。

4.2.1 從扛家計的婆婆談起

婆婆在我嫁入柯家前就在家中前院賣起家庭便當，每到中午許多上班族、家庭主婦就來家中買便當，炸排骨、雞腿、魚排…美味可口，一天下來可收到千把元，但看著婆婆每天一早就去通化街採買、十時左右開始煮菜、十一時半就有人來買。忙到下午二點，自己才吃一些剩菜。下午睡個小覺，就得忙洗衣、曬衣，傍晚時分煮著晚餐、打掃家內，晚上孩子們回家吃晚飯後，又再忙著兒子們的大小事…，她這樣的日子過了 20 幾年。

我看到一個家庭主婦兼負擔家計者的一生勞動，沒有什麼幫手，公公瞧不起婆婆賣便當，常常跟她伸手要錢又不幫她的忙，每天早上六點多就可以聽到他們在院子為錢爭吵；其它的孩子在讀書的、上班的也都不太分擔家務，與我的家庭經驗非常不同，有從公公眼界中標示的性別上的刻板落差(操賤業／不分擔家務)，也有這個家庭複雜的歷史發展脈絡，總之，我嫁入之後覺得全身不對勁。

一開始我無法理解這個家的重擔為何會落在婆婆身上，也不理解先生與弟弟們為何話不多，公婆每日的爭吵都在孩子面前上演，這是什麼樣的家庭啊？我不太敢問先生這方面的事，他初期會提醒我不要管家裡的事，做好一個媳婦的角色幫幫婆婆就好；但家中多了一個外人，公公其實很想找我說話，我嫁入這個家時間較久後，他有時會嘟囔著婆婆的不是，說他以前好不容易打拼出的事業被搞垮，連個電話都不會接、連三個便當多少錢都不會算…，這個女人如何如何。住越久越了解公公婆婆之間在吵什麼，先生兄弟四人為何說不上話，這個家有著沈重難解的小歷史，與台灣的經濟發展過程有直接的關連性，雖也可用時運不佳、做生意有賺有賠來解釋，但用個人不努力是說不通的。

公公住在苗栗縣後龍鎮龍港村，是一個小漁村多數人都是靠打魚維生，民國 40 幾年公公(16 六歲)就獨自北上打工做水電，28 歲才回家相親娶妻、生子，民國 57 年帶著老婆、小孩(我先生)再度北上在台北縣永和落腳，做起水電工程的事業，起初因為台北縣市正在大興土木，營建業強勢，水電工程做的很不錯，四個孩子陸續出生後，婆婆負責帶孩子並煮食給工人吃，民國 60 幾年公公又包攬到許多大型國宅興建業務，在工料都叫好後，沒想到民國 68 年，台灣受到退出聯合國的影響，這些營建資本突然喊停、整個工期拖延，造成公公事業週轉不靈，付不出工人的薪水及工料費，把所有的資產都拿去抵押，最後連住的房子都沒了，全家人開始了搬家的流浪生活，躲債、付不出房租的日子，公公整個人從此失志消沈下去。

怎麼辦？婆婆看著孩子要讀書、吃穿；除了向親戚借錢外，得靠自己想辦法，她開始在路口擺攤賣早點，20 幾斤的豆漿從四樓搬到一樓，沒有人幫她，每天給孩子帶便當，給車錢，她說這是一定要做到的，「不讓孩子被人家看不起」。孩子長大一點後，婆婆開始賣便當、公公也偶爾接一些小工程，家庭經濟才稍有起色，但四個孩子讀書要錢、房租也貴，不可能有積蓄，公公一心想翻身，有一些錢後就想再做投資，他的經營哲學是買房子的人最蠢，買地才值錢，他把念頭動到苗栗龍港家鄉的海埔新生地，花了錢作漁池的堤防，他僅有錢都花光了，卻只能得到漁池的使用權沒有所有權，為了整地他一再向婆婆要錢，廿幾年來，婆婆想存點錢買房的積蓄又都沒了，這些孩子們念大學的學費，全都靠助學貸款，他們兩人不停的爭吵著，算舊帳、扯開支，連婆婆的娘家親戚也全被拖進來吵，孩子們除了有時會向著媽媽外，也很難介入，彼此的關係就更為冷淡、疏離。

4.2.2 第一次與公公爭吵

在我嫁入柯家後，就常聽公公講他發明的負壓式馬桶要申請專利，我其實完全不懂他的專利，也對他想東想西的念頭不以為然，有時還會幫婆婆出氣，對他沒有好臉色。

但他確實意志力過人，不放棄他的夢想，民國 92 年台灣暴發 SARS 疫情，公公趕忙把他的發明寄送到各政府機關、忙著參加世貿發明展，還要我幫忙介紹這個好東西給市政府(我剛離開市府的工作)，的確，他的發明在 85 年時獲得肯定，取得了廿年的專利權。可是，好東西沒有資本生產終究也只是個發明，不會變成商品，公公自從取得專利後就到處去找人投資，期間被竹南的某家陶磁工廠惡整，故意生產一些不良品，還拖延交貨，讓他拿到的苗栗小學廁所改造訂單全泡湯，他對廠方提告還被對方反過來咬說他的專利是仿冒的，公公氣不過在法庭上與法官對罵又被判刑六個月，成了通緝犯；在 86 年底他正在做台北地下街工程時被警方臨檢，直接被帶去台北看守所，關了六個月；而剩下的地下街工程就落到我先生頭上，那時柯逸民在台北一家工會才做不到三天，就得辭去工會工作趕忙收拾殘局，捲起袖子與一些搞工程的廠商交手，硬著頭皮、賠錢搞完工地的

工作。

公公出獄後整個人更封閉、消沈，88 年底孩子也生了，下班後待在家裡的時間比較多，但公婆的吵架聲卻從未減少，雖然有了孫子讓他們稍感欣慰，但也因為關心過度，時常搞的我心裡很不舒坦，想說，如果我能力一定要搬出去住。民國 92 年間，我從市府轉到工委會工作，柯逸民也到了南山人壽工會工作，我剛換新工作，壓力不小，每次回到家中除了我、小孩還有二位小叔，小小一個房子就住了八個人，空間上非常干擾，大家不時火氣都很大；記得有一天晚上，柯逸民還沒下班，只有一位小叔在家，我在房裡照顧小孩，突然間，婆婆跑到房子找我哭訴，公公馬上跟進來，作勢要打婆婆，我實在氣不過就破口大罵，公公見我發怒才跑出去，但一會又進來，手上拿著支票本，說家裡的錢都被婆婆用光了，他的人生都被這個女人搞垮的。

當時，我兩邊都不站，心裡想著「都是你們把這家搞垮的，不然孩子們怎麼都這麼不快樂、一回家就躲在房裡不出來」，一時間衝動過頭，跑到客廳把結婚時掛在牆上著的婚匾砸到地上，還拿出五千塊放在公公桌上說，「要錢，給你啦！」。這個過程，只有小叔知道，小叔原本在房內不出聲，隔了一會他也出來幫腔，他也發怒了，「每天都在吵，到底吵到什麼時候」。公公一開始被我們嚇了一跳，但不一會他也不甘勢弱回嗆我說「你從嫁進來就看不起我們柯家，從來

沒有好臉色，你看不起我，我去牢，讓你很沒面子」。

這是我第一次與公公爭吵，當天，柯逸民到晚上 11 點多才下班，他一回來婆婆就告訴他這件事，他進房後沒多說什麼「該發生的都發生了，不要想太多」，好像他原本就預期會有這樣的下場，後來聽小叔們講，其實柯逸民變了很多，以前只要公公罵婆婆，他就會出來保護媽媽，還曾經因此與公公打架，把家裡的門板都踢破。而公公最怕的就是柯逸民，也會挑他不在的時間找婆婆的碴，柯逸民這些年確實變的很多，比較不會動怒了，但只要情緒一來，我們房內的門板、櫃子、小東西該破的都破了。

4.2.3 公公發病，孩子成禁臠！

民國 92 年中我們搬到南港住，會搬出住與我和公公的爭吵有關，婆婆看這樣下去早晚會出事勸我們趕快走；與公婆分開住了一段時間，公公有一次與朋友到大陸找生產馬桶的工廠，希望有台商願意投資，一去二個多禮拜，回來後直呼有大陸公安在巷口監視他，他在大陸是被菩薩指引才逃回來的，他拿出一本又一本的照片跟我說，他是這樣那樣穿牆逃出的，飯店的菩薩保佑他不被公安捉走…。我盯著相片，不知該如何回話，拼命點頭又不時轉頭望了婆婆、先生一眼，大家都知道情況不樂觀了。

聽到公公細數自己在大陸的遭遇，一開始我是害怕的，但仍沒有把他發病的事當真，但之後的情勢就很棘手了，因為公公的茅頭對起我來了。當時我在工委會工作，三不五時就會接到公公來電，說一些激怒我的話，主要還是因為他在家中與婆婆爭吵，氣不過就打電話給我，一開始先試探我的口氣，之後見我不耐煩了就先數落婆婆的不是，然後就切入重點說孩子跟著我們會餓死、病死，還是他來照顧比較好⁴²；更嚴重的是說我們住南港空氣不好，搞不好全家會被毒氣毒死（我們住在南港輪胎廠對面），有幾次他一大早五、六點就到我們家附近檢查有沒有毒氣排放，還去找里長說要檢舉南港輪胎公司，反正費盡唇舌就是要我把孩子帶回去給他照顧才可罷手，最後爲了安撫他，孩子在幼稚園中班下學期時被接回去了，我只能在週末時接他回南港。

公公發病的事我一直不能接受，一是這個病應該很早就有了，大家都不去面對與處理，最後婆婆及我二個女人竟成爲他發怒的「壞人」；二是，我的孩子從小受他們照顧，卻也被窮慣了，我做爲母親無法親自教導，甚至在週末要把孩子

⁴² 民國 92 年我們存了一些錢到南港買了一間老房子，本想把公婆與孩子一起搬去住，公婆在台北住了 30 幾年一直是租房子，我們原本一家八人住在一起，有了孩子後生活空間更緊壓，加上公公一下子失去孫子的陪伴及患了身心方面的疾病，他對我們在南港住宅安全性有很深的恐懼感，才會一直要把孩子帶回去給他照顧。

帶回南港家中時還得想出各種理由說服他，心中的怨與怒勝過去同理公公的病與他一生的落寞、孤單。這個家庭關係的糾結難解也深深影響著我的夫妻關係，我可以理解柯逸民身上被層層壓制的辛苦，但他可以更主動做些事情，又，或許他做不了什麼吧！這幾年，他真的變了，他勸我把孩子交給公公照顧，這樣應該可以緩解公公的不安，而他也不想老是當壞人了，每次在最後關頭都要用強壓手段把公公送進市療的急診室，他說：叫救護車。

三年前我們才把孩子從公婆那裡接回來上小二，這幾年，我一直有當母親的愧疚，深怕孩子已被寵壞、分辨不清公公在發病與正常時對他說的話；而我最想知道的是，在那段期間，孩子怎麼與阿公相處？怕不怕？這五年多來，公公發病次數越來越頻繁，每一次起因都不太相同，大部份原因好像與他的馬桶生意有關(只要聽到有人要下單就知道可能不妙了)，部份與藍綠政治爭鬥的激烈引發他的想像有關，而他對我們陣營中的鄭村棋也非常反感，常把老鄭的相貌、言論拿來批評，一直覺得我們是被老鄭陷害的。經歷越多次，自己內在的積怨似乎慢慢找到了出口，因為，我好像看懂公公每次散發出的警訊，不是那麼不可理解或超乎想像，只是他自己可以承受的壓力與想出的解決方案與真實差距太大，而因為他的矛頭不是對著婆婆就是我(他迴避面對柯逸民)才觸發我的情緒爆衝，以前我因為氣不過而違逆他，反而造成更大的困擾，使得我與先生之間更無法對話。

現在我略為理解到他就是得有一個處理內在世界情緒緩解到爆開的歷程，只要不涉及暴力，家人之間的相忍與善意引導，或許是唯一的共處之道。

4.2.4 放下纏鬥的怨，我的「悟」與認受

從自己的處境中習得了認受的理解與領悟，在運動社群中也參與了夏林清老師舉辦的家庭經驗工作坊，我幾次去參加了精障者及家屬的聚會，在成員們時而激動、流淚的過程中，席間我不只一次讀到某種共通的「情感」在淺層流動著，那種情感帶著痛與怨，但又不太只是家內／個人的，似乎這些座落在不同個人身上／家內的「病」，有著一定的社會成因，大部份人在工作坊中試著去理解這些社會成因。

從我有限的經驗中，我看到了無數病友被這個社會的有用／沒有用的分類而受盡擠壓／扭結／丟棄的社會真實，陪伴的家人有著說不出的苦，卻也長出另一種觀看／解釋社會的視角，病友要被家人理解，家人更要去理解個變異扭曲的社會成因，才不會雙重擠壓回家內，擠壓著最弱的成員(如我婆婆、孩子)，我的「悟」是有著階級反抗性的，要把這個家內的壓力釋放至社會中，打破家庭的牆界，不是在權力關係中相互制約而是在社會空間中相互給予。

我在另一個家內，見識到了社會結構與家內衝突的政治性，也理解了與我不同成長條件背景的枕邊人，三十幾年來壓抑情緒、緊閉心房，對不公義之事暴跳如雷，對政治極其敏感，時而消沈無語，時而意氣風發。這個家對他來說痛苦多於快樂，在外搞階級運動，在內必須認受與承擔；而我與這樣的家庭生活了 15 年，在兩個不同的家庭經驗中學習理解「差異」的歷史脈絡，我的原生家庭有著從無到有的農工參雜的勞動歷史，父母親咬著牙把十個孩子拉拔成人；我的另一個家在經濟大環境中歷經大起大落，在大都會中載浮載沈，靠著婆婆強韌的毅力與強度勞動撐起這個家，我在這個家生活著，以肉身「溶混」於底層人民的行列中，因為運動我得以放下了纏鬥的怨，也磨出了夫妻與公婆相處之道，用社會性理解這個家的政治歷史，我終於認受承擔了一些。

第二篇 工運與政黨政治—工委會的轉型(／進)探究

本篇的章節是以我 2003 年初進到工委會的運動位置後，代表群體與運動圈及藍綠政治結叢間的交手過程記錄，許多的經驗還在咀嚼與面對中，無法進一步提出結論式的總結，許多運動中擠壓的關係張力透過書寫過程才逐漸有條件去碰觸，因此在內容上有些點到為止的描述力式反應了我狀態調整的速率，想說的未必說得清，能寫的也還在猶豫中。這些猶豫在文本中可細查發覺，尤其對照前一篇我書寫自身的運動歷程與家內經驗的回觀，在心境上是非常不同的。

不過，我想記錄運動過程的動力是強烈的，因為我自認我們走過的路、開拓出的田野記實反應出的社會真實結構矛盾，不應被更大的主流論述所取代、壓下，運動者除了自身的實踐，亦是社會改革的中介者，走在自主運動中形形色色的人民，是有清楚的面貌與身形的，我想把走在這條「反抗」糾結交纏社會景況中的小人物，如何出場又如何消失的足跡印在台灣這塊土地上，也對自己曾與這樣的人民同行感到光榮，是為運動也為我個人的需要；只是這一路的我處在高度的焦慮狀態中，從 2003 年至今台灣歷經的政治變化，早超過我的意識與能力範疇，但書寫過程我一再看到自身的動能不減，即使挫折不斷，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行動我們都走過，這股強烈的動能讓我找到了一些小路、一些同伴。

本篇的〈紀實〉是以我在代表的工委會群體，長期實踐「不藍不綠」的運動自主路線，有意識的「介入」一場場的藍綠政治鬥爭，我認為對摸索組織轉型、參與者的認同轉化都發生了效果，只是該提取更確定的論述，非我一人所能承擔，因此，我先以「運動自主性」來界定我們的實踐敢徑，以面向一般的公民群眾(包括運動社群)的政治化來記錄工委會從工會、勞動關係進一步走進地方政治、公民社會的運動歷程，這個記錄是做為運動者間日後相互理解與檢討的素材。

第五章 工委會的實踐路線

雖然從 1993 年起我就參與了工委會的工人立法行動及每年一次的「秋鬥」遊行，但當時主要的心力還是放在基層工會及台北縣／市的地方勞工行政業務為主(參考第一篇的運動者生成之反身探究)，因此，同時期以工委會、勞工陣線、勞動黨等三大團體間因統獨立場分歧、與政黨關係的路線之爭、工運議題的競爭合作等激烈戰況，我是透過運動社群的會議及參與在不同的工人版修法小組⁴³中

⁴³ 工委會的工人版修法小組由組織者及工會幹部等依各自關注議題及運動上的爭議焦點形成討論小組，我在勞教中心工作時因為接觸大量關廠爭議案，所以由我負責關廠法的研議及討論，曾邀請政大勞研所博士班的張相文協助法案條文的制定；在貨運站工會時亦參加由田淑蘭、莊妙慈、王醒之所組成的民營化小組，就「國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進行討論與提出反民營化的行動論述；同時期的工人版修法小組還有就業服務法、全民健保法、國民年金法及工會法、勞基法等，在我到工委會任職後，主要是勞工退休金條例的修法工作，當時由何燕堂主持，我們

才清楚各運動團體的實踐差異，上到更高一層的視野看問題、想策略。在 90 年代激烈的工運戰鬥階段，我對勞工法的學習是快速的、相關的實務工作非常擠壓但壓力卻相對小，因為主要的戰略、操盤是由鄭村棋、吳永毅、陳素香及在工委會工作的同志們負責指揮調度，我只要顧好基層及配合修法進度的議題性作戰即可。

但 2003 年我自告奮勇到工委會工作後，當時整體社運及工運狀況已走過解嚴前後所謂的「社運黃金期」或 90 年代間的大型群眾對抗、專業遊說的氛圍(李丁讚，2007)，政治上也已從要求政治自由化進一步走到了 2000 年的政黨輪替，民進黨執政後其以掌握國家機器的優勢，進行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的統合治理，社運團體間也因為政治立場的差異、選邊，難以再有更緊密的聯合，再加上藍綠政黨間以奪權競爭，國家定位、族群矛盾的激化成為政治的焦點，擠壓著社會議題的發言空間，工運的訴求、零星抗爭被高度漠視。在如此不利的結構中，我們不得不快速的進行運動策略的調整，以主動「介入」藍綠政黨的奪權競賽中，試圖開展不藍不綠、社運自主的公民參政行動。

本章從 2000 年政黨輪替後工委會轉型／進的探究為視框，就工委會近 20 年來堅持的「不統不獨」、「不藍不綠」路線與其它運動陣營及政黨間的交鋒歷史中(林子文，2004；何明修，2008)，重新理解我們在政黨輪替後藍綠政治挾擊的政治結叢中如何進行轉型／進的歷程，這些歷程與「慢政治」企圖發生人的意識轉化、政治化又有何關連。我在這個時期上到運動前線，負有延續實踐路線的政治任務，又得在運動困境中摸索轉型／進的方向，2003 年的廢票運動（見第七章）是以工運與政黨關係的路線再辯論為起點，以社運思維企圖改變一般公民的投票行為，反省人民與統治者間的權力關係、2004-2007 的「人民老大·參選作主」運動(見第八章)則是工委會繼廢票運動後朝向集結不藍不綠的公民進行階級意識與政治認同的轉化，以進入主流政治(參選搞組織)的方式，讓運動社群的政治化進一步提升。

第一節 從工運自主性談起

過去時而聽聞工運(／會)圈對工委會激進路線的批評。

在我 2003 年到工委會擔任總幹事後所理解到的大概是指「在勞資鬥爭中不輕易退讓」、「在政治上藍綠都批」、「工委會對工會組織上要求做往下紮根的教育，以集體力量逼資方表態或退讓，不輕易尋求民意代表的協助」，這樣的路線在運動上被有些團體或個人批評為搞山頭主義或是自以為是。不管其它陣營怎麼

邀請了工會幹部、學生及世新社發所黃德北老師同參與，提出工人版立法主張並比較了各國的版本，最後工委會委請高金素梅委員提出工人版，在立法院與民進黨版（即是全產總版）、國民黨等 12 個版本競逐。

看，以我的經驗這些批評並沒有深入理解我們在是在對峙何種主要社會矛盾；以組織工作及對待群眾的關係上，我們做的相當紮實，特別是在工會自主化的層面，組織者被要求在工會組織運作中落實基層民主的運作模式，讓工人理解與學習集體決策與監督的必要性；但若從另一種批評，如：沒有政治綱領、不敢碰統獨之類的，則不涉及個人恩怨或組織方式上的差異，是與台灣特殊的政治歷史中有關族群政治及國家認同所引發的政治表態有關⁴⁴。

台灣的工運歷史，「自主化」的政治意涵應從解嚴前反黨國控制的黨外運動說起，80年代中後期的工運幹部其政治意識的啓蒙多半與反國民黨控制的階級／民族壓迫的不滿情結有關，特別，對應於台灣的政治民主化運動，解嚴前的黨外勢力中，社會運動在其中曾以衝鋒陷陣的力道衝撞出解除黨禁、報禁，國會全面改選、廢除刑法一百條等政治空間，這些政治力量中新潮流當年拉開的「體制外改革」揭啓了社會運動的發展(簡錫堦，2003；李丁讚，2007)，最終為1987年民進黨的組黨、地方選舉勝利等累積了戰果，期間黨外力量間曾就「議會路線」與「街頭路線」進行辯論⁴⁵，一定程度把群眾(左的)集結路線與靠地方派系支持以取得執政機會的鬥爭路徑搬上檯面；但二十年後，簡錫堦(曾為新潮流系政協)投書以〈重回體制外改革〉的沉痛告白，對當年以「體制外改革」起家的新潮流淪為保皇黨，對工農階級採取冷血政策，表示他面臨與昔日民進黨同志「割袍斷義」的抉擇(吳永毅，2003)。簡錫堦投書也清楚界定民進黨政權的屬性：

民進黨的治國理念，是以建立一個獨立的台灣國為最終目標，對於左右的意識型態的中心思想可說毫無共識，甚至說是一無所知。所以政黨間是以「統、獨」作為「區隔」，也難怪在選舉時會以操作族群議題為競選策略，以分化族群和諧作為獲取選票的手段。(簡錫堦，2003)

從簡錫堦在2003年的投書及其以籌組泛紫聯盟⁴⁶做為攻佔新潮流右轉後留下的中間偏左政治空間的行動，對我想探究的社運自主性已舖了一個底。因為，就我所認知的工運自主性是從清楚「定性」黨外政治力量奪權後的「黨屬性」到

⁴⁴自解嚴後的自主工運分合對峙過程到2003年工委會主張投廢票，社會運動與統獨政治歷史的關係矛盾一直是團體間實質差異的核心，面對外界的批評，我們的政治路線一直是「階級優先」，在統、獨爭議中倡議「不統不獨」。

⁴⁵一九七九年美麗島大逮捕後，黨外領導權由康寧祥為首的公職所取代，急於世代交替的新生代在八二年開始批康，進而組織了「編聯會」，對康寧祥主導的「公政會」發動「雞兔論戰」—群眾／反體制路線是雞，議會／妥協路線是兔。台北市議員的陳水扁被封為「雞」之典範—清流、不包工程，對比選舉掛帥的黨外公職。如日中天的康寧祥，在「雞兔不同籠」的口號圍剿下，迅速流失了黨外群眾的支持，八三年底立委選舉落敗、黯然赴美。八四年勝利的雞宣布組成「新潮流」，一路發展成為今日民進黨最主要的派系。(吳永毅，2003)

⁴⁶泛紫聯盟是曾任新潮流系的簡錫堦在卸下立委一職後，與民進黨漸行漸遠，在2003年籌組泛紫聯盟，揚言走出藍綠對抗的格局(何明修，2008：191)。在泛紫聯盟的網站上簡錫堦以〈重回體制外改革〉一文表示：「…從國民黨到民進黨皆為一丘之貉，執政是以資本主義「競爭」價值觀做決策思考，並沒有扶持弱勢族群的公平正義思維」(簡錫堦，2003)

其與社運關係漸行漸遠的歷史脈絡中，可以認定此力量並非以反階級壓迫為核心宗旨，而是涵混著國族主義與階級的口號，階級力量在其中是被使用又被糟蹋的，因此，我所認定的運動自主性意涵是與之反向生成的。

5.1.1 順法鬥爭到工人立法

運動的「自主性」以工委會組織形成的歷史脈絡來看，1992 年基隆客運罷工事件引發工運界對國家法權無法保障工會自主權的強力批判，決定引用 1988 年苗客罷工事件時，聲援團體及知識界發動二法一案抗爭遊行的模式(何雪影，1992:80-81)，由工運界的七個團體⁴⁷發起籌備，定名為「三法一案行動委員會」，決定在 1992.11.12 當天發動抗爭，定調為遏阻金牛惡修勞動三法，以基客工會的罷工事件突顯「工人守法該死！資方違法，官方沒辦法」，對政府偏袒資方的行徑進行強力批判，這個罷工運動也宣告著解嚴後工人以「順法」鬥爭的抗爭取得經濟利益分配的政治空間已經消失，在勞、資權力／武器不對等的現實中，工人得認清事實，從根本上挑戰國家法權的合理性／正當性。

1992 年的三法一案行動，有效的延緩了勞委會的修法進程，並迫使政府官員公開承諾與工運團體辯論，之後「三法一案行動委員會」也在遊行後改名為「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由鄭村棋擔任修法小組召集人(林子文，2004,55-57)，展開了近十年的立法運動階段。⁴⁸

政治解嚴後的工運鬥爭脈絡從「順法鬥爭」爭取到經濟利益分配的思維，進一步發展成對國家法權及資產階級的批判，引爆的事件是以發動激烈的「罷工」手段逼使資方退讓，卻受到黨／政力量的干預介入，聲援團體及知識份子從中「引導」了運動的打法及走向，把基層工會的勞資鬥爭拉高到對政府法權的鬥爭，工委會於 1993 年接手主辦「秋鬥」，以介入社會立法的運動策略，牽動工會對抗國家法權的控制，這個「自主化」的歷程以提升勞動者的自覺，認清自身的社會階層處境，敢站上對抗法權、國家資本主義政權（國民黨主政下），以集體力量要求政府中立的處理勞資間的剝削問題與社會資源的再分配等，工委會透過無數次的修法抗爭、在各地進行深入的勞工教育，工會自主化即是工運政治化的一個面向。

而工運政治化反應在對待政黨間的立場與關係，工委會透過歷次的介入修／立法過程，敢直接揭露各政黨的自利行徑，讓工人看清其支持的政治如何策略運

⁴⁷ 當時的七個發起單位：女工團結生產線、中正機場工會聯誼會、基客工會、台灣倉儲運輸工會聯合會、勞工陣線、勞動人權協會、全國自主工聯。

⁴⁸ 從 1993-2003 年工委會提出過的工人版法案：勞基法、工會法、全民健保法、就業服務法、關廠法、職災勞工保護法、勞工退休金條例等，部份法案有進行國會版本的立法競逐，如：職災勞工保護法(1999)、勞工退休金條例(2003)。

用，在關鍵時刻如何出賣工人，一次又一次的揭露資產階級政黨的「偽民主」真相，進而實質推動了階級優先的政治發言空間。

90年代隨著經濟成長後越趨不公平的兩極化社會反應在社會立法的加速過程中，政府以社會福利立法來因應矛盾的激化，此間也使得工人立法的戰線指向批判國家處理階級利益衝突的思維，以1993年起工委會提出的「工人版」健保條例要求政府落實公醫制，回歸憲法精神⁴⁹；工委會以持續二年多的立法監督及基層動員的教育過程拉起「反賤保」的運動，並與勞工陣線有多次交鋒；而在政界、企業界、醫藥商、工運界等不同力量的抗衡下，1995年健保法通過的是以社會保險的財務分擔中提供醫事單位掌控醫療資源分配的制度，在整個立法過程中，工委會展開無數次的街頭抗爭及立法過程監督，由不同工會代表進行24小時接力的施壓行動⁵⁰。

介入政府立法的抗爭行動，對基層工人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一個法案從內容的提出到完成立法，其過程涉及的秘密的協商利益交換及階級鬥爭等，一般勞工若未參與其中根本無法提出反對的聲音，而各政黨的民代為其政黨或政治生涯考慮與上層結合都來不及怎麼會看到基層人民，工人立法運動就是把被排除在外的人民硬擠進官資壟斷的政治運作中，要求政府(國家)正視階級分配的問題。工人版的主張：「公醫制，以稅收、家戶所得處理財富重分配」，在密集的勞教及抗爭行動中已被勞工大眾支持，也凝聚了運動的能量才得以在政商聯合的不利結構中要求改變內容，硬是爭到了在保費分擔中政府得負擔10%。

5.1.2 階級優先／統獨其次

從草根立法運動階段中，工委會對工會進行勞工階級意識的教育，提出對國民黨政權所主導的經濟發展及勞動剝削的批判，反應在「工人版」法案精神及採取的抗爭手段中，有關「統獨」的爭論是被置放於次要鬥爭層次來思考的。

統／獨的次要性是相對於階級問題的優先性，在三法一案行動之後，原先七個發起團體中，傾向獨派的勞工陣線以「經過多時討論所提出勞基法及工會法修法相對草案，已在立法院連署成案，…為恐日後兩種版本有所抵觸，產生推動上之困擾；乃決議即日起退出勞工立法行動委員會。」(勞工陣線，1993:6)當時，勞工陣線與所屬新潮流派的立法委員合作提出了「勞陣版」修法草案，把自主工運累積出的成果奉送給民進黨，結合民進黨的「選舉總路線」要在國會中拿下席

⁴⁹ 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五項明文規定「國家應推行全民健保」在其說明文中亦有「國家為增進民族健康，應普遍行衛生保健事業及公醫制度」的立法指導。

⁵⁰ 1993到1995年的全民健保法立法期間，工委會除在工會進行勞工教育外，更以立法院場外施壓方式要求各政黨回應工人訴求，同時動員工會進入立法議事場全程監視投票過程，於1995年公佈立委在法案態度上的投票記錄，供勞工及一般選民在投票時有所參考。(顧玉玲，1995)

次，勞工陣線的政治選擇十分清楚，就是為民進黨吸納工人群眾的選票，打造其為工農下階級爭取權益的進步形像(相對於黑金體質的國民黨)。

90年代中的民進黨政治實力正值上升，許多在工運中出生的學運份子紛紛投入地方選舉，在社運中的資歷多少都增加了其進步性，眾多有反國民黨意識的工運幹部對他們期待甚深，此時，勞工陣線決定退出工委會，表面理由是對權力運作結構的不滿，實則是與其它團體在政治選擇上的差異⁵¹：

就政黨政治與工運派系的發展來說，民主化的開展使得民進黨走向「選舉總路線」，李文忠、賴勁麟、周威佑紛紛在地方參選，台灣石油工會一分會的黃清賢也擔任不分區國大代表，新潮流從直接參與社運的路線上退縮。另一方面，鄭村棋打著「不統不獨」的旗號，帶領子弟兵成立「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結合勞動黨與勞陣以及學運社團，發動了1992年的工學聯合三法一案大遊行，隨後，勞陣的工會幹部對於此一委員會的權力結構，未能反映基層工會的組織實力，而感到不滿，隨即退出。

工委會的實踐路線向來不是以簡單的二分法或線性思考，就以對統／獨的立場、主張來看，工委會召集人鄭村棋曾於1993年正式回應工運界的統獨與階級鬥爭的差異，他強調「不投入統獨運動並不等於迴避國家認同，我們關心的是如何有力量去實現屬於工人階級「自己」的社會，而不是在統治階級的「這個」或「那個」國家裡去選一個！我們根本拒絕在「別人」出的國家認同題目上作選擇，我們這種作法是對目前統獨問題的「否定」而不是「迴避」。」，而鄭村棋對其它陣營的統獨傾向則表示「但我們不會反對有人要為她們的統獨信仰而努力，但我們決不會投入」。⁵²

隨著民進黨逐步從地方包圍中央取得地方執政權，到2000年取得國家最高統治權力，統／獨派的力量消長有了明顯的變化，就以工委會在運動上較常合作的團體發展來看，自1993年勞工陣線退出後，工運上呈現的是工委會、勞工陣線的對峙與角力，與統派的勞權會(勞動黨)則在勞動議題上有間歇合作，但在政治上卻沒有更緊密的連結，最終勞權會也退出工委會(林子文，2009:59)。「不統不獨」與「統／獨」的三者立場差異對自主意識較高的運動幹部來說，鄭村棋提出的「工人不必趕搭統獨列車，先壯大自己」是有號召力與回應政治張力的一種態度，因此，得到了不少工會幹部的認同，雖然勞工陣線、勞權會相繼退出工委

⁵¹ 節錄文是勞陣二十週年紀念特刊「站門陣、戰同線」的官方說法，而在林子文的論文中則指出1992年底勞工陣線主席方來進當選民進黨不分區立委，擁有直接表達勞工議題的政治資源，便藉機宣佈退出工委會(林子文，2004：61)

⁵² 1993年時值「辜汪會談」引發島內二黨三派為此爭鬥的十分激烈，資本家也一再提出訴求，鄭村棋藉機提出《統獨跟工人什麼關係？》的文章，並質疑工運團體對統獨的主張，鄭村棋以為「工人不必趕搭統獨列車，先壯大自己」(鄭村棋，1993；林子文，2004)

會，但在議題卻仍有合作，「分而不裂、鬥而不爭，但我們之間是有區別的」（鄭村棋，2003），這個區別指的就是工運路線選擇與資產階級政黨的關係。

在主流媒體新新聞(謝柏宏 617 期,p.48)也曾有一段關於工運團體與統獨關係的報導：「工委會在意識形態上，既排斥勞權會的左統立場，也排斥勞工陣線的左獨立場。工委會發言人李易昆強調，國家認同問題，他們看不出和工人的階級利益有什麼樣的關聯，雖然他們也同意兩岸關係是未來思考台灣經濟議題所不可避免的，但是他們在內部討論的場合中（例如讀書會），從沒有像勞權會和勞陣一樣，刻意關注社會主義理論或國家認同方向，工委會所要面對的，是更實際的現實制度問題。如果真要為工委會冠上一個意識型態的框架，李易昆說，他們所主張的是公平、正義的社會主義。從鄭村棋提出的「先壯大自己」到李易昆指出的「公平、正義的社會主義」，我的看法是「不統不獨」的主張，是指「統還是獨」、「先統獨再左右」等選擇權不是現階段台灣左翼運動應優先解決的主要矛盾，工委會從工會自主化運動進行的階級意識啓蒙，不被資產階級政黨的奪權所收編，我們以集結工會自主力量對抗資產階級國家的壓制，每年一次的「秋鬥」操演即是朝向組織出具激進性草根力量的實踐過程。

這樣的實踐進程被不同政治傾向的陣營批評為「工團主義」⁵³或只關注經濟利益，無政治主張、政治面貌模糊等，是在質疑工委會「迴避」主權爭論並缺乏一套引領左翼力量的政治綱領⁵⁴。要反駁這些質疑並不難，因為「不統不獨」是「否定」此時各自政黨結合資產階級利益為建立其統治合法性而大作統／獨政治認同(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的文章，弱勢者的生存條件在此間被嚴重擠壓，左的批判性論述無法與之相抗時，必須先在運動中建立弱勢者間的相互支持與新的政治認同；「不統不獨」在 90 年代中後期可以獲得自主工運團體幹部們的認同(林子文，2004：62)，主要還是工委會在經濟性鬥爭中清楚「撥開」了資產階級的統獨與奪權及攫取利益間所製造出的各式煙幕，一般人或許受其牽引、隨之起舞，但工委會在做的是把「誰的國家」認同與「階級的依附性」分別對待，只有解離此依附性才能奪得工人階級自主發展的空間，生成具有階級認同的主體意識。

5.1.3 抹紅、藍綠二分，民進黨的鬥爭技倆

⁵³ 工運圈指稱工委會是工團主義從勞動黨到工人民主協會均係指稱以「全力搞工會和經濟鬥爭，然後拿會員選票去和他政黨交涉」的手段。特別工委會在 2000 年以前主張工運與政黨關係的立場原則「等比結盟、等距外交」、「有奶便是娘」等是運動團體指稱工團主義的政治內涵。(楊偉中,2004)

⁵⁴ 工委會成立的背景脈絡可以從幾個工運團體描寫的九 0 年代工運分合記錄中了解在工人順法鬥爭的運動階段，以統獨／左右的政治立場產生的作用力，反應在與政黨政治的關係與選擇至工委會的運動位子是從實際鬥爭中長成的工運隊伍，而非先以標舉政黨／政綱的左翼政治號召而集結產生(林子文，2004,p56，勞工陣線廿週年特刊 2004.5，曾茂興的工運傳奇，何明修，2008：69-71)，而具體指陳工委會沒有綱領性願景是在 2003 年秋鬥勞工高峰會中自主工聯會長劉庸及工人民主協會楊偉中的會議發言。

90年代的工運陣勢中，統獨認同差異區分不同的運動實踐過程，這個差異在2000年台灣首次政黨輪替後，民進黨政權的「本土／台灣人」等主體意識漸居上風，主張統一或統派力量則相對被壓抑，工運團體間差異的對話沒有繼續前進。但政黨輪替後政治結構的衝突反應在朝小野大的國會生態中，少數執政的民進黨政府面對民間各式的批評，將其施政不佳的原因歸究於在野黨的杯葛，而藍綠政治集團也競相拉攏不同社會組織以鞏固其社會影響力的政爭，社運團體各自發動的行動很快的被解讀為「非藍即綠／非綠即藍」的政治光譜中。

這種藍綠二分法，對於統治集團間的鬥爭或許有立即的利益(如拼選舉、指責對方)，但放在工運的脈絡對民進黨則未必有利；以2002年「秋鬥」為例，民進黨籍立委李明憲、廖本煙、李鎮楠三人於11月10日秋鬥遊行當天早上在台大校友會館召開記者會，標題是「秋鬥？鬥什麼？馬市府團隊十舊特務勢力十中共同路人，國共合作，鬥臭台灣」，並列出「國共合作」的具體人物關係圖，直指工委會的秋鬥是台北市政府團隊(指國民黨的馬市府團隊及勞工局長鄭村棋)在介入，要求工委會交代經費來源⁵⁵，並以鬥陣團體中有勞動人權協會而指控工委會為中共同路人，該三名立委以扣人紅帽子來為其施政傾向資本家、對弱勢者打壓等行為開脫，並順勢移轉政治上的危機。

2002年的「秋鬥」主題是「失業真恐怖」，弱勢者面臨失業的威脅以致「活不起、住不起、生不起、讀不起、老不起、病不起」的生活壓迫日益明顯，在一一檢視執政黨的財經、社福、勞工、教育等政策後，工委會從階級利益分配不公的角度批判扁政府的施政，同時定性其上台前高唱的「新中間路線」其實是服膺於新自由主義的資本優先、政府退位、市場至上等勞動彈性化政策，對弱勢者經驗到的就業不穩定、生活成本增加有直接的影響；當時台灣的經濟已是靠全面的自由化、國際化才能生存的論調中，扁政府與國民黨在全國級的經改會議中大唱雙簧，聯手減富人稅、幫資本解套找活路，搞二次金改鬆綁法令等，藍綠兩黨在政治上各有所圖，但在經濟政策上卻相去不遠，藉著經改會議盤算著佈建政商網絡以累積未來的選舉資本，對微弱卻尖銳的社運呼聲⁵⁶，根本不以為意。

為何民進黨三位立委在此情勢下還要急著把工委會抹紅呢？真正的目的還是護主心切、盤算其各自的政治利益，因為只要把對手抹紅即可鞏固原本的支持者，又可轉移執政無能的焦點，在政治上製造更多挑動藍綠、統獨情結的內部矛盾，即使不能打倒對方，起碼不會流失基本群眾。而「秋鬥」的社運力量雖小卻

⁵⁵ 參考聯合報，郭瓊琍 2002.11.11 的報導，工委會亦在隔天由召集人王耀梓、何燕堂等一行人赴民進黨中央黨部抗議抹紅的劣質手法。

⁵⁶ 參考工委會 2002.5.1 反白金政權行動文宣，工委會以圖表方式對比出新政府上台後以政策性補貼送給資本家的大禮遠遠超過以勞工法案形式上照顧勞工的權益。在五一勞動節的行動中，提出勞工要實質紓困的訴求：1.勞工全面減稅，薪資扣除額提高到每戶 27 萬元；2.失業勞工國家雇用。

精準而立即的揭露了民進黨政權的虛偽性，民進黨無法回應基層人民的不滿，最後只以扣對方帽子的手法來鬥臭對方。

5.1.4 「政黨附庸」vs. 「等距外交」

政黨輪替後自主工運的伙伴更少了，許多過去相當活躍的社運組織，視民進黨上台為重要的社會改革契機，應和著民進黨政府的統治論調，紛紛成為弱勢運動的政治代言人，對於批判民進黨的施政無能或拿國民黨過去的施政做比較的言論，這些社運代言人經常主動站出來辯護⁵⁷。

工委會從 2001 年起的「秋鬥」即已站上批判民進黨政權的第一線，這種批藍批綠的作法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下，很快的被貼上「反綠」的標籤。只是反綠不代表親藍，工委會還是堅持階級優先的論點，不落入「統／獨」認同的藍綠鬥爭泥沼中，以「不藍不綠」的立場，重新定位與藍綠政黨的關係。

以工運上各陣營與政黨關係的發展過程來看，工委會主張「不統不獨」、「不藍不綠」是與運動的自主性鬥爭有關：

（一） 批判「依附」路線，主張「以上皆非」。

1994 年工委會舉辦 418 春鬥提出「不修賤保、不給選票」的主張，在全民健保法修法的激烈鬥爭中，工運團體間並未同聲一氣，主要還是與政黨關係的選擇性施壓有關。「工委會認為，依附政黨，短期內個別工運派系有利，但對長期的階級運動不利。…以當前各工運團體有限資源，若不與政黨適度結盟，很難在政治上發揮影響力。但工運力量也沒有小到要依、投靠政黨才能存活的地步」(吳永毅，1995a)

吳永毅在健保法的鬥爭過程中，清楚點出全國總工會及勞工陣線無法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行動，是因為全總在當時依附國民黨政權，每年以獲得官方兩千萬元以上的補助才得以生存；勞陣則依附民進黨新潮流系，一樣可獲得政治捐款及公職人員的支持；這種依附黨的運動團體一旦面臨像全民健保攸關階級利益的鬥爭中，都得受制於資源及政黨關係而不敢點名批判出賣工人利益的政黨、政客⁵⁸。工委會在當時的鬥爭中對「依附政黨」的作法提出批判，引來了勞工陣線的

⁵⁷ 參考工委會「關心基層教師處境，不要蓄意抹黑」聲明稿。2002 年教師會發動 928 遊行，人本基金會、勞工陣線及勵馨基金會提出「課多少、補多少」的訴求反制，其遂以行政院院長游錫堃的意志，將公務員身份福利與教師爭取勞動三權的社會張力糾結在一起，提出連署的反動行為，工委會以新聞稿提出批判。(2002.9.15，工委會聲明稿)

⁵⁸ 當時勞陣只選擇批沈富雄(非新系民進黨立委)卻不點名批判洪奇昌，洪奇昌、盧修一是當時民進黨協商健保法案的代表，勞陣對此二位輕放受到工委會的批判。(吳永毅，1995：26)

嚴肅回應⁵⁹：「…雖然階級立場不同於民進黨的「全民政黨」但是在國家認同上，與民進黨看法一致，階段性合作的信任度較高，遊說的效果較好，所以我們選擇民進黨」。

在健保法鬥爭期間適逢 1994 年號稱「四百年來第一戰」的省、市長選舉，工委會挾著健保法的抗爭結果，對三黨的省／市長政見進行分析，發現根本沒有一個黨主動提出工人的政見，頂多是在社福、婦女議題中「順便」夾帶出現⁶⁰；工委會在當年即提出要投給「以上皆非」，並批判勞陣又是只挺民進黨，把工人在黨外議價的空間也扼殺了，勞工陣線在當時反駁說，「…投廢票部份，認為得利的將是始作俑者的國民黨，這樣將使金權政治更穩固，一黨獨大局面延續更久」。⁶¹

（二） 批判「押寶、交換」提出「等距外交、等比結盟」。

勞陣在政黨附庸性下提出「勞工說帖」給民進黨參選人的作法，工委會也把其說帖遭民進黨省長候選人陳定南殺價的結果公佈出來，進一步向勞陣喊話，認為勞陣的說帖充份發揮了替民進黨減緩壓力的效果，正如全總輔選國民黨、勞動黨輔選新黨，都在大選中揮了類似作用，延緩了工人得認清事實，建立「自求多福、自立自強」的階級意識。(吳永毅，1995b:28)

正是基於對政治現實的清楚認識，工委會與各政黨間採取了「等距外交、等比結盟」的指導性原則，雖看似以現實利益為導向，但在歷次的工人版修法運動中，即使與特定政治人物合作也非無條件式的輔選其黨，而是看其著力多深，再決定要投入多少力量支持，保持自由之身而非受其綁架、阻斷了運動上施壓的政治作用。工委會提出的「等距外交、等比結盟」運動路線，是以保有工人主體性的自主結盟關係，那一黨／一人著力最深，自然合作的深度亦較多，但絕非倒過來為其抬轎、成其附屬。思考運動的自主性，以對應於政黨關係的路線之爭為考察背景，是希望把受制於統獨／藍綠影響的社會運動，能辨明階級優先與政黨關係間在實踐中的差異，靠著運動團體間分而不裂、鬥而不爭的歷史回顧，工人運動是得面對如何發展出獨立自主的實踐觀。

表 2-1 工人與選舉，工委會如何鬥選舉

時間	針對選舉	工委會行動	成效
1994 年初	縣市議員、鄉鎮長	工人連線：十大政見，五大要求：	

⁵⁹參考台灣工運第 9 期—勞工陣線 1994.11.17 反駁工委會「提出勞工說帖是政黨附庸」之謬論。

⁶⁰同上，顧玉玲，1995.1 台灣工運雜誌，第 9 期:16；聯合報徐國淦報導「勞」「工」支持誰？互相對上了一文「勞陣階段性支持民進黨，工委會不押單一政黨」(聯合報，93.11.18)。

⁶¹台灣工運第 9 期—勞工陣線 1994.11.17 反駁工委會「提出勞工說帖是政黨附庸」之謬論。

	選舉	推荐七名工人候選人給各黨派優先列入不分區名單	
1994.11	三合一大選（四百年來第一戰！）	組工人問政團，向三黨及候選人提出「工人政見 20 問」。 12.3 社運聯合催票行動，工投三論：1.政黨制衡論、2.勞資相對論、3.以上皆非論	與勞陣選定民進黨押寶的行動，展開工運路線辯論，工委會正式提出與各政黨「等距外交，等比結盟」
1995.4.18	年底立委改選	不修賤保，不給選票：車隊大遊行，立法院前群眾大會，向各黨團及立委提「賤保三階段施壓時間表」	塵肺症納入重大傷病，免部份負擔。工人一成保費由地方政府補
1995.11.12	1996 年第一屆民選總統大選	秋鬥：工人與總統有約 工論政見會，以 12 組勞工政見與六名總統候選人對話	
1997.3	縣市長選舉	反謝參選（前一年總統大選前，先打出反李倒謝） 結合東菱女工，鎖定台北縣長候選人謝深山，不准他辭官參選，要他在勞委會留校查看。	謝深山飲恨落選
2000.3.16	第二屆民選總統	「工人賭總統」車隊遊行，週休二日，四 0 工時，要求四組候選人簽選	四組全部簽署，後引爆八四工時案，週休二日
2004.3	總統大選	「百萬廢票行動聯盟」在政治上提出罷免藍綠 走自己的路，提出拒吃爛蘋果、廢掉爛政客的激進主張。	投票結果，廢票(無效票)高達三十幾萬張票，因藍綠二黨票數差僅二萬多票，廢票運動被視為是台灣選民唾棄藍綠操弄族群政治的反對力量。

表 2-2 其他勞工團體的行動

時間	針對選舉	行動	發動團體	成效
1992	立委選舉	反金牛、反金權	自主工聯	
1992	立委選舉	針對特定國民黨籍反輔選	銀行員工會	

			聯合會	
1994.10	三合一大選 (四百年來第一戰！)	押寶民進黨，提出九大（後被陳定南刪為七大、陳水扁刪為四大）勞工政策說帖，公開支持民進黨三大候選人	勞工陣線	
1995.10	立委選舉	勞工投票指南 金權法案總體檢，公布財團、身價三億以上、華隆幫立委名單，反金權、反輔選	勞工陣線	反輔選 12 人，落選 2 人
1995	立委選舉	輔選國民黨，推荐八名老 k 候選人（三名工人，其他五名含黑道金牛林明義）	全國總工會	三名工人全倒
1996	總統大選	反李連 對四組候選人提勞工政策說帖，林洋港照單全收，但勞陣在彭李緊繃時主打反李連	勞工陣線	李連上
2000.3	總統大選	勞工政策白皮書，扁列為勞工政見公布「500 大工會領導人政治態度調查報告」，四成二支持陳水扁	勞工陣線	陳水扁上
2004.3	總統大選	以稅制改革，要求藍綠兩黨在立法院通過開徵富人稅、國民年金、勞工退休金附加年金制等社會福利政見	泛紫聯盟	陳水扁上

製表／賴香伶

資料來源／工委會夏令營 2003/08/29

第二節 政黨輪替後「秋鬥」的轉型

政黨輪替後，藍綠的政權之爭愈演愈烈，但台灣的民主有更深入嗎？與其它支持特定政黨的工運團體不同，工委會結合少數僅存的自主運動力量，在政黨輪替後以積極介入主流政治以揭露藍綠政黨本質的目標，進行著政治意識改造的文化鬥爭。

過去運動團體間的結盟或以擱置差異，異中求同以累積力量，但政黨輪替後，再以「異中求同」進行階級意識轉化有產生混淆的作用，2003 年的「秋鬥」，工委會提出「走自己的路」，呼籲各界在隔年總統大選時投下廢票，定性藍綠兩

黨都是爛蘋果，主動攻擊藍綠操弄的族群政治對社會民主的戕害，就此揭開了工委會轉型(／進)的政治實驗。但許多基層工會及工會領袖仍認為工人應繼續施壓或拉近各種中間、相對比較溫和、比較開放、對勞工比較友善的各種政治力量與他們採取策性合作(林惠官，2003：7)或不認為政治上藍綠是一樣爛而與工委會的關係漸行漸遠⁶²，2000年後「秋鬥」的參與人數也越來越少。

我認為台灣在兩黨制已漸成形後，自主社運的空間卻更被擠壓，因為國族／統獨等歷史矛盾短期內不可能被解構，階級性的鬥爭力量受到藍綠陣營的影響而更為分立、弱化，面對這個情勢，政黨輪替後的「秋鬥」把勞資間的鬥爭拉到更普遍性的生存處境中，貧富兩極化、社會安全建置的不足，其肇因於人民權力被藍綠集團聯合壟斷，總體資源分配不公，工委會以檢視政黨輪替後統治階層拿弱勢墊底、為資本找出路的經濟政策，進入全面性的政策體檢，揭露弱勢處境惡化的問題，透過「秋鬥」運動的轉型／進實踐，群眾得以再思其與國家政權、階級矛盾間的運動關係。

5.2.1 勞動彈性化變本加厲

2000年起陳菊主委面對失業率破5%的歷史高點，五十幾萬的失業工人，引進丹麥模式搞出了「就業希望工程」方案，由政府出錢讓民間社團得短期僱用失業者(六個月)，但六個月之後怎麼辦？

2000年起工人「秋鬥」一系列集中在對峙階級處境的分配問題上，不只失業問題，連帶的子女就學、老人安養等連社會安全網的不足造成失業全家自殺的慘劇大為增加。因此，2002年秋鬥以搶救「工人六不起」⁶³為行動訴求，此六不起的生活處境正是對應扁政府遂行「新自由主義」在勞動政策上極力推動的勞動彈性化政策，政黨輪替後，自主工運間偶有合作的聯合行動亦與反對此議題為主。

2000年後失業率居高不下，勞資抗議事件不斷，社會上瀰漫的失業恐怖氣氛，對初次執政的民進黨政府是極大的威脅，此間，勞委會適時推出借鑑丹麥政府推動的「永續就業希望工程」長期實驗方案，以三年為期階段性實驗開發產業與創造就業機會的政策；但政府資源再多也滿足不了民間就業者的需求，因此，繼經發會後，勞委會即著手研議《勞基法修正案》、《勞動派遣法》草案的公聽會；而工運界反勞動彈性化的導火線是在2001年扁政府主導的經發會上，陳菊主委的一句「No Work！No Pay！」，為民進黨政府的勞動法修法定調，隨即有關派遣合法化、女性夜間工時開放及部份工時制等降低勞動條件的政策一一出

⁶² 最明顯的是基層工會幹部質疑工委會只搞政治不搞勞工的指責上，特別在廢票運動之後倉運聯、大傳聯部份淺藍幹部明顯不支持工委會的活動。

⁶³ 2002年秋鬥主題是「活不起、反貧窮」提出階級處境「活不起、住不起、生不起、讀不起、老不起、病不起」的現況，要求勞委會主委陳菊下台、謝罪。(工委會2002秋鬥主文宣)

爐，陳菊為回應資本家的要求也決定了外勞薪資含膳宿費的決定(2001年經發會的決議)，更使得僱用外勞成本降低，本勞就業機會越受到擠壓。

這些勞動彈性化的政策不但實質降低了資本家的人事成本，陳菊主委的名言「先求有，再求好」成為勞委會對中高齡勞工再就業的基本態度。2004年初勞委會為宣傳其政績替總統大選加分，陳菊主委準備要親自召開記者會，工委會得知消息後決定到場外嗆聲，準備對上任四年的陳菊施政打分數，不料前一夜消息走漏，當天一早勞委會以主委到立法院備詢而臨時取消記者會，到場的我及一群記者都傻眼。換了政權，勞工的處境並沒有太大的改善反而變本加厲：「勞委會不僅無力解決日漸惡化的失業問題，反而一再配合財經部會，削弱國家對勞動者的保護，並大力推動勞動彈性化政策，加速外包化政策（政府精簡人力、擴大臨時雇用）、彈性化（修法通過彈性工時、推動部分工時、）、加速國營企業民營化（加速私有化腳步）的勞動政策，更坐視民間企業大量裁員、外包。結果是失業工人等死，保有工作權的勞工（如製造業、媒體業、運輸業、金融業、服務業等等）個個面臨雇用不穩定、超時工作、過度勞動，在不安全的環境下勞動，「二個人薪水雇三個人做四個人的事」成為當今勞工處境的最佳寫照！」（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新聞稿，2004.01.08）

面對勞動彈性化造成的工作權不保，政府部門其實是最大的買家⁶⁴，2004年3月行政院通過了《服務業發展綱領及行動方案》，9月份召開「全國服務業發展會議」，表將全力發展人力派遣業。

5.2.2 公共服務「商品化」

不只企業界採取派遣、外包以降低人事成本，民進黨政府上台後亦以政府組織改造之名展開了「小政府」的組織縮編方案⁶⁵。行政院為落實經發會共識，依總統府政府改造委員會之建議，於2002年5月29日成立「行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委員會」決定了「四化」的改造方案—「去任務化」、「地方化」（地方能做的、中央不做）、「行政法人化」（無須由行政機關做的，由其它組織做）及「委外化」（民間能做的，政府不做）等所謂順應全球政府改造的時代潮流，民進黨在政治上以建立一個「小而美／小而省」的政府來貫徹公共服務「商品化」的政策。

這個「四化」衝擊最大的莫過於在公部門任職一、二十年的約聘僱人員，因為他們的身份即非適用勞基法的一般勞工，又無公務員資格有終身僱用的保障，

⁶⁴ 勞委會 2006 年 6 月份公布一項調查報告，顯示政府機關是人力派遣的大客戶，公營事業使用派遣勞工比例高達 41%，民營企業是 7%。104 人力銀行：2006 年派遣工作成長了六成。經建會更預估到 2008 年，國內派遣員工將從 8 萬人，大幅增加到 30 萬人，派遣業者市場超過 800 億元。

⁶⁵ 參考〈行政院組織再造的目的與影響〉，（葉俊榮，2004）。

而「四化」中的「去任務化」就是從中央到地方政府依部門層級提出可被裁撤或合併的機關、單位，至於生產或營業單位則以「委外化」，將業務委外給民間業者承包續辦，人事上遇缺不補、凍結預算，但政府的預算不但年年增加，各種利益輸送問題漸漸浮上抬面，政府官員被告貪瀆的司法案件也層出不窮！

勞委會在面對「四化」的組織再造過程，亦曾傳出將更名為「勞動及人力資源部」，大大提升其為財經部門、資本家準備好用／廉價的勞動力的培訓部門，2000年民進黨主政後，時任行政院長的游錫堃即對「四化」的政策說的透徹「民間會做的，政府不用做；民間不會做的，政府教他做」，表面上是「不與民爭利」，事實上即是由政府帶頭加速推動民營化的腳步、以BOT方式特許財團取得壟斷性業務，在民營、委外的作法下政府部門容易的閃過民意機關的監督，公共服務漸漸走向市場化、營利為目的商品。

民進黨政府延續國民黨主政時期的民營化／自由化政策，進一步以「小政府大市場」讓資本的生長激素快速分化再生，拿人民納稅錢累積的家產做私人買賣，不但將公營事業單位轉為私人所有，更將公共服務業務大肆委外經營，一切都以「企業化、追求績效」來進行「公共」的服務，讓民眾原來享有的免費或低價服務被縮減打折，導致人民的生活成本大量提高！社會付出的代價是貧富差距的快速兩極化，勞動彈性化的人力市場中，長期穩定的雇傭關係被派遣、契約工取代，導致低工資、長工時及職災率等就業安全品質下降，政府將廣大勞工置於高風險中，未來必須付出的社會成本恐將無法估算！

5.2.3 「垃圾」政府，工人幹譙

政黨輪替後，新政權與產業／金融等資本集團過從甚密，在民進黨政權多次操作政商間資源分配重組的政策下，工人集體利益一點一滴的流失，從2001年經濟發展會議、2004年「全民服務業發展會議」、2006年經濟永續會議、金融改革會議中，新的政商之間進行著更大的利益交換、政治投資的佈局。反觀一般人民深受失業威脅、薪資不漲、物價飛漲，貧富化的威脅擠壓著中下階層；過去國民黨下台是因為人民唾棄黑金政權，沒想到新政府是明目張膽的搞白金政權，政黨輪替後的執政組合與其聲稱的進步、改革理念南轅北轍，藍綠政黨與資產階級互利共生的統治手法所差無幾。

因為貧富差距的加速拉大，中產階級的相對剝奪感逐漸上升，以2002年政府公佈的家戶最高所得與最低所得的差距達6.31倍，個人所得差距更高61.3倍，政府一手大減富人稅(土增稅減半、傳統產業五年免徵營業稅、降低金融營業稅到2%)另一手則以加強執法手段罰單收入較之前暴增二倍，健保費及部份負擔應

聲雙漲、勞退金改為「個人帳戶制」…。至於對特定性壟斷集團的資金挹注⁶⁶；通過金融重建基金 9000 億，打消銀行呆帳，而人民因為荷包縮水在使用信用卡、現金卡借貸度日致被高額循環利息壓得喘不過氣，卡債族大量出現。

2002 年的「秋鬥」以提出人民六不起的生活處境，對新政權的經濟政策進行批判，我們以「垃圾」來比喻民進黨政權，號召群眾帶家中的「垃圾」到總統府前抗議，「秋鬥」當天約聚集二千名群眾，從勞委會出發遊行到總統府，當二大卡車的垃圾車就定位後，總指揮楊國楨一聲令下，大卡車的車斗緩緩升起，「垃圾政府、工人幹譙」八個大字印入參與者的眼中，幾噸重的垃圾“轟轟”地砸入地面，在群眾口號、沖天炮齊發的悲憤中，失業工人組成的招魂幡大隊把寫滿自殺者名單的白幡丟向蛇籠後的總統府，「垃圾政府」成為歷年「秋鬥」行動中最強烈的批判，訴求方面得到幾個部會的立即回應⁶⁷，弱勢者只有站出來才能改變現況。

5.2.4 藍綠比爛，公投法被玩爛

2003 年期間更多尖銳的政治議題隨著總統大選的布局躍上檯面，最根本的意識形態之爭反應在公投立法與國防、軍事預算的審查等，引發兩陣營的運動團體競相出面護航、反制。

2004 年的總統大選國民黨與親民黨合作形成「國親聯盟」，為總統勝選在公投法的立場上轉守為攻，占著國會多數席次的實力，最後在 2003 年 11 月 27 日通過了「國親版」的公投法。之後藍綠陣營競相以公投法進行基層動員，陳水扁總統隨即在 2004 年 1 月提出二項「防禦性公投」⁶⁸，頓時國內的所有政治焦點都集中在公投的話題上，政界、媒體名嘴們都競相投入正／反方的辯論陣營。從一般民眾的政治認識來看該二項公投，第一案「強化國防」，是扁政府為採購軍事武器在國會引發在野陣營及統派團體的不滿，陳總統策略性的使用公投，來處

⁶⁶ 以高鐵 BOT 案，政府從零出資到政府投入 80 億，虧損保證買回，外加郵儲、勞保、勞退、退輔四大基金融資 2400 億。高鐵五大原始股東分別承包營建、機電、通訊等工程，於採購過程中早已賺回基本出資額。

⁶⁷ 2002 年 9 月起工委會即提出「搶救六不起的訴求」，10 月份起分別到不同部會下戰帖，10 月 9 日教育部回應：1.與銀行團協商調降就學貸款利息。2.請勞委會及財政部研究減免失業勞工子女學雜費；10 月 17 日內政部承諾：1.失業勞工子女納入公立托兒所保障名額。2.研議發放「扶養兒童生活津貼」；10 月 24 日勞委會宣佈：即日起放寬非自願性失業勞工勞工住宅貸款償還本息延長一年，約有 21 萬勞貸戶受惠。而在醫不起方面，也引發社會廣泛討論「醫療行為商業化」「藥價大黑洞」等議題。(工委會 2002 秋鬥主文宣)

⁶⁸ 2004.3.20 的公投主題由陳水扁總統依公投法 一條的「防禦性公投」—第一案：「台灣人民堅持臺海問題應該和平解決。如果中共不撤除瞄準台灣的飛彈、不放棄對台灣使用武力，您是否贊成政府增加購置反飛彈裝備，以強化台灣自我防衛能力？」，第二案：「您是否同意政府與中共展開協商，推動建立兩岸和平穩定的互動架構，以謀求兩岸的共識與人民的福祉？」，二案均未通過(第一案的領票率 45.17%與第二案的領票率 45.12%皆未達全國投票權人總數二分之一 1 的法定門檻，因此二案的投票結果均為無效)

理兩岸關係緊張、美方的不滿及滿足獨派群眾的政治手段；而第二案「對等談判」則是以呼籲兩岸和平對話的一種對內表態行徑。眾所皆知，這二案不論公投過與不過，都非台灣政府單方面可決定的，特別在軍購案上受制於美方軍火工業的利益，兩岸對話更涉及統獨與國家主權、定位等爭論，在扁政府挾龐大的政治資源宣傳公投的民主意義，民間部門配合著選舉與動員的操兵，台灣的首次公投是在政黨操作選舉下進行的。

對公投法的立法鬥爭，工委會雖無相應版本與之相抗，但對兩黨惡搞的行徑自不能輕放，因為公投權力是解決代議政治的不足，人民得以行使直接民權的重要武器，兩黨為選舉利益聯手通過了一部「鳥籠」公投法，已扼殺了人民的政治權力。在運動社群內部簡單討論後，工委會隨即於 2003 年底分別赴民進黨及國民黨部前抗議兩黨。在民進黨部的行動中，一位長期支持黨外運動的失業勞工說：「…民進黨已經執政四年，現在為奪取政權，大玩台獨議題，操弄台灣人民對台灣的濃厚情感，身為民進黨死忠的支持者，看到 11 月 27 日藍綠公投對決，在美方的壓力下，民進黨一面指責國親強力推動「鳥籠公投」，另一方面卻封殺蔡同榮版，這難道不是欺騙死忠的選民嗎？」，隨後他當場把自己的民進黨黨證剪掉，這個動作看在民進黨公關部職員的眼中似乎無所謂，但對這名失業勞工來說卻是有著棄離民進黨的悵然。隔天，我們又前往國民黨部抗議，奇怪的是沒有任何一家電子或平面媒體出現，只有社運媒體苦勞網到場，參與群眾莫不好奇問道「為什麼沒有媒體，難道都被國民黨收買了嗎？」。

「公投綁大選」無疑擠壓著社運的聲音，政治上各路人馬紛紛進入公投議題的討論及正反方辯論的遊戲規則中，在選舉操作與公民自主的拉扯間，社運團體分別採取相應的行動：以統派為首的勞動黨、勞權會等組織從頭至尾反對公投，他們發出拒領公投票(依公投法規定進行反制)反制扁政府、獨派團體則全力鼓吹公投的價值(從住民自決到台灣人意識)。我們的政治態度是不反對公投精神，但對公投法的內文採取批判的立場，特別就公投提案、連署等高門檻設計⁶⁹，直接扼殺了一般公民的提案權，只剩有財有勢的政黨或財團有能力操作公投，另外在人民創制複決的權力上也被設限，這種處處限制人民權力的公投法不但是「鳥籠公投」更是「剝奪人民的武器」。

民進黨果然是善長操作選舉的政黨，他們用簡單的口號就把複雜的事單純化，對於第一次的公投，他們以「台灣 100 分」的文宣指引民眾的投票行為，「總統投 1 號，兩票 0 0（同意）」，這個 100 民眾一看就懂；反觀國民黨則顯得左支右絀無以為繼，一下是被民進黨提出的「不義黨產」追著跑，只好以陳水扁個人行徑的反覆無信(如對兩岸開放的進程)進行反擊，在公投部份見風轉舵，隨著民間反對「公投綁大選」的聲浪而起舞，兩方陣營藉著領票／不領票或正／反意見

⁶⁹ 依公投法規定，提案門檻就要八萬人，提案通過後還要有八十萬人以上的連署才能成案。

上動員各自系統，我們在此夾縫中見機行事，以「藍綠一丘之貉、同流合烏」定性公投已被兩黨玩爛，人民只有投「廢票」才能反制。

5.2.5 總統投「廢票」，公投拒領票

2003 年是藍綠兩黨爭奪總統大位的關鍵年，循著 2002 年秋鬥提出的「垃圾」政府基調，2003 年的「秋鬥」勢必在兩黨「拼選舉」的激烈選情戰中突破，尤其在「公投綁大選」的變數中，每個人要領三張票，如何投／領票又成為兩黨攻防的焦點。

我從 2003 年進入工委會秘書處，當年度的秋鬥就以政治性議題——「總統大選，工人怎麼投？」進行基層教育。過去秋鬥相應於台灣政治民主化過程採取的行動不在少數⁷⁰，但多半是以勞工關切的經濟性訴求或受害事件要求政府介入的施壓行動為主，與主流政治採取批判但未介入的形式。2000 年政黨輪替後，我們的批判論述增加了檢驗執政黨、不放掉在野黨的立場，戰線變的更廣而難以面面俱到，但我們深知過去以廠場工會的集結及議題性抗議，已無法對抗藍綠兩黨既聯合又鬥爭的現況，運動上雖力量漸消，但一定還是可以突圍而出的。

因此，2004 年 3 月的總統大選及公投是重要的歷史時機，把社會上不滿藍綠的聲音導向激進的反抗力量中。因此，我們在 2003 年 7 月工委會就舉辦了工運夏令營，邀請社運學者來解析政府財政支出的問題、請吳永毅進行藍綠政治變化的解析，參與者依各自的政治傾向進行分組討論⁷¹，最後做出工委會對 2004 年總統大選的政治態度。總統投廢票確定後，公投部份並未在夏令營中討論，不過在公投法通過後，針對首次公投的態度，社群中有人支持拒領票，有人希望投反對或贊成票，但當時我們以主推廢票為主，公投部份未能完全整合，最後工委會以抗議烏籠公投及公投法被政客操弄，而採取拒領票的立場。

從總統投廢票到公投拒領票，對應於藍綠政黨擠壓下的社運空間，工委會找到了介入主流政黨政治的運動策略，面對藍綠政黨都遂行新自由主義，聯手出賣工人利益，操弄族群、玩弄公投等反民主的作為，台灣的市民社會應有相應的力量進行反制，「投廢票」是我們從工運領域跨入公民政治的轉折點；對群眾的公民意識進行階級性的召喚，與政黨關係也從「等距外交」走向「藍綠向右走，我

⁷⁰ 工委會秋鬥對應於政治民主化進程中所規畫的各式勞工議題，在政治上提出對峙的政治行動，例如 1995 年台灣首次實施三合一選舉，到同年的總統首次民選，挾著當時健保立法鬥爭及勞工權益下降的政治現實，秋鬥的設計形式直接訴諸當權階級而試圖在政治上要脅統治者，以 1995 年的「工人與總統有約」或「不修賤保、不給選票」等對政權取得過程中展現施壓的集體性行動……

⁷¹ 以每個人的投票意向進行分組：「不投票／投藍／投綠／投第三組／投廢票／不表態」等。各組選定組長，了解各自的理由，最後在各組間相互辯論、說服。最後決定一個共同的態度。

們向左走」。

5.2.6 「等距斷交、分別算帳」

1994 年工委會就提出過「以上皆非」(參考本章第一節 6.1.4 之「政黨附庸」vs.「等距外交」)時，這是我們對民主政治的一個立場，「民主選舉如果只是在一大堆爛蘋果中選一個最不爛的，那是『爛民主』，我們根本拒絕！民主政治如果只是資產階級輪流作莊，而工人人永遠是輸家，那是『假民主』，我們徹底對抗！」(鄭村棋，1995)。回顧政黨輪替前工運團體因為統獨、左右立場選擇差異，工委會曾對先統再左、先獨再左的陣營提出尖銳的挑戰，我們對政黨政治的批判是有政治歷史脈絡的。

對比 1994 年工委會在三合一選舉時提出的「以上皆非」，當時的政治民主化是從後威權進到民主化的轉型期中，人民對政治參與的熱情高過反思民主價值的本身，而 2003 年工委會再提廢票，立場上是對「爛民主」、「假民主」的根本拒絕。工人在資產階級政權的統治下，要真的拿回做主人的權力，得在立場上有徹底的覺悟，政黨輪替後的台灣政治，確實是兩黨輪流作莊，中下階層處於貧富兩極化的社會中，要靠政黨間的競爭來換取憐憫、施捨(如老農津貼的加碼)，還是靠社運力量改變不公平的結構？我們在實踐中曾為突破政治上的限制而以「等距外交、等比結盟」與政黨或各別民代進行合作，但不是成為政黨的附庸。2000 年後許多團體、工會都還以此合縱連橫為主要施壓、交換利益的思維，工委會在此時提出投廢票的主張，希望運動團體與藍綠兩黨「等距斷交、分別算帳」(吳永毅，2003)，不要再寄望藍綠。

從工運界因為統獨立場殊異到政黨輪替後工委會提出與藍綠政黨畫清界線的歷程回顧，工委會與勞工陣線、勞動黨在 90 年代間形成的工運三足鼎立陣勢，到了二千年政黨輪替後，勞工陣線轉為全國產業總工會的主要運作幕僚，近年來更以勞工政策研究為主不發展群眾性組織；勞動黨則在工會經營上以新竹地區為重心，在政治上與反獨的社會力量結合，著墨於兩岸交流、統一的民族大業進程，只有工委會在政治上採取對峙兩黨、揭露其耍弄民粹的公民反抗行動。二千年後的「秋鬥」(見下表)即是工委會以階級性的公民政治進行的轉型／進軌跡，這些軌跡是延續我們一貫的堅持：「自主性—不藍不綠」、「政治性—不統不獨」。

因為這樣的路線堅持，我在工委會的運動位置中對主流政治的操弄手段特別反感，對工運力量的消退又有一種無奈的憤怒，所以，2003 年的總統大選我提議要投廢票時，是運動者的一種直覺反抗，一種階級性的抵制。只是這個抵制的政治性是在推動廢票運動後才意識到我與族群政治的歷史糾結。廢票運動放在工運與政黨關係的鬥爭脈絡是有高度政治性的，但在投票行為上我認為是一般公民

對藍綠政治的反感（與我一開始的直覺類近），但在我身上不只是直覺的反抗還有二重的歷史交雜，一是工運政治鬥爭、一是知覺到身上的政治歷史斷裂，在廢票運動中感受到的挫敗沒有條件反芻、理解，廢票運動後我才有機會面對，把複雜的情緒包裹一一解開，並以「慢政治」的運動視框來理解我的內在衝突。

我是從工委會的政治實踐中意識到「慢政治」的，因為我在運動中看到結構的難以撼動，在挑戰藍綠政權的過程中產生了族群意識的衝突，過去我在工運場上(與國家或與運動團體間)認識到階級差異並轉化了階級的認同，至工委會後更在找出路的轉型／進壓力中受到藍綠政治結叢主導的「主流政治」的擠壓，因為有了過去的政治路線區辨，我才得以釐清我所感知到的擠壓是與我的客家族群、階級出生與運動性養成的歷程有關，這個政治性出土的過程，就是我的「慢政治」運動視框：這個視框的生成來自於解嚴後自主工運中的路線鬥爭脈絡，也來自於台灣政治歷史作用在不同世代的解殖過程。

表 3 2000 年政黨輪替後工委會主辦之「秋鬥」

年份	主題	論述焦點
2001 秋鬥	失業真恐怖	提出打擊「失業恐怖」的九大主張
2002 秋鬥	活不起、反貧窮 —工人幹譙垃圾政府	工人找活路—搶救六不起： 活不起、住不起、生不起、讀不起、 老不起、病不起(提出 20 條訴求)
2003 秋鬥	秋鬥高峰會 「罷免藍綠，走自己的路」	三大挑戰：勞工自主性的挑戰、大 選主軸—國家再定位的挑戰、國家 利益 vs. 人利益；國家安全 vs. 社會 安全的挑戰 投廢票的意義：落實「以上皆非」， 深化民主
2004 春鬥	拒吃爛蘋果、投出新希望	百萬廢票·人民作主／呼籲自主公 民投廢票，走自己的路
2005 秋鬥	財團治國、人民火大 人民自覺行動論壇	執政不反省、在野不上進，黑金打 劫，全民浩劫—斬斷黑金靠自己 人民對話：卡債還不起、底層活不 起、窮人病不起、前途看不見、人 民火大組(六組街頭論壇主題)
2009 秋鬥再起	消滅政商壟斷、實現社會正義	拿回我們做主人的權力—經濟平 等、環境正義、尊重多元、保障弱 勢人權

整理／賴香伶 資料來源：工委會 (2003 年以前之秋鬥主題、訴求，見林子文，2004)

第六章 召喚藍綠之外的「人民性」運動

回顧廢票運動之於我個人、社運界對主流政治的關係及台灣的民主化進程都有不同的意義。2003 年 7 月份起我們從籌辦工運夏令營到「秋鬥」勞工高峰會，並在工運圈內引發了與政黨關係間的路線爭辯之後，我一路面對的是自己從中引發的困惑，特別是以社運的立場試圖介入藍綠政治引發我的族群意識，我們以挑戰代議式民主中人民權力被扼殺的行動與論辯，反應了社運以階級意識對抗資本政商的剝削結構，但另一個更大的對抗意識，則是藍綠政黨為奪權不斷的操弄族群矛盾及使用激烈的選舉話術⁷²，使我長期內隱的客家族群邊緣性意識，不斷的被牽動而產生了內在深層的壓抑情緒。

在又急又快的廢票運動中，我的內在壓抑、困惑沒有條件多做釐清，在開出台灣選舉史上最高的廢票數⁷³後，藍綠政治集團的對立延續著選前「二顆子彈」的爭議，一般群眾對政治人物的誠信產生更大的質疑，人民與統治者的抗衡態勢升高；緊接著 2004 年底又是立法委員選舉，我們沒有太多休息、準備的條件，工委會又推動了「人民老大·參選作主」⁷⁴的行動，直到 2006 年紅衫軍的公民政治運動出現後，我的幾層備受壓抑的內在狀態：焦慮於工運集體力量的消褪、運動組織能量的不足與運動者與主流政治結叢相抗產生的困惑，經過這幾波的振盪、刺激，得以透過不同的社會場域回觀探究自身的政治性，同時更辨識了廢票運動對工委會的轉型／進是重要的關鍵。

第一節 廢票運動的政治性

2009 年 12 月 5 日台灣舉行三合一選舉⁷⁵，在藍綠陣營各自為勝、敗選進行檢討時，廢票意外成為媒體觀察政治的一組依變項，各地當選者也紛紛站出來解釋廢票反應出的警訊⁷⁶。2008 年台灣的政黨再次輪替了，國民黨統包了行政、

⁷² 2004 年總統大選時，民進黨的舉選操盤手邱義仁提出「割喉戰」，以凝聚民進黨的支持者並定性該選舉是政黨輪替未完成的序曲；同年底立委選舉時邱義仁更提出「割喉割到斷」，意指民進黨要徹底執政、國會席次要過半。

⁷³ 參考歷年中選會的總統選舉投票記錄，無效票(廢票)大都是 1%，約 12 萬票，而 2004 年的總統大選無效票占總投票數的 2.5%，開出 337297 張廢票，高於兩千年總統大選的十二萬二千多張的廢票。

⁷⁴ 參閱第七章—人民老大運動，這是繼廢票之後，工委會挑戰「代議式民主」，以另類的方式投入選舉的公民政治行動。

⁷⁵ 2009 年 12 月 5 日台灣除了五都(台北、新北市、台南、高雄、台中)以外的縣市進行縣市長、鄉鎮長及議員的選舉，此次的廢票數在地方層級亦出現史上超高的現象。

⁷⁶ 桃園縣八德市廢票對照投票人數，平均每 6 人就有 1 人投廢票；平鎮市長每 8 人有 1 張廢票；復興鄉投票人口 4000 多人，廢票占十分之一。平鎮市長陳萬得表示，每個投開票所都有廢票，研判有些廢票是民進黨深綠鐵票不甘心投給國民黨籍市長，領票後故意蓋廢票，當然也有一些「對施政不滿的選民，蓋廢票表達內心的不滿」。陳萬得又說，9072 張廢票傳達的意思很明

立法大權，在野黨及民間社會憂慮過去國民黨一獨大的政治控制會捲土重來，我個人認為這樣的隱憂對地方型選舉是有產生一些影響，應該是反應在政治冷漠或不去投票，但我沒有意料到連地方派系綁得緊的鄉鎮市長選舉，廢票數也創了新高，一時間各方的政治解讀都以提名、操盤策略如何或政治經濟社會的劇大變化(如 88 風災、美國牛肉進口、ECFA)來分析藍綠支持者的投票行為，沒有以反應在選民的分裂性投票(縣長、鄉鎮長、縣市議員廢票數不同)的意義，此結果是否代表了基層人民對從下往上的政治人物都已不信任？而在部份縣市的社運團體⁷⁷也使用廢票來進行反攻(非反輔選或選前施壓)，除了賭爛二顆爛蘋果外，更多的社會性訴求是針對了城市發展的邊緣性或工業污染造成農業、土地生態浩劫的指控。

對照 2004 年工委會發動的「罷免藍綠、走自己的路」，此間廢票運動更具有穿透性，做為反制政客的手段亦廣為一般公民接受，廢票不只是反藍綠政治綁架的一種手段，更是展現人民意志的直接武器，雖然在既有選制上還是有人當選，但連政治名人陳長文先生都在選前數度撰文呼籲國人要正視選制改革的問題⁷⁸，「重要的是社會應該要先展開思辨的過程。於是天平的一端是多一次選舉以及可能增加的選舉經費；而天平的另一端是落實民主的多數原則以及避免現行選制可能帶來『搓圓仔湯』、『摸頭政治』、『棄保效應』等負面效果。」(陳長文，2009)。台灣在二千年政黨輪替後因為選舉造成的政治紛爭已威脅到社會的安定性，陳長文先生關切的「民主多數原則」及「在總統選舉等單一名額選舉採取絕對多數選制」以避免政治紛爭，這與我們提出的選制改革出發點是不同的，其中或許是我們與陳長文先生的階級位置不同所致，因為，我認為 2004 年的廢票運動與此間各社運伙伴繼續鼓吹的投廢票，都是基於階級觀點的社會實踐，形成了批判性的改革訴求，廢票有一種選制改革的想像，更深層的是要奪回中下階層人民的政治權力。

本章回觀 2004 年的廢票運動不在論斷其成敗，而是在於揭示其作為社運的一種戰略思考，對台灣的公民自主性、不被藍綠綁架起了作用，也在市民社會文化領導權搶奪中有所進展，以此間陳長文先生的選制改革呼聲、更多社運力量的投入都顯示了當時廢票運動的前瞻性，因為廢票本身所承載的意涵極其複雜，我

顯，「未來施政，我會儘量做到不分政黨、族群，若做得不好，會虛心檢討，儘量減少民怨與不便。」(吳佩玲，2009.12.08，聯合報)

⁷⁷2009 年的地方選舉，有「人民火大行動聯盟」在基隆市推動廢票、「彰化環保聯盟」在彰化縣鼓吹投廢票，這兩個縣市的廢選數亦只低於 2004 年總統投票時的廢票數而已。基隆 2009 年廢票數 3027 張、2004 年總統大選廢票數 4996 張；彰化縣長的投票率從四年前 71.5%降低為 65.6%，廢票數達 16000 張，廢票率高達 2.5%，比上屆的數量更多。

⁷⁸陳長文先生於 2009 年起，陸續投書媒體提出選制改革的思辨，中國時報 2009/10/19/A14/時論廣場〈端正選風，改為絕對多數決制〉、2009/11/02 又投書回應聯合報社論的建議，將修憲的複決公投和二〇一二年的總統大選合併舉行，之後再於 2009/11/10 投書中國時報〈樂見深度思辯的選制改革討論〉，進一步提出其對二輪制投票、絕對多數的看法。

當時最大的內在衝突是對藍綠政黨為奪權藉「人民」之名隨意詮釋民主的價值，在拼選舉的策略上操弄族群矛盾以掩蓋兩黨在階級壓迫的罪責，而社運界頭人以國／民族的政治認同或保障特別利益迴避了階級性的戰鬥位子，面對交織在我身上的幾重挫折與憤怒，廢票運動開啓了我對政治與社運、階級與族群方面的反身探究歷程。

6.1.1 廢票運動的歷史前身

說起投廢票，從工委會的運動脈絡來看，1994 年的省、市長三合一大選，工委會即提過「以上皆非」⁷⁹的主張(參考第五章第一節 5.1.4 之「政黨附庸」vs.「等距外交」)，但當時工運勢頭仍旺，「以上皆非」難以違逆「施壓論」或「交換說」的開支票主流作為。而當時工委會與政黨間的對應關係還是定調在「等距外交、等比結盟」⁸⁰，「以上皆非」的主張沒有具體落實。

1995 年 418 春鬥，工委會提出「不修賤保、不給選票」的主張持續對健保法修法進行抗爭，針對 1996 年台灣進行的首次民選總統，以工人階級處境來定性台灣民主選舉其實是「爛民主」、「假民主」，「以上皆非」是一種反制的政治手段，也是對資產階級以民主化號召政治認同的反制論述。短短十年後，台灣政治歷經政黨輪替、兩黨制已漸成形，此時挑戰資產階級式「偽民主」的廢票運動才有了落實的社會基礎。

台灣從解嚴後的勞工運動歷經了反抗國民黨控制工会的「自主化」階段，體制外的工運團體發揮了運動領導的政治作用，雖然台灣的工運力量還是很弱、工人的階級意識還是不強，但工委會採取揭露藍綠政黨本質的作法一直是運動上轉化工人階級認同的主軸。二千政黨輪替後，工委會在 2002 年提出過「六不起(活不起、住不起、讀不起、生不起、病不起、老不起)」的訴求，當時從觀察經發會的狀況，認為貧富差距的問題，必然要成為重要的社會訴求，工委會執行長何燕堂說：「2003 年，發現總統大選已經被藍綠政黨所綁架，要怎麼樣把選舉的空間打開來？，再光談政策，已經沒有空間，因此，工委會設想要有一個『不藍不綠』的運動，可以參與到選戰裡，進行階級的教育」(孫窮理，2005)。

2003 年我們衡諸時勢及在檢驗藍綠兩黨的政治屬性後，投廢票成為突破藍綠政治壟斷的一個可行策略，我們開始與運動團體對話，提出「依靠既有政黨的

⁷⁹ 「以上皆非」是怎麼來的？訪談鄭村棋老師時他提及此概念是他自創的，並沒有參考任何現實資訊或國外案例，而是從我們的考試制度來的。試卷中有是非題、選擇題、複選題之後有了「以上皆非」一項，他當時是受這個刺激，沒有參考其它政治學上的理論；1994 年我們提出「以上皆非」後，約一個月，中國時報有一篇報導蘇聯選制的文章也用「以上皆非」一詞翻釋。(2009.12.31 訪談鄭村棋)

⁸⁰ 參閱第五章第一節之 5.1.4 「政黨附庸」vs.「等距外交」。

競爭空間，以施壓或反輔選做為換取利益的手段，已難以在結構上換到實質利益」的政治定性，這是我們認定工運團體已無法再藉由政治機會結構⁸¹進行相互拉升的分析，不只是經濟利益方面，在藍綠政黨的資產階級屬性同質化後，依附政黨路線或與之利益「交換」已成為政黨間獲取選票的一種美化手段，「施壓論」某種程度延緩了社會改革的時機，工委會主張此時應與藍綠政黨斷交⁸²。

接起 1994 年對資產階級民主的批判觀點，2004 年工委會以廢票運動宣示與藍綠政黨從「等距外交」走向「罷免藍綠、走自己的路」，聯合了少數堅持自主發展的社運力量⁸³，進到主流政治的結叢中影響一般公民的政治認同，實踐對抗統治集團意識宰制的人民運動。

6.1.2 與「泛紫聯盟」的差異

2004 年的廢票運動一開始發起階段並沒有引起太多社會上的關注，直到聯合報記者徐國淦在報端以醒目的標題報導「工委會倡議投廢票，結合社運團體成立『百萬廢票行動聯盟』，希望選民丟掉藍綠兩顆爛蘋果，走出第三條路」，文中又雜著由前民進黨立委簡錫堦所組成的「泛紫聯盟」⁸⁴，說：「明年總統大選，社運界成立「泛紫聯盟」後，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也將結合勞工、環保、學術及性別運動團體，針對總統大選發起「投廢票」運動。」(徐國淦，2003.9.24，聯合報)

前後相差不到一個月形成的社運聯盟，在媒體的報導下，政治上被解讀為準備集結藍綠之外第三勢力的代表。工委會倡議投廢票、泛紫聯盟則打著建立社會安全網、開徵富人稅等主張「公平正義」的理念，要求兩大黨在立法院（93 年底）會期通過課徵富人稅、普及式的國民年金，更改勞工退休金為附加年金制等⁸⁵，但在總統大選的政治態度上，泛紫聯盟始終沒有表態。

⁸¹台灣研究工運與政治民主化轉型關係的學者，經常以政治機會結構路徑來分析工運參與在民主化中的位置(范雲，2000；郭國文 2003)；范雲引用研究西班牙工運史的 Fishman 的「雙重任務說」，指出威權體下，工運必須擔民主化與階級運動的兩重任務(頁 223-224)；郭國文也以政治機會結構路徑分析民主政治開放程度看待工運參與在民主化的邊緣性位址 (吳永毅，2009)。廢票運動時我們反對再以「交換說」、「施壓論」、「階段說」與政黨發生關係，即是要挑起政治認同與階級運動的關係，拉扯從政治機會結構看待工運的邊緣性認定。

⁸² 參考百萬廢票宣言—「罷免藍綠，走自己的路」一文。(工委會，2004)

⁸³ 百萬廢票聯盟的組合：工委會、性別人權協會、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差事劇團、倉運聯、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台灣省碼頭裝卸搬運業職業工會、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新寶島視障藝團、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等

⁸⁴ 泛紫聯盟的發起團體為：老人福利推動聯盟、全國教師會、婦女新知基金會、殘障聯盟、銀行員工會全國聯合會、台灣促進和平文教基金會、智障者家長總會、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台灣勞工陣線。

⁸⁵ 1999 年簡錫堦在立委任內，擔任立法院財政委員會的召集人，開始接觸到大量的財稅議題及資料，於是組成一個「稅改讀書會」，希望厚植對稅制改革問題的基礎，2002 年 6 月，他再召集社運團體，進行了一個一日的「社運工作坊」，期間探討到許多社會政策的議題，並希望找回社運團體的自主

在廢票運動推展期間我與燕堂曾親自拜會過泛紫聯盟召集人簡錫堃先生，他表示因為內部的歧見過大，對於明年總統大選該採取怎樣的行動，目前還沒有辦法討論，而他們設定的運動進程是到 2004 年五月納稅時，要發起「公民不服從運動」進行抗稅(不繳稅)以達到施壓的目的，對於總統大選還是未表態。

直到 2003 年 11 月工委會舉辦秋鬥「勞工高峰會」時，泛紫聯盟以「會派出發言人吳忠泰先生做為泛紫聯盟代表，可是不會代表泛紫聯盟進行報告，他們是來向勞工界觀摩、學習的」，到 2004 年 2 月份時泛紫聯盟才以「政策」參選推出虛擬候選人—志明、春嬌來解決他們在政治上沒有獲得任何承諾的尷尬處境。「泛紫強調參與總統大選到底，簡錫堃說，推出虛擬候選人為泛紫整體行動中一環，明天的聯盟成員會議將做最後確認，大致方向定調，應是以有趣方式吸引青年人為訴求。此外，泛紫聯盟是否支持投廢票運動，他強調，投廢票是否定式，泛紫希望用政策參選，並未加入投廢票聯盟，但對此團體的訴求也持平實態度，沒有其他意見。」(中央社，2004.2.3)

對照二個社運聯盟組成的背景與操作過程可以理解何為在選舉態度上有所差異，「泛紫聯盟由政策議題出發，相對之下結合各種屬性的團體較為容易，但也因為聯盟屬於議題的結合，到了碰觸到敏感的政治表態問題時，就難以形成共識，這也使得泛紫聯盟雖由政策起，但卻仍未能跳脫停留在政策層次的格局；而廢票聯盟，則首先進行政治表態，以此作為結合的基礎，其結果是，也許能夠產生聯盟原先預期的「對話」效果，但就結合不同屬性團體的功能，相對之下，也就較弱」(孫窮理，2005)，循著工運發展的歷史脈絡，孫窮理的觀察有其認定運動侷限性的分析視角，但一般人的普遍認知卻常把這兩個團體混為一談，很多人把「投廢票」視為是泛紫聯盟的政治主張；對稅改或要求社會公平正義的訴求又認為是「廢票運動」的基本前提，因而，有些憂心社運力量分散的工運人士曾提出二股社運力量結合的想法，以對藍綠二大黨形成更強大的威脅，並在廢票運動之後推人出來參選立委，如此對社運力量的集中與政治化應是好的發展。

表 4 工委會拜會各團體代表性人物記錄(2003. 9-10 月份)

日 期	對 像	反 應	分 析
09.28(日) 下午 13:00	全教會的一些 與者	沒意義，難道要讓爛的再一次機會，有些事不能再給一次機會，教改可以再來一嗎？有能力讓你下來。 投廢是搞破壞，會讓綠當選，後果是你要的嗎？(屏東老師、年青、女性) * 不投給綠就是給藍機會，投廢票是給宋機會(忘了是誰講的)	教師群眾中 藍骨較多

性和信心；一直到 2003 年中，感受到總統大選的緊張氣氛，希望有一個不一樣的力量能夠出現，於是在 2003 年 8 月，結合了來自不同領域的社運團體，正式宣告泛紫聯盟的成立。(孫窮理，2005)

日 期	對 像	反 應	分 析
		* 有三位非常支持，連署(自由業、中高齡教師(台中)) * 可推第三組，教師有 22 萬人，推張緒中出來，自己搞(台中) * 挑戰選舉制度，絕對多數(苗栗)	
09.29(一) 晚上 7:00	樂學連代表 李幸長	支持	尾牙一起搞 米粉輔選大會
09.30(二) 上午 11:00	高金素梅委員 辦公室主任 張俊傑、陳先生	1. 如果能從統獨拉回貧富問題就有意思，之前宋有提但之後就沒了 2. 目前在推原住民三法，藍有可能都同意，如果同意就賣給他 3. 問：但若都不簽，沒換成如何？未答	陳分析：助綠否？意義何在？綠若跨只是陳玩完了，藍若跨整盤輸，藍會拼老命幹，可換到東西 * 未回應藍若未具體承諾，如何面對。 * 部落中藍骨多 麗鈞—法國有挾鼻子投票行為(臭)、國外原住的投廢票文章
09.30(二) 下午 5:00	差事劇團 鍾 喬	把團體圈進來，談投廢的意義，可以怎麼搞。11-12 前忙，可協助工作坊	
10.01(三) 上午 10:00	石油二分會 徐慶國、林倍寬	可以把爛的拉下來。反民營議題藍營比較有可能簽，民進黨安插人事、顧問，吃相難看。 林—如果有百萬實力，為何不推第三組、石油裡面綠多(基層)工會難推 徐—有實力讓你不當選，投廢之後要嘛？選立委...	理事會可討論，邀你們來討論，接觸大家想法。 * 當調性拉到貧富時，可接受展現以投廢來對抗政黨、自主意識的表現，但不會這做

日 期	對 像	反 應	分 析
			* 有實力拉你下來
10.01(三) 中午 12:00	韓仕賢	● 工會曾談過三種玩法；1.推人選，方、鄭選立委 2.投廢 3.壓一邊。認為廢票難度高，集中討論年底立委選舉。 ● 關心廢票後的集中問題，想推年底立委選舉。 ● 謝長廷知道他們在幹嘛，有時會點一下，不要太過火。認為謝有理想性、下階段會上一層樓。	態度保留，關心如何集中問題。 另對目前押謝，覺得還划算，不傾向表態。
10.1 下午 5 點 鄭、堂	中華電信工會 張緒中等幹部	● 會便宜了阿扁，應該讓再政黨輪替一次，做不好就換掉。(朱傳炳) ● 集中到那裡？是不是要對明年底立委選舉有想像？ ● 投廢票是比不投票有意義，但如果真能衝到百萬，不是很可惜嗎？ ● 投廢票以後呢？要有後續，否則一波搞玩就沒有了。後續如果沒有累積，不是白廢了？應該要一併談後續如何累積？(莊、芬) ● 工運目前還很靠政黨，幹部、會員都會有顧慮，不敢公開表態！(莊炳棠) ● 有沒有可能投廢票，又能把阿扁拉下來？ ● 投廢票到底對力量是集中還是分散？成功的門檻是什麼？政治覺醒要夠，否則容易失敗！ ● 投廢票對勞工意識有沒有加強？要等到外界干擾因素降低，勞工主體才會出現，像工委會之前對全產總的寄望很大，全產總卻也沒太大作用。(張緒中) ● 看這次勢會不會起來？如果鄭與 JAN(簡)一起推，就很有可能。JAN 搞泛紫如果要大家一起來，就應該與 DPP 徹底絕裂(張緒中)	關心的焦點： 1. 投廢票到底有多少勝算？值不值得投資？→ 急著想要有成果，投機心態，如果勢起來，再考慮投入。 2. 要集中到哪裡？關心可不可以累積？→ 急著想了解我們的評估，盤算什麼可以撈，反映急著要掌握權力。 3. 怕對阿扁有利。→ 反映還是希望靠政黨討糖吃。
10.01(三) 晚上 7:00	詹澈	農業未來靠大陸市場，越早三通越好，台灣必須走計劃性生產，農民才	鼓勵其自搞組織，往前

日 期	對 像	反 應	分 析
		希望，藍會兌現政治支票，會要求列入白皮書。 失業勞工回農村吃不飽，苦悶，老農有津貼，還算支持綠，但過去藍執政沒有津貼日子過得去，現在有津貼吃不飽，可以讓農民認清民進黨。	弄。 農會組織上沒有空間搞投廢行動。他本人也不會搞。
10.02(四) 下午 2:00	石油五分會 常務理事·理事	意義何在？ 藍對勞工比較好，過去有勞工教育，現在根本沒有、綠安插人事、資產管理把大樓租出去也要被列入，客委會、農委會租用．．． 五分會泛藍多，把爛的拉下來 投廢票是苦行僧，很困難推	押藍，相信藍執政後還可以換東西。 理念上可以接受，但不相信會成功，及產生任何作用。
10.03(五) 上午 10:00	石油工會理事會	投廢票，對勞工有利的地方在那裡？ 要加上去（開支票） 張一與泛紫有何不同，泛紫是鞏固綠票，你們是扭捏作態（助綠）要說清楚。 藍綠真的一樣爛嗎？爛蘋果定義要楚，（藍比較好），且藍未執政（連宋與李登輝不一樣），為何不讓爛的下來，為何知道是一樣爛？ * 統治基礎薄弱，萬一投廢票還是拿到更爛的，勞工怎麼辦？只是爽一下而已，我還是以選一個比較不爛的，或有第三個好蘋果出來 * 綠統治基礎薄弱，但他當政後拿他沒辦法，更積極一點可推立委候選人 * 藍時期有勞工董事，綠連高銀都不准有勞工董事（藍較好）	張的效應，增強藍比綠不爛。把我們與泛紫訂為助綠的動機。 沒有直接提出開支票的交換論，但質疑有效性及對誰有利。反應是一種不敢與政黨絕裂的不安全感。 拉下來一力量；上去的比較好，但會對勞工不一樣否？對政黨有寄望，支持廢是與政黨劃清界線，太激進。（國公營的保性與怕失去利益的恐懼）
10.03(五) 下午 2:00	台鐵工會主秘、組長、代理事長	陳—這是運動，力量不夠大時，這樣做是對的。 賴—意義、作用何在？有用嗎？投藍	

日 期	對 像	反 應	分 析
		讓綠下來。社區中偏綠，但現在已不敢大聲講，因為國民黨對勞工比較好。（對國公營） 政黨輪替多次後，才會學乖	

製表、整理／賴香伶 2003.11.05

6.1.3 工運團體立場各異、越辯越明

社運界期待可以開創藍綠之外的政治空間，但從上表反應出的認知與實際行動的落差就可理解「廢票」與「開創空間」的辨證關係還有得走。2003 年秋鬥「勞工高峰會」上就真實上演了社運界與藍綠政治關係的糾結難解；基於不同利益結構或資源條件的優劣，是要開支票、反輔選或根本不需表態，工委會提出了「藍綠向右，我們向左走」主張，以投廢票來檢驗自身及凝聚政治力量，引發了不同政治立場者的圍攻。

這場高峰會在主流媒體的報導下把運動策略的差異解讀為工運圈搞內訌(高有智，中國時報，2003.11.10)，政治上關切的焦點還是工運頭人的反應，以出席代表曾茂興(時任扁政府有給職國策顧問)為例，他在會中不只一次被群眾質疑是否立場已變，他回應說自己二次立委選舉都高票落敗，對勞工群眾大失所望，對藍綠政黨也不滿，只是他認為現階段工人沒有力量，搞廢票會被人看笑話，不夠積極，在高峰會上他不改個人英雄性作風，語出驚人的說要帶頭撕選票的激進主張，來「間接」肯定廢票。「只有有人被捉去關才會被重視啦！有種走出去、領了選票、當著選務人員的面，當場撕掉，然後給在場的警察看，我違反選罷法，你要起訴我，起訴以後，會被罰款，大家不要交罰款，一起去被關，這才是真正的勞工運動！有種的，三月二十號跟我來，不是投百萬廢票，而是撕百萬選票！」，他發言結束，立即獲得滿堂彩，倉運聯的幹部小精靈也應和著要一起行動，媒體對他的激進言論都大肆報導⁸⁶，只是最後曾茂興並沒有兌現他的承諾。

廢票運動一推出即受到各界的批評，除了以「助藍打綠」或「助綠打藍」的「動機論」弱化其政治性外，工運界最直接的批評是「廢票是沒有政治主張的運動」（臧汝興，2003.11.9）、「廢票運動是一個自絕於台灣社會之外的運動」（新世代青年團，2004.3.16），這些集中在社運路線上的批判，楊偉中以「期待更進步力量集結以催生準階級政黨」，來間接呼應勞動黨的批評，表示此階段應以組黨為前提，工委會的「廢票」雖沒有政治綱領，但他個人不反對廢票。

⁸⁶ 參考中國時報高有智(2003.11.10)「百萬廢票難獲共識—總統大選工委會要撕選票」一文；聯合報林怡婷(2003.11.10)「不一樣的秋鬥，推動百萬勞工投廢票」。文中都提及曾茂興主張撕選票的提議。

各方的批評我們都具體回應，以鼓吹「組黨論」的觀點來說，工人民主協會的楊偉中質疑工委會長期以「先經營基層」這個萬靈丹迴避組黨之說，我們則發表了「工委會無力獨自承擔組黨大任，但別廢了「百萬廢票」工人走自己的路的机会」一文，楊偉中針對工委會的回應又為文「工人階級要不要奪取政治權力」，指責工委會迴避「組黨是工人運動應該奮鬥的目標」，更論析廢票運動是「從極右到極左都可以有無數的理由來投廢票，難道進步的廢票運動要和右派蛇鼠一窩嗎？」⁸⁷。「『蛇鼠一窩』的確有可能，但我們在乎的是有更多的工人因為廢票運動，更能看破藍綠資產階級政黨的本質，台灣階級運動也就往前跨一大步。至於其他因為各種理由投廢票的人，即使他是如楊偉中所說的右派，不是間接對打破遭藍綠壟斷的台灣政治空間有幫助嗎？」（何燕堂，2003）。

此間的差異反應出的是各團體對運動進程的分析及採取作法上的不同，工委會在當時並非以組黨為前提推動廢票，但對廢票與組黨的關係、廢票與階級運動有明確的看法：「階段性的將工會及總工會作為政治團體的工運，仍是組黨前必經的考驗，考驗知識分子是否走入基層、考驗工人是否能夠發展出集體民主、考驗我們是否有足夠的創造力批判主流價值。」（吳永毅，2003）。廢票運動不必然是籌組階級政黨的準備，但卻是在台灣工運歷史脈絡中再一次挑戰主流政治，「組黨（左翼政黨）急不得一時，也不會因主觀期待就會自動推進。適時運用社會矛盾、揭露資產階級政黨的偽裝面目，讓階級意識再往前一步，才真的是『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的實踐方式」（何燕堂，2003）。

在組黨說之外，更一步要對話的就是以統／獨先於階級的立場差異。在工運圈長期主張兩岸和平統一的勞動人權協會／勞動黨，他們在秋鬥高峰會上對主要言論：

「…說勞動黨沒有立場（對總統大選），有！我們這十幾年來一直講『一個中國、兩岸和平』，一個中國就是回歸民族歷史，你要反觀歷史關係是一個革命性的行動、一個革命性的政治學。另外，兩岸和平，我想回到社會現實，我們要在和平的條件下，進行台灣的社會改革，勞工的力量集結起來，這才是我們的機會。」（吳榮元，2003，秋鬥勞工高峰會發言記錄）

在投票態度上，勞動黨另一位發言代表汪立峽說的更明白：「勞動黨很清楚在兩岸政策上，眾所周知，當然是藍色陣營比較可以和平解決兩岸問題，這個是

⁸⁷ 在秋鬥高峰會後，「組黨說」與廢票運動的對話直持續一陣子，主要是楊偉中在高峰會上發表應以組黨做為廢票運動的前提，由一左翼政黨來領導才是正確的道路；針對工委會回應組黨說的「工委會無力獨自承擔組黨大任，但別廢了「百萬廢票」工人走自己的路的机会」一文，他又以「工人階級要不要奪取政治權力」一文質疑工委會的廢票運動是蛇鼠一窩；工委會何燕堂再以「階級運動不是插旗子比賽」明確點出楊偉中犯的邏輯謬誤：「不主張現在組黨，就是反對工人階級奪取政治權力！」，我們的立場是不排斥有人要推動組黨，楊偉中應認真推動而不是一再批評工委而已。（何燕堂，2003）

不必諱言的…」(汪立峽，2003.11.09)。勞動黨以一個中國、兩岸統一的前提表態要支持國民黨，這與廢票運動主張「罷免藍綠，走自己的路」是完全不同的。

這場秋鬥「勞工高峰會」是工委會主動邀請社運界面對總統大選政治態度的對話，發言代表分別提出了不同的見解及策略⁸⁸，對比 90 年代工運動團體間的「分而不裂，鬥而不爭」，各團體在議題上相互競爭但很少惡鬥⁸⁹，但工委會以廢票主張挑戰運動陣營與藍綠政黨間的關係，進而面對彼此間的「分還是合」，是延續著工運自主性及工會做為市民社會的一環，在政濟結構中如何取得自主發展的空間以主導社會變革的作用的尖銳提問，部份社運團體仍無法跳脫比資本主義壓迫結構更具壓迫性的國／民族認同宰制，並以後者來界定與右派政權、藍綠政黨的態度。

從各陣營提出的回應中可以看到不同的政治選擇與利益考量，已確定這場廢票運動無法在工運界「分而不裂」的關係中前進，廢票運動拉出了挑戰階級與國族(統獨)的優先性、人民與統治者關係的辯論與實踐，在高峰會後我們開始轉進解構藍綠認同的公民社會中行動。

第二節 廢票運動的穿透性

爲了在既存藍綠政治中確立廢票的「正當性」，面對各式「消極說」(還是有人會當選)的反應，得樹立其做為對抗爛政治的「積極」手段，以「選制」不公(有錢人才玩得起)到「藍綠政治」的政治壟斷(輪流作莊)再到「綁架」弱勢者的等大跨距的論述挑戰，對我初到工委會的運動者來說，超過我對政黨政治的認識與分析能力，每每與運動界的頭人們對話後，總覺得被壓的很不舒服，因爲這個政治工作不是單純的理念對話，而是與既存的現實「政治」交手——「你們選完之後要幹嘛？」、「廢票是消極的，不如推人參選」，沒有人對「走自己的路」有所期待，這些反應或是間接拒絕或是實質看衰，總之，廢票運動從我直覺的反抗中漸漸的貼近了「主流政治」的現實中，搞得自己疲備不堪。

6.2.1 二種「輪替說」——有實力拉你下台與選比較不爛的

在廢票運動的推動中，我拜會過不少熟識的工會幹部，印象較深的一次是與石油工會資深幹部徐慶國的對話，因爲我在貨運站工會時曾與他一起主持廣播節目，對他的政治傾向略爲了解，但他在工人立場及行動上是認同工委會的基進路線的⁹⁰，所以歷年秋鬥他都大力支持，又因爲他身在國營工會熟悉高官與政商間

⁸⁸ 詳見 2003「秋鬥」勞工高峰會會議實錄(工委會，2003.11.09)

⁸⁹ 鄭村棋，《左與右，國家政黨與勞工》2003，台灣沙龍座談會

⁹⁰ 參考台灣工運雜誌第 13.14 期:17:〈國公營工人鬥陣行〉，專訪石油工會幹部徐慶國、曾銘恩的

的抬面下運作，石油工會對抗民營化政策經驗豐富，我想藉此了解政黨輪替後他如何思考工運與政黨政治的關係。

剛走進石油工會的辦公室，他劈頭就說「香伶，你們搞陰謀哦！會投廢票的是綠的，因為阿扁做的太爛，國民黨的又投不下去，廢票會拉走綠的票，麥假啊！」，我反駁說「不一定，我們接觸的結果的是藍的傾向投廢票，雖然阿扁做的不好，但連宋這個組合沒有新意嘛，國民黨這四年也沒什麼改變，藍的投不下去」，阿國回應說「話是沒錯，但是 2000 年阿扁贏是因為連宋分裂，這次國親整合成功，躺著選都贏，民進黨基本教義派會更有危機意識，綁更緊，…我們工會不一定會表態支持那一方，但選前施壓換點承諾是一定會做的，廢票是來擾局的啦！」。這一來一往內容因為記憶有限或已失真，但我至今印象深刻的是他的表態「我會投連宋，不是我支持國民黨，是因為我相信只有政黨輪替才能教訓他們，二千年我是選阿扁，我們把你送上去，這次要把他拉下台，民主政治就是要這樣幹，教幾遍就乖了。」。

政黨輪替是民主的常態？！

2000 年至今台灣政黨輪替又輪替，人們有學到或記取教訓嗎？輪流作莊才是事實，「民主常態」成了他們獲取選票的藉口，工會幹部們難道看不清嗎？我心中的不解是如工運幹部者，有一定的政治歷練及工人意識，為個別工會利益壓寶無可厚非，但真有換到什麼好處嗎？阿國堅信的「實力論」、「輪替說」，對民主政治的發展制是可以被檢驗的，他不受族群／本土政權意識宰制，思考的是選民的理性行為可以左右、改變惡質選風，這也是一種行動的抉擇，非關藍綠。當時記得他表態支持選制改革，但不想浪費票，而是要把「比較爛」的拉下來，先展現實力再說！對他的論點我自認沒有能力改變或說服他，因為現實中「投廢票」還是會有人一組人當選，選制未改前永遠都得面對這個結果，把廢票數衝高是否真能影響政局、改變制度，當時我是沒有把握的。

另一次的訪談則更貼近一般人對政治的真實態度。我因為有機會到西北航空工會上課，認識了常務理事江志昌，直覺他應該不排斥談政治，就與他約了一次談總統大選，或許是行業的特殊性，他看事情的角度比較不是施壓或交換的意味。「…我一定投藍的，雖然二千年我投阿扁，但他們幹的太差了，把基本的社會價值都搞亂了，我兒子問我什麼是『碗糕』？你說，怎麼有一個總統是這樣當的…」，我回應說「他應該是對深綠的群眾講話，鄉土性強嘛，但你覺得藍的上來會比較好嗎？」，「藍的不一定比較好，但藍的人才比較多，起碼現在的經濟搞的這麼差，兩岸關係搞的這麼僵，都是政治人物在操弄，一般人並不這麼反

秋鬥感想，徐慶國從 1993 年就參加秋鬥，對工委會路線的理解是「利用每次機會教育工會會員，讓所有人能主參與…，不同於硬性的、由上而下的權威領導，注重每個參與者的意見表達…」。(楊偉中，1996)

中...」，「那你們航空業有受到什麼影響嗎？」，他說「其實我們主要是飛日本、美國，勞動條件是與亞太的標準在比較的，但大陸這塊餅總公司已在準備，整個重心會移往日本，台灣的基地很可能會收起來，我們正想談團體協約，但受限於亞太區的高層，難以溝通，我們想搞國際串連，台北人少，力量小…」。

有關政治的部份我們談的不多，勞工處境的憂慮、工會下一步的策略成了討論的話題，藍綠政治雖然吵翻天，但江志昌擔心的是明天就要勞資談判，無心對口水戰發表意見，誰有能力把經濟搞好一點，大家有飯吃，管他誰當總統，他是選黨不選人，誰上誰下工會都得靠自己拚！。

把工會發展與個人政治選擇切開，並不是所有工會幹部都這麼理性的，對比於阿國的理性說或我在廢票運動推廣的挫折感(最強烈的一次是回到苗栗家鄉的那一次⁹¹)，現在回頭看，重點不在「不藍不綠」、「拒絕綁架」或「含淚投票」，而是市民社會正是受制於主流政黨所宰制的意識中，自主性社運又尚未成為可期待或支持的反制性中介者，我們試圖以左／右之分來穿透統獨／藍綠的意識控制馴化，得發展出不同的行動策略才能脫困往前。

6.2.2 媒體對廢票的二種定性—罔顧弱勢 or 公民反撲？

廢票運動在社運界引發辯論的報導，也引起主流媒體的競相評論，在民生報的社論中認為廢票運動違逆了弱勢者生存的利益，只有「在其中挑選比較不爛的那一顆」才是弱勢者明智的選擇，投廢票是政客們得利，不是什麼「走自己的路」：

勞工是台灣社會為數最大的弱勢群體，也是這些年來政黨惡鬥、政府無能、經濟政策搖擺不定之下的最大受害者。雖然，面對的是兩顆爛蘋果，但勞工朋友有權利、也有必要在其中挑選比較不爛的那一顆。豈不見李登輝已明言「這次大選，沒有中間選民」，亦即擺明了要以意識形態來切割選票，而不是以經濟發展、民生福祉來爭取選民？

在這種情勢下，勞工投廢票不啻將自己的命運交給根本罔顧弱勢群體的政客們，而不是甚麼「走自己的路」。工運領袖們，千萬慎思！（民生報社論—「百萬「廢票」，對誰有利？2003.11.11）

這種政治論點與「二選一」的邏輯正是維護及迎合了綠藍政黨統治的社會正當性，完全不處理政治上一般人在意識形態上「綁架」或得「含淚投票」等支配性的實質現象；在中國時報更早一篇的社論中倒是直接以「第三種選擇」來定性「廢票」的積極性意義，在中國時報 2003.9.30 的社論中指出：

⁹¹ 見第三章第二節 3.2.2 挑戰藍綠政治—「廢票運動的複雜性，超乎我的想像」一節。

其實，反投票、投廢票等運動在歐美國家早已屢見不鮮。因為不投票只是表達不滿與無奈，除了降低投票率，無法彰顯出更積極的意義，投廢票有可能發展出文化價值，顯示選民抗議政治現況、要求尋找出路。藍綠陣營在未來半年想要避免抗議反撲，唯有拿出像樣的政績及具體端出牛肉，才能讓中間選民心甘情願在藍綠之間選邊站，否則，千萬別忘了選民還有「第三種選擇」。(中國時報社論，2003.9.30)

以上二種詮釋的角度分別訴諸不同的選民，不論以弱勢者利益自保或公民政可能的反撲，都是認定在「藍綠政治」的框架下，弱勢者如何選擇／行動而獲得具體的「利益交換」說，不是以拒絕藍綠綁架來定性「人民作主」的反抗性，但能在主流媒體中以「社論」被詮釋，正是廢票運動試圖引發對話的重要過程。

6.2.3 運動的另類嚐試—網路對話、推爛蘋果、登廣告

總結了一些政治訪談的經驗後，我們把力氣轉到「不投票」一族的召喚上，不再強拉已有定見的人。如果台灣社會左／右之分的認識紮根不深，對藍綠仍有期待的「中間選民」並不是我們想召喚的對象，因為「中間選民」在政黨眼中是被定性成影響藍綠版塊挪移的關鍵少數，他們並非具有社會改革的強烈企圖，我們把目標縮小到不投票者，「對綠失望、對藍絕望」的政治冷漠族，希望在看到我們的訴求後，能主動去投下廢票，加入改變社會的具體行動中。

6.2.3.1 網路公民對話

在激烈的選戰中，一般的社運行動除非與政治議題有搭連，否則根本不受主流媒體的青睞，我們的訊息傳遞得發展出另類的方式，在秋鬥高峰會後，我們採取了街頭與網路的政治行動，就代議制中產生的各式弊端及「廢票」的主張以即時的網路報導散發出去(文宣不計其數、電子報就出了七期)。網路行動對年青人來說已成為接收資訊的重要管道，我對於使用網路進行運動組織的想像非常貧乏，直覺上還是對直接的溝通比較有動力，網路的虛擬性讓我覺得不夠真實，但在廢票運動中受制於主流媒體詮釋的限制，使用網路是必要的補充工具，因此，我們在工作中編派了論述及網路小組，負責在網路上進行回應或引發討論。

一位在網路上積極推動廢票運動的網民—「剝雞碎碎念」，在 2004 年 314 春鬥時來到現場，帶著他的女友一起參與推爛蘋果行動。能遇到這樣的網路行動者十分難得，因為透過網路我們不時看到一些惡意批評或不知所云的意見，因為不知對方的政治想法，只能以文字或邀請進行對話回應，並不知這樣的處理過程是否有發揮效果，因此，當「剝雞碎碎念」到現場時，經媒體訪問才知道他就是網友之一，著實令人士氣大振。

廢票運動也是我們首次透過網路進行論述與辯論的嚐試，在實質的組織上或許無法看到立即效果，但對比過去以工會／社團為基底的串聯形式，網路一定程度發揮了宣傳與影響投票行為的功能，雖然許多工會幹部或弱勢者不太以網路進行學習，但對於年青世代或非運動圈人士，一些素未相認的網友們逕自發動的行動不斷出現，「米白色廢票運動」聲明，亦是在網路上廣為流傳的電子文件。（

為什麼叫「米白色廢票運動」呢？因為我們不想被歸類為藍色、綠色、或橘色。又憑什麼不歸屬於這三種已被高度染指的顏色，就該活該被歸類叫做「中間選民」，活該每天被老氣橫秋的政客與媒體操弄我們的民意？ …

我們要去投票，要去投廢票，我們要用廢票的數量宣告我們的不滿，不滿40年國民黨黨國機器成功弱化我們的民智並戕害我們的經濟體質，不滿扁政府上台以後也無能整理台灣社會以羸弱的病軀，不滿綠營自以為上述罪愆都事不干己的自以為是，不滿台灣媒體從未發揮誓言作為社會公器的自我期許…（摘錄自「米白色廢票運動」聲明，2003.11，百萬廢票手冊 P:42）。

這種公民行動的自發性串聯，與直接對話式的張力不同，但卻是不可忽視的運動能量。對比於主流媒體的報導，我因為對外負責發言，經常面對記者的採訪，記得在選前我們到中選會抗議，中國時報記者高有智一直拉著我問東問西，主要是說要做廢票與泛紫聯盟的比較，過程中聽得出來他對廢票不看好，對泛紫聯盟期許甚多，訪談中他問到「你們目前估會有多少廢票？」，我當然無法直接回答，他也不太在意我的回應，只在最後冒出一句話說「政治上是看實力的啦」，隔天報紙出來是一大篇泛紫聯盟的內容，文中只加一小段廢票行動的文字。他的報導或許反應媒體觀察政治的視角，廢票運動不太符合中產階級要的改革方式，而有些媒體工作者也不是真想了解運動，多數是以抱著政治觀察的心態詮釋運動，「政治上看實力」指的是可否影響藍綠選情，如果我們聲勢看漲他的報導角度一定會有所調整，就像他對泛紫的拉抬一般。

越是理解到主流媒體的保守性後，我才更加投入網路上的宣傳與回應，雖然還是不知影響了多少人，但從「剝雞碎碎念」網友的肯定中，我知道這個工具有其一定的力道。

6.2.3.2 “推爛蘋果”高難度遊行

要在激烈選戰中能爭取到發言及被關注的空間，廢票要如何「打」選戰？在認清無法期待各別工會以集體名義參與，又未能透過主流媒體集結到一般的選民，我們開了無數次的選戰會議，各種點子與行動設計反覆的討論著，記得在一次會議膠著時，工運前輩吳永毅提了一個高難度的點子——用鼻子推爛蘋果。

大家先是狐疑「真有人這樣幹嗎？」，後來吳永毅把網路上的圖片⁹²拿給大家看，原來，是一個英國青年為抗議高學費而以鼻子推花生到白金漢宮前的行動，這個人推了好幾十公里，引起輿論的重視。但這個點子與廢票運動如何連結呢？吳永毅說：「我們可以改用鼻子推蘋果，表示我們不吃爛蘋果，一定會有效果的」，只是這個動作對我們又是中高齡又是工傷者的運動社群來說難度高，有條件參與的人不多，怎麼辦？

吳永毅不死心，隔天他就做了一個蘋果道具來，並現場示範給大家看，說來也有趣，我們推了幾步，不是太累人，但推整個遊行一、二公里就這樣搞一定會引起反彈，在大家七嘴八舌的討論後決定提到廢盟的會議中做決定。令人意外的是，在廢盟的工作會議上反應出奇熱烈，有些老骨頭(如王耀梓、賴吳明)也說他們要報名第一隊，大家對這種新奇的作法共識頗高，只是苦了工作小組，到底要準備多少顆蘋果呢？蘋果是圓的會滾來滾去，到時一定笑場連連，影響到活動調子…，還有一群人在凱道前跪下來用鼻子推爛蘋果，要如何詮釋呢？大家七嘴八舌的問起技術性問題

經過一翻試推與技術上的改良，我們先號召了 100 位先鋒隊員，負責推爛蘋果，在外形上將他們的雙手用藍綠兩條繩子纏住表示被綁架，推完蘋果之後再把蘋果與繩子統統丟到垃圾車，表示掙脫「藍綠」綁架、拒吃「爛蘋果」的意象。但無法推蘋果的群眾如何參與呢？

遊行前一天晚上，吳永毅又興沖沖的打電話給我「香伶，可以買到捲筒式衛生紙嗎？」，「幹嘛用？」，「讓沒辦法推蘋果的人推捲筒式衛生紙，表示他們『擦乾眼淚，投廢票』的意思」。真不虧是點子王、智多星，吳永毅當時已到香港念書，為了廢票運動還特地回台幫忙，他把深奧的意涵簡單、具象的反應在行動中。

解決了動作上的設計，我的焦慮又來了，人少會被看笑話，怎麼辦？時間越來越逼近，春鬥的籌辦緊鑼密鼓的展開，我們一開始預估的人數大約是二百到三百人，雖然有推蘋果的重頭戲，也已號召了百人先鋒隊，但人數多寡還是會影響士氣的。春鬥前一天，老鄭與我們開工作會議，他問我需不需他上場頂，我說「ok 啦，但人這麼少，會被看衰」，他想了想沒有回應什麼。隔天在佈置場地時他先打電話問說「想到沒有？怎麼說」，我個人在一種興奮又焦慮的狀態，一時答不上來，後來他提醒說「改革本來就是少數人在做的事，人少不代表是錯的，人多也不一定是對的，你覺得呢？」。

⁹² 自由時報「推花生」抗爭一文，在英國高德史密斯學院修習藝術的麥高文，因不滿高額的學生款，自九月一日以學校為起點，進行以鼻子推花生的議行動。(自由時報，2003.9.13，第 12 版)

我想他早已知道運動的現實，論實力，數人頭我們早已大不如前，從秋鬥的廢票高峰會到春鬥行動，一路與工會或社運團體的接觸就知道這條路有多難走，即使過程中有一些個人，如：運動前輩紀萬生先生、左翼進步圈學者或網路公民的支持，但要在街頭現身相挺得有更多的條件配合，一般選民更不會因為媒體偶而的報導就自動來參與，「少數不一定是錯的」，這句話讓我在當下回過神來，一是，當下我確實看到凱道前邊台北賓館的整修工程中有好幾名工人在看著我們，不時比起大姆指，這群人搞不好投票日都還得上工，不可能去投票，他們的聲音更不可被兩大黨聽見，我們要做的不就幫底邊的人發出聲音嗎？一時間我的信心與勇氣一湧而現；此外，媒體的反應也讓我意外，一早就有 SNG 車到現場連線報導，顯示這個活動已引起社會重視，對投票意向有具體的影響力。

老鄭在中午左右到現場，問我「準備好了嗎？要不要我上場」，我說「不用，你在遊行出發前演講即可」。

「理想少數，改革起步」是我們在現場約四百人的隊伍的自我認知，相對於兩陣營動輒數十萬人的互別苗頭式的政治動員，激情、高音喇叭、名人站台、群眾如癡如狂；我們的「春鬥」人少、沒有名人加持、沒有聲光噱頭，但意志堅強、相濡以沫，我們這群弱勢者以自己的身體、聲音在凱道前，向「政客說 NO！向自己說 YES！」，這是多麼不容易的集結，當然要自我肯定一番。

總統大選只剩 12 天，藍綠兩黨還在互相抹黑、攻訐，為選戰殺紅了眼，再這樣比爛下去，台灣的民主如何深化？越扯越爛的政治獻金問題、頻繁動員拼人氣的造勢，向客家族群搶票、喊話的心戰，人民面對的生活壓力、自殺不斷、貧富差距、稅負不公、失業等，兩黨都視而不見。這樣的政客、比爛的政黨，為什麼我們還要投藍、投綠？（2004.3.14 春鬥文宣，賴香伶）

在凱道集會完後，遊行隊伍正式開拔，在大車頭的前導下，兩顆長滿蟲的藍綠大蘋果穿梭在隊伍中，眾人跪在地上用鼻子吃力的推著爛蘋果，許多工傷者坐著輪子滾衛生紙，當隊伍來到中選會前時，我們把兩個大藍綠爛蘋果道具丟進中選會還與警方發生推擠，所幸沒有人受傷，警方說要沒收証物，我們則反噏說那是要還給中選會的劣質品，雙方隔街叫陣。最後，我們把載滿小蘋果的大車斗舉起，一時間近千顆的蘋果及衛生紙轟然落下，眾聲喊著「拒絕含淚投票、拒絕藍綠綁架」，群眾堅定投廢的意志，氣勢驚人。

這場春鬥活動到此結束，雖然只有四百人參加，但對我來說是政治上關鍵的戰役⁹³。

⁹³ 其關鍵性在於政治上把投廢票的行為從一般認知的投錯、無意義轉為公民自主性的展現，同時鬆開了藍綠綁架的宰制，公民在既存體中找到可對抗統治者的武器。

6.2.3.3 廢票怎麼投？政客都閉嘴

結束了 314 春鬥，2004 年 3 月 20 日選前的最後一週，台灣藍綠政治是否翻盤已進入倒數階段，我們除了完成了推爛蘋果行動，在 3 月 16 日又再度集結數百人次的接力行動，企圖做最後一波衝刺，「藍綠比爛，民主比龜慢」的 26 小時馬拉松式行動，是我們對選舉過程中兩大陣營採取各種奧步、大打口水仗的反諷行動，這個行動比推爛蘋果更難，因為活動的設計是以一百顆蘋果從兩個競選部中移動的速度來計算行動時間，整個距離是 3.6 公里⁹⁴，時間要用掉 26 小時，對參與者來說是一場體力與意志力的挑戰。

抗議、諷刺、論述攻防都做了，但廢票到底要怎麼投呢？說來有趣，自從使用網路宣傳後，廢票怎麼投也可以是一種搞創意的動員行動，在網路上我們發起徵求投廢票的方式，真有人設計了各式點子，從自行印製豬頭貼紙到把候選人臉塗黑的選票樣章都有，為了呈現廢票運動的效果，我們想在平面媒體上登廣告，這麼花錢的點子，過去都不太敢想，但既然頭都洗了還怕什麼，鄭老師一口答應去募款，我則負責接洽媒體。在世新大學黃德北老師等 135 位朋友的贊助下 (2004.3.19 蘋果日報 A19 版)，我們決定刊登廣告，透過主流媒體的宣傳，直接把廢票的理念及投票指南公佈出去，讓更多人可以看到。

與鄭村棋討論後，文稿的雛形已經出現，他對選民的狀態也作了重要的定性：1.投藍／投綠的就先不寄望他們會轉向、2.對於未決定或還在猶豫中的人，短期內不可能放掉「政黨再輪替」或「民主就是選一個比較不爛的」思維；3.「含淚」一族，有著特定歷史政治糾結的情感，要他們立即挪移到不「縱容」所屬陣營而成為「內部改革力量」，在理性上說得通，在情感上不太可能。最後，在絞盡腦力下，我們依類別列出九大族群⁹⁵，提示出他們各自該投廢票的理由，這份文宣呈現的是廢票運動對民主改革的基本立場，不再是簡單的「瞎爛」情緒，而真正想打動的對象是號召「不投票者」，企圖改變他們不去投票的決定。

在文稿出爐後，我不禁自問是那一類人？如果不在運動中被改造與看到底層的處境，我可能在客家情結與反藍綠的情緒中不去投票，反正「不差我一票」；但在十幾年的運動生涯中，知識份子被群眾挑戰與改造的影響已然發生，運動中的自己開啓了理解自身政治性的摸索，廢票運動更使我深入的理解我們這支運動路線的指向與困難度，看著文稿中—「九族共和，廢票救國」的標語，以運動的思維重新定義活在政治社會中被擺置的人民，一小步的挪移或參照都會是聚集改

⁹⁴從台北市八德路國民黨全國競選總部出發，間隔交換百顆蘋果，緩步走向民進黨位於民生東路的全國競選總部，共花了二天一夜的時間，在行動尾聲快到民進黨競選總部前，一些自美返台投票的綠營支持者，在半路上下車挑釁我們，還出發了警方保護我們的抗議行動。

⁹⁵九族共和廢票救國，指的是 1.拒投族 2.苦命族 3.廢票族 4.理想族 5.綠皮廢骨族 6.藍皮廢骨族 7.含淚投藍族 8.含淚投綠族 9.基本教義族等九個類別。

變結構的力場共振。

第三節 廢票運動「人民性」實踐

廢票運動除了接上 90 年代中自主工運面對政黨的路線選擇、辯論外，最核心的目標還是以發展人民對抗藍綠統治集團所操作的政治意識，以階級優先的思維提出「拒絕藍綠綁架」、落實「人民當家作主」為基本論述，透過投廢票的政治號召突顯兩大黨聯合壟斷、剝奪人民政治權利的事實。

如何檢驗此運動產生的作用，在此援引丘延亮教授提出的實質民主概念，就其所定義的「人民性」的覺知與踐行(praxis)之對話，是以人民追求自由、責任而不是秩序的實質民主，從「民主不是什麼」來反駁形式民主的統治性質，這一抗爭踐行的人民性感知與體現，丘以 Touraine 所提的「主體化」概念呈現行動者「主體」(非 ego)的建構過程，是透過參與、由生命經驗所充實、所認定、所重新解釋的一種自由，形成一挑戰既有社會秩序的社會行動和精神運動。(丘延亮 2008：19-27)

在此，我以主要推動者的經驗回應「人民性」中實質民主得以被行動者踐行與覺知，放在廢票運動的政治對峙場域中，有三個清楚的鬥爭軸線：「民主不是什麼」、「重新建構民族／族群與階級意識的交融混雜」以及「解構政黨奪取利益操弄的認同政治」。這三個軸線，在前揭的一、二節中，我以廢票運動的政治性、穿透性描述了社運與政黨政治間的交鋒過程，本節以廢票運動後藍綠鬥爭愈形激烈，廢票運動在階級運動到底開創了什麼政治空間？

6.3.1 開票之夜～33 萬張廢票

2004.03.20 晚間六點多，工委會辦公室異常熱鬧，以前除了籌辦「秋鬥」時因為得日夜趕工，辦公室也時常燈火通明，人聲雜沓，但因為選舉開票而聚集三、四十人對小小的辦公室來說是擠了些，大伙一邊看開票一邊吃東西，不時有電話進來也算氣氛緊張，因為這次的開票不是只有藍綠二大陣營的票數差距，誰贏誰輸，還有一組重要的數據在開票過程一直沒有顯現，要不要派人去中選會看看呢？我心裡一直有這個念頭。

我因為負責廢票運動的推展，當晚確實有點忙亂，要照顧前來看開票的伙伴們又要在第一時間回應選舉結果，心情一直未能放鬆，晚間約末八點半接到中華日報記者簡子祥的來電，他的聲音比我還興奮，他說「香伶，恭喜，廢票數創歷史新高」，我說「不會吧？」一顆心半信半疑的，特別是記者的來電，但他說「33 萬張廢票，中選會已經統計出來」，「哇！真的嗎？」，我把電話擺下向大伙宣佈電視轉播尚未傳送的訊息，同時又向記者問到是誰當選？他說「陳水扁當選，

差三萬多票」，我向記者致意後趕忙進到工作間與燕堂、鄭村棋報告現在最新消息，一種興奮感立即轉為莫名的焦慮，因為藍綠陣營票數相差這麼少，結果又是藍營輸，而廢票數高達三十三萬張，比去年高出三倍（每次選舉廢票數約十萬張），在選前我們曾預估了幾種可能的狀況，而藍營從 2000 年的分裂到 2004 年選前一天的 319 槍擊案，最後還是輸了，這個結果對廢票運動的未來推展最為不利，但果然歷史就這樣發生了。

6.3.1.1 藍營提出「選舉無效」之訴

當晚開票結束後，中選會公佈選舉結果，透過電視畫面的轉播，國民黨部前上萬名的支持者席地而坐，有人掩面流淚、有人鼓躁要抗爭，候選人連戰與宋楚瑜宣佈不承認選舉結果，要求重新驗票並提出「選舉無效之訴」，要求中選會立即查封所有票箱，進行驗票。台北市高等法院在 3 月 21 日早晨 7 點做出裁決，要求立即查封所有票箱。民進黨競選總部前則少了一些喧鬧口號，主持人呼籲群眾要冷靜、趕快回家...；當晚，支持國民黨陣營的群眾在連戰的帶領下赴中選會抗議選舉不公，群眾的不滿從選舉結果到三一九槍擊案再到選前操弄族群的對立，三月廿日起台灣的政治局勢進入了更黑暗的藍綠政治對立中。

33 萬張的廢票一定程度上被視為壓垮藍營的最後一根稻草，要求重新驗票的藍營嚴重質疑中選會及各地投開票所作票(2004.3.22，蘋果日報，A7)，各地選委會也著手展開調查；綠營認為與無效票的認定從嚴及受到廢票運動的影響有關，總之，在「贏者全拿」²的總統選制中，廢票從社會運動對峙藍綠政治的宣傳中成為政治上影響輸贏的關鍵少數，只是這個廢票運動放在藍綠政治嚴重對立的社會矛盾中，一再被解讀為「賭爛」情緒的出口，而非屬藍綠政治之外可進一步集結的改革力量。

6.3.1.2 廢盟：公投「重新選舉」

回顧 2004 年總統大選的結果，以廢票數高低來論斷工委會號召發動的百萬廢票運動，確實令人振奮，選後部份媒體及運動人士亦曾論定廢票運動打開藍綠政治之外「第三勢力」的政治空間，但開票當晚，台灣政治陷入前所未見的政治風暴中，在藍營申請司法驗票又因程序不符遭高院駁回後，我們再次提出聲明(如下)，並認為應以公投方式決定是否「重新選舉」：

人民選擇舵手，卻不知舵手要把船開往那裡，兩邊的主人因為僕人之間的爭議形成對立，造成人民對民主政治發展的認知錯亂。廢盟表示，發起「廢票運動」提出選制不公等結構問題，台灣因為沒有「以上皆非」的選項、得票未過半應舉行二次投票、不在籍投票等先進國家的選制，「廢票」被視為無效票，亦未被列入得票率的計算，如果將 33 萬多張廢票列入得票率

計算，綠藍兩組候選人的得票率只有 48.8%及 48.6%，兩黨均未過 50%，若以其它先進國家的選制來看，可以進行二次選舉，由人民再次投票。

…廢盟認為此種理性的呼籲，藍綠兩陣營可能不會接受，但站在人民的利益考量，320 前原本只是含淚投藍綠者，經過槍擊事件可能變成含恨投票、含怒投票，一場選賢與能的大位之爭，卻成為台灣民主化歷史最負面的示範。重新選舉，排除所有影響選舉的負面因素，用政策、理念來贏得選民的認同，才是國家之福、全民之福。(百萬廢票行動聯盟 2004.03.24)

這個主張曾引來某社運團體的撻伐，為文引涉工委會的廢票運動是助藍打綠才會在第一時間自我轉向，不敢承認廢票數創新高是運動力量的展現。這種指控與選前的「動機論」、「消極說」、「無政治主張」等批評差不多，無須多作解釋，但我們提出的以公投方式解決爭端與國民黨的「重新選舉」、「重新驗票」以「選舉無效」之訴來解決相差二萬多票敗選的情勢是完全不同的立場。

6.3.2 “藍軍” 嗆聲了

從台灣政治民主化的過程來看待藍營在 2004 年總統大選後延燒的抗爭行動，這群憤怒的“藍軍”逼使國親聯盟及連宋等人接受體制外的街頭形式，不論這個群眾屬性是保守、反動或有多少進步性，只有近身觀察才能理解。再回頭理解黨外時期以街頭衝撞匯集的政治改革力道，在生命共同體及民粹式省籍—國族身份的認同，這股改革力量卻被收為「省籍路徑民主化」的動員架構中，具有民族主義以人民非階級為訴求(王振寰，1993)的台灣人反威權統治意識，這些衝撞體制的力量成就了民進黨也完成了本土性政權的政黨輪替；2004 年人民對抗的政權已換成了本土的／台灣人主政下的政府，群眾也從中下階級為主的「本省人」轉為「外省」、「喝國民黨奶水長大的」公教階層為多的藍軍，歷經 8 年(2000 年至 2008)的民進黨政權統治後，「民主不是什麼」，一般人民已有較務實的社會認識了。

6.3.2.1 延燒的選戰～「沒有真相、沒有總統」

雖然在政治上引起群眾不滿的導因是連宋以些微票數敗選，支持者難掩失落與絕望，情緒上轉以對選舉結果的不接受、不承認，但在抗爭的訴求上「要真相、拼公道、救民主」⁹⁶，一部份反應出對選舉過程的質疑，另一個未解的猜疑是對 319「二顆子彈」事件是否是陳水扁自導自演的選舉奧步。

這個槍擊案發生的時點就在總統大選前一日，當天早上我們還到中選會針對

⁹⁶這三個訴求是藍營在選後標示選舉不公不義的政治口號。(楊祖珪，2005)

兩黨紛紛印製公投與大選的貼紙進行投票指引，質疑兩黨違反選罷法，要求中選會立即作出裁示，沒想到，下午一點多電視上就插撥了陳水扁於造勢遊行途中被槍擊的訊息，下午 2 時我就接到記者來電詢問「廢盟」對此事件的看法，自此媒體及坊間各種政治解讀不斷⁹⁷，整個大選有延選或暫停的可能。

3.19 當晚國親可能認為勝券在握，而要求選舉不中斷，但整個選情已超出我們的想像，只得在隔天一早的投票時，仍以「放下激清、理性投票」來呼籲選民不要被政治局勢干擾，投廢票才能有效檢驗政黨，但從選後人民自發的抗爭訴求中可以看到，319 槍擊案是許多人對扁政府徹底不信任的關鍵事件。總之，選後歷經二個多月的抗爭，「沒有真相、沒有總統」及「廢票太多」成為選戰延燒的曲目，國親聯盟從一開始被群眾要求進行街頭抗議，到最後以「聲請驗票」、「選舉無效」之訴回擊敗選的政治餘波；陳水扁則在 3 月 30 日中選會發給第十一屆正副總統當選證書後即著手進行 520 的就職儀式，自此藍綠兩黨高層人士相互放話要以群眾集會來拼場。

6.3.2.2 重新認識凱道上的「藍軍」

在大選後掀起的街頭抗爭期間，我經常去凱道，有機會就與身旁的一些群眾聊聊，想知道參與群眾對廢票運動的態度，同時也抱著觀察的心態，看看這些「藍軍」們有激進化的可能嗎？

一開始我對群眾的基本認定是「他們是外省掛、公教背景的、支持國民黨的、中產的、保守的、被動員來的、…」，確實帶著這些主觀的看法讓我與群眾保持了距離，這些認定的框架是以工運中經常接觸的群眾做對照來的，但意外的是，我在廣場上看到了一些工運場合中的熟面孔，在我的分類框架中他們也成了「藍軍」⁹⁸的一部份，但他們即非外省掛、特權階層背景，也曾在工運中與我們批藍批綠(甚至投廢票)，這樣的群眾因為不滿選舉過程或結果而站出來，是公民政治意識的召喚嗎？還是被政治動員來的？

其二，我的認定是，在台灣幾乎年年都有選舉，透過政黨從上而下的操作模式，人頭動員成為藍綠二黨拼實力的象徵，因為是人頭動員即使有數十萬人站出來，時間一到也就解散回家；此次持續近二個月的凱道群眾聚集，早已超出政黨

⁹⁷ 當時的政治評論以質疑陳水扁為了勝選而自編自導的選舉奧步，而深綠地下電台則放出此乃中共為干擾台灣的選舉而搞的陰謀，不希望陳水扁黨當選的政治介入，另一些傳言則認為是美國情治單位對選情的操作，但更令大部份人驚愕的是地下賭盤對藍綠翻盤的賭注代價太大了，槍擊案是黑道勢力所為。

⁹⁸ 藍軍／綠軍是在選舉拼場式的對壘式稱呼，而此種以顏色來區分兩黨的支持者是二千年政黨輪替後，政治上國親二黨從分裂再到合作，「泛藍」陣營指的是國／親／新黨在基本認同上的同質性，是以此支持者一般均統稱為「藍軍」，而「綠軍」則被視為是支持民進黨與台聯黨的群眾。

指揮系統的控制，集會解散令下達後，群眾仍佔據街頭、露宿接力，似乎不達目的絕不罷休，以群眾的意志倒過來逼使領導層改變決策的過程，此「藍軍」展現的自主／激進性讓我的基本認定又有了改觀。好幾次在散場時聽到「國旗隊」⁹⁹的女性群眾們呼喊著「我們走了就輸了，一定要撐下去，要學以前民進黨的抗爭手法，不要被他們看不起」，聽到群眾們自主性的嗆聲或群聚的討論對話總讓我感到興奮，因為心中的「藍軍」刻板印象一直在變化著，到底他們想的運動目標是什麼？翻盤嗎？做為一個社運工作者又是公民群眾之一的我，可以與他們發生什麼連結¹⁰⁰呢？

「人好多喲，你從台北來嗎？」，「是。我今天請假來的，陳水扁做的太過分了」，我主動與身旁的陌生人聊個兩句，第一時間沒有被拒絕是好的開始，但接下來要說什麼呢？「你投連宋嗎？」，「對。我之前是投陳水扁，但他做的太爛了，這次要給他教訓一下，沒想到他竟然搞這種事」，「對啊！，真是太過分了」，挾著台上台下吵雜的聲響，身旁的人川流不息，還能繼續聊什麼呢？「你來幾次了？」，「第一次，我看到電視報導說人越來越少，怕這樣會被他們幺過去，所以就請假來看看，下午再回去上班」。

這麼直接的情緒與要“站出來”的動能，帶著檢驗政治人物的誠信，在選舉過程中公民的權利意識直接對上統治者的權威，在順服關係中似乎有些鬆動，這樣的群眾或許在政治認同上還是有一定的傾向，也未必以同等標準檢視二黨的屬性，但即便如此，當他決定請假“站出來”表達討公道的意志時，被視為「藍軍」或只是為了討藍營的公道，已不足以包裹解釋其身為國家公民的主體性，以人民的立場要求政府認錯或面對問題的態度，況且整個抗爭是群眾逼使著國親政黨採取街頭抗爭的，就這個關係也足以彰顯公民的主體性而非被動的政治動員。

在當時，我仍以某種距離觀察著「藍軍」，以至在場中沒能發展出進一步的行動，這個距離一部份是因為我主推廢票運動，受基本信念的認知所致，當然廢票被視為藍營失利的重要因素之一，也讓我對這樣的「群眾」沒有信任感。察覺自己行動上遲滯是在細讀楊祖珺老師的《我在凱達格蘭等你，2004 年 320-520 抗爭紀實》及經歷了紅衫軍倒扁運動後才逐漸清晰的。

至於筆者當初同意著手記錄這場 2004 年總統大選後的抗爭實況，其實與個人從黨外時期從事反對運動到參與民進黨建黨過程中，一路走來的領悟有關

⁹⁹凱道上出現了一群群的「國旗隊」，這些群眾彼此之間並不熟識，在持續幾個月的抗爭行動中，培養出相互接力抗爭的默契，並以揮舞國旗形成一種愛國家的印象。

¹⁰⁰對比我的運動同志—王芳萍，她在此階段的參與動力比我強烈許多，她說「其實我與群眾的關係是親近的，我是外省二代喝國民黨奶水長大的，對國民黨並不反感，但在這的抗爭中，我看到宋楚瑜等政客操弄群眾、棄離群眾，我是很憤怒的」（王芳萍，2009 口述訪談記錄），因此，她在那段期間常常去凱道，支持這些打死不退的「藍軍」。

——看慣支持者熱情奉獻，卻對「被背叛」的真相毫不知情。或者，縱使意識到「被背叛」，卻甘願選擇不分青紅皂白，找盡藉口為當權者脫罪，甚至以自我催眠的方式，讓自己陷入義和團式黨同伐異的簡約行動模式中，而忘了人民自己也有辨識是非，當家作主的能力！（楊祖珪，2005.3,p:5）

楊老師帶著她一路在黨外運動「被背叛」的領悟，對抗爭場上的部份「藍軍」進行領導關係中的訪談記錄，她揭露了這場抗爭中政客們的「背叛」，也記錄了不同階段中群眾們的自主性，在「人民做主」的視框中，群眾如何看待領導與決策的關係，楊老師在《紀實》一書中訪談的部份積極群眾，經歷過一次又一次被連宋陣營「留在街頭」的不堪對待，受到數次保警驅離、毆打的遭遇，正是反應出此次抗爭領導者與群眾間權力關係的不對等，政客們心中想的已是透過體制內的國會、司法等政治空間的交手，不是在街頭衝撞、逼宮。

對照我的行動策略，以觀察者的角度進場，其實是設定自己是一個「局外人」，因為選舉結果對公民政治意識覺醒未必不利，就以群眾的狀態來說，要透過街頭行動達到施壓以至於翻盤，首先得面對國親政黨的政治利益、盤算等，當時我在現場刻意問到「如果無法翻盤，該怎麼辦？」，一般非特定組織的群眾多半是先指責陳水扁「他臉皮太厚了，他不會下來的」，對領導者採取的司法驗票、訴訟等，覺得可能有希望，因此，街頭行動是展現力量給對手看，做為國親的「後盾」，不是以街頭力量達到翻盤的目的。

反觀《紀實》中的較激進群眾，從 320 到 520 的留守街頭，培養出相濡以沫的革命情感，在國親高層數次「離棄」的過程中總能自行武裝，獨自面對國家暴力的壓制與形成自治性團體(鬆散的)，對於政客的盤算、對群眾的擺弄操縱有深刻的體悟與反省，這場人民抗爭雖未對國親的奪權計畫取得戰果(幸好沒有，如果有就太便宜了國親高層)，但這群經歷了街頭抗爭的激進「藍軍」，對於人民作主的意識應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6.3.2 「民主不是什麼」

就「民主」概念的一般認知，「人民當家作主」指的是人民對某一政黨／政權統治認受性之反向拮抗，人民要在順服／支配、被統治的社會事實中，成為一具歷史質、主體性的權力擁有者及操縱者，其間的翻轉始於踐行「民主」本質性中的抵抗認知，「向那些勢力爭奪回自己作為主體的權利，就是最廣義的爭取民主精神」，而這個爭取（或鬥爭）是為一時、一地、一群人以其日常生活、生產與生長的基本權利持續進行的（丘延亮，2009:22）。

廢票運動把存於現實中的抵抗力道，透過批判當今藍綠政治集團宣稱的「民

主」價值，揪舉出「主僕錯置」、「藍綠綁架」、「族群對立」等統治階層用以奪取政黨私利的意識形態，在廢票政治性引發的價值衝突中，開展了人民性運動的實踐，以丘延亮教授於「實質民主」(台社，2009)一書中列舉的十種「民主不是什麼」，廢票運動實實在在的對映了其論證的基礎，更甚於此的是一廢票運動進一步處理了人民與人民之間「差異」的主體對話歷程。

以 Touraine 所提的「主體化」概念來看，行動者「主體」的建構，不是單一個體自我認知、轉化，而應係指人民之間透過參與、由生命經驗所充實、所認定、所重新解釋的一種自由，這種自由屬於人／我之間「集體」的共有，在相互傾軋、辨異至趨同的政治過程中，具歷史質的挑戰既有社會秩序的社會行動與精神才得以出現。廢票運動即是為人民取得此一「自由」創造了不可多得的政治空間，過程是充滿艱辛與阻礙的。

首先，廢票的“逆”主流民意，不取巧：「政黨輪替是民主常態」、「選比較不爛的」，一般人的選擇有其認識未澄澈的蔽障，但泛紫聯盟此一社運組織，在政治上絕口不提「投廢票」，其來有自；一是為討好中產階級，廢票手段過於太激進，二是投廢票否定藍綠兩黨，與權勢者通通清界線，對靠政府資源辦事的社福團體不利（其組成團體性質）；兩權相害取其輕，最後以「政策參選」自我解套。

再者，廢票的“否定”性被評為消極與投石問路：「投廢票太消極，推人參選才積極」、「選完要幹嘛，以組黨為前提嗎？」，即使工委會在工運圈主動挑過數次與政黨政治關係鬥爭的歷史脈絡，社運界對藍綠政黨的利害考量因其資源交換、押寶等現實利益的差異，得花更多的時間對話，簡單的以推人參選或組黨的「前提」來論析廢票的消極性，與政黨窮舉「民主」是什麼，以部份來定義全部的作法（丘延亮，2009:19），相去不遠。

第三，台灣族群政治的歷史複雜性，非廢票運動能畢其功於一役，但廢票直指政黨操弄族群政治，揭露其奪取私利的「假民主」，鬆動了人民之間的有形對立，而在選後延燒的政治情勢中，廢票得以再穿透假民主的蔽障、易容，在藍綠對立愈形衝突的空間中，人民以自發、主動的進行「政治表態」，無形的把「公民」的政治性從二分的身份認同中解離再生，無形的踐行了「認異的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

廢票運動是一場人民的抵抗運動，從「民主不是什麼」的階級反身論述中，我得以與自身的政治歷史相認（參考第二章第一節 1.3.2 我的「主體性」探究歷程），在辨析自身及所屬階級的「歷史質」中，我視此公共領域的人民行動是「慢政治」力場共振的延展，工委會在政黨輪替後的工運轉型／進困境中，廢票

運動的「在選戰中進行階級教育」的方向已經成形，同年底我們推出「人民老大參選作主」以「直接民權代議制」推動社會公民權¹⁰¹的政治工作、2006 年介入紅衫軍運動挑戰「公民不服從」運動的尺度及 2007 年基隆火盟推動罷免許財利市長並投入市長補選等，都是以思索社會公民權與轉化階級認同的重要實踐。

¹⁰¹工委會從廢票運動至提出「直接民權代議制」的行動過程，政治大學政治所博士生尤怡文曾於廢票運動後專訪我並發表〈從後威權到多元民主——試析 2004 總統大選工委會「百萬廢票運動」專文〉，她以「社會公民權建制化的路徑」來觀察廢票運動與工委會在運動轉型上的思考，我認為其評述的視框在理解的架構上正確，但未觸及運動中細緻的矛盾與不同路線鬥爭的差別，這也更反應了一般人在當時認知廢票運動的侷限性。

第七章 人民老大的政治行動——「直接民權代議制」

2003 年總統大選前我們號召政治上「不藍不綠」、「拒吃爛蘋果」的自主公民投廢票，揭露藍綠政治操弄族群以奪取大位的惡行劣績，大選中開出三十三萬多張廢票，著實讓人振奮，各方的政治解讀一部份以出現「第三勢力」的可能來評析時政，社運界把目光投向鄭村棋老師，希望他可以出來領導「第三勢力」，讓台灣的左翼政治力量得以快速發展。

但另一種負面評價、攻擊的言論卻發生在號稱（自許）進步的媒體——新新聞的報導中，「…選票開出來了，無效廢票高達三十三萬張，因此，遭到連宋競選總部質疑，這時，就有人想到，「百萬廢票運動」是不是造成廢票過高的原因之一。孰料鄭村棋聽到這種說法後，趕緊撇清關係，還對媒體表示，當時喊出一百萬張廢票的目標，只是廣告詞，原本就不預期達成。原來只是「廣告詞」？如果他未來還要帶領社運團體上街頭，又有誰相信他們是玩真的呢？」（新新聞周報 890 期:66 2004/3/26 ~ 2004/3/31），新新聞周報的惡意中傷與另一週刊的報導——「廢票數超高，鄭村棋狂勝？」一文直接引用凱道上抗爭群眾的聲音「鄭村棋搞什意廢票」、「都是馬英九沒管好」來彰顯藍營敗選與曾任馬市府勞工局長鄭村棋的「背骨」（叛離）有關。

我們在開票當天(2004.3.20)即發表了「理想少數・進步正數」¹⁰²的聲明，在之後也提出「公投決定重新選舉」的主張(2004. 03. 24)，均未獲兩陣營的回應。之後新新聞等周刊的報導就出現了，特別是新新聞，其記者劉伯姬在沒有訪問鄭村棋先生，又未參閱我們的正式聲明下，主觀臆測出「鄭村棋的態度」，在結語部份更是對社運極其負面的攻擊。我們在 2004.3.26 日下午立即與執筆記者劉伯姬連繫，並去電新新聞周刊表達抗議該文枉顧新聞專業，要求與總編輯楊照見面以了解新新聞周刊的處理原則。¹⁰³

上該兩篇文章只是選後點名批判廢票的主流媒體，更多散見在網路上的意見更是对「廢票」充滿敵意，顯見藍綠政權爭奪已不只是「爛蘋果」之差，更是台灣民主政治扭曲變形的毒樹果之根。不論藍綠兩陣營或其支持者如何看待廢票，我們在意的是自主投廢的公民未來可以如何連結與對話。

¹⁰²工委會於開票當天即發表聲明「理想少數・進步正數」，文中提及「在選情如此緊繃的情況下，一年多來的選舉造勢，乃至在二二八手牽手，三一三換總統救台灣造勢活動，加上選前一日的總統遭槍擊事件，兩陣營用盡所有手段動員，能夠不為藍綠牽動的獨立選民，在這次理性冷靜的思考，自主地投下投廢票，這是一個高貴的決定。我們是社會上的少數，但這樣的少數在民主社會應被聽到、看到，更要被尊重。我們雖然社會是少數，但絕對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正數，而不會是負數。（百萬廢票行動聯盟 20040320 聲明）

¹⁰³工委會何燕堂於 2004.3.26 下午打電話到新新聞給該採訪主任楊舒媚，要求楊主任說明新新聞之處理原則，竟遭楊舒媚主任以新聞自由為由悍然拒絕，並掛斷電話。

從公民自主意識來看待廢票運動的政治性，選前會以「消極說」、「無用論」來理解廢票的群眾，反應出的是對既存選制的不滿卻又莫可耐何的心態，「在爛蘋果中選一個比較不爛的」與「拒絕含淚投票」成為投藍(連宋)與投廢票間最直接的拉扯¹⁰⁴，選後廢票數創新高，廢票運動確實有發揮影響力，只是大選後藍綠政爭不斷，要再接再續擴展「不藍不綠」的公民自主運動較選前更為吃力。鄭村棋老師在大選後談他對藍軍的看法：「我不是迴避談廢票，但我寧願與群眾溝通，群眾要自己作主人比較重要。我理解連宋落選後，這些群眾的傷痛，我不忍心在那個時候在他們的傷口上灑鹽。該反省的是連宋，這麼大好的情況，怎麼就輸掉了？不要找代罪羔羊，該負責的是連宋，找他們去算帳！…要知道，總統選舉投給陳水扁的，可能對選舉公正性也有意見，要真相不等於是挺連宋！群眾的自主性力量出不來，還是會被泛藍政客耍弄的。」¹⁰⁵（楊祖珪，2005：60）

第一節 廢票後～藉選舉、搞組織！

即便 320 之後藍綠陣營衝突激烈，關注政治發展的有志之士，仍加速串聯¹⁰⁶的行動，如：「民主行動聯盟」、「台灣民主學校」等，這些力量不約而同的以 2004 年底立委選戰為集結的想像，媒體也以第三勢力的角度觀察幾股不同的社會集團，我們在選前大力提倡投廢票，鄭村棋老師成為該運動的代表人，選前／後我們都被視為是一股不同於藍綠的政治力量。

選後，我們沒有被票數沖昏頭，以為「撿到籃子裡的就是菜」，「廢票的增加代表了許多選民拒絕藍綠綁架，但絕對不等同第三勢力。不要一看到這個力量，就認為可以往進步的方向走，這是不一定的。所以下階段應該推動政治辯論，討論這個力量代表什麼、台灣社會需要什麼。」（鄭村棋，2004）。到底有多少選民是真的唾棄藍綠？況且這運動不是用來累積個人的政治資本的，我們對於「後廢票」階段該怎麼找出「自主投廢」者是組織上最優先的工作，只是以我們的能量還是只能從運動社群中開始著手。

¹⁰⁴ 在工委會的社群中許多原本從支持藍綠到決定投廢的選民，因為「二顆子彈」害怕對方當選只好又投給藍綠的人不少，選後廢票創新高，這些人對廢票或有不諒解或有改變看法，在人民老大運動中有更多人坦誠其是棄廢投藍、綠。

¹⁰⁵ 參閱楊祖珪(2005)《我在凱達格蘭等你，2004 年 320-520 抗爭紀實》訪問鄭村棋節錄稿。

¹⁰⁶ 在 2004 總統大選前以不滿選舉操弄族群議題，造成台灣社會對立不安，林懷民、簡錫堃等六、七十位文化界、社運界與學界大規模串聯籌組「族群平等行動聯盟」，由名導演侯孝賢擔任召集人。(中國時報／高有智／2004.01.11)選後民主行動聯盟於 2004 年 5 月 4 日成立，召集人為黃光國，主要成員包括黃光國、南方朔、王清峰等 36 位台灣文化界、教育界與社運界人士。2005 年民盟投入任務型國代選舉，民盟推出 150 人參選，選上 5 席，獲 6 萬 5081 張票，得票率為 1.68%。2004 年 7 月 19 日由民進黨前主席許信良發起的「台灣民主學校」，成員包括影劇圈的國際導演、作家、媒體記者、政客及四位院士級顧問等。民主學校號稱要在年底立委選舉號召對政治失望的三百萬中間選民的選票，在政治上發揮影響力。（新新聞第 909 期，2004：40）

7.1.1 研發「直接民權代議制」

「參選是為了搞運動，不是為了當選，一個人選上能幹嘛？藉選舉過程搞運動是我關切的，如果期待我選上可以幫你們解決問題，那你們去找藍綠立委，我不會幹這種事！」（鄭村棋，工委會幹組營，2004.7.台北客家會館）

雖然，我們不認為 33 萬張廢票都是要求改革的進步力量，但確實有多數選民對藍綠比爛非常厭煩，期待社會有新興力量出現，廢票運動把這個政治空間打開了，一些嗅覺靈敏的政治人物也紛紛進場喊出第三勢力要集結，把目標放在 2004 年底的立委選舉。我們是廢票運動的發動者，不該放任此空間被失意政客玩弄、篡奪，我們不同意既有選舉的遊戲規則，要投入選舉就得從改變自身的思維做起，實際操演出不同於主流的參選過程。

社運團體資源有限，一旦決定投入選舉，馬上面臨高額保證金如何籌措，如何參選及對「代議式民主」的反省。2004 年，時序進入六月份，各路人馬開始蠢蠢欲動，競相放出風聲要投入年底的立委選戰，各方提出的口袋名單中，也不時傳出鄭村棋老師已加入某陣營，或說他已辦妥戶口遷移、有意參選立委等消息。鄭老師從不避諱談選舉一事，但他想搞的選舉與其它人不一樣，在民主學校的一場座談會中，他提出了另類搞選舉的想法¹⁰⁷。

把選舉當運動來搞！廢票後我除了經常去凱道外，也找了鄭老師討論如何在政治上突圍，他提出另類選舉模式，藉選舉找出「廢票族」進行下一階段的「認同意識」轉化、影響工作，他要求我們把已有「政治認識」的群眾組織起來。

這是廢票後工委會決定投入 2004 年立委選舉時的之初衷，在廢票時我們以「主僕錯置」、「主人被奴欺」來界定代議民主中人民政治權力的被剝奪，我們投入選舉是爲了讓選民更面對與民意代表的關係。總統選制的相對多數制、贏者全拿，我們以投廢票來突顯選民沒有其它的選擇，才會一再被藍綠綁架、含淚投票；在立委選舉時，我們提出了人民與政治代理者間的關係調整，研發「直接民權代議制」¹⁰⁸，以選前先簽「辭職書」、候選人要與選民簽「履約保證書」，這二份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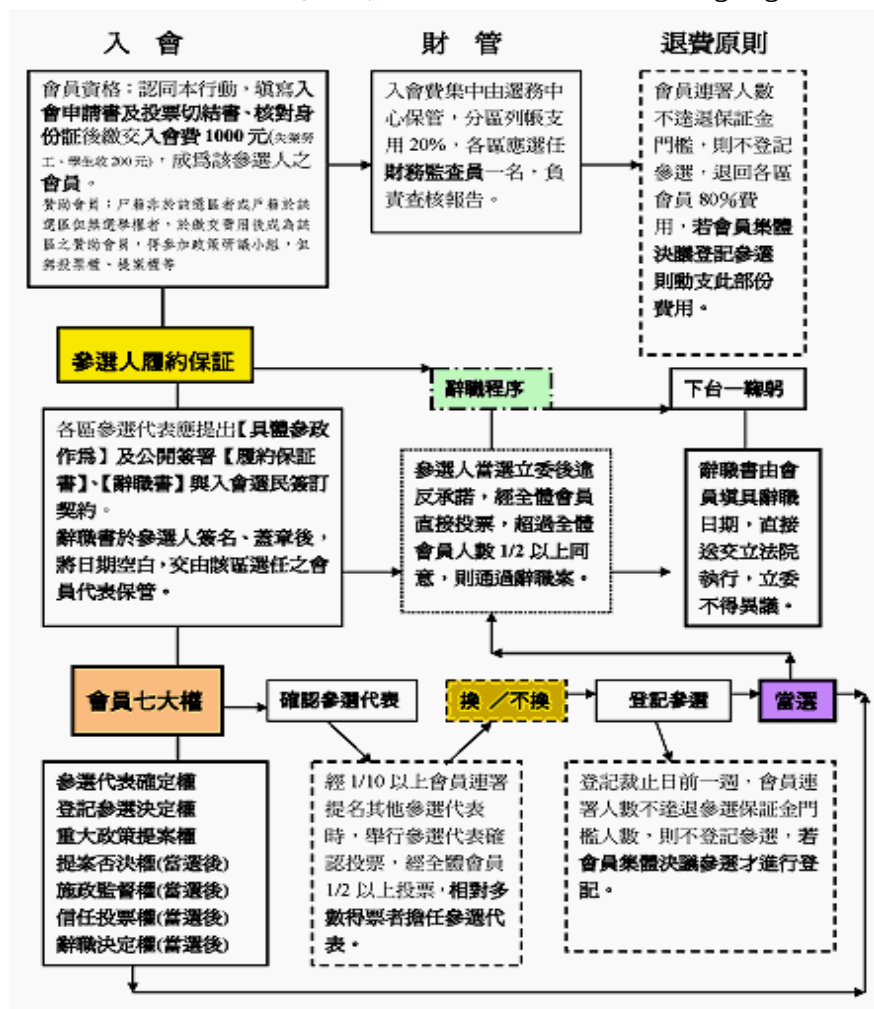
¹⁰⁷ 對選制改革的想法是鄭村棋老師早在 90 年代擔任工運組織者時經驗到群眾一直希望他出來選，但如何在選舉過程轉化他們的想法，他提出了這一套改變權力關係的機制；在 2004 年族盟成立後，找了鄭村棋老師參與，他對族盟提出幾個提問：1.族盟是長期性組織嗎？2.除了族群議題之外，還會擴及階級、教育、性別等平等的運動嗎？3.面對選舉到底是什麼態度，如何選？。在幾經對話後，鄭老師提出要用「人民老大」的機制選，否則不會出來選。（2009.12.31 訪談）

¹⁰⁸ 鄭村棋在民主學校的演講會上提出搞選舉的機制，主要的論點是組織小眾選民，以小額捐款支持特定候選人，候選人當選後有義務兌現支持者的政策要求，否則就被這些支持者罷免。（中國時報 A2 版，羅如蘭，2004.8.1）「直接民權代議制」的基本理念、架構參考人民老大、參

件交由選民組成的監督團體保管，當選者得受該特定選民組織監督，一旦做不好經選民投票後將辭職書送給選委會，當選者不得拒絕即應下台。這是對選民高度的政治要求，不是投完票就把權力交出去，任由政客玩四年。

圖一 「直接民權代議制」的基本架構

摘自【人民老大、參選作主】網頁（www.nobnog.org.tw）



7.1.2 參選實驗，翻轉「主僕」關係

藉參選過程尋找負責任的「公民」，形成對政治人物的監督與制衡。這個目標說來簡單做起來卻困難重重，比鼓吹廢票更難，因為要翻轉選民與候選人(當選者)的權力關係，拿起做主人的責任進行實質的「監督與制衡」，我們自己能不能做到，我們自己投入選舉中就是在挑戰我們自己。在諮詢了幾位政治、法律學者¹⁰⁹後，工委會提出改良代議民主運作的想法，並以「做不好就下台」的罷免機

選作主網頁。（www.nobnog.org.tw）

¹⁰⁹當時工委會秘書處邀請鄭村棋老師、政大孫善豪老師、黃德北老師共同討論直接民權的機制概念，並徵詢了台大顏厥安教授的意見；有關是否涉及期約問題還請教了詹文凱律師、台北市政府徐卿廉科長等人。(賴香伶，2004.7 工委會執委會工作報告案記錄)

制為宣傳主軸，這麼前進的選制改革與一般人的認知差很大，而放在參選中來推展運動難度更高。在第一場「人民老大、參選作主」的說明會上，就經驗了第一個挑戰「先選上再說」。

在首場說明會上，我們批評了現有選制並詳細說明「人民老大」制度，一開始就引起不小的反彈，主要的意見是這套機制(上圖)太複雜，參與者要先繳錢(民主基金)、又要盡至民主頭家的責任，對沒錢／沒閒的勞工來說，搞工會、社運都耗盡心力了，還要管政治、搞選民間的組織串聯，如果參選者沒有知名度或有勝算的可能，怎麼會有動力去拉人、拉票？更不要說去談制度了！在一陣沈默中，政治性極高的環保工會蔣萬金直接「嗆賭」鄭老師：「你出來選，我一定拉一千票，沒問題」、「絕對挺你挺到底」(2004.9.18，台北客家會館)。他的發言打破之前的沈悶氣氛，一時間大家精神都來了，這時只見鄭老師不急不徐的站到台前說「光看你這樣挺我，我就怕，你不怕我上去後把你賣掉嗎？」，「你不會啦！，我相信你」；老鄭說「好，你先去拉一千票然後說候選人還沒決定，到時由這一千人來投票，看誰比較適合，這樣做得到嗎？」，蔣萬金說「這樣有困難咧！沒有候選人要怎麼拉票，還要先繳一千元，又要開會討論，又不是呷飽閒閒，沒這個時間啦！」，老鄭說：「是啊！選民都不負自己的責任，投完票就了事，有事拜託時還要看人家的臉色，政治人物選上後任他們亂搞，不能拿他怎麼辦，你們要這樣的政治制度嗎？」(鄭村棋，2004.9.18)。

這個運動強調不是幫那一位候選人拉票，而是要集結有認識的群眾進行組織性力量，既是推人參選又得對抗主流選舉操作的模式，不能紙上談兵，只能一個個去接觸、對話，對我來說就是在過程中去認清群眾的狀態，沒有一定的能力，確實很難踏出去。因此，當蔣萬金提議鄭老師出來選時，既是以主流選舉的思考及有沒有勝選的可能來認知這個運動，「選得上最重要，制度再好選不上也沒有用」蔣萬金說。

7.1.3 找出“民主頭家”，兩種實驗方法

以主流的標準看待選舉，鄭老師的「知名度」恰是對人民老大運動最大的挑戰，鄭老師面對工會幹部的反應與期待後決定不參選¹¹⁰。這不影響我們依「人民老大」的概念進行選民的對話與討論工作，工委會先成立了選務推動小組，在參選代表出爐後與兩區團隊搭配，整個人民老大運動的推動是以「一對一」模式來尋找「民主頭家」，由鄭村棋老師每週協助工作督導，我把這個模式簡稱為「第

¹¹⁰當時工委會提出「直接民權代議制」時曾辦過社運界的說明會，並主動找性別人權協會及楊祖珺老師談代表參選的可能，但他們考量工作條件、能量負荷而未參與；工委會也徵詢了王耀梓、鄭村棋二位前輩的意願。最後日日春王芳萍、倉運聯張通賢在集體決議後代表「人民老大」運動參與了台北市南區、台北縣第三選區的立委選舉。

一型」。第一型的操作確實可以清楚知道參與者對藍綠政治的理解與態度，但要在參選的形式下進一步翻轉對主流選舉與政治的想法，相應於外在熱切、激烈的選舉氣氛，人民老大「一對一」對話的模式是冷靜、細緻但與一般人的動能搭不起來的，怎麼辦？在第二場說明會後，夏林清老師看到我的停滯與焦慮，會後她主動問我可以如何前進，我在完成第一型的壓力下不知所措，她提議我們可以採取小群式的「政治行動方案」來接上參與者的動能，以個別人的政治經驗為軸線，由參與者提出與選舉相應的行動方案，並以固定聚會的討論、對話中轉／動他們的政治性，我稱之為「第二型」實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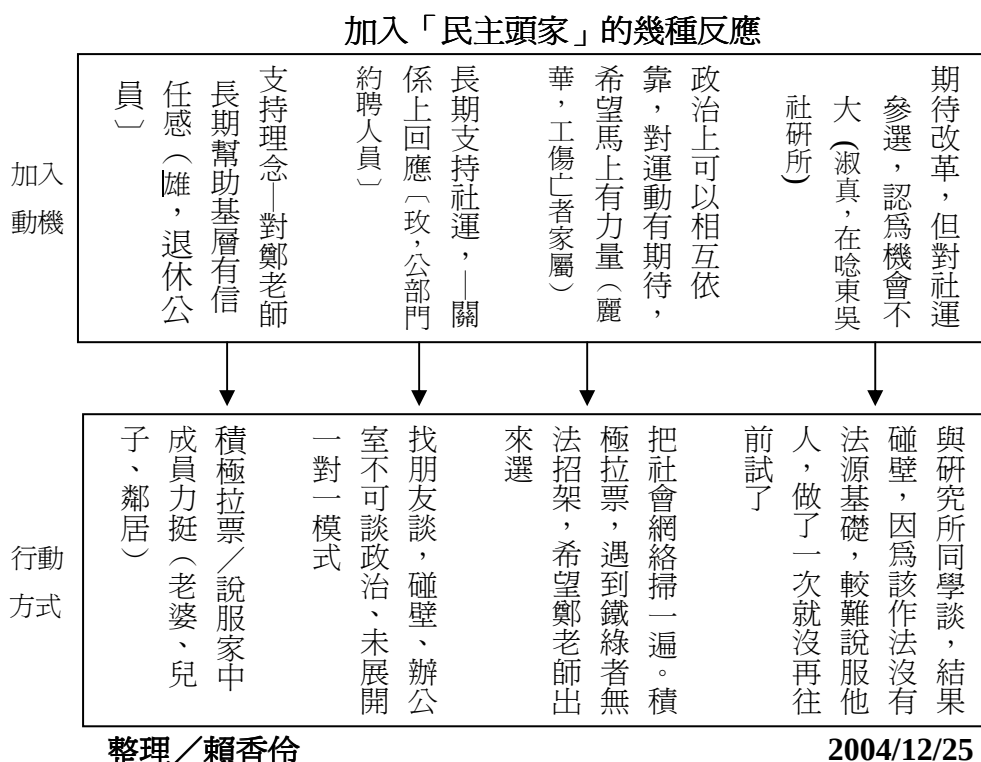
這兩種模式並非對立，只是當時設定的目標是藉選舉找出「民主頭家」，因此，「第一型」是以操作「直接民權代議制」的制度實驗為主，設定的對象也是已有相當程度政治認識的對象為主；然而，藉選舉過程讓「人的意識轉化」該如何並進，在我們設計的制度上沒有被充份討論，而兩區的選舉團隊在面對運動進程與群眾政治性的落差中得聯手推展人民老大運動，過程中引發了數次的關係緊張、衝突¹¹¹。而我身負主要推動的任務，兩種取徑、操作都親自參與，對過程中引發的衝突矛盾，當時並未有這樣的理解，在當時的條件擠壓下，成員間也未能清楚面對彼此(參本章 1.4.1)。

7.1.3.1 我的「第一型」對話經驗

因為我同時進行兩種模式，得以就其中的差異及效果進行比較，在過程中也更理解了一般人對政治的看法：在「一對一」的行動中，我找了幾位關係上較信任的朋友進行對話，從這幾位朋友(選民)加入「民主頭家」的動機及行動後遇到的困難，我的理解是：(一)我們提出的選制及操作機制過於複雜(產品賣相不好)，又沒有法源基礎，以致在說服力方面難以往下推動，難以發展出第二層的組織；(二)候選人知名度不足(代言人不具社會辨識度)，即使是「拉票」也引不起別人的興趣，就是選不上、沒有希望當選。(三)「選舉(選人)」與「投廢票」對選民的認知不同，選舉是選民對參選者的支持或反對，準備交付權力給某人的授權；「投廢票」卻是對人／事／制度的否定，雖然都是去投票但一是正向肯定(投某人)另一是反面否定(意見表達)。(四)以參選(或搞另類組織)之名與選民建立討論政治的平台，是與一般人的社會關係與政治認識進行複雜而多重的交涉，這個交涉可以知道對方在想什麼，怎麼想，但要進一步讓他認識自身處境得有其它條件補上。光以行動者「一對一」的細緻對話要找到理念相同、關係上

¹¹¹在訪談當時的主要推動者何燕堂、王芳萍、王秋月討論如何理解與看待當時的衝突，燕堂是以 1-1 方法推動不下去，對日日春的推法(晚會、上街)又不認同，他處在無力的困境中，面對會運聯複雜的政治關係也未介入，當時他已是動力漸失的狀況；但他同意我說的不是單純的與兩個權威的關係(2009.12.07 訪談何燕堂)；芳萍則表示經過那次才更意識到社群內差異的真實，對於 1-1 她覺得很好、也做了許多，但做了之後還能怎麼轉？整個人在選中是悶的，所以接上 2002 年日日春選舉時的經驗，讓更多的參與者捲進來(訪談王芳萍，2009.12.8)。

趨進的人，在現實上是困難的。



7.1.3.2 我的「第二型」行動方案

為了解決「第一型」的不足，我找了夏林清老師協助，她表示在 2002 年日日春協會的參選經驗時¹¹²，由幾個人組成小組到街頭演行動劇、與陌生人對話，參與者在過程中經驗自身與政治的關係，從而在過程中更認識社會、理解自身的政治性。因此，她主動表示願意協助操作政治行動工作坊，並要參與者能提出設計出自己的行動方案。在第二次的工作坊中，我提出了我的方案。

我的行動方案是來自於廢票運動時對藍綠政治意形態操弄，我想了解一般人與我的政治感知有何差別，真的心生厭惡嗎？有期待社會的新興改革力量嗎？我在廢票運動時即受困於此，藉選舉過程進一步探究是我的政治性出土的延續。在第一次的小組討論中，我先試探性問大家會不會進行「第一型」模式，有人回應說「這樣搞太慢了」、「最好還是老鄭出來，比較好推啦！」（賴香伶，2004，工作筆記），他們又再一次對「直接民權代議制」複雜的操作感到不耐煩，「選舉就選舉還要認真監督，那來的美國時間」。面對同樣的反應，我又被將住了，要改變原來的主張嗎？還是順著他們的動能試過再說？在一陣拉扯後，曹麗華¹¹³（工

¹¹²2002 年日日春協會推出王芳萍秘書長參選台北市議員，藉選舉推動「性工作除罪合法」運動。

¹¹³曹麗華，一位工傷亡者的家屬，在民國 90 年我當時任職台北市政府勞工局，她在議員的協助下到勞工局申請職災亡者家屬補助，當時她帶著小女兒秋綿（才小學四年級）到勞工局來，之後我們介紹她與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接觸，她從一位職災亡者家屬的身份漸漸投入勞動安全的運

傷家屬)突然興致勃勃的說「沒關係啦，去試了就知道，香伶，我帶你去講啦，你講比較清楚」，即使我一再強調不是要去拉票，但她的熱切讓我的「將住」有了出口。

這個行動小組的討論只進行一次，就停了，但我與麗華的二人行卻走出去了。我們一共拜會了大同區(麗華住家及工作的地區)的四位選民，這個走訪過程對我來說是重要的學習，一是我從來沒有為選舉做過任何陌生拜訪(與廢票運動接觸人的經驗不同)過程中看到自己與人談政治的無能、另一則是真實看到了選舉中政黨灑資源、綁樁腳的方式，當然意外的收獲是我對行動伙伴麗華的「再認識」。

7.1.3.3 碰釘子的陌生拜訪

每到一位選民家中，對方的第一句話就問「你們是什麼黨的，代表是誰？」，因為是麗華的鄰里關係，她總是先回答說「是鄭村棋啦，我們是搞社會運動的，候選人是日日春王芳萍」，她的引介、幫腔化解了第一時間的尷尬，但對比我的進場，身體是僵硬與有距離的，尤其聽到他們問你的「政治背景」—藍的、綠的、無黨籍等，我該如何讓他們知道「我們是誰？」，沒有可供一般人辨識的政治符號，「鄭老師」成為代表與象徵(在媒體上敢言、倡議廢票的形象)，而短短的拜會過程如何勾連到「公民／主人」的權力翻轉？談選制？太生硬；談政治？沒有可供連結的信任關係，我的說明成為一種「宣傳」而不是「對話」。而最能連結的「弱勢者」與政治權力被剝奪的真相呢？這個說法引來的回應是對方的同情關懷，他們更直接的建議是「這樣搞太慢了，應該去找政治人物幫忙推才快啦」，十幾分鐘的對話不可能深入，除非聊起他們較關心的議題，如：退休金、勞保改月退等(有一家襪子店的店員及彩券行員工都有談到勞保方面的問題)。

雖然這樣的走訪很累也不知效果如何，但卻增加了我對主流選舉的觀察。記得有一次麗華帶我去承德路上的一家小貨運行，一到店門口，就看到司機們忙進忙出的佈置小發財車，老板娘俐落的發給司機們掃街路線單，一看到我們老板還以為是國民黨的輔選人員來盯他們的工作進度，對我們還蠻客氣的(因為麗華曾經做過藍的議員／立委選舉時的志工，在顏色上被視為挺藍的¹¹⁴)。但在我們表明身份後對方就沒多問什麼了。貨運行桌上擺滿了國民黨立委候選人的文宣品與

動中，這幾年她也在社運中找到自己的方向。雖然她只是一位市民清潔工，常常面臨工作不保的壓力，但他著社會改革充滿期待，在工傷協會的鼓勵下她參加繪畫課，也在工作之餘將街頭／公園當作畫布，把她看到的各種弱勢處境畫在路橋上、公園矮牆邊，她已是社會運動的重要行動者。

¹¹⁴ 她會去幫忙藍陣營輔選是基於他要保住市民工的清潔工作，市政府每年都用抽籤決定市民工的工作，而在單親家庭組的競爭越來越激烈，每年麗華都在錄取邊緣，好幾次是得靠民代幫忙才保住工作。

背心，他們的小貨卡車也被某立委包租為宣傳車使用(當時員工正在佈置貨車)，選舉期間的地方政治與生意商機的結合，我以前不太察覺，因為我們也在選舉，才知道選舉牽動的人脈、利益有多深。

7.1.3.4 ”既反又求”弱勢者的生存策略

有了幾次的拜訪經驗後，我在選務工作會議中提出報告，鄭老師一聽完就問「你為什麼要順著麗華的動力走，你自己的判斷與動能是什麼？」，我說「我也沒做過陌生拜訪，而且麗華是我們重要的運動成員，她這麼熱情我不好拒絕」，接著他挑戰我說「你對麗華的政治態度認識多少？她為什麼這麼想去拉票？」，她認同我們的參選方式嗎？」，前一個問題是基於我對主流選舉的好奇，也想知道麗華經常提的朋友們(在地關係)是怎麼的社會背景，經過四次的拜訪可以確定這套「人民老大參選行動」對他們沒有什麼吸引力，與他們認知的政治差很多，走訪只能確認這一點，沒有改變他們的政治認同；但後一個問題就複雜了，「你對麗華的政治態度認識多少？她為什麼這麼想去拉票？」。

麗華——一個單親、工傷亡者家屬、市民工——她的政治意識是如何形成的？我確實沒有細察過，只知道她非常支持我們，也積極投身運動中。這次的同行，我對她有了更多的認識，不只一次我讀到她在朋友面前散放的訊息——「我雖是弱勢，但我有一群社運伙伴，我們有人要出來拼選舉」¹¹⁵，對麗華來說這個看似「拉票」的拜訪，其實是在展現她背後的社會(力量)關係，並且帶著弱勢反攻的姿態，對強勢的藍綠政客予以間接回擊。她在貨運行老板娘面前說「靠藍綠沒有用啦！還是要靠自己」(明明人家在賺選舉財，她還要暗虧一下老板娘)；另一方面，她清楚為保住市民工的工作機會，得拜託民代關說、幫忙，幾年下來也都安全過關，所以一有選舉，她都會主動去還人情(幫忙發傳單等)，這個”既反又求”的生存姿態，與我有一定生存條件的運動者是不同的，起碼我不用心去求民代幫什麼忙，自然在一些身段、身體上是直硬、無需彎腰的。

再「認識」麗華，是此次選舉中最紮實的收獲。貼身的走訪中，我們的關係緊密多了，對她的身世背景也更了解；她是一位緬甸華僑，20幾年前依親來到台灣，與先生結婚後努力認真打拼，她開了一間自助餐店、老公兼作板模工，攢了一些錢後買了一棟房子，不料九年前她先生因職災死亡，留下她與女兒二人，一時之間房子不保、工作又不順，生活陷入困境，之後她以單親的資格獲得台北市市民工的清潔工作，開始獨自扶養女兒及繳房貸，因為市民工的收入不高，她早上在公園打掃，下午就到附近學校兼打掃教室、幫人家清理家庭等零工，把女兒一路培養到高中(秋綿現在高三)，這種超時勞動及與女兒相依為命的辛苦，讓

¹¹⁵ 在走訪的過程，我觀察到她講話的姿態，不是一個弱勢者被同情似的懇求而是一種要被社會看到的力道。

她在參與社會運動時比其它人都賣力，因為她知道我們在做什麼，也知道我們是認真對待彼此的。

越深入理解她的處境與動能後，我確信「人民老大參選行動」要找的民主頭家，就在我所接觸過的許多弱勢者中，他們自己的經驗足以驗證藍綠政黨都不會真正解決身上的重擔，即使因為一時之需得拜託政治人物幫忙，在人情義理上得挺藍／綠，在政治意識上他們是期待社運的，不然她不會興沖沖的拉著我去拜訪朋友，把社運的理念傳播出去，雖然走訪下來她也有些失落，但她說「總有一天會成功的啦！」。

7.1.4 人民老大運動的自我檢討

因為不同意主流選舉把選民視為一張張的選票，過程中製造的動員、洗腦、拉幫結派是基於勝選後分配資源與利害關係的勾連，我們就是要改變這種政治生態，才有意識的以「人民老大」的概念轉化選民與參選者及選民與選民之間的關係，但怎麼操作才有用？鄭老師提出的「一對一」模式是精準的要對峙這個「關係」，只是受限於每個人能力、認識的落差而難有突破；夏老師提出的方法比較容易理解，因為要轉化「意識」得認清每個人的「差異」，即使是推動者也帶著身上不同政治歷史、情感在過程中面對自身，社運參選為的是改變結構，要改變結構就得先面對自身的「歷史質」，藉由不同行動方案的組合進行經驗的釐清與參照。

7.1.4.1 衝突中理解差異，卻無能面對

之所以描述「人民老大」的兩種模式，是為了重新檢視當時設定的運動目標與我調整行動方式反應在選舉過程中團隊成員間幾次的衝突，該如何理解衝突的性質？當下我為何提不出足以說服或改變彼此想法的行動？至少在衝突當下我認知的「差異」已有幾個可能的解釋，在選後的檢討中我意識到此差異的歷史性是與工委會的工運實踐路徑與社群分立後各自面對的政治進程、群眾性質及運動社群集體要撐住運動空間的對內擠壓有關¹¹⁶。

重看我的「人民老大推動過程的檢討」報告，是在選舉結束後三個月才提出（2005年3月，如下表），其延宕的原因一是選後兩區的工作者還在進行「以票找人」（兩區800多票）的繁複作業，另一應是無法清楚面對選舉中的關係挾纏、衝突矛盾等，雖在過程中兩區已採取不同的選舉手法，我在工委會的位子具體看

¹¹⁶在人民老大參選時的關係衝突性質，王芳萍在「女性運動者的生成—台北市公娼抗爭與日日春運動紀實」一文中以「運動自己：撞回運動內部差異結構」清楚界定有三個層次的交錯：「…到底要不要從集體式的『選務中心』到各自行動，我惱火自己的卡、也焦急基隆的滯還帶著我們與權威關係的僵直停滯」（王芳萍，2009：140）

到兩區的組織能量、條件的差異，與權威關係也有許多拉扯¹¹⁷，但在運動轉進的任務壓力下，帶著多重的焦慮前進¹¹⁸。

所謂的衝突，首先發生在我與燕堂對「第一型」、「第二型」操作模式的不同取向。一開始並沒有什麼差異，但在兩區面對群眾屬性的差異，使用不同的方式搞選舉後，我接上日日春過去的參選經驗，採取了「第二型」的行動方案，這個決定並未與燕堂討論過，而他當時在倉運聯的團隊中，受限於工會幹部對參選與政治認同的差異，他認真的推動「第一型」模式。在一次工作討論中，我提出對「第一型」模式的意見認為無法操作下去，燕堂部份同意說「這個產品賣相不佳，很難推」，但他的「對話」工作還是一步步往前了，是他的對象（倉運聯資深工會幹部）已有相當的政治認識，還是他的能力、經驗足以勝任，當時我沒有細究。

廢票運動後我與燕堂循著鄭老師提議的「藉選舉，搞組織」，與社群內同志研發了「直接民權代議制」，這個具實驗性的方案，在與群眾說明、對話及實際行動後，我認為這套制度有其政治上的對峙性，卻不容易操作，即使是資深運動者也得在深入的討論後才能掌握重點，當時我還咀嚼著廢票運動中受到的衝擊，對人民老大這套規則覺得是個出路，對目標上要找出「同志」也深表贊同，只是在幾次的行動後，覺得使不上力，當時說不清楚是什麼問題，而看燕堂似乎沒有什麼困擾，覺得或許是我自己能力不足，說服力不夠才難以前進。

但真正的衝突是發生在兩區爭執要用何種方法搞選舉，要不要搞晚會、要不要上街對話，在「第一型」的要求下，這些形式被窄化為有「造勢」之嫌，在「第二型」中卻是對轉化政治性的空間被創造出來，差異之大困住了我的思考。「我們是在選舉，不能悶著頭幹」，候選人之一王芳萍對著大家嘶吼，另一區候選人張通賢緊閉雙唇卻是激憤的表情。在主流選舉的壓力下又要搞組織、細緻的對待群眾，又要回應外在情勢的捲動，候選人的壓力特別大，組織者間也無法迴避群眾的壓力。另類選舉要如何實踐？「一對一」搞不下去不能改變嗎？要在此時與權威者溝通、改變政策嗎？還是各自行動、相互支援？

當時，我們「連溝通都語言都沒有，如何從其中辨識差異與對焦」¹¹⁹（訪問

¹¹⁷在論文書寫過程我對這幾層衝突拉扯的理解已在行動中開始面對，但因為涉及較細的組織歷史轉折脈絡，在論文軸線的取舍下沒有完全呈現，有些行動還在進行中，非短期內可處理完。

¹¹⁸尤其是我與工作伙伴燕堂的關係，從廢票運動時就有協同關係上不一致的覺察，但在工作我們還是各自補位、相互協助；在人民老大運動時，我與燕堂分兩區（日日春、倉運聯）工作，有意識到兩區資源條件及群眾性質的差異，對選舉操作方法的選擇也不同。

¹¹⁹此次行動研究，我訪問了王芳萍、何燕堂，試圖對照在人民老大運動時如何看待衝突，芳萍直接回應的是社群分立／化的差異（日日春、倉運聯），更意識工會及工運當時要轉，組織者辛苦撐的很緊，她有看到，但不知如何協助，她的情緒是對著運動中的自身爆開的；燕堂的回應是很多場景已不復記憶，在他經歷了廢票運動、人民老大到離開工委會轉到學院及基隆火盟等心路歷程的轉折，他暫時以「認知與內在政治性調動的落差」來述說當時的「卡」、「困」，其中涉及更內在深層的孤單與不被理解與我的關係等，因為還在對話的過程中，未能做最後的註

王芳萍，2009)。挾著多重性質的衝突，我們試著把焦點限縮在方法上，沒選擇與權威者對話，挾著差異與衝突，兩區的選舉推動還是盡可能前進，越討論差異越明顯，關係也越緊張，即要在多重衝突中搞選舉，又要帶動運動社群伙伴的政治化，我是該運動的主要執行者，實驗了二種模式後，我清楚看到「第一型」的困境，找了夏老師協助在日日春實驗「第二型」，有些空間被創造出來了。

表 5 人民老大的推動過程：從不清楚到有些輪廓

階段	時間 主軸	工作內容	推動方式	為何無法推動？
制度研發期	2004/7 民主入股 (千元當 立委)	內部初分三組—— 一論述、行銷組 織、制度章程 (財務監督、網 站)等，由工委 會代表拜會律 師、學者等詢問 法律及選制等 問題	在草案雛型出來後，行銷組的推動方式是先培訓第批一種子人員，並採取直銷的方式往下推動，找人來介紹直銷的作法，她建議每個人先清理自己的社會關係在其中找出可能的人選，再辦理 POP 方式把人帶來，由組織者介紹制度，再由社群中的組織者下去建立關係、發展協助關係。	要大家把一些可接觸的關係回報給選務中心，只有少數人回填，因為有幾個決定與系統未建置完成，大家不知交出來後要幹嘛，如： 誘因不足——人家為何要來參加？參選者未定，與誰簽約？如何往下推？ 大家的狀態不一，沒有找同志的想像與共識。
內部振盪期／建立責任區	2004.8 月 當家搞選舉—— 人民來作主、挑戰主僕關係	8/9 第一份說帖出來(在執委會未對外) 8/21 第一場內部幹訓班——“招兵買馬”搞選舉說明會——招募創始會員，訓練第一批種子隊	舉辦幹訓營就制度設計與幹部對話，演練直銷方式(培訓種子的想像及與組織社群外的人) 組織者都卡在工作中，選舉無法推進，工委會想辦法把社群人架上去，提出分五區，以戶籍分區，選任組長、小組長等運作機制	當時的考慮：以搞選舉、在地經營、與地方人士建立關係的模式想像。成員意見： 1. 大家的社群關係不是以戶籍為主，自己的群眾都搞不定了，分區經營群眾，不實際 2. 一直沒有會員進來，也還沒對外招募。大家沒有實際的壓力。 五區太龐大，集中一區或二區較實際；持續爭議中。
宣傳期	2004.9 月 人民老大 (直接民	9/11 第一次對社運體說明(章程名稱、草案內	決定要下去搞，持續邀請社運圈的人參與——王蘋、楊祖裙等人。後來，	尚未有會員入會，沒有實際操作的想像。制度太複雜，不容易

解。

方式： 說明會	權代議 制)	容大致確定) 9/13 台灣日報 的【探針】批為 鄭村棋條款 9/18 客家會館 說明會 9/25 辦第二場 9/30 在辦公室 自辦說明會	只有日日春及倉運聯參 選，才開始對外說明。 9/18 起開始有會員入 會，在繳錢時並未有具 體的簽約關係，形式上 也是以五區的方式入會 9/25 辦第二場，希望第 一次參加者能分享推動 經驗，但來了社大及日 日春的朋友，一時無法 處理，會中夏提政治學 習方案。	說明。 第一場說明會(媒體) 第二場客家會館，大 家把熟識的朋友找 來，大約有 60 人參 加。(當天有 10 幾人 繳費) 制度介紹太枯燥，老 鄭開講後又被大量投 射，之後老鄭決定不 選。內部陷入要不要 參選的討論。 夏老師協助各社群協 助發展自己的方案
分 二 區 工 作	2004.10 政治學習 論壇	9/15-10/6 決定 要不要選 10/10 NGO 參 選決定說明會 10/12 參選決定 10/24 政治論 壇	到中時、停管、環亞工 會說明人民老大制度 內部決定誰要選／日日 春 9/22 決定選、阿賢在 10/6 決定參選，10/26 討 論是否辦 2004「秋鬥」 夏與工運組討論秋鬥形 式，但被老鄭批評有造 勢之嫌，提醒我們不要 把二者混在一起，之後 鄭提批勞工不分區立委 案，但在基層動力不足 及政治上不準備搞的狀 況下，「秋鬥」停辦。	鄭表示一不宣傳、不 造勢、不拉票，要求 們建置三人小組，把 會員分下去，每週人 民老大組織運作會 議。 附記：到決定參選前 都未再擴大入會者， 但每次說明會後都有 零星加入者，組織上 未建置對待機制，幾 乎仍以原來社群的關 係維繫。
三 人 小 組 建 置	2004.11 3 人組成 立	11/01 與鄭討論 確定「三人組」 運作機制 11/7、/13、20 工作會議； 11/27 晚會 11/28、12/05 工 作會議	除了每週三人組會議， 日日春仍進行政治學 習、走街等；期間日日 春邀北基區辦晚會、活 動及 CALL 非選區會員 進行與政治人物對話方 案	有些人有分配到會 員、下線，有些沒有， 內部處理差異與對下 線的了解。 三人組的運作主要是 了解社群內部差異及 系統建置的摸索。
下線分 析與追 票找查	2004.12--- 2005.3	12/11 選舉兩區 800 多票	選後，兩選區「以票找 人」的組織工作繁複。	團隊(工委會)工作者 間關係緊張 二種模式的差異未對 話釐清

製表／賴香伶

7.14.2 「你自己過關了嗎？」與老鄭對話

在選後的檢討會上，我與幾個選舉團隊成員提出對「第一型」模式的意見，結論是：當時的社會條件尚未成熟到「理性」看待／認識選舉與政治的關係，即使是參與運動多年的工會幹部對選舉都停留在「選得上比較重要」的階段時，人民老大的參選運動得有相應的配套方式，才能有效推動。

意識上我理解也接受「第一型」在手段與目標的一致性，這個一致性要求的是對人的政治意識有徹底釐清的作用(看能耐，不是每個人有這個能力)，而我的經驗是參與者的政治能動性無法用這個方式接住，爲了補足這方面的不足，「第二型」的操作出現，我與麗華的陌生拜訪，不違背「人民老大」原則的多種組合模式¹²⁰也得以在日日春的運動中持續著。

針對我們的看法，鄭老師部份同意但他更進一步挑戰說「你們自己相信這一套嗎？」，「要改變一個人的意識，不是順著他的動能而已，得挑戰他的思維，你們自己過關了嗎？」。這個批評同樣是在“理性”的框架下的挑戰。但放回「找政治認同」者與改變或影響他人的不同目標，人民老大其實是有雙重作用的，因爲這套制度是要號召選民形成一種政治集體，打破現實政治的主流選舉思維，要號召人就不能只談制度還得與主流的意識對話，在其中改變或鬆動認識。在人民老大推動期間，我與張通賢(倉運聯的參選代表)受邀到永和社大「社會參與」社團¹²¹報告「人民老大」運動，課上學員大部份是中高年齡的上班族及家庭主婦，「你們選得上嗎？找一個名人來推動才會快」，「不插旗、不造勢、不掃街，是因為你們窮」，一位支持民進黨的學員不看好社運參選直接吐槽我們。爲了對峙政治亂象我們提出要求候選人選前簽職辭書，選後受支持公民的監督等變主僕關係，學員們更直接的說「選得上的根本不會你理這一套，選不上的才會簽啦」，對政治人物還有期待的人則好心建議「那就選出好一點的人啊，像雷倩(台北縣候選人)就很不錯！形象好、學識高，待人誠懇」。會後一位家庭主婦提醒我可以去找雷倩試試，「搞不好她會接受」。我當時邀她是否願意跟我一起去找雷倩，她說「我只是一個小人物，她不會見我的啦！」(2004.11，永和社大公民課學員討論筆記)。

¹²⁰我們嘗試過的尋找社群代表方式：以戶籍所在地分組；找出共同選區的會員(談選舉經驗、入會認同、不拉票)；搭配的活動：邀請參加政治學習論壇、組成行動方案上街與選民對話、組織幸福傳唱小組(日日春)；兩區聯合參選的活動；過程中曾組織其它選區的選民與候選人(施明德)談人民老大簽承諾書；在開票後「以票找人」的選民組織等。(參考 2005.3.26 賴香伶—人民老大參選檢討記錄)

¹²¹該社團是以認識社會弱勢者的處境及社區參與爲主，開課的老師是我在台北市勞工局時的一位同事，本身對社會運動非常支持，他原是我設定要找的「人民老大」，但基於他的工作位子不便出面談政治，但他在社區大學的社團課是可以去試的公民對話空間，在他的安排下我與張通賢(北縣三選區代表)有機會到課上與學員深入討論。

一般人對政治(選舉)的看法，不能只在理性層次對話，得從現實利益上去說服他們。主流政黨撒資源輔植市民社會中的各種團體到底解決了什麼需求：從替選民排難解紛、爭取地方預算、造橋鋪路，這是選看得到；看不到的民代炒地皮、圍標、挪用資源圖利自己人，這些龐大的政商聯手一般人不是不知道，「那一個政治人物不貪？」，「下次不選他！」，這些消極但真實的反應正是社運參選就對話、處理的部份。我們就是與這些認知在對話／拉扯，「一對一」的模式充其量更認識彼此的立場，但就其利益的盤算與期待還得解決「你們的頭人是誰？你們選不選得上？」；這是一般人對政治的基本看法，該如何轉化？

第二型的操作則比較回到一般人的真實處境，從個人的政治歷史找到可以自我解釋的政治座標，再透過團體中的對話、引導與自身面對的矛盾同行，個人與集體間有了相互參看的辨識過程，而讓參與者認真對待此矛盾的社會性。這種團體對話的設計與帶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夏林清老師的協助下，我們舉辦了四次的工作坊，生產了多篇屬於個人政治歷史探究的文本，清楚記錄了個人政治意識從模糊到清晰的歷程，這個屬於個體政治面貌的出現與集體意志的逐步整合，亦是「藉選舉、搞組織」所獲得的重要累積。(參考 www.nobnog.org.tw 網站資料)

7.1.4.3 「辨識」學習路徑

回顧「人民老大」的運動經驗，我以社群內部的衝突重新解釋該運動的政治性，2003 年的廢票運動打開了公民自主的社會運動空間，「人民老大」則是運動組織面向自身的政治化操演，藉選舉過程集結、號召出有階級認識的「政治公民」，包含運動者自身；但在「兩種模式」的取徑差異下，運動目標(公民政治意識的釐清、轉化)與選擇那一種模式成為內部關係拉扯的引線，在拉不開觀看、檢查的關係中又糾結了與權威者的歷史情結，「衝突」被多重關係包裹著難以解開，選舉期間經驗到的關係衝突／拉扯，放在另一選區一倉運聯，正值組織轉型的工運脈絡中，運動者張通賢、王秋月都承擔著突破困境、個人有限的政治經驗及必須面對工會成員受制於外部主流政治力量制約的意識抗衡，每個人都在經驗其有限性及多重擠壓。

這場運動我還學到了「辨識」路徑的作用，反應在主流與另類、方法與目標及政治化與去政治化的意義：1.藉參選搞運動一啟動社會改革的力量，一定會被群眾投射或與主流政治做比較，因為有比較運動者得以奪得空間發聲、行動。2.讓支持者轉變為行動者，創造條件讓不同個體探究自身的政治歷史，認識自身的社會處境。3.借用夏林清老師在人民老大行動中的一場對話，她說「…我想這樣的歷程可以創造一種恐懼與隔離可以現形與對話的公共空間，也是我們不再去政

治化的一個協作起點吧！」¹²²。

每一個投身社會變革運動的行動者，如何感知自身的「去政治」、「政治無感」¹²³，當時我們設定「藉選舉、搞組織」，政治化自身是一個前提，對自身的政治經驗反應出的政治性多所討論(表 6 的三人小組建置期)，但要創造出對峙自身「不再去政治化」的空間，夏林清老師的政治行動方案，在選舉期間發展以對話式的協作過程，讓更多參與者得以進場梳理自身，就是方法本身反應出的政治性。

「人民老大」的參選過程雖然痛苦不堪，有些經驗我至今還在咀嚼中，不過對政治的認識與學習非常深刻。選後日日春繼續推動「人民老大政治經驗工作坊」，影響了許多年輕人願意到基層工作；倉運聯也在之後二年更有意識的介入主流政治，逐步轉型為地方性公民政治組織，並以「人民火大行動」之名參與 2007 年 5 月基隆市長的補選，2008 年我們以「人民火大行聯盟」與「綠黨」合作參與「單一選區兩票制」的立委選舉，這些過程我們都一路對照並修正著「人民老大」的參選經驗，從自創、研發到帶著困惑、衝突中往前，經過不斷的失敗與修正，即使是面向公民、主流政治，我們以參選進行人的意識轉化的目標與「慢政治」運動的概念是一致的。

第二節 廢票後～人民對話之「秋鬥」

在 2004 年底推進了翻轉主／僕關的「人民老大」運動後，台灣的社會仍在藍綠政治壟斷與民進黨政權以轉型正義揭示社會改革未完成而引發的矛盾情境中，自主社運持續被邊緣化。2005 年初我們仍在經驗社群內關係的糾結與工運力量衰退的情況，如何在政體上愈形以兩黨政治被社會認可的情勢中，拉開人民面對統治集團間的反思，廢票運動中我們宣示要「走自己的路」，人民與人民之間的對話得具體往前。

廢票運動後各方政治力量以參選集結出第三勢力的想像，在選後隨著選舉的失利而各自轉為倡議性團體或解散了。我們在參選時認定要在藍綠以外發展出不同的政治力量，階級性的對抗是我們與其它團體間最大的差別。而陳水扁政府二次執政，其操作族群對立的手法更為直接，就以其緊追國民黨黨產及操作退休公

¹²² 人民老大運動中，夏林清老師的政治行動方案是邀約在社會、心理、教育場域實踐的學者進行開放式論壇—「直接民權」心理／社工／教育女教師的政治對話開放論壇。在邀約信中夏老以「不再去政治化」做為探究自身社會實踐與政治性出土的參看與理解(夏林清，2004)

¹²³ 「政治無感」一詞，是在論文的協同探究中，日日春的君竺(年輕卻已有十年運動經歷)回溯其家族與主流政治的淵源極深，為何她是與政治絕緣的「政治無感」者，1997 年她參與了公娼運動，認識了階級與底層政治，她以這樣的視角與政治接上，成為一個有階級意識的政治運動者。

教人員 18%優惠利率的改革，一般弱勢者的議題／聲音受到更大的排擠，而國民黨奪權失利更藉勢引導群眾對扁政府的不滿，串聯公教、農民等社會團體進行政治上的鬥爭；在藍綠政治的結叢擠壓下，我們除了以社會性議題進行小型的對抗外，2005 年的「秋鬥」則是底層人民看破藍綠、要求「政客還權、財團還錢」，具體展現「走自己的路」的決心。

7.2.1 高捷泰勞抗暴，引發 7 7 7 行動

2005 年 7 月，高捷泰勞抗暴事件，引發台灣政治高層貪污弊案，總統府秘書長陳哲男與商人陳敏賢同赴韓國濟洲島賭博的照片曝光，引發國人對民進黨政權的高度質疑，政治人物搞貪污從來就不是新鮮事，但此次因為泰勞的抗暴，牽扯出了高官、買辦集團剝削外勞大賺私利的惡劣行徑，這種吃人的政治醜聞，社運工作者感覺特別憤怒，在火盟社群幾個同志¹²⁴的發動下，「人民火大、就地反抗」的 7 7 7 不滿族¹²⁵行動就此出現。

「整晚飄不停的毛毛細雨，濕冷得令人直打哆嗦；再加上每隔 1、2 個小時就來巡察的警察ㄅㄅㄅ，讓人根本無法入睡。終於到了清晨，很久沒有看過這麼"早"的台北市。早起運動的人漸漸多了起來，廣場上也有研究人員在採集鴿糞，想是防治禽流感的人員吧？！不知道早一步患了"政治禽流感"的政府，什麼時候才有特效藥能夠治癒它..」（張競中，2005.10.29，火大行動網頁）

幾個社運工作者放下手邊繁瑣的會務，對政治的不滿直接化為街頭行動，在社群伙伴的聲援下，我們以靜坐為主，結合者演說、文宣海報等，我們以中正紀念堂前的自由廣場為行動場域，與來往的遊客、路人談政治，一開始很多人都站在遠處觀望，不太敢靠近我們，或只是放慢腳步看一下文宣、聽聽我們的演說。這個行動一共進行七個週末，在媒體的報導下第二週起就有一些人主動來參與。

7.2.1.1 遊民無產階級，與卜派相遇

7 7 7 行動讓我們從原來熟悉的社運場域，轉身直接面對一般陌生的群眾，以我曾經經驗過的 2004 年總統大選後藍軍的抗爭場，只要與一般人談政治就會先試探你的藍綠傾向，不輕易表露立場，因為在那樣的場合中表露立場是有潛在的壓力的；我們自己發起的行動，如何可以脫除藍綠政治選邊、表態的壓力，而能

¹²⁴當時發動者有七人—台北市產業總工會周佳君、柯逸民、袁孔琪；蘆荻社區大學張競中、朱瑩琪；工委會賴香伶、張榮哲等七人，之後運動社群及世新社發所師生亦相繼加入各週次的行動。

¹²⁵7 7 7 火大行動是以 7 人發起，持續 7 週的行動、一個人再次找 7 個朋友來參與的街頭論壇；過程中參與者得以靜坐、講演等表達對時政的批評，在過程中透過公民的現身相互認識。（鄭學庸，2005）

創造出「不去政治化」的對話空間，是777行動中最大的挑戰。

幾次的行動中有幾位參與者已成了常客，彼此的認識也深了一些。第二週起我們調整了進行方式，除了靜坐外，我們設計了主題論壇，讓別人可以透過演說內容更認識我們。第三週有二位參與者主動發言，一位是有社工專業背景的中年人，他對政治現況非常不滿，發言非常踴躍。他的主張是「…趕快成立公民黨，向社會募款號召有志之士，這樣才有政治影響力，你們這樣搞是搞不起來的」；另一位成員則比較特殊，他身上總是背著個大塑膠袋，第二週起他就來了，但是站在很遠的地方，沒有靠近我們。第三週他比我們早到，好像在等我們，論壇開始後，我請他自我介紹，他拿起麥克風站在一旁小聲的說：「我叫鄭卜榮，你們可以叫我普派，對，大力水手的那個卜派…，我正在找工作，看到你們在這邊我就來了。謝謝大家」。我聽完他的介紹後問他「那你怎麼會來這裡？有什麼話要說嗎？」，他說「我住土城，剛被老板解僱，我從土城走來的，想找工作，可是我長的這樣(掩嘴、撇頭)，別人看到就不想請我了，這個社會我覺得很不公平，…老板不發薪水，說你去找陳水扁討好了，…我覺得政府對勞工太不公平了。」

在抗爭群眾場上總會有許多社會邊緣人出現，舞台上沒他們發言的份，搖旗吶喊總少不了他們；在777行動場上，我們雖有主客之分卻無上下之別。這種開放式的對話，卜派，如此邊緣、特殊的底層人物可以在場中被看見、被認識，這是我們希望人民之間可以相互看見的初衷。普派，話不多，唯一的家當就是那個背包，沒有家人…。能與他相遇對我是很有意義的，一無所有的無產者在你面前出現，對資本社會中吃人、被踢來踢去的命運他已嚐盡，鼓勵他適應現實、委曲求生的話我說不出口，他寄望社會運動早日成功，改變處境，短期內根本不可能，也做不到，該如何與這樣的伙伴同行？

與普派認識後，透過朋友的關係，我們引介他去加油站應徵加油員，但面試時他沒有來…。777結束後就沒有遇到他了。2006年9月紅衫軍行動，我才又再見到他，他身形本就瘦弱，但那時他興奮的搖著「民主行動聯盟」的戰旗，每天就睡在凱道，吃著源源不斷的便當、包子點心。我問他這一年怎麼度日？他說白天當派遣工到街頭舉牌子、打零工，晚上睡台北地下街…，聽他說著遊民朋友們搶地盤的事，之後他曾在中和一處空屋住，卻被通報有竊賊而被警察扭送看守所，住了一陣子，出來後身上的家當又被偷了好幾樣…，他說起這些事沒有太多情緒，好像是他生命註定般的無奈，而我聽著他的話、看著他在凱道上興奮的神情，街頭，一個無產階級遊民找到他安置一時的「窩」。

從777行動初識，2006年紅衫軍再相逢，普派之後就常在社運場合出現，只要有弱勢者抗爭，他都帶著那個家當「走」來與大家會合。2007年我們在參選立委時辦過數場次論壇，他總是主動發言，對遊民被歧視的處境及政府住屋

政策多所批評，與會者或許接不住他的情緒，卻也實在的與無產者共處一室，認識普派讓我對人的生命韌性、無產者的政治性有更深的體悟，每當處於困頓無方時，我都會想起卜派搖旗吶喊的身影。

7.2.1.2 7 7 7 行動的經驗檢討

7 7 7 行動中讓我們思索一般沒有工會、社團組織或政治參與管道的人，對各種政策的擠壓、對政治的不滿，透過對話可以相互更認識而集結起來嗎？此次的行動是我們首次面對陌生群眾，不同於以往在工會基層的組織或是對特定受害者的協助，當群眾們論及政治議題如：藍綠政權的差別、如何懲治貪官污吏及 18% 改革的對錯、原住民生存權、青年世代沒出路…等想法時，社會運動早已在各種抗議、陳情的場合提出過，批判政黨、政治人物偽善很容易，但要能改變政治結構、拿回做主人的權力卻很不容易。我們在運動中做的都是藉具體事件來改變／轉化受壓迫者的認識，把壓擠在個別人身上的痛苦放回到社會結構／處境中重新理解，運動者自身感受到的不滿、憤怒是與受壓迫者共同面對的；但 7 7 7 行動跨過了主／客體相互牽引的過程，是運動者以「拿回做主人的權力」，以自身公民的政治主體性位置行動，以「就地戰鬥」的形式表達對政治的不滿。

為何是自主公民的一份子而不是以某社運組織、社運工作者出現呢？其實這兩個身份並不衝突，社運組織是我們參與社會實踐的運動位置，在特定關係中運動者可以發揮一定的影響作用，協助弱勢或工會進行組織與行動等；在不特定社會關係中，公民身份是在既存社會中被統治的相同地位，「自主」公民則是有意識的對宰制關係進行抵制或反抗，我們的街頭對話是從形式（就地戰鬥）中呈現公民可以突破宰制的自主意涵。只是我們沒有採取人民老大運動時的「一對一」模式，也做不到「政治行動方案」的細緻的對話，因為在街頭論壇的公開、公共場域中，與不特定群眾接觸、對話，目標不在「把誰拉下來」¹²⁶，而是「拉下來又如何」，如果制度、結構不改，一樣會貪、會腐化¹²⁷。

7.2.1 人民對話之「秋鬥」

2005 年的秋鬥，就是我們一邊在推動 7 7 7 行動，一邊籌辦「秋鬥」來匯聚運動中的改革力量，以集體政治現身的形式與一般公民對話。雖然社運能量衰退，我們還是期待「秋鬥」能號召到有志之士，展現公民對政治改革的意志。

歷年來的秋鬥，不管在立法鬥爭或特定議題的訴求，有清楚的對抗脈絡，2005

¹²⁶ 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中正紀念堂前廣場上聚集的群眾以反扁人士居多，當我們表示 2004 年的廢票運動是我們發動的，引起圍觀群眾的高聲指責，有人見到鄭村棋來掉頭就走。他們的聲音是「把綠拉下來」，我們以藍綠一國、人民自己一國試圖對話，但效果不大。

¹²⁷ 7 7 7 不滿族行動的主標題是：「貪藍污綠、人民唾棄」，「政客還權、財團還錢」。當時除了陳哲南爆發高捷貪污案，二次金改的金融機構整併也傳出不少爭議。

的「秋鬥」不在提出訴求而是定調在抗議、揭露政黨輪替後更為猖獗的官商壟斷政體，直指國家(政商集團)竊奪了人民的政治權力。時任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秘書柯逸民(亦是 777 發起人之一)提出「政客還權、財團還錢」的主張，我們在這個認識下進行具體政策的分析、批判。如：高鐵 BOT 案，從政府零出資到最後要拿人民的四大基金上千億來為高鐵做擔保、金融改革成就了吳辜蔡花共合國，國家資產一夕消失¹²⁸，人民被高額的卡債利息(20%)壓的喘不過氣來…；我們再一資定性藍綠兩黨執政下的是「財團國」，弱勢者永遠被踩在腳下。

2005 年的秋鬥，我們從 7 7 7 行動的經驗出發，結合了過去秋鬥的社會性展演、弱勢者現身說等內容，把人民的生活處境搬上抬面。同時諮詢夏林清老師有關集體對話的操作可能，她建議應把「對話」的經驗放到秋鬥的對抗性上來思考，即使參與的群眾是長期支持運動的伙伴，但仍然可以從各自的生活經驗進行公民自主意識的政治化工作，也讓一般社會大眾更認識這個運動社群的政治性。

7.2.2.1 解放性的社會展演

2005 秋鬥，首先揭開序幕的仍是工人康康舞，從 1995 年「工人與總統有約」起，歷年秋鬥的集會形式就有了康康舞、黑手那卡西等文化性的元素，而工人康康舞是以男性反串、穿著芭蕾舞衣的蕾絲裙呈現「反」的概念，在激昂的樂曲中溶入「俗」(常民)的文化意像，藉此把參與者的動力引發出來，在平易中顛覆了傳統工運刻板的「陽剛、沈重」形式，參與者受到「俗擱有力」的視覺吸引，僵硬的軀體暫時獲得鬆釋，只是表達形式與控訴性的尖銳度如何拿捏，每次要處理康康舞最後的政治調性都得傷透腦筋：

「為著 10 萬元……。」幾位無畏冷雨的「失業舞男」，襯著耳熟能詳的台語老歌出場。他們僅穿著「在朝 A 光，在野兩光」的襠布，幾位舞男跳起康康舞。歡愉舞蹈的前提是，他們打破了「卡債」、「稅金」、「學貸」、「健保」等窮人枷鎖。「幹！財團賺我 18 代！」(康康舞者褲襠上的字)眾人吶喊著，賴香伶說，政府說砍掉軍公教的 18%，可以讓老農津貼多 1 千，「卡債 18% 怎麼不降？」她問。(陳朝政，2005.11.20，台灣立報)

2005 年的秋鬥以「政客還錢、財團還錢」為主調，當天一齣由工會幹部、日日春年輕運動者、學生及差事劇場表演者共同協作編製、演出「台灣鐵達尼號」舞台劇，更是讓群眾對「財團治國」有更深刻的反思：

「嘿咻！嘿咻！」台灣鐵達尼克號登場，划槳的工農百姓在「官」的發號施令下，努力提起「稅金」槳向前划。無奈，接連的高鐵資金 75 億、一次金

¹²⁸參考 2005 年秋鬥文宣—「貪藍污綠財團國，人民自覺拼活路」(工委會，2005)

改的4千億與二次金改的無底深淵，漸漸拖垮了工人、農民的負荷；隨著電影「賭神」配樂響起，「雙陳」踢破了台灣這艘危在旦夕的船。只是，誰又在乎將隨著台灣沉沒的廣大百姓？「75億，難道不夠給全國國小學童營養午餐費用？4千億，難道沒辦法救濟失業的工人，做國民年金？」賴香伶完全不顧感冒未癒，激動地吼著。(ibid)

這齣劇描繪了台灣弱勢階級為「鐵達尼號」船推進千里，卻在掌舵者的巧取掠奪中，這艘船被弄沈了，藍綠操弄中人民被分為藍／綠二方，高捷泰勞的抗暴衝破了統治集團虛幻矯情的意識控制，赤裸裸的剝削黑幕一樁樁被揭發，這部由弱勢者自編、自導、自演的劇就是台灣現實政治的縮影，苦勞大眾看在眼裡除了火大，還得自己扛起改革的任務，「『秋鬥』人數一年比一年少¹²⁹，有些人擔心，有些人焦慮；鄭村棋呼籲得到利益的朋友別忘了，真正結構的問題還沒解決，「想想下一代」；一位從黨外運動「抗爭」至今的前輩則很有活力地說，人少沒關係，重要的是想做事的留下來。冰冷的雨一陣一陣，人民的火大交換成鬥陣的溫暖」(ibid)。

7.2.2.2 弱勢者的眼淚，穿透差異

在各式抗議、控訴的展演結束後，2005年秋鬥人民對話的「街頭論壇」開始進行，看似靜態，卻帶著深層的反抗性，參與者從理解自身到參看他者，我所理解的政治化過程已經展開。為了籌辦街頭對話式論壇，我們在秋鬥籌辦期間舉辦了夏令營、幹訓營及各議題討論會，由不同社群推派代表，就其自身處境及運動經驗與群眾對話。秋鬥當天，「青年沒未來」組的代表曾曉玲（大學剛畢業，時任倉運聯¹³⁰秘書），提到自己的助學貸款是靠阿公的勞保死亡給付來償還的，一時之間台下許多勞動父母眼眶都濕了，曾曉玲也吶喊似的表明她會進入工運是因為對自己階級出身的反省，雖然有機會還是會想往上爬，但感念於過世的阿公及母親的培養讓她想運動中試一試；另一組「底層活不起」的代表是職災工人羅茂盛大哥，秋鬥當天他帶著妻兒來到現場。羅大哥因為長期從事營造工地的工作，外表比實際年齡蒼老，滿是風霜的臉在他低沈而微微顫抖的聲音中我看到他眼中的淚。他訴說自己工作被壓斷了腿、之後帶著妻兒努力過活，一個家庭生計的支柱就接在這一截合金的假腳上，靠著打零工的日子，而他與重度弱視的妻子、輕度弱視但勤奮向上的兒子三人相依為命，現在他以一台腳踏車改裝的咖啡車在台北師大路附近擺攤子賣咖啡，他說他要站起來、要活的有尊嚴。

2005年秋鬥，除了工、農、學生、進步知識份子的參與外，首次有退休公

¹²⁹2005年秋鬥人約五百人，相較歷年來有千人以上的群眾規模，確實是少多了。

¹³⁰倉運聯是工委會的加盟團體之一，全名是台灣倉儲運輸工會聯合會，1992年由團體動力工作室成員協助成立，十幾年的運動路線受工委會影響，早期並未登記，之後因為加入工會高達十四家，經工會內部討論後決定登記為全國性工會聯合會，每年秋鬥都是最主要的參與團體。

教職人員加入¹³¹，他們不滿民進黨政府以轉型之名把他們一桿子人打成是既得利益者，全國教師會及退休公務員協會都主動表示想來參加秋鬥。一開始他們表示要來參加工委會執委會並沒有不同意見，但是否要讓他們上台講話，卻是態度不一，有人覺得他們來「秋鬥」是認同工運及階級應該接納；有些人則認定他們本來就是既得利益者，與工人、弱勢者的處境差異太大，可以來但不應讓他們上台講話（賴香伶，工委會會議筆記）；在秋鬥前全國教師會曾邀請我代表工委會去報告秋鬥，當時他們的反省是公教階層不能只顧自己的利益，參加秋鬥是挺工人及看見不同群體的處境，能不能上台表示意見則由主辦單位決定。

我的想法是，不管他們上台說了什麼，重要是他們準備怎麼做，因此，在對話論壇上我們邀請來參與的退休公教職人員進到小組中，以不同位置、處境的參看相互認識，這才是「對話」行動的目的。一位中年退休女老師在現場說：「我在國中教書時，看到有些學生真的很可憐，中午就只買一個 10 元的麵包當午餐，我還常假借名義買午餐給學生吃。我非常慶幸自己有這個鐵飯碗，我弟弟目前失業，妹妹一個人獨自撫養小孩，都需要靠我幫忙。要改老師的 18% 沒問題，只是改得太粗糙。阿扁說老師退休了都在遊山玩水，那當初老師申請退休你就不要准！我是依法退休的。不要以羞辱的方式來羞辱老師。」（2005 秋鬥街頭論壇，第一組）

其它組的發言也十分令人感動。勞動家長協會理事楊豔麗說：「聽到曾曉玲說自己為了念大學負債 20 萬，其實是很心酸的。但想到自己三個小孩，更覺得難過。老大幫同學做作業來賺錢，還安慰自己，一邊幫同學做作業，還可以一邊複習課業。老二幫同學燙衣服，還跟同學說，外面燙一件衣服要 60 元，算同學便宜只要 40 元，而老二在家裡其實也不會幫忙作家事，現在為了賺一些生活費及零用錢還會去幫同學燙衣服。小女兒在學校找到一份工作，利用星期假日打掃宿舍的歐巴桑放假幫學校宿舍打掃廁所。整個學期總共賺了 3900 元，拿到這筆錢後，還說要請我去吃牛排，你們說，這牛排我吃的下去嗎？」（2005 秋鬥街頭論壇，第一組）

如果只看媒體報導秋鬥的「只有五百人，運動力量消退」（2005.11.21 蘋果日報），可能會覺得很失望、無力，但人在場中感受到的力量卻是媒體不感興趣也未讀懂的，因為數人頭式的群眾場是展現了實力，但卻未必能強化、轉化階級認同；秋鬥的人數減少被媒體「看衰」，但在方法上我們已能讓這五百人從自己、社會結構認識自身的階級處境，進一步與不同群體的經驗連結起來。2005 年人民對話的「秋鬥」承接了自主工運對抗國家統合控制的體系，衝向「藍綠政治結叢」又得在運動中維持自主性數十年，歷經了 90 年代末關廠外移風潮、工會會

¹³¹參閱 2005.11.2 台視新聞報導電子報：〈工人秋鬥遊行，公教首次加入〉

員解離四散，民營工會凋零萎縮¹³²的政經情勢。二千年政黨輪替後，社運力量受到藍綠政治集團有意的收編、餵養而更形退化；工委會以「等距外交、等比結盟」的路線挑戰政黨附庸、利益交換等，2004 年的廢票運動宣示「罷免藍綠、走自己的路」，進一步與社運界面對了國族認同與階級的關係¹³³；2005 年人民對話之「秋鬥」是從生活經驗理解社會壓迫而以國家主人、公民的身份接連起個體與集體間的階級意識轉化。2005 年之後我們未再舉辦「秋鬥」¹³⁴，投入更多的力氣在人民參政的公民政治行動中。

¹³² 1989 年，僱用 30 人以上工作單位的工會組織率是 30.57%；2008 年，僱用 30 人以上的企業中，只有 3.17%有工會組織。19 年來，產業工會的數量從 1345 家跌落到 989 家，少掉 365 家；會員數則從 698,118 名降到 579,291 名，流失將近 12 萬名。

¹³³ 國族與階級認同的關係，有二種論點：第一種是勞動黨、勞工陣線認為國族矛盾的解決先於階級矛盾，解決或服務於第一矛盾會決定其與個別政黨的關係距離；另一種是「實力論」（二階段論），指現階段工人沒力量，應與特定政黨合作，待有力量再脫離、自主，這個論點是曾任親民黨不分區立委、全國總工會理事長林惠官在 2003 年秋鬥勞工高峰會的論點。

¹³⁴ 2009 年「秋鬥再起」遊行，於 2009.11.22 舉辦。這是睽違四年後的社運力量再次集結，主題定為「消滅政商壟斷、實現社會正義」，就弱勢者間相互看見及運動陣線的有機聯合開創新局，以發展政治主、經濟平等、環境正義、尊重多元的人民草根運動。（秋鬥再文宣，2009.11.22）

第三篇 展望「慢政治」：階級性的公民政治運動

我以自主工運的實踐及行動者意識轉化來探究「慢政治」，「行動者得以辨識自身的政治性並與他者建立起一推移社會變革的實踐取徑」，指的是鑲嵌於社會結構處境中的行動者得以在一定的歷史感知下，透過社會實踐轉變其政治意識，進而辨識自身，展開「走自己的路」的主體性探究。

如何從一定的歷史感知中生成階級意識，「敢」反抗既存體制的結構性壓迫？我認為重點在「人的意識轉化」，這個轉化需要一種回溯的歷史反映空間，即是「慢政治」所能承載的共振力場。一個人從理性認知到改變行動，意識到個體與集體(階級)間的差異、自身與他者的相互碰撞、磨擦，在相互參看的作用下反應其一定的歷史質，再與客觀存在的政治社會變化、個人處境的連結，人的「主體性」是可以被自身辨識的。

但這種過程與我所描繪的快速而激進的工運歷程，外在局勢的變化高度擠壓著行動者，如何創造出「慢政治」的回溯反映空間？不是很矛盾嗎？其實所有與在運動中的個體都清楚這一回溯反應的空間就在行動當下出現了，當行動者帶著各式困惑、不解或覺得格格不入時，反映的回溯空間已經發生了，參與越深其得以辨思自身政治性的土壤就越豐厚，透過一定的對話或討論，其辨識社會處境的「看見」就更清晰，「慢政治」與「快行動」的矛盾統一在實踐的取徑中。

本篇以展望「慢政治」為題，把探究場域轉向台灣百年難見的紅衫軍公民行動中，火盟以「不放棄使用暴力」的抗暴主張進到 2006 年的紅衫軍反貪倒扁運動，我們與施明德、簡錫堃主張的「合平、非暴力」公民不服從運動多所交鋒，我身為火盟主張的執行者，在紅潮中又成為百萬群眾之一，如何在行動中辨識了我的公民自體性。紅衫軍之後，火盟藉著反貪腐的政治空間在基隆發起罷免市長許財利的公民行動，以階級性自主公民的身份介入藍綠政治，引發了運動者間對「政治恐懼」的對話，梳理這兩個經驗是站在延續運動自主性與工委會轉進到公民參政，召喚「不藍不綠」的公民以轉化其階級認同的實踐路徑說清楚些。

第八章 公民政治性初探

以 2006 年的紅衫軍之役作為探究公民政治性的意涵，主要是想對實質民主中的「自主公民」¹³⁵的體現及去政黨色彩的人民運動何以發生進行考察。我們

¹³⁵為實踐「實質民主」而上街的論點，丘延亮教授所提的「自主公民」(self-constituted 的公民)

（火盟）這支運動隊伍在當時決定進場，以「不放棄使用暴力」的主張與群眾間發生的關係張力，我做為主要推動者，在過程中對自身及群眾的「自主性」有更深的體悟。

第一節 2006 年紅衫軍之役——火大行動之反省

2006 年中起，經媒體名嘴不斷爆料批露民進黨政府高官、總統親信的貪污醜聞後，不少政學界的菁英開始對此情勢展開行動串聯及筆伐的工作¹³⁶，同年 8 月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發起「百萬人反貪倒扁運動」的募款行動，政治上的焦點即轉向對該運動目標與手段間如何推展的討論，眼尖嘴快的政治名嘴們紛紛施展各式權謀的「退場」建言或臆測，如媒體曾傳出施明德要以「內閣制交換扁不下台」的憲政體制改革、或是傳聞李登輝運作「蘇下王上、阿扁虛位」等政治交易的準政變傳聞，此外，將目光轉向評述百萬人民參與反貪行動，從社會運動的角度給予諸多肯定與投射的新公民運動論述，則集中在長期關注社會運動的學術陣營，過程中曾幾度與捍衛既有體制或民主價值的保守性言論交鋒，總之，這場紅衫軍反貪倒扁運動對我思索人民民主有極大的衝擊。

8.1.1 主張暴力路線的兩面刃

把支持激進化的群眾組織起來，「暴力路線」是一種檢驗，看這波中產階級反省的程度，還能等到 2008 的人不會激進化，主張行動的恐怕是等不下去的邊緣人，但我們就是要去組織這些人，過程中與他們對話與討論。

（2006-8-19 與鄭村棋老師的討論對話記錄）

2006 年 8 月，「百萬人民反貪倒扁」行動開始在社會上引起高度迴響，我們基於 2004 年底的人民老大運動及 2005 年的 777 行動(參考第七章 7.2.1)的理念，很快的便加入了一人一百元的紅衫軍募集行動。

在參與之前我們對於政治上的各種風聲及反貪倒扁總部訂出的各種抗爭行動守則(不准拿標牌、不能出現組織的名稱、取號碼牌才能進場靜坐)感到不解，決定找運動前輩鄭村棋老師討教；當時鄭老師經常在飛碟電台的節目時段與聽眾

是指在日常生活的鬥爭主體，丘指出這不是一個分類系統，不是一個名號，是在運動中浮現的，是在鬥爭的過程中，隨著他的任務、隨著鬥爭的需要，使他的主體不斷的分裂與重組。（丘延亮，2006）

¹³⁶ 從親綠學者群發表 715 聲明表示對執政黨失望對在野黨不寄望的學界串聯行動起，學政界展開對紅衫軍運動的觀察思辨與批判論戰。其中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出版《自主公民進場對百萬人民倒扁運動的觀察與展望》一書，將各方批評、論述做詳細的整理。（台社，2006）

進行空中對話，他對此次紅衫軍運動最關注的焦點是——「如果和平靜坐無法達到目標，要不要使用暴力手段？」，在對話過程中多數人起初認為和平理性比較對，但又希望陳水扁趕快「知恥」下台，「萬一他不下台呢？」鄭老師進一步逼問這些聽眾，多數人的態度已能調整到接受「必要時」採取暴力抗爭的手段。

其實，面對「暴力」手段的立場態度與準備採取暴力手段行動及真實面對暴力衝突是三個不同層次的問題，就我的理解鄭老師與一般聽眾的對話是在第一個層次，與一般人對「暴力」的認知進行對話，當然鄭老師口中的暴力並非特指街頭的流血衝突或失序混亂而已，更大的暴力其實是來自於國家(政府)的統治機制中，特別是他們擁有合法使用暴力的權力，一旦取得了維護社會秩序的正當性後，可以全面性的壓制、清除、抹黑人民自發性的抵抗力量。

8.1.1.1 為什麼主張暴力路線¹³⁷？

這場近似人民審判的反貪倒扁政治示威行動，其指揮總部一開始即定調在和平、非暴力的「公民不服從運動」層次，洋洋灑灑的訂出許多行為準則，鄭老師除了在電台廣播時段多所批評，也一再質疑和平非暴力所具有的壓制本質。做為公民的一員又有多年社運組織經驗的我很自然的接受了鄭老師的觀點，也盡可能跟上這波行動中各方意見的辯論，我們該如何進場？

唯一可以把權力交回給百萬人民的關鍵，就是主張和平或暴力路線的爭辯，因為那是手無寸鐵的人民與國家機器之間最大的決裂。不準備談判、不遵守體制內的規定、不受現有法治威脅、不願被資產階級主控的民主社會所馴服。(賴香伶，2006)

紅衫軍 99 行動前我寫下這篇文章。一個社運工作者帶著任務進場，在更大的運動場中成為被領導的群眾之一，如何辨析自身的行動與目標，當時只有意識上的理解，不到身體上的實踐，在文末「用自己的政治認識決定參與的行動，別讓那些未戰先談、早已啟動計畫的權謀分子，攔截了我們的權力，因為我們才是民主運動的接班人」，這是我的運動主體性認定，也期待參與者扛起做主人的責任，不要再對藍綠政黨、政治人物有所期待。

¹³⁷鄭村棋老師當時會提出「暴力路線」，他對領導階層、群眾及運動形勢有三個評估：1.施明德原本採取的「以戰逼和」形勢，戰略上是邊走邊看，不是真要用群眾的陣勢逼上去，藉力使力挑動內部矛盾。看誰開第一槍！我們如果衝進去他可能會跟進，成了是他在接收，不成是我們倒楣，從利害評估覺得他們不會激進化；2.群眾基本的認識與激進性有侷限，並未到零界點，但群眾力量這麼大，領導者沒有要真幹，簡錫堉又沒有要扛政治責任，可惜。群眾沒有切身逼上來的感覺；3.整個社會進步力量在他們身上，但不暴力可以達到他宣稱的改變嗎？以挑戰集遊法去做政治交換可能在其中運作。「我是在這些評估後覺得該把激進群眾組織起來，與他們做區辨，本來這樣的群眾就是少數。大部份的群眾沒有澈底的覺悟，不是我們可以影響的。」(2009.12.31 訪談鄭村棋)

重新回視我的論點—拿回作主人的權力、不依循體制的規約及對自己的行為負責。這些論點放在行動的層次就與倒扁總部訂的行為守則不同，起碼是對和平非暴力路線的一種挑戰心態；相對於 2004 年「沒有真相、沒有總統」的藍軍抗爭場，我是以一種觀察的心態進入，紅衫軍之於我是比較接近於做主人、拿回權力的人民運動。基於對政治改變的想像與期待，我認真的參與其中，也負責任的執行「不放棄使用暴力」的路線。只是，沒想到在實際的運動過程中，社群內及其它被召喚的公民朋友們，對我們的作法有所質疑，這是我始料未及的。

8.1.1.2 老鄭：你們敢接激進的群眾嗎？

原先我們帶著 777 的經驗，決定集體進入是希望組織有認識的群眾，再漸漸形成由群眾參與的決策中心，而不是一個口令一個動作的跟隨頭人、或是在造神膜拜式的關係中又把權力交出去。這個想法沒什麼不對，只是那是別人的主場，我們雖有「區辨」的企圖卻無十足的準備，這種想法過於天真。

爲了審慎起見，行前我們找鄭老師討論，他劈頭就問「施明德玩真的還是假的？政治上他要什麼？為何在行動前他的政治表態是親日不反中，美方也同意這個政治決定嗎？群眾會是激進還是保守的？如果群眾是激進的，你們這套或許可以操作，如果只是走馬看花的多，隔日要上班的人，就散了，能持續多久？他們是如何評估戰力的…」。(賴香伶，2006.9.6 工作討論記錄)對於鄭老師尖銳的提問，我一時答不上話，就好比工會在討論要不要罷工一樣，喊罷工容易，但何時罷？怎麼罷？戰力可以維持多久？何時是決戰點？資方會出什麼招？。「想清楚」，鄭老師不耐的說。

紅衫軍一役可不是勞資對決，是要奪權的。面對來自四面八方，基於不同的理由上街頭的群眾，倒扁總部匯集了各方力量，以宣傳造勢、預演操兵來累積動能，百萬人民被盤進了街頭。這個工程之浩大與工會動輒幾百人的罷工天差地別，我們沒有經驗可對照，當然想不清楚（只能從媒體政論節目的報導進行解讀）；再者，這場人民運動所謂的「成敗」該如何看待？老鄭接著說「能做到『政客小贏、人民小輸』就是階段性的成功。人民不可能拿回主權，但政客破功、看清政客嘴臉，不再容易被騙就算不錯了」（2006-8-19 與鄭村棋老師的討論對話記錄）。他所指的應是運動中領導者與被領導者間的對待關係，以工會罷工為例，工會幹部爲顧及會員最大利益，到底是見好就收還是非戰到一兵一卒，最終還是得由會員集體面對並承擔後果，不是一個人說了算。

施明德發起該運動，與百萬人民簽下承諾（每人交一百元，與我們的「人民

老大運動」非常類似的民主契約金¹³⁸)，他發下豪語「不下台絕不罷休」，這個政治承諾也是運動最終的目標，倒扁總部與百萬群眾間是交付所託還是共負成敗，考驗著參與的群眾與運動領導人。只是這麼複雜的問題不是施明德該想，我們即已決定進場也該面對，在 99 行動前夕，鄭老師打電話問我「你們準備好了嗎？」，我說「嗯，就這樣啦！」他說「怎麼樣？怎麼區辨？準不準備承接激進的群眾？」，我心想人民的怒火真的漫延開來了嗎？這一百一百元所累積出來的上億元，是基層人民的不滿與求變的決心嗎？時間緊迫，沒能多想什麼，只好再把同志們找來討論，我們敢／想承接激進的群眾嗎？敢在進場時以「不排除使用暴力」來號召群眾嗎？

8.1.1.3 熱情的紅衫軍現身

在事前準備不及的情況下，我們還是作了基本分工，2006.9.9 紅衫軍出師的當天，我們跟朋友借了一個小帳棚，在中山北路／仁愛路口設置了簡單的報到處，一群人趕著發放黃色頭帶、接力演講。下午三點一到，「納斯卡」¹³⁹線開始轉動，成千上萬身穿紅衣的群眾經過我們的報到區，熱切的群眾向我們揮著手「對啦！就是要以暴抗暴」，有些群眾看我們手忙腳亂紛紛主動幫忙，有些人拿起麥克風就即興演講起來，當然也有些人不以為然，紛紛表示「冷靜、理性、和平、和平」，我們動作當然引起倒扁總部的關切，也一直有警察在一旁搜證。

一整天下來，我們的帳棚區一直有不少群眾進進出出，有幾位待得比較久是聽到鄭老師在電台的廣播，特定從台中、高雄上來，準備再坐夜車趕回去的。他們一見到鄭老師就說希望鄭老師帶領大家往前衝。下午二時起鄭老師就到了現場，看到我們手忙腳亂的樣子他只有苦笑，但他也知道這場面不是我們應付得來的，到了傍晚他也加入接力演講的行列，許多人看到他都圍過來要他帶頭，同樣的一句話「大家準備好了嗎？不用非常手段他（指阿扁）會下台嗎？」，話峰一轉他再次提醒「但我們不要當人家的替死鬼，衝在前面卻被人家說成是破壞份子，和平手段可以解決最好，如果不行是否準備暴力相向，有這個準備嗎？」，群眾有掌聲也有噓聲，而我們這群準備承接激進群眾的運動者有準備與統治者放手一搏嗎？

當時的我被迎面而來的熱情鼓舞著，但在忙亂中發覺我們根本接不得住他們的期待；因為，即不當馬前卒又不甘被擺弄，「火大行動」在第一天的紅衫軍場

¹³⁸ 2004 年底立委選舉期間，人民老大競選團隊一日日春及工委會代表曾帶部分選民(支持日日春選舉運動但戶籍在施先生的選區)去拜會施明德先生，了解他的選舉理念。我們並介紹了「直接民權代議制」與入會人員繳交 1000 元民主契約金、與候選人簽約等直接民權的機制；在 2006 年紅衫軍推出每人交 100 元與施先生訂契約時，直覺是與「人民老大」參選運動有所連結。

¹³⁹ 這個行動動線規畫來自於倒扁總部的指揮之一范可欽，他借引南美洲秘魯的特殊地理圖線，在紅衫運 99 行動當天以凱道上的景福門為軸點，從總統府到仁愛路、杭州南路段為範圍，群眾著紅衣繞行的動線，稱之為納斯卡圖形的再現。

上有如一根探針，在「不排除使用暴力」的標牌與黃色頭帶的區辨下，引起了當天政論節目對「和平非暴力」或「以暴抗暴」的選項進行民意調查，群眾的反應也多少抱著速戰速決的“爆衝”得以成事，但一天下來沒有群眾爆衝也沒有突發事件，在一場大雨後，人群紛紛找地方躲雨，許多人都擔心這場雨會把群眾驅離，可是雨停後黑壓壓的人群又回到凱道上，氣勢一時間更旺了，彷彿打了一場勝仗，99 行動讓倒扁總部打了一劑強心針，之後連日的活動都按表操課，紅衫軍在凱道上持續了近一個月。

8.1.2 黨外衝族—遇到朱世紀老前輩

因為看不到總部有升高對峙的態勢，我們在凱道一角的輪班與凱道上的人潮形成強烈對比，當時一到傍晚時分許多裝扮時髦的青年男女來來往往，越到深夜人越多，但會瞄我們一眼的人也少了，對暴力主張也未多留意，頂多是投以奇怪的眼神。

但我們採取區隔的進場方式，讓我們結識了一些激進的草根群眾，特別是有三位老先生們，他們幾乎每天有輪流到我們的帳棚區來，對我們很友善也不時問到鄭村棋老師來不來。有一天我實在對他們感到好奇，主動問他們對這場運動的看法，其中有一位伯伯拿出用報紙包的東西，小聲的說「東西都準備好了，就等鄭老師一聲令下」，我以為他是開玩笑的，問到「裡面是什麼？」，他把報紙翻開竟是一把菜刀，頓時我有些驚訝，連忙問道「你有與鄭老師連絡嗎？」，他說「我之前有打電話給他，他叫我來這裡，要我不要衝動，我知道他的意思，這種行動我看太多了，這樣搞沒有結果的啦，當年我在日本…」。

這位身材矮小的老伯名叫朱世紀，一頭灰白的短髮滿布風霜的臉龐，在凱道的一角講著他看到多數中下階層人民生活的無奈，「民進黨呼阿扁這款人侮了了，要翻掉」他說。2002 年 10 月 23 日他曾串聯過無數的流動攤販向政府嗆聲，當時他就找了鄭老師幫忙，電話還是我接的，沒想到會在紅衫軍的抗爭中遇到他，我也才知道他的運動經歷。年輕時期的朱世紀老前輩即與多位海外獨派人士搞過激烈的獨立建國思想運動，1973 年他曾在東京創辦社會主義刊物《台灣文化》¹⁴⁰。從日本回台後就一直投入獨立建國運動，也曾在台北縣以個人名義參選

¹⁴⁰ 參考台灣獨立運動大事紀 (<http://www.wufi.org.tw/events.htm>)，在李筱峰教授整理的「近百年台灣民主運動」有部份記載朱世紀先生在日本的運動位子「60 年代以後，在日本的台灣獨立運動組織逐漸分歧發展，1960 年的 2 月 28 日，王育德在東京成立「台灣青年社」，許多當時的台灣留學生，如黃有仁(昭堂)、許世楷、金美齡等紛紛投入。後來辜寬敏應邀參加，並於 1965 年將之改組為「台灣青年獨立聯盟」；原初與廖文毅攜手的醫師吳振南，於 1963 年另組「台灣獨立評議會」；其他，還有左翼的團體如郭幸裕的「台灣建國委員會」、朱世紀的「台灣文化會」。(李筱峰，2000)

立委，之後還擔任了建國黨秘書長。

像他這樣有滿腔熱血卻沒有政治資本的台獨人士，在民進黨上台後不但沒有分到任何好處，還在光華商場附近以賣豬血糕維生，靠自己的勞力賺錢，天天躲警察、吃罰單；他說有時一天之內就收到七、八張罰單，一個月下來就好幾百張罰單，他自己累積了近千張的罰單未繳，欠政府近百萬的罰款根本無力負擔，當時他發起拒繳罰單並要求政府正視中下階層生活困苦、社會福利照顧不足的問題，也組織了流動攤販自救會，對警察把他們當垃圾一樣的抄攤、取締表達抗議。後來呢？我追問著。「民進黨政府當然沒有任何回應」他說；朱世紀先生闖蕩運動看多了政治人物表裡不一的嘴臉，對民進黨政府的冷漠回應也了然於胸，但他對鄭老師（社會運動）有寄望，「我常常跟鄭老師聊天，他叫我們不要衝動，被抹黑不打緊，當這些人的替死鬼才冤枉，唉！」

99 行動之後的一週，政治情勢仍然十分詭異，倒扁總部規畫了 915 圍城之夜，我們火大行動又動了起來。當晚我們駐點的帳棚區前少說也有上千人，「不做順民、貪腐下台」是我們行動的口號，在擁擠的空間中我盡可能把認識的伙伴集中在一起，當場我又見到了朱世紀老伯他們，他們三人手持竹竿來到我們的隊伍中，我見狀連忙問他們有何打算，他們又拿出了用報紙包的物品，說看情況就要綁上去。比起他們的準備周全我們的行頭還是只有紙做的標語牌；整個氣氛是嚴肅的，我做完簡短的說明與分工後，隊伍也就挾在人群中緩緩前進了，一開始朱世紀三位前興奮的走在最前面，也會幫忙拿主布條，但約莫走了二公里，他們就離開隊伍了，我也因為要先到其它點去了解狀況而將隊伍交給了其它人負責。

一切似乎都非常理性平和。在最靠近總統官邸的拒馬區，多數民眾也只是叫囂、嘲弄警察或丟保特瓶等，我因為連日的駐點輪值，心身都很疲累，離開我們的隊伍後就趕忙跑到官邸區附近，有許多人已停在那邊不想離開了，但最接近官邸的指揮車一再叫群眾「前進、前進、慢慢走」，還是有許多人在現場逗留，不時也有人三三二二脫隊到拒馬前拍照留念、比手勢、噏聲、吐口水等，而我一個人坐在一旁騎樓的地上，看著潮水般的百萬紅衫大軍高喊著「阿扁下台」，倒扁手勢一次又一次的舉起，還有各式新型應景的夜光棒、充氣道具，一時間心中有了定見「了不起的公民行動，但解決不了問題」，心情從出發時的緊張興奮掉到了憂鬱的谷底，落寞。本想起身回家休息了，但想到其它的同伴可能還在現場，顧不了起泡破皮的雙腳又趕忙走進人群中去找他們，凌晨十二點多回到凱道上，人群少了，SNG 轉播車的工作人員正在收線，我與幾個同伴也在凱道上碰到面了，我才又想起朱世紀老伯他們！

8.1.3 群眾：「要搞暴力再來找我！」

紅衫軍的群眾與 2004 年 3.20-5.20 群眾集結的過程越來越相似，白天人不多，大部份人是下班後才來，而且越晚人越多、遇到週末大型集會時則全家總動員。915 圍城之後，電子媒體 SNG 轉播的內容慢慢集中在觀察施明德何時出現在集會現場、何發表演說，連他休息時百萬休旅車外有保全輪值都有詳盡的報導，群眾參與狀態與媒體觀察重點的改變，這場反貪倒扁運動要靠街頭力量扳倒政權的時機早已過去，況且過程中檢調偵辦扁案的動作及進度對執政者的威脅似乎更甚於街頭的群眾，那麼從 99 行動後一路從凱道被驅趕到台北火車站最後又要占回凱道的人群如何看待自身的行動？百萬紅衫軍為何無法在政治上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為什麼？

9.1.3.1 林一方告發鄭、袁二位暴力論者

這個提問反應出我對以街頭力量直接取得戰果的殷切，當然政治情勢的發展或改變不會是單一力量能主導的，政黨、司法、媒體輿論等掌握資源、權力的社會力在反貪倒扁運動中各有其不同的影響作用，街頭的行動亦不必然是執政者最畏懼的部份，但卻可能是最難掌握的。就以火大行動的進場及主張，在 99 行動當天情治單位及親綠人士就緊盯我們的發言，並立即採取提告的行動¹⁴¹。

在一則專訪林一方的部落格上更清楚指出主張暴力言論觸犯刑法的條文：「林一方表示，鄭村棋自八月以來，主張以暴制暴，是倒扁集團的暴力派，且對群眾揚言，若總統陳水扁不下台，不惜以流血來革命；袁孔琪則是在本月十日於凱達格蘭大道和中山南路交叉口，透過麥克風和標語公開主張暴力。他指出，鄭村棋和袁孔琪分別透過電子媒體和標語，公然惡意煽動民眾，發動流血革命主張，意圖暴力推翻政府，已嚴重觸犯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條規定，以文字、圖書、演說等，公然煽惑他人犯罪，可處兩年以下有期徒刑。」¹⁴²

這是在倒扁運動中「暴力論」被清楚報導的新聞片斷，在 99 當天混亂的現場，我們清楚提出使用暴力手段的前提與發放行動守則——「尊重和平手段，不放棄使用暴力」，過程中盡可能讓參與者了解，而林一方先生人是否在現場或經由特定媒體的轉知而決定提告，這則報導及提告的動作，一定程度刺激了群眾思考

¹⁴¹ 林一方今告鄭村棋、袁孔琪煽惑犯罪：「林一方昨天以台灣意象傳播公司名義，發出新聞稿指出，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秘書袁孔琪表示，如果和平靜坐不能成功，就主張暴力革命，還表示他不是偷偷主張，而是公開主張。林一方並說，鄭村棋也聲稱「和平路線如果沒有戰果，沒有不流血的革命」。(賴仁中，2006.9.12，自由時報)

¹⁴² 「亮麗下的醜陋」影像雜誌發行人林一方 2006.9.12 上午到台北地檢署，告發社運人士鄭村棋和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秘書袁孔琪涉嫌煽惑他人犯罪。(http://blog.roodo.com/freemanspot/)

「和平理性」的靜坐與「以暴抗暴」的運動手段的差別。

8.1.3.2 政治性罷工的討論

2006 年紅衫軍從 99 行動到 915 圍城之夜間，倒扁總部的指揮者之一簡錫堃曾對外表示要規畫十月份的全國性大罷工，此種非合法的運動策略立即引起社會高度的關注，在一次簡錫堃先生私下邀約的討論會中，我與工委會召集人王耀梓共同出席，席間簡錫堃就其在工運抗爭時期曾推出的「1101 怠工一小時」行動為例¹⁴³，他說當年怠工行動花了 3 至 4 個月準備，現在民怨不滿程度遠超過當年，應該只要一個月就可以得到各界響應；而他也認為，除了靜坐，他們也有擬定各種非暴力抗爭的計畫，即使發動全國大罷工，都會秉持公開透明行動原則，事先預告、串聯；在他的說明之後，各出席代表紛紛對罷工提出了困難配合的考慮，只有工委會的代表呼應其政治性罷工的積極性，甚至表達對倒扁運動如何進一步往商人罷市、學生罷課等擴大運動串聯的提議，不過基於過去我們在工運上與簡先生交手的認識，王耀梓直接問他說：「這次是玩真的，還是假的，如果倒扁總部不支持你的提議，你要怎麼辦？」，簡先生說：「如果理念不同，考慮退出」。

從媒體的報導中可以發現「政治性大罷工」引發的意見分歧與社會恐慌¹⁴⁴比「暴力論」更為劇烈，雖倒扁總部內及施明德個人均以未討論及推說是簡錫堃等少數的個人意見，加以駁斥，但對於該運動得進一步激進化的壓力已經在其內部領導層中出現差異，至於群眾是否會跟上或接受此激進的手段也考驗著「暴力論者」，我們有準備迎上了嗎？

8.1.3.3 火大行動與群眾對話

對林一方先生的提告我們可以一笑置之，但對 99 當天留下資料的上百名群眾必須認真對待，因為在當天混亂的情況下許多人以簽名表示支持該運動，卻不一定是支持我們的主張，為了進一步釐清雙方的認知，915 圍城行動前我們開始分頭打電話給留下資料的群眾¹⁴⁵，清楚告知我們的主張及想知道他們有沒有繼

¹⁴³倒扁總部成員簡錫堃(時任勞工陣線領導)曾在 1994 年發動「1101 怠工運動」，當時為抗議全民健保修法，以「人頭稅」設計，影響弱勢者權益，選在 11 月 1 日 11 點 1 分發動全國集體性的怠工一小時行動。(勞動者目錄 1-123，1994.11/30(72)革新版 3 期)

¹⁴⁴經媒體報導全國產業總工會、勞工陣線等原先簡錫堃先生關係最密切的運動陣營均表示非關勞動議題，不可行也不會參與；各大政黨也紛紛以恐不合法對勞工不利、會影響經濟及把國人當肉票大力否定這種提案。倒扁總部內也不同調，基本上對此激進性提案視為簡錫堃等少數個人意見。(自由時報，2006.9.12 綜合報導)

¹⁴⁵當天約有 220 位群眾留下資料，經我們一一電話溝通後，約有五十人願意持續收到我們的行動訊息，大部份人表示當天是不了解我們的訴求，以為是總部設的報到處就留下資料，至於對不排除暴力的主張，只有 1/3 左右同意這樣的看法(約 20 人)，其它人都認為採取和平手段比較好。(香伶的工作記錄，2006.10)

續參與行動的意願，多數人是搞不清楚狀況，以為我們是紅衫軍的報到處，經過我們的澄清與說明後，只剩少部份人願意持續收到我們的資訊。

搭著紅衫軍漸次的行動，我們也不時與願意保持連絡的群眾連絡。十月十日倒扁總部發動二度圍城，取名「天下圍攻」，挾著國慶假日的紅衫軍人潮再聚、街頭佈署了重重保護外賓出席國慶典禮的警戒，要讓國際媒體看到紅衫軍群眾對執政者的不滿，雙十國慶日的行動是倒扁運動的關鍵時機。

對於「天下圍攻」一事，火大行動又該如何進場，我自己已沒有太多熱情了，因為在我當時的運動位置上，有較多管道了解一個多月以來紅衫軍的相關資訊，而透過自己密集的參與，也沒有看到他們有準備組織性的抗爭，甚至在行動上挑戰集遊法的紅線（即使在簡錫堦的介入下曾募集千人的不合作抗爭訓練，但也未曾主動展開行動）。而運動期間被指稱為暴力色彩濃厚的個人式集結（如林正杰的天使隊）或激進性言論的小型組織（如黃光國教授們所持續進行的民主行動聯盟）也都只有少數群眾的基礎。我們主張暴力路線的火大行動，雖然連個隊伍的形式都組不起來，卻仍然得對群眾負責。經過社群內部主要參與規畫的同志們討論後，決定再打一次電話給他們，了解他們會不會參與「天下圍攻」的行動，有機會可以再對話。

沒有準備相應的行動，要與陌生群眾對話我其實充滿著焦慮。雙十那天下午一點左右，我們與群眾約在台北火車站東三門口，一到現場約有 20 幾人，我把「人民火大行動」的紙牌拿在手上，有幾位中年人與我打招呼，後來也有些人陸續靠近，其中有位從桃園來的男性著急的問「到底要不要動？他們搞他們的，我們來讓他們措手不及嘛！」，旁邊也有人應和著「本來不來的，接到你們的電話才來，他們這樣搞沒有用啦，要搞暴力才行」，這幾位大哥本來對此運動已經沒動力，因為我們的電話邀約才特定跑到台北，看到集合的群眾不到百人，有一位大哥氣憤的說「沒搞頭了，人這麼少？動不起來」，轉身就走了，聽到這些人的反應我其實已招架不住，硬著頭皮把邀約的目的平板的說了一遍：「我們今天是想與大家討論對這個運動的想法，如果要採取烈的行動也應該有過對話或進一步的組織動員，所以，如果大家願意坐下來談，或許我們可以決定下一步怎麼做。」，這時那位轉身已走的大哥又衝上來說「一句話，動不動，不然我走了。」（賴香伶，2006.10.10，與群眾對話過程）

他走了。一個人走到台鐵東三門外的公園隔著玻璃門遠遠望著我們，抽著煙。這時有位女性朋友（是一位小學老師，從中壢來）似乎在幫我解圍的說「我是來支持你們的，我不贊成暴力，但你們的訴求我認同」，就在匆促而短暫的說明後，有二十幾位朋友留了下來，我們就地分成五、六個小組討論，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我因為太過焦慮而在一旁聽著其它人的討論，不時看著在外頭抽煙的大

哥，念頭一轉索性走出去找他。他看我過去氣消了一些，直說「人這麼少怎麼搞，我以為你們的組織很大，可以動個幾千人，如果有幾千人還怕動不起來嗎？」，我苦笑著說「社運團體其實都很困難經營，我們是搞工運的，這次的活動對我來說也是新的經驗」，那時我的心情是苦悶的，很想掉淚，話也沒多說了…。

8.1.4 朱世紀老伯的死！

回想從 99 行動開始，火大行動標舉「不放棄使用暴力」進場，一路認識到不同的群眾，有些被結構逼死(如朱世紀老伯)¹⁴⁶，有些表態要「幹」才加入的人也悻悻然的走了，這些人對我們的認識不多，頂多知道我們都是鄭村棋老師帶出來的學生，他們因為受鄭老師廣播的號召，期待他出來領導，而我做為認同該主張的執行者，對內得面對不少同志對暴力路線的質疑¹⁴⁷、對外又得承接群眾的不滿，壓力很大，幸好團隊中不少同志情義相挺，如：黑手那卡西的團長陳柏偉，他個人並不贊成暴力路線，但他在當時只要我找他，他幾乎隨傳隨到，有一次紅衫軍特別邀他上台演唱，他除了帶唱了「福氣個屁」外，還勇敢的把「抗暴是人民的權力」的主張搬上台面，引起倒扁總部的小抱怨。

雖然至今我仍覺得對被召喚來的群眾感到抱歉，當時沒有把我們對運動形勢的分析及動與不動的考量說清楚，也無能組織足以對抗國家暴力的群眾，但對紅衫軍運動的參與及組織交付的任務已盡力了。

第二節 政客大贏，人民大輸？—論公民自體性(citizenship)

這場反貪倒扁訴求，不是只有阿扁下台，更勝於此的是認識民主的真諦，包括建立領導與被領導者平等關係、放掉政治上利益盤算的陰謀，以及「政治責任」的具體落實，參與行動中的人民必須學習與檢討，擁有經驗的指揮者更應走下舞台、放掉麥克風，不再複製「由上而下」的形式民主，否

¹⁴⁶ 朱世紀老伯在 2007.2.9 過去在光華商場的攤子旁，經媒體及在場人士的轉述，疑似遭警方言語挑釁、諷刺後，當場心臟病突發倒地不起，過幾天我們的伙伴李丹鳳接到一通電話，問她認不認識朱世紀先生，是什麼關係，並告知她朱先生已過世的消息，丹鳳立即告知我這個訊息，我還半信半疑的說會不會是情治單位來套話的，丹鳳說「對方說在朱世紀老伯的筆記上有我的電話號碼，所以對方打來問」。丹鳳是在倒扁運動期間火大行動主要輪值者，經常與朱世紀老伯聊天，後來老伯有留下丹鳳的電話。三月初在媒體的報導下證實了朱世紀先生的死訊，鄭老師在飛碟電台的節目也對此發表過評論。

¹⁴⁷ 有關採取暴力路線的定調與執行過程，運動社群內反對意見並沒有形成焦點式的內部辯論，只有在行動過程中運動同志吳永毅曾以內部文件表示過不同意，陳柏偉在關係中間接表示過質疑，他們的論點基本上有三層：1.我們恐淪為邊緣性的處境。2.暴力論與運動進程(群眾)的落差。3.運動上的倫理問題，自己拉一場運動主導。(吳永毅回應團體一文—與暴力路線的關係之狀態，2006.10.31)

則這場運動終究還是走向「政客大贏、人民大輸」的結局罷了。(賴香伶，2006)

在 2009 年 10.10 紅衫軍「天下圍攻」之後，我寫下了第二篇投書「政客大贏，人民大輸？」，因為在當天接近 20 小時的徹夜抵抗中，我與二百多位群眾一同佔據忠孝東路不接受指揮總部的命令，決定留在原地，看政府準備怎麼處理我們這群人。在 10.11 凌晨四點左右，上千警力開始出動進行驅離，大伙再回到台北火車站前時已是早上七時，忠孝東路上車水馬龍，前一夜的警民對待只留在電視畫面中，疲累不堪的紅衫軍們在一旁或坐或臥，氣勢衰去大半。

8.2.1 步調不一的倒扁指揮系統

10 月 10 日下午我們與群眾談到下午五點，散場後有些人決定參與反貪總部未經申請的遊行，有些人離開了。我聽著指揮車上傳出的訊息「我們不走了，留下來，待在原地」，趕忙到人群中了解狀況，這場無申請的遊行算是拉高情勢的招術，準備讓人群自然溢出後看警方如何處理，在警方的介入下很快的火車站前的忠孝東路讓出了一個車道，沒想到人越聚越多，到晚上七時左靠近中山北路到重慶北路間的忠孝東路段雙向車道都讓出來了，群眾情緒更為激昂，紛紛打起手機呼朋引伴。

這時的指揮是由簡錫堦主持，整個隊伍的調度也從站前廣場移到了忠孝東路上，「不走了，把忠孝東路佔下來」指揮車激昂的喊著，不一會整個人潮佈滿了車道及兩旁的人行道，一度有要突破警方的限制往凱道挺進的趨勢，此時在現場遲遲未見著施明德，同一時間不少在電視旁的同志打電話告知我最新的訊息，一會說是把要隊伍帶回凱道，一會又說施明德正在與馬英九協調…，但現場群眾是聽指揮車的，「不走了」、「回凱道」只要有人主張往前越進，人潮就像水銀一般的流向前去，有幾波試圖突破警力包圍直往館前路衝去的人群，因為沒有指揮車的強力調度，幾波突圍都無功而返，但這一試探警方的近逼、清場動作也越發明顯。

時間逼近晚上十一時，簡錫堦調度的指揮系統仍在持續加溫，「待在原地，不要走」，眾人被這清楚的指令所吸引，紛紛席地佔位子、討論氣氛熱烈；但這時傳出施明德與馬英九已達成協議，到十二時就會淨空一個車道出來，但人群眾多現場的指揮調度該如取捨？群眾可能否決施明德的意見，自行決定就地戰鬥嗎？我們火大行動人數才約十五人，大家沒有太多討論就一直留在原地不準備離開，有些激進群眾也陸續坐下來排成一排排的隊形，期間有一位倒扁總部的年青人出來，借大聲公給我們用，但一會又有人出來搶走了大聲公，來來回回的拉扯

群眾情緒更不耐煩了。這時，指揮車傳來政客李新、李永萍¹⁴⁸等人的聲音，「請大家配合指揮，移到一個車道上」，群眾回嗆「不要走、不要走」，兩車道間群眾在對罵、叫囂，一會罵聲停了，或許是基於長久以來的積怨及某種默契，我們這些留在車道上的人(六台警備車，約 200 人)不再出聲了，聽著指揮車斥責似的呼喊、看著隔壁車道上群眾的猶豫，前方近千名的鎮暴警察已準備就緒，我們唱著「團結就是力量」，手挽著手倒臥在地上，沒有人起身離開。

這些鼓動姿態是從指揮系統發出的訊息，如果還是暖身就不要說「今夜不走了」、「你們怕不怕」，當群眾拚命發簡訊出去時，就已是行動的開始；當指揮高喊午夜由群眾公投是否留在原地時，決策權就已經交給群眾了；當施明德站上指揮車要求讓出四個車道時，群眾內部就開始產生議論與衝突了；當政客們準備撇清二種群眾時，部分群眾心理就清楚了，彼此心照不宣的就地靜坐、周遭圍觀的人因害怕而大聲鼓譟，希望施明德出來解決，大聲斥責馬英九不仁，但最重要的是靜坐群眾中沒有政治明星伺機加入，只有百餘位政治公民的團結歌聲。(賴香伶，2006 年 10 月 12 日蘋果日報)

10 月 11 日清晨四時左右我們被警方架離了，指揮車上還是一再的重申「理性、和平」。其實，當時在現場的人都感覺到指揮中心起了內鬨¹⁴⁹（當晚傳出施明德與馬英九見面，決定過午夜就撤離，但在晚上約十一時簡錫堃在宣傳車上捉麥克風，呼籲更多人到現場支援，不能散掉、佔領路面），甚至有一度沒有任何人出來指揮，任由群眾自由散去，但不走的群眾越來越多。我們這一群人沒有人帶頭指揮，大家就是席地而坐，身旁圍觀者不時問「你們為何不退到火車站前廣場，在那邊一樣可以繼續抗爭啊」，我心想總部透過電視動員群眾到現場來癱瘓忠孝東路，現在沒有半個人要出來扛責任，就說這群人是「破壞份子」，一邊協商一邊耍弄群眾，這時如果群眾都聽話撤退，不是全輸了嗎。不能讓政客全撈光！

8.2.2 公民自主性的「實體」再現

重新理解我在紅衫軍運動期間的強烈動能，細想應與 2004 年總統大選後身處藍軍集結的抗議場中，對於自己隱藏運動性的壓抑有關。當時做為「廢票運動」

¹⁴⁸此間的領導指揮已由藍營的政治人物接手，簡錫堃也已不在現場調度；有一說是施明德覺得這些群眾是藍軍，由藍營自己去收拾善後。

¹⁴⁹倒扁總部指揮之一莊嚴回憶 9.15 至 10.10 的行動「…昨天還聽到盛治仁在電視上講，我們是非暴力、愛和平的抗爭，所以我們要完全合法。這真是完全不瞭解、完全的扭曲啊！原本 10 月 10 日我們已經決議就是要在忠孝西路上坐下來，癱瘓台北市的交通，我們就是要去試探統治階級的底線在哪裡。就是要走在這種法律的邊緣嘛！這樣才能知道統治階級要用什麼方式來對付我們，是要驅離、柔性勸離……還是怎麼樣？那時候我們人夠多，簡和我就可以號召我們的先鋒隊，把拒馬先推一寸，看警察怎麼回應；要是不回應，就再得寸進尺。我們的手段可以是和平的，但要去挑戰統治者的底線。結果 915 沒做，1010 又沒做，每次號召那麼多人上街頭幹嘛？」(公民不服從運動座談會記錄，2006 年 10 月 14 日)

的主要執行者，對選後的藍綠政權爭奪持著冷眼旁觀的心態，對街頭群眾的行動卻充滿期待，經常穿梭在黑壓壓的人群中，無法表露自己的立場也極少與人對話，只有學生發起「孤挺花學運」時才有一些意見參與；當 2006 年紅衫軍運動開始集結時，一開始我對群眾反應出的熱烈情緒還是以藍綠的視框看待，沒有新的見解，後來抱著姑且一試的想法進場，在認同鄭老師挑起的「暴力路線」爭論刺激下，「不放棄使用暴力」但把自己的身體卡在貫徹「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行動中，經驗了一個積極的參與者該領受到的權力關係也學到所謂「自主性」的抵抗意義，不論是對峙國家機器還是運動中的領導權威，對我來說清楚經驗到了公民自主性的「實體」經驗。

「實體」指的是公民參與政治行動的經驗層次，在主事者設定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論述框架中，不論原初帶著何種的政治認同或意圖，個體的政治性受著多數同意(一百元／授權／被領導)的權力關係而轉為共有的認同，這個認同又在參與過程中與現實感知快速對話著，即是「個體」與「集體」間的辨證轉化階段，只是這個過程非屬一公開、共同確認的歷程。而當我們採取不同於多數認同的「暴力路線」在場中產生了差異與張力的效果時，個體的政治性(我們)與集體共有的認同(他們)間形成一組對照性的視框，個體性的立場、面貌與集體的共有認同發生了意識上的「交涉」，只是這種「介入」(行動)形式在力量對比及領導關係(正當性)充份確立的客觀條件中，移動中的認知無法直接對話，沒有形成「量變」到「質變」的壓力，最終我們淪為邊緣性的小群。

隨著運動局勢的變化，群眾從熱切參與到逐漸積不耐，個體間突破了舊有的認知模式，中產生了身體與意識上的解離過程。我們的火大行動雖只結識了少數群眾，經過幾次電訪與對話，可理解他們對街頭運動所持的看法，「速戰速決」最好，「如果不成功，也只好這樣了」；可是我們這些決定撐到最後一夜被驅離的群眾卻不是火大行動的群眾，大半是參與過 2004 年藍軍抗爭的群眾(聊天中知道他們有些自稱是新黨的支持者、歷經黨外運動的邊緣人、有些則自稱是天使隊的成員)，相較於我們，「他們」背後也帶著不同的經驗進場，在 2004 年「要真相」一戰沒有任何成果，反被定性為暴民、黑衣人、國旗隊，就已對當時藍營的領導者十分不滿。當 2006 年施明德號召紅衫軍時，他們雖是百萬成員之一，仍有著自己搞的動能、企圖，當時有媒體評論紅衫軍運動是「綠頭藍身」，但這個「藍身」也已有了分裂與重組的成份了，他們對社會運動未必全然投入，但在紅衫軍一役中他們未接受領導者的要求，對政治人物也不再全然寄望，在「行動中改變」是我在紅衫軍運動中確認公民自主性的重大發現。

8.2.3 實質民主的展現

紅衫軍運動的出現有其歷史時機，如指揮者之一莊嚴的描述「這一次之所以

可以集結那麼多人，最簡單的說法就是這些人積怨六年，又看準了在野黨軟弱無能，所以這些自主公民無處宣洩。這時候剛好有一個施明德把他本來要在選舉中玩的遊戲，沒玩到，現在拿到這裡玩，就這樣起來了。」(莊嚴，2006.10.14 座談會發言)。人民積怨已久，情緒無處宣洩；我從親自參與的過程，一部份同意群眾動能的累積，另一部份還是著眼於此政治性運動對「公民自主」¹⁵⁰意識改變的關係。

我還是覺得運動使人意識產生變化的過程是快速、直接與清晰的。一是紅衫軍運動領導者看準時機以「不合作／不服從」的抵抗意識開啓運動，接上了許多公民在 2004 年至 2006 年間對當政者不滿的情緒，加上此情緒從檢視政治人物的政治道德到社會道德的喪失，更多婦女朋友走上街頭(陳宜中，2007：56-57)、與過去社會運動中特定群眾的現身有不同的政治性。在政黨政治的各種機制已無法保全「民主」真意時，人民不再寄望在野陣營的監督，期間各式以第三勢力自居的政治人物——從發動罷免到政治頭人的合縱連橫(李登輝、施明德、許信良或新民主黨的宋楚瑜情楚嗅到此政治動能)，均有接收新的群眾或從藍陣營分解出來的激進群眾，因此，在街頭(體制外)主攻的政治壓力，到立法／司法(體制內)的跟進策略交錯下，在野黨將紅衫軍視為奪權的助力，各式街頭場外的協商、交涉、細密佈局規畫中，群眾們已有了一次受騙的經驗，在一聲聲「不要退、留下來」的聲音中打掉了政治利益的交換、領導者的盤算，這是公民「主體」意識的浮現與實質作用。

在公民不服從的行為上，沒有什麼政黨、什麼組織可以命令別人，命令一個運動的主體選擇去做什麼事情，同樣也不能要他不去做任何事。因此，10月10日當天，在忠孝西路上的人，是作為運動主體自己願意被搬，他們做一個選擇。這不是聽施明德的命令，所以隔天施還在那裡道歉什麼！為什麼我被搬，你要道歉？那我的主體在哪裡？(丘延亮，2006)

從「實質民主」的意涵來看待紅衫軍表現出的自主性：其一，群眾們非在屬意某特定政黨才被動員集結，公民的「自主性」是相對於解構了藍綠的政治佈署與國族認同，以社會正義的公民意識為前導，對統治者、統治正當性的質疑；過程中公民展現的抵抗性（不合作／不服從）同時挑戰了運動內部及政治結構的外

¹⁵⁰ 《新國際》辦公室於 2006 年 10 月 14 日舉辦的「公民不服從」討論會，主要對話者蔡建仁與丘延亮及紅衫軍副總指揮莊嚴的發言論點可以看出幾個定性上的差異。蔡建仁不認同此為公民主體性的運動，頂多是一轟而散國民激情聚合，以行使他們認知的權利與義務而已；真要是公民不服從應是來的民眾要有內部的有機連結，代表什麼會、什麼團而來，不是 Mass 的散眾。公民社會要從絲結成線，由線變成繩，然後再結成索，這樣才有力量。丘延亮則以「自主公民是自己造成自己的公民，是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事情。他們是一個集體(collective)，但不一定是組織，不一定是什麼協會，不是什麼組織、協會給他的命令，而是他自己願意成為集體的一部份，參與其中」(丘延亮，2006)

部領導關係，只是對政治結構的外部認同上非此運動的主要矛盾。

其二，就認知群眾或我自身的「自主性」，在歷經了 2004 到 2006 二次運動經驗中，所謂的「自主性」得從台灣政治民主化進程，不同階段的人民反抗運動所存有的政治歷史時空來對照。如戒嚴時期以掙脫威權宰制下的思想及行為控制而形成的黨外運動力量，群眾反抗的是族群、階級的雙重壓迫，台灣人意識亦有「當家作主」民族／主的政治目標，多數底層群眾推動了台灣資產階級的政治民主化，此自主意識匯聚以黨外政治勢力的成長與進入體制中，政黨政治的權力競逐形式確定後，群眾的自主性漸形退居為政治認同的追隨，期許台灣人獨立自主的群眾在一次次選舉的策略操作中，沒有奪得革命性的主導位置，自主性被政治信仰所綁架、弱化。

政黨輪替後更為劇烈的族群／省籍分化、動員，偏狹的身份政治與資產階級式的民主價值出現了統合上的矛盾，信仰者／普遍公民在政治意識上認識「國家」的保守性，人民基於追求道德式或民主性的國家，得以從藍綠政治挾擊的隙縫中燃起公民(國家主人)的主體意識，此間的自主性亦是相對於鬆解中保守性而來，不一定是具有解放意識的自主性。我認為紅衫軍運動對群眾挑戰國家霸權並意圖奪取主導權的抵抗意識讓公民的自主性在運動中被繼續檢證、理解。

第三節 罷免行動—在地公民的組織

其實在紅衫軍運動期間，我們火大行動還有另一支行動在醞釀著，與紅衫軍行動的關係是與其所主張的「遍地開花」¹⁵¹引發的刺激有關。

2006 年 9 月份基隆火盟辦公室即著手規畫「在地戰鬥」—反貪腐，從「台灣頭」做起的行動。由於政治上反扁、倒扁的氣勢正旺，一些地方政治人物的貪瀆事件也備受媒體關注，期間基隆市長許財利因公車購地案被檢方起訴，引發人民對藍綠兩黨互咬貪腐卻都輕放自己人的不滿，我們因為在基隆地區以倉儲運輸工會集結出的一支自主工運力量，不少對階級政治已有認識的工會幹部在行動上能跨出廠場及勞資個別利益往公共政策發聲、行動，因此，在紅衫軍抗爭時我們就主動找幹部們討論在地方上發動罷免基隆市長的行動評估。

8.3.1 反貪罷「許」！火大行動的在地經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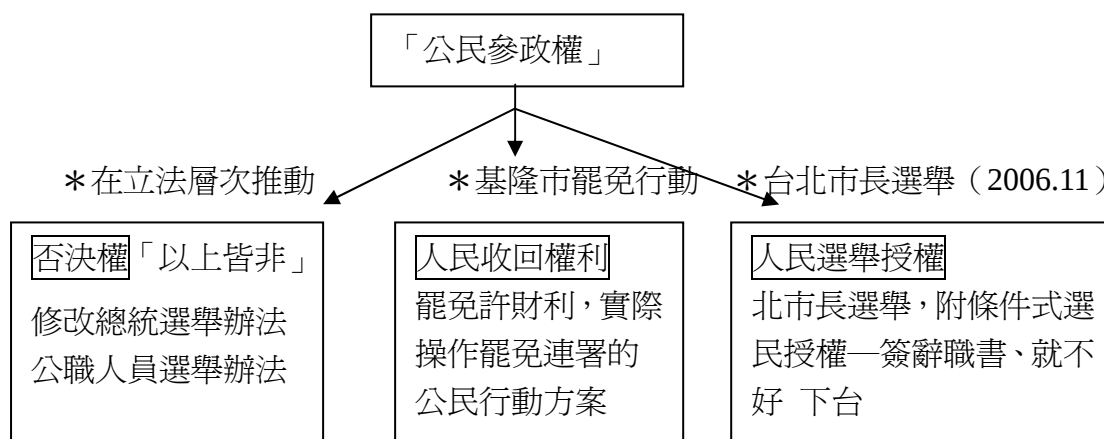
¹⁵¹ 2006 年 9.29 倒扁總部發起「環島遍地開花」行動，由總指揮施明德率隊啓程出發，進行到 10 月 9 日。

「為什麼要罷免許財利？人家都說工委會不搞工運了，一天到晚要基層會員來搞政治，廢票就已經被罵的臭頭了，還要在地方上搞這攤，穩死的」，基隆市失協幹部小精靈邊開會邊罵道。但他可是幹部群中曾參與黨外運動的狂熱份子，因為罷工才結識我們，自此就一頭栽進工運十幾年，在 2003 年公投綁大選時在民進黨部前把黨證剪掉，以示抗議、廢票運動時還擔任廢票副總統的角色，號召底層人民投廢票。對於他直言批評罷免行動，應該不是說著玩的。

我以「倉運聯的轉型」試著與小精靈溝通：「雖在地方政治生態及無勢可藉的狀態中很難搞到 5800 人的罷免提議人門檻，或可能最後變成 2005 年「人民老大」參選時內部(指倉運聯幹部的反應)感到挫敗、組織又賠上不利後果，但在評估利弊後，可以在過程中面對不利後果進行先前的預防與調整，試著推動看看。」(香伶筆記，2006.10.18 跨組會議討論方向)這個說法一開始就被小精靈的「穩死的」潑了冷水，我沒有進入理解他所指的「穩死的」，以為只要能與會員清楚溝通應可化解阻力，但到底「穩死的」指的是什麼？經過來回的釐清與對話，我才意識到這個行動具有的潛在威脅性，在沒有特殊政治背景、實力的依恃下，靠工會、社運團體在要地方上搞政治，而且還是搞「罷免」當政者，沒有三兩三，豈敢上梁山？

8.3.1.1 浮現一個真實的「落差」

看著 2006.10.18 我做的「反貪罷許」會議筆記，我的認知框架中沒有進入幹部們的在地政治現實，而產生了一個處境上的「落差」。當時我在思考「罷許」行動時有二個軸線，一是想知道基隆市民對市長貪瀆事件的反應，藉著連署「罷免」的公開合法形式，工會幹部可以與會員對話或與社區友人、陌生群眾等接觸，算是從工會政治轉向公民領域的嚐試與學習(政治化轉型的一種想像)；其二則是想把人民老大運動(參考第八章)的公民行動藉此往前累積經驗，做為對當時在政治上社群間可連結的共同行動，我當時的思考架構如下：



這個思考架構與小精靈口中所說的「穩死的」有關嗎？最直接的關係是，這個運動思考的脈絡對工會組織的發展不具「內在合理性」，頂多是工會受到運動團體的介入／牽動，以間接「相挺」的關係讓我們進到工會內與會員溝通、互動，而這個行動是直接訴者政治制度的「選制改革」，要能捲動工會的動能(即使工委會與倉運聯是長期的運動盟友)，還得在內容上轉許多彎才能扣住工會與政治體制的關係，更不用說對其它工會能更是不得其門而入(台灣工會組織談到與政治有關的議題一如：參選、廢票等，即選擇不碰或不表態)；但就社運上工會與政治的關係是最有條件從階級處境與政治改革產生共鳴的場域，我期待的「從工會政治轉向公民領域的嚐試與學習」即是把工會當作是階級公民的實踐場域，看看罷許的公民政治行動可否在此展開。

工會的結構性侷限我清楚，才會主觀期待資深工會幹部們可以發揮牽動的作用，讓公民政治的在地戰鬥從倉運聯轉型的脈絡中發展，只是沒想到小精靈的吐槽及之後最堅實的戰友—阿賢（時任倉運聯理長），進退反覆的行動，我才面對這場「罷免」行動對幹部們來說是「知易行難」。要在熟悉的地方政治態上搞奪權，比起幹部們在工會中搞罷工、嗆政府「難」，因為所有人情壓力來自於左鄰右舍、街頭巷尾間，狠一點的是黑道上門放話(政治勢力中的私家保全)，壓力不小。

8.3.1.2 阿賢：「你們不住在這裡！」

在我們發動罷免基隆市長許財利的過程中，整個倒扁運動尚未結束，在紅衫軍發起遍地開花期間，基隆市長許財利的貪瀆案件一再被提起，馬英九當時是國民黨主席，在社會輿論與國民黨內部世代權力交鋒的爭鬥中，罷免基隆市長的聲音除了民進黨有所行動外，國民黨內的青壯派—「五六七聯盟」亦曾到基隆嗆聲要罷免許財利，我們在此時敏感時機進場，搭了一小段順風車，卻也被地方政治勢力盯上，特別在國民黨不同派系間引發里長間的互嗆事件中，透過媒體的大肆報導，地方黑道互毆事件公開浮上抬面。

這些地方派系、樁腳現身的動作可以解讀為國民黨內部權力卡位的爭鬥，但也真實透露了各種利益關係盤結的網絡；我們藉勢加緊宣傳工作，但就在罷免理由書已印製完成，一群人也利用週末到基隆市公車循環站進行連署後，領銜者之一張通賢¹⁵²卻正式提出要退出罷免提案的行動，並希望到場的人有誰願意扛下這個擔子。

¹⁵²三位工運同志列為提案領銜者—王耀梓、張通賢、郭清圳，這三位論工運資歷與政治認識有相當的代表性，經過會議討論後決定由他們三位在地公民銜罷免案。

一聽到阿賢的提議，大家都錯鄂不已，不知為何在推動一個月後他才提出，紛紛站以運動目標與義理層次說服他，在大家的關切下，阿賢一臉嚴肅，一語不發，猶豫許久後他說：「你們講的這些我都知道，我也很不願意這樣做，我考慮了很久還是要說出來。你們又不住在這裡，是我要面對這些鄰里街坊，而且我的表哥、叔伯都與許財利相識，此人地方關係作的那麼深，我叔伯已經來關切了，那天他們用黑道來搞我，你們要一起扛嗎？我自認沒有準備好，我要退出領銜者，連署就好。」(約是 11 月 10 日前後某次工作會議中的談話筆記，賴香伶，2006)

在阿賢吐露的一字一句中，我最先聽到的是「你們」與「我」的差異位子。確實，我所認識的阿賢，爲了運動目標的推進一定是先扛下擔子再說，但是一個多月來他內心的焦慮與不安，不到他不忍受不了，是不會輕易表露的。聽完他說自己沒有準備好時，我是挫折的，因爲阿賢在工運中打滾了十幾年，基隆志信工會罷工沒有打垮他，不畏老板與黑道的威脅，扛下工會存亡的最後一役，工會弟兄認這個大哥；大風大浪都走過來了，這次領導「罷許」的壓力會比之前的罷工來的吃重嗎？還是工會的仗不得不硬挺下去，因爲是生死交關，而公民政治行動別人來帶頭，不行嗎？來不及進到他的內在焦慮，我當時想的是“如果對方真用到黑道來堵我們，表示運動有搞起來，這不是我們要的嗎？”，可是話到嘴邊就停了，因爲「你們不住在這裡」。

被將住事小，但如何與阿賢吐露的黑道恐懼(焦慮)對話，是得認真面對的，因爲這個焦慮的訊息不是只有阿賢，之前小精靈的「穩死的」不就是有同樣的意味嗎？果然，在聽到阿賢吐實後，小精靈不假思索的立即應聲說他也不搞了，原因是他的工作環境就是整天與一些地方角頭、大哥、小弟在一起(小精靈當時從事殯葬業，就他的描述，光搶屍體就得打一架，上面沒人罩著，不可能搞這行)，罷免的訊息已經傳開了，現在是不成氣候，萬一真的被我們搞起來，那鐵定吃不完兜著走，阿賢的擔心他也清楚，但他是爲了挺這個大哥才一起“撩”下去的。

雖然我是外來者，在地方上沒有要面對的複雜關係，可是因爲當時媒體一再播放地方里長間的對街互嗆畫面，阿賢看在眼裡並非杞人憂天，尤其他們對許財利的出身背景及做事風格十分了解，加上叔伯親友的關切，他更意識此事不單純，而搞運動的大家沒有足夠的經驗應付黑道(如被打、有人被恐嚇該如何處理)，他的猶豫、焦慮到行動上的卻步，我雖對“黑道要脅”有所保留，但在另一組利害關係出現後我才比較理解阿賢的擔心。

8.3.1.3 基隆市總工會來說項

繼地方里長們的表態、互嗆風波暫歇後，各式社會關係的拉扯也隨之而來，

基隆市總工會在第一時間即發出聲明稿給基層工會，以歷年來最照顧基層勞工的市長來力挺許財利，市總工會幹部亦主動連絡阿賢說要來拜會倉運聯，希望我們等判決出來再發動連署也不遲，明的、暗的都是要我們停止罷免連署。這個工會圈的政治動作讓阿賢的疑慮更加深，在一次會議中他把這個邀約交由大家決定，經過討論後我們決定赴約，藉此了解基隆市總工會在地方政治中扮演的角色，當然，這個會談阿賢沒有出席，由我及王耀梓、王秋月一同前往。

過程中我們質疑基隆市總工會代表工人集體卻放掉監督市長的責任，主動為其說項，一來一往的對話交鋒中，知道基隆市政府撥給總工會的利頭不少，從經營勞工育樂中心的業務到勞教補助款…等，這些就是他們文宣上所說的對勞工照顧有加，聽在我們耳中不就是政治綁樁與工會頭人分到的利益嘛！何必藉所有勞工之名，幫其主子護航，這種說辭根本無法說服我們。在這次的交手之後，大家的連署信心又提高了些，在技術上我們也做些調整，因為，依選罷法規定在提案期間不需要三位領銜者的姓名；二是此案有國民黨、民進黨的地方支部也在串聯，我們把三位領銜者的名字拿掉，重印許多的連署書，阿賢的參與方式也有了調整。

從阿賢的「你們不住在這裡」，我看到了一個資深運動者誠實面對自我的掙扎與勇氣。在複雜的地方政治生態中，即使理念上知道要對抗體制，但就政治上、經濟上、勞資關係上的“弱勢者”（包括集體），在此既存體制中要如何生存、行動，對政治的恐懼是非常內隱的。二年後我再訪問阿賢，請他回想當時的焦憂與恐懼，他說「…敵暗我明、友敵難分你知道嗎！與工會罷工不一樣，老板會出什麼招我清楚，用肉身去擋黑道也知道是怎麼回事；但政治是無法預估的，尤其靠許財利吃穿的人有多少，對著我來還好，如果是對著其它人，警示性的，我們有準備嗎？我當時說不出口的是這個，萬一其它人出事，我會…不捨…」(2009.12.7 訪談阿賢)

面對「政治恐懼」的內在壓力，阿賢帶著十幾年在工運中用肉身（勞動）搏鬥長出的階級性及對現實政治難測的不安，一個工運幹部要在集體中頂上領導的位子(時任倉運聯理事長、台北縣聯結車職業工會常務理事)，又得在強度勞動中掙口飯吃(阿賢是一位聯結車司機，做一休一)，他的實踐歷程比我來得辛苦，過去我不曾意識到這個強悍身軀下有著不甘表露的無助或徬徨，反而在這次與主流政治廝殺(庖根，阿賢的用語)的過程中，得以有機會重新認識我的運動同志，也因著他的表露讓每個參與者得以內視自己與懼怕的關係，特別是我這個用「理念」想政治的「外地人」。

8.3.2 「外地人」的在地政治學

為推動罷免基隆市長許財利的公民連署，我與郭發財(財哥，倉運聯常務理事)、王秋月(倉運聯總幹事)到各基層工會進行說明，在預知高門檻(5800 人)難以達成的情況下，我們的說明主軸以工會會員監督工會幹部的經驗連結上公民對政治人物亦有監督的權力，邀請會員加入罷免許市長的連署及協助我們進到社區中推動此事。

8.3.2.1 工會幹部對罷許案的反應

一般會員的直接反應以為是紅衫軍運動，但經過我們的說明後倒是可以區別反貪倒扁與罷許的差異，最大的差別是我們以體制內的手段進行基層民主的教育與階級上的政治認知，就藍綠執政下的各縣市長、民代因貪瀆被起訴者的具體證據¹⁵³來檢視政治人物，尤其基隆市長是馬英九(時任國民黨主席)強力背書下贏得選舉的，選上之後基隆市民拿他們沒辦法，罷免連署是行使公民的政治權力，如果「不藍不綠」的公民不站出來，投機政客就可以繼續漁肉鄉民。我們的罷許文宣上寫道：「國民黨成為在野黨之後真的洗心革面了嗎？去年縣市長選舉時賄選傳聞不斷，「馬利兄弟」的宣傳拉抬了基隆市長許財利的選情，讓他順利連任市長，然而，上任不到一年，今年九月，卻因為公車處購地弊案，被基隆地方法院依貪污治罪條例一審判決七年有期徒刑，國民黨雖已立即開除其黨籍，馬英九也出面致歉，但是，所有動作只是作道德呼籲，要他請辭。試問：一個得到權勢的既得利益者，有可能自行下台嗎？」(2006.10.5，工委會罷許文宣稿)

我們採取一貫藍綠都批的論述與行動，讓許多各擁藍綠的工會會員不甚認同，但他們也很難反駁，只會在私底下批評我們，小精靈說的「工委會都在搞政治，不搞工會了」，「穩死的」就是指他在基層聽到的不滿。比起許多大型工會團體在政治上不表態，或明知無效但仍以壓寶方式代替批判兩黨的作為，好換取必要時的靠山，倉運聯從 1992 年成立，歷經了大大小小的反私有化抗爭，面對台北港的競爭及貨櫃產業量驟減的不利結構，對藍綠立委們只做表面功夫非常清楚，然而在地方上搞罷許卻不純然是理性的政治認識而已，倉運聯的會員八成都是在地居民，與地方上的政治人物、政黨週邊社團有遠近不同的關係，搞罷許是與綿密的地方勢力交手，拿既得利益者開刀，這不是理念之爭，是分敵友、亮招牌的「政治」。

果然在行動推展後不少的反對聲音開始出現，每次工作會議都得評估對倉運

¹⁵³2006 年的貪腐弊案，從陳水扁總統國務機要費案、馬英九的首長特支費，陳哲男、郭瑤琪貪污收賄等弊案。到基隆市長許財利、新竹縣長鄭永金等因圖利、貪瀆遭司法起訴、判決。據統計去年全台 309 位鄉鎮市長中，有 45 人因工程弊案或買票賄選遭到調查。(聯合報，2006)

聯這個組織的具體影響(指的是早已受產業結構改變而會員人數驟減¹⁵⁴)，此壓力都集中在阿賢及秋月(時任倉運聯總幹事)的身上，他們的態度會決定該運動與組織發展的關係，是藉此議題往下做教育及讓會員提早面對組織困境，共同尋找「轉進」的出路，還是另辟戰場，培養積極工會幹部成為運動者，在地方政治上發展藍綠之外的新的公民政治團體？

這是個相當嚴肅的課題，我考慮的不只是倉運聯的轉型，更直接的壓力是來自於我的運動位子——工委會。工委會與倉運聯遭遇到的困境與大環境的產業結構變化有關；勞動彈性化（外包、派遣）、自由化（如碼頭民營化政策）等造成不少藍領、民營工會的瓦解，自主工運對抗資本外移、工作權不保的能量快速消弱，對我而言找尋出路不只是倉聯運而是有著雙重任務的。可是就單以倉運聯試圖在結構上進行翻轉的抗爭歷程¹⁵⁵，之後以「台北縣聯結車職業工會」及「基隆失業勞工保護協會」來承接部份離退及失業的邊緣性工人，這兩個組織的生成意謂著產業結構調整下組織的相應「調整」，然而，這樣的調整速度與發展終究敵不過政治經濟情勢的變化，在「台北港」¹⁵⁶開始營運、基隆港轉為休憩觀光碼頭的政策下，現在的倉運聯只剩下六家較大型跨國資本的基層工會，普遍會員在屆齡退休的保全心態下，自然不希望聯合會的任何激進行動對工作權產生威脅。

8.3.2.2 可將沈重化輕盈嗎？

知道運動推展上可能的「不利後果」，也準備要面對基層，在罷許行動展開一個月後的會議上我們又重新對話「到底在此『時機』推動『公民連署』能做到政治上的『突破』(倉運聯轉型、公民政治組織)嗎？」。這個提問是對著「倉運聯組織轉型」而生的，一開始大家各抒己見，正／反意見都有，我因為在工作位子上不在其緊密關係中的「內部」但是有運動上的「外部」連繫，以某種「距離」協助釐清差異；在當時的焦著中我看著阿賢、秋月的沈重與疲累，我提了一個思考的軸線(當然也是對自己)，「這次的行動，可以不負擔重重的任務，將此沈重（任務目標）化做輕盈嗎？」(2006.11.11，罷許行動小組會議記錄)。

¹⁵⁴倉運聯自全盛期 3000 多人，至今僅餘 540 多人左右，期間除此行業資方以外包方式、優惠資遣方式進行有計畫裁員外，倉運聯作為一個行業聯合會都很難抵擋外包政策，會員一個一個被逼出穩定就業市場，轉為彈性的契約工、或表面當老闆實質更被剝削的個人車主，這樣的勞動位置是港口自由化政策下的犧牲品。(張通賢，2006)

¹⁵⁵民國 85 年起倉儲運輸業因櫃量減少而開始業者惡性競價，業者為惡性競價搶食貨源，開始以外包政策（或以經營改革之名）節省人事成本，運輸業首先發難，偉聯運輸工會在倉運聯協助下，為阻擋外包政策召開大會通過罷工案。志信工會罷工、太古運輸、台聯工會等相繼罷工、廣欣司機鎖場罷工等(民 84-90 年間)；在勞動條件下降方面有志信、偉聯、台聯、長春等工會的勞動條件爭議案，這一串的反外包抗爭、罷工即是反應了倉運聯(以「碼頭二線工人」的組織為主)在產業結構上的不利處境(2006.12.3 倉運聯代表勞教資料，張通賢報告)

¹⁵⁶李登輝主政時期開放長榮集團在淡水興建台北港，對基隆港造成貨源運輸倉儲等業務的衝擊，台北港於 2007 年開始營運。

這個提問不只對賢哥或秋月還有在基隆的組織者王醒之、何燕堂，我在工委會面對運動的困境，已試著把層疊擠壓在運動者身上的重擔—理性(主觀)上確實「該」承擔組織轉型的「任務」一移開，真實面對運動的侷限與可能的出路。以反方意見的陳述—「罷許不是一個好推的議題，可找另一更貼近基層的議題重新運作，不急著推」，意思是：「倉運聯維持現況，推下去的反彈／質疑此時沒有條件轉化，對轉型未必有利」；而正方的意見是「企圖突破現況，即使會付出組織加速瓦解的代價，對漸失運動性的現況不想再繼續下去，罷許確實不好推，但好推的議題輪不到我們」，這兩種看法沒什麼對錯，都是著眼於組織轉進時與基層會員的關係。

我的看法是「轉型」不會在一時之間發生，基層也不會因罷許案而提早選擇脫離倉運聯，因為在倉儲業界的資方團體對倉運聯還是有所顧忌，不會隨意更動勞動條件，基層工會也知道只要出事，倉運聯還是會出面擋在前面，這個利害算不會讓倉運聯組織立即瓦解。既然清楚了內在的動力平衡關係，組織者何不勢轉動自身，以過去在工運上打下的基礎，試著磨練組織在地公民的身手，對想做／所能的事具體去實踐，以轉化工人的政治意識為目標，暫時放下組織轉型的「沈重」任務，不被原先設定的目標綁住，我指的「輕盈」不是工作上挑輕鬆的做，而是自我狀態的解放，做我們做得到的，全力以赴。

8.3.2.3 火大公民行動了

既然要在地方上被看見及被辨認，原來發動罷免連署的三個組織(工委會、倉運聯、失協)改以新的名稱出現，同時讓非工會的市民朋友有機會加入，在幾次的討論會中我們以「拿回公民的政治權力、不藍不綠、社會運動等視框進行自我定位，最後基隆市「自主公民火大行動聯盟」¹⁵⁷名稱終於敲定，在組織面貌上的重構，除了與即有政治勢力做區隔外，更希望能結合到不藍不綠的市民認識我們，更重要的是在行動中轉化即有的工會群眾加入這支運動隊伍。

基隆地方政治因罷許案引發的風波，自主公民運動空間慢慢出現，各方對「馬利兄弟、品質保證」¹⁵⁸的背書大做文章。貪瀆案暴發後，國民黨部的處理態度消極，馬英九在社會輿論及政黨鬥爭的壓力下最後以主動開除許財利黨籍進行切割，然而如火如荼的「陳水扁下台」紅衫軍運動，對政治人物貪腐要求更高道德

¹⁵⁷見 2006 年 12 月 27 日，火大聯盟於基隆市政府前發起「罷免許財利、基隆自主公民現身記者會」文宣及主布條，「自主公民火大行動聯盟」仍由工委會、倉運聯及基隆市失業勞工保護協會三個單位發起，倉運聯理事會亦開會通過此決議，之後的對外行動均以此名稱為主，三個單位的主要工作者亦以公民身份參與此活動，只有在新聞連絡人時會掛上單位身份。

¹⁵⁸ 2005 年縣市長選舉，劉文雄堅持參選基隆市長，與競選連任的許財利競爭。時泛綠進行整合，立法委員王拓退選，聯合共推台聯的陳建銘參選。重演分裂的泛藍對上團結的泛綠，結果在馬英九站台支持的效應下，許財利順利當選。(維基百科，2007 年基隆市長補選資料)

標準，國民黨主席馬英九的回應¹⁵⁹卻還是非常保守，此舉讓民進黨趁虛而入，升高反置動作，「民主行動聯盟」及「倒扁」總部亦都跟進，在基隆召開記者會。我們的「自主公民火大行動聯盟」亦以「反貪、倒扁、罷許」的主調，於基隆市政府前舉行「罷免許財利、基隆自主公民現身」記者會，在地方上引起不小的關注¹⁶⁰。

經過了二個多月的公民連署及論壇活動，我們除了繼續連署行動外，更進一步提出「政黨贖罪」條款¹⁶¹。對比於台面上各政黨以「自清」之名推動的反貪腐「陽光法案」(民進黨「陽光九法」、國民黨「陽光四法」)，雖然民意高漲，但立法權掌握在兩大黨手中，「陽光法案」最重要的是「溯及既往」，但兩大黨均不表態，只以「政治獻金法」進入二讀來回應民意，我們明知法案不會通過，但應提出相應的公民立場與認知，因此，在 2007 年 1 月 4 日赴兩大政黨要求簽署——「政黨贖罪條款」，突顯兩黨對改革自身的輕放。

8.3.2.4 火大公民政治經驗談

在公民政治行動展開後，我除了協同秋月到基層工會進行說明外，主要還是參與罷許小組的討論，每次都能聽到幹部們對地方政治人物的八卦，比如：「肉棟仔」就是地方上對許財利的別稱，因為他是賣豬肉出身，在地方上做人海派，從里長幹起，經營地方人脈有一套；阿賢說，肉棟仔的名言就是「做人卡贏做代誌」，真是傳神！政治人物在鄰里關係中如何「搏感情」收買人心呢？阿莉在是倉運聯基層工會的秘書，到工會工作的時間並不長，但在罷免行動中卻非常投入，她在罷許的公民論壇中寫了她生平的第一篇政治告白：

大家好：

我就是阿莉！我的身份和在場許多人一樣是基隆市公民。我本身一點政

¹⁵⁹馬英九對許財利一審被判七年案的處理態度先是開除其黨籍，在各界輿論要求許下台時，馬英九先以許會「知所進退」來間接喊話，後因親民黨亦加以施壓，馬英九才說出「許應立即辭職」重話。而許財利則表示自己沒有做錯事，不會下台，將上訴爭取清白。(2006.9.25, ET.today 政治中心綜合報導、中央通訊社)

¹⁶⁰當時倒扁反貪腐聲浪正盛，民主行動聯盟等政治團體要求許財利自行請辭下台，人民火大行動聯盟則揚言發動「反貪、倒扁、罷許」連署。(維基百科，2007 年基隆市長補選資料)

¹⁶¹自主公民火大行動聯盟，2007.1.4 赴國、民兩黨部抗議，提出「政黨贖罪條款」一反切割、反包庇、要賠款的政治性訴求：國民黨部：1. 反對國民黨切割「馬利」兄弟，卸責、便宜行事。2. 要求立即罷免因採購弊案遭起訴之新竹縣長鄭永金。3. 要求國民黨「行動中常會」到基隆召開，直接推動「罷許」。4. 要求開除基隆市黨部主委顏世一，為「罷許」不力負責。對民進黨部份：1. 反對民進黨釋憲、為扁脫罪，要求阿扁出庭面對司法，當個男子漢。2. 要求民進黨在最短時間內完成「罷許」連署門檻，還權於民。3. 未來基隆市長補選或指派，民進黨推出選應事先簽下「辭職書」，只要涉貪起訴就下台！共同性訴求：當選人後涉貪應退還中選會補助之競選費用及賠償貪污金額。2. 前項金額政黨應負連帶賠償責任。

治觀念都沒有，這就是所謂人家說的政治白痴，但我說我是比白痴還白痴的智障，為什麼這麼說呢？譬如最基本的常在電視上出現的政治人物名字都喊不出來，還常搞錯誰是誰？最離譜的是每當選舉投票總是家人、朋友囑咐我要投給誰而我就投給誰，莫名其妙就把神聖一票給糟蹋了。

有鑑於此，當我看到電視上紅衫軍圍城時的振憾（雖然我沒參加），他們用行動證明對貪腐的政府貪腐的總統做最嚴厲的抗議時，我想我能做什麼，我當時只能暗自悔恨及慚愧，因為我投了阿扁一票。回到地方上，基隆市市長許財利也因貪腐事件經一審判決起訴有罪，而我又只能暗自悔恨及慚愧，因為我又投了財利一票。各位一定想我怎麼那麼準，為什麼我選出的都是貪腐之人？買樂透也沒那麼準啊！所以我心中一直有個疑問？難道這些政府官員最初都標榜清廉的人，一旦面臨權利、地位的利誘是不是也無法克制「貪」的慾望？

有個朋友告訴我她的鄰居是許的親戚，倆人住家僅隔一條巷子，結果許家親戚門口鋪的是柏油路他們家是石頭路，多麼強烈的對比，難道市長親戚就有此特權，我們稅金又不是不用繳而且還逃不掉憑什麼大小眼啊！

有一次接到婆婆來電，說許市長住院，要我們夫妻倆買水果去醫院慰問，我問為什麼要去？她答的很認真：「妳老公當初當兵時許有包紅包給他（當時許為七堵區市議員），我要是去買他們家的肉也會偷偷塞一塊肉給我，對我們很好啊！」對於沒讀過書的婆婆，認為這是天大的恩情，而我當時聽後又好氣又好笑，我們是要選會做人的市長還是會做事的市長？心想如果選好人好事就投給他了。

施點小恩小惠就可以贏得民心，如果用這種邏輯推斷，假設市長選票只要5萬票就可當選，那他可以用此方式對5萬人施以小惠，就不用管什麼公共政策推動、市政建設。但是錢從那裡來？基隆市總工會針對貪腐事件傳真一份許市長的告白書給各基層工會，清楚寫著：「我許財利只是圖利國家的財庫給基隆市的市民我有錯嗎？」。當然最後還是拿全民的利益做為他個人功勞及各人名義上的照顧，就像馬英九拿了特支費行個人捐款同樣道理。大家幫忙替他想想，他到底錯了嗎？（反貪罷許行動說明會上，基隆市公民阿莉說出她決定採取行動的思索過程，2006.10.14，基隆信義國小校史室）

從阿莉的現身、告白及與會者熱烈的討論中，我看到了公民政治性得以出土的歷程，在工會天天面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困境及工作權的威脅，面對基隆的繁盛不在，在地公民憂心的是下一代的出路在那裡？基隆一古老的港都，從藍到綠，再由綠變成藍，歷任多少市長，無論是哪一黨，都只會在選舉時畫大餅，老百姓的日子越來越難過，底層的勞苦大眾心中的怨氣無處發，年青人越來越冷漠，而「做人卡贏做代誌」的政客邏輯，做好少數的選民服務，修好你家門前的水溝、馬路，就可以得到人心，繼續掌權搞錢，這就是台灣典型的地方政治生態，我們以一支小小的社運隊伍涉足基隆的在地政治，不敢說能成就大事，但起碼讓一般

人看到不一樣的政治思維，人人都可以像阿莉一樣向政客說「不」。

階級性的公民政治運動，即是文化領導權的霸權轉移運動。我們從召喚「不藍不綠」的自主公民投廢票、人民老大參選、「777 不滿族」街頭對話到紅衫軍、罷免許財利，實踐的場域跨出工會進到社區、市民團體、媒體¹⁶²及家庭空間，從生活經驗中談社會中的既存壓迫結構，與一般人談公民權建置的改革主張，這些轉進公民政治域的實踐與在工運中談生產關係、剩餘價值的剝削是有相同目標的，即是在資本主義社會宰制／順服結構中存活的公民(勞動者)，如何可以長出階級意識，從生活經驗中轉化政治意識，形成階級性的抵抗力量。2004 年的廢票運動後我們投入選舉及各式政治行動，提出「直接民權代議制」、「政黨贖罪條款」、操作過罷免連署及對公民投票法、集會遊行法提出修正主張，這些攸關民主政體中「拿回人民抵抗權」的行動，就是轉移／重置文化領導權之爭。

¹⁶² 火盟社群中使用文化形式進行意識形態鬥爭的團體以黑手那卡西、日日春協會的社會性展演、行動有效的穿透中產階級社群中，清楚呈現底層政治、人民作主的運動性；而在主流媒體上，鄭村棋老師於 2003 年起以左派階級觀點進行時政評論，近二年亦主持電台節目不斷的與聽眾對話，改變其觀點與政治意識，在保守、右傾的媒體生態中爭得了批判性的言論空間。

第九章 「慢政治」的進行式

2003 年廢票運動開啓了我的政治歷史回觀探究，2004 年總統大選後藍軍發動的「要真相」抗爭到 2006 紅衫軍倒扁行動，我對運動中的領導關係、群眾的政治性有更實在的理解，期間雖然我承擔了火盟、工委會轉進的焦慮與面對社群分立後「類集體」的重新整編，卻沒有減弱我的參與動能，這個動能趨使我一路參與著紅衫軍運動，從「99 行動」到「雙十圍攻」，認真的參與在不合作運動中，在最後亦越過了不合作運動的「紅線」，當時的我對紅衫軍人民運動是有高度期待的，期許這樣的人民力量可以成為社會改革的動力，不願見到希望的火苗被政客間的利益算計澆熄，當時「雙十圍攻」的那一夜，我與數百名不願撤離的群眾席地而坐，千名警察用力敲擊著盾牌前進，我是冷靜不懼怕的。經過那一次的街頭對峙，面對驅離、鎮暴警察的壓頂，國家用合法的暴力再次樹立其權威感，我們是不合作的一群、是被領導者有意放棄的暴民，但身為社會公民本來就是在各式生活制約中進到反抗的前線，街頭是體制方法無效後人民最直接的行動場，工人或它的運動主體也經常在街頭現身，我是運動者亦是公民的一份子，在更大的社運中我的身心獲得另一種解放的空間，公民主體意識由然而升。

行文至此，我以 16 年的運動經歷回觀自身政治性與慢政治的關係，探究個體政治生與集體階級力量接合相生的實踐取徑，這是台灣自主性社運生成的歷史脈絡，從實踐中累積的知識。台灣政治解嚴前後的自主工運、政黨政治的民主化轉型歷程，累積了「慢政治」與社會變革取徑之「人的意識轉化」的探究基礎，「民主」就是人民要當家作主，我們從藍綠政治結叢中撥開一條反身理解自身與他者／群間的參看路徑，這個路徑是長在廿年的自主性運動中的。

第一節 「慢政治」是一解放的探究

在第一章我提出「慢政治」的運動視框：「個體政治性與集體階級性力量接合互生的過程」，這個過程又以政治性的出土、生成為核心；以我自身的實踐歷程，政治性映照在三個層次間：

(一)知識份子的自我改造：指的是一個面貌、意識從模糊到清晰的啓蒙過程。這個過程是對立身其中的政治環境採取「逆向」思考，透過運動實踐不斷與群眾碰撞而獲致了批判性的社會意識。葛蘭西以搶奪市民社會的文化領導權，來界定知識份子的「有機性」，我以「慢政治」作為意識轉化的運動取徑，指的是知識份子不斷對峙自身，在行動（實踐）中轉化意識的「解放」過程。

(二)行動者的主體性探究。從回觀自身的政治歷史到政治性出土，是一反身性(Reflexivity) 的思考和行為活動(action)，因為台灣特殊的族群政治矛盾、藍綠政治撕殺，我在廢票運動中驚覺自身的政治歷史斷裂與空白感，當我鼓起勇氣重看父親的人生回憶，咀嚼、凝視著自身的情緒包裹，過去—當下—未來的整體情景被連貫起來(黃華新、唐禮勇，2003)，走上了解殖的階級歷史探究，與過去(父親的故事)—當下(族群矛盾)—未來(後廢票)不間斷的對話著，自此我認定自身是一清晰面貌的運動者，不是好心的讀書人、理論上的階級認同者。

(三)歷史質的「差異」再現。在社會變革的取徑中，行動者透過集體施為的參看、理解，反應出個體間的分殊差異，都有其一定的社會成因，作用回不同行動者的身上都有一定的歷史質可供辨析。「慢政治」之於「個體政治性與集體階級性力量接合互生」，即是對此一歷史質的再現空間。行動中的「我」從各種「異化」的認知中經過「對峙／反映」的過程，「解放」的政治過程得以發生，覺知「差異」就是個體與集體間的交涉互融。

9.1.1 「慢政治」行動探究的發現

釐清與理解了「慢政治」的實踐取徑與核心內涵，在最後的章節，我的論文行動¹⁶³放回與運動社群的協同探究中，以我的「意識轉變」及「政治性」生成為文本規畫了二次論壇；在一次與火盟社群中資歷較淺的組織者對話時，一位伙伴激動的說：「我雖然年紀大，但運動資歷淺，與運動的關係也還在想。這些年我一直在找一種東西，我是在眷村長大的，前幾年我參與了許多有關眷村的活動，但好像都不是我要的，直至去心理系唸書，接觸到工運的人，這麼多年來我參與了推爛蘋果、秋鬥，到人民老大夏林清的工作坊，後來也辭去工作(教職)全心參與運動，讀你的政治性出土的敘說，和我只在參加者的邊邊位置有立體性的對照，我突然讀懂為什麼我會一直留在這裡，妙的是，順著你的報導/自身回觀，我內在更深層的政治/運動性才有機會被自己理解。從工運一路走到政黨政治運動，所累積出來的政治能量轉進的某種對個體以及對運動潛在但紮實的轉變，真是有夠「慢」啊！不過這種慢正好適合我這種大器晚成的人」(火盟論壇，2009.12.27)

這場論壇的目的是希望我的經驗可以做為不同運動者產生的疑惑、困頓、猶豫有一相互參看與理解的過程，我想創造出「慢政治」的一種回溯空間，經由個體間的參與、對話，發生共振的可能。會中有人以自述方式回應其自身的實踐，「我在搞一個什麼運動？要說慢，社大的運動很慢…」，蘆荻社大的伙伴若有所

¹⁶³我在論文行動中共規畫了二種形式的論壇，一是深度訪談、一是集體對話，深度訪談共進行七位(王秋月、王芳萍、陳柏偉、柯逸民、何燕堂、張通賢、鄭村棋)，集體對話二次—12/19、12/27，主要是以運動者為主，以火盟社群中資深、資淺的工作者分別設定主題進行協同探究。

思的回應著；有人則希望我能多寫一些在勞工局時與公務員間協同工作，是如何改變他們的思維的，因為此時火盟社群多數與官僚機構有交手的經驗，對公務員處理公眾事物的心態十分不解與無奈……會後也有人找我談團隊中發生的衝突至今不知如何前進，我主動提及工作中的衝突引發其極深的感觸。

協同探究不是為「慢政治」找到相同的解方，而是一個面對自身的反思過程。在二場的協同探究中我看到運動者的反思行動已經展開，在早些幾年我應該還是接不住這樣的參看(如 2005 年與馬華學生的對話窘境)，因為太「重」、太擠壓。運動者帶著任務與現實環境正面衝突，在有限的條件下要舒解複解壓抑的情緒，如果沒有集體的支撐、同行，帶著困惑、擠壓前進是很容易退卻的。我從 2003 年到工委會，承擔集體交付的運動任務，看著工運力量的消退轉而「介入」主流政治結叢找方向，在高度擠壓中我與最親近的工作伙伴無法對話、漸行漸遠，在訪談燕堂時，他說：「看了你的文本，我比較了解你當時的困惑，之前我認為是某種競爭(權力)關係，你需要一個空間做你的事，…」；我對他的看法回應道：「競爭關係或許有，但是我逼你的一種策略，我們在工委會的位子上轉不出去，與其坐困愁城不如去行動，而我對你有預設，你似乎不太有動力去參與這些(指廢票後的群眾場)」。我藉由論文書寫重新面對這個關係中的「漸遠」，客觀性的因素好像是權力關係與步驟不一，深層內在的「遠」是我與燕堂的歷史質「差異」，廢票運動時我的客家邊緣性政治意識被觸發，他則是在運動上感受到社群力量的無以為繼，要撐起工委會的政治是辛苦而困難的，當時我沒有看見他的「困」，只想到我的「卡」而採取了最直接的行動，去「介入」、去外面找答案，進一步拉開了我們的協同關係，距離遠了自然張力也更多重了。

再以運動社群分立後出現的幾次衝突，我把對話軸線放在 2005 年人民老大參選及 2006 年的紅衫軍暴力路線¹⁶⁴，就幾位主要工作者進行回顧，其中王芳萍以人民老大參選的經驗說道「這是一個要求非常澈底的運動，挑戰我們自己與政治的關係，當一個候選人被群眾投射、與社會對話，我很認真的推了一對一(一對多)，把一些參與者的狀態從支持該運動到成為運動的主體性，我們之間更認識彼此，走的更長久；但人的轉變除了談政治還有一種動力的牽引，我們搞晚會、上街對話，讓不同狀態的人親身經驗／感受政治行動，這也是重要的；至於與倉運聯的衝突，當時才意識到工運的撐、組織者轉不動的苦，當時連對話的語言都

¹⁶⁴ 人民老大參選時幾位主要工作者有王秋月、張通賢、王芳萍、鍾君竺、何燕堂及我，在分二區參選時，我們每週有一次聯合作會議，此次訪談分別就文本中較直接的相關者為主，非集體式對話；而 2006 年年參與紅衫軍的「暴力路線」回顧，我以當時曾公開表示不同意的陳柏偉為主要對象，了解他當時對團體決策及推動過程為何採取觀察的立場。訪談時他表示「我本來就不同意暴力論，對團體中每個人沒有想清楚「暴力」就配合行動感到不解也不同意，在團體討論時我是被壓抑的」；但在看完我的文本後他提出另一個理解「慢政治」的意見，「其實這樣蠻好的，說出自己的話，我在做的創作音樂工作坊，讓每個人可以說出自己的話是一樣的」(陳柏偉，2009)。當時有關暴力論的正／反方意見沒有更實質的對話，少部份是在個別關係中前進，因此，本文先不就此「差異」進行釐清。

不一樣了，…但我覺得我們還是在同一條路上。」(2009.12.8 訪談王芳萍)

芳萍的運動資歷比我深，從 80 年代末她進到中時工會當秘書、參與高雄工運到籌組高雄女線，之後又籌組大傳聯、參與公娼抗爭，扛起性權／勞動的運動實踐（王芳萍，2009），20 年來代表集體參與過 2002 年台北市議員、2004 年立委及 2007 年綠黨不分區立委的參選，即使十年前跨出工運進入妓運／底邊政治的領域，她在集體中擔負的開拓性位子是沈重的，在她的論文中清楚描寫了女性運動者政治性出土的歷程，意外的與我書寫的「政治歷史斷裂」相似，我們參與在 90 年代後的階級運動中，得以接起自身的政治歷史，是這支運動實踐路徑的徹底性，讓運動者無法迴避自身的「難堪」，持續的與錯置的主體對話著，這個路徑撐起了「慢政治」的運動也提供了運動者回身探究的空間。

令我感到振奮的是論壇會後一位年青運動的來信。日日春協會的星喬來信說道：「我以為我是中產階級小孩，結果父母其實都是佃農的小孩，爸爸家裡八七水災整片田被沖走、國中時才發現好像有點怪怪的為何自己家裡沒有給自己中午帶便當吃、都只能跑去盪鞦韆，媽媽是貧農的小孩抱去給富商養，他們在對貧窮的羞恥和恐懼中長大。青春期我真是恨透我爸媽，不明白為何我已經唸了第一志願學校還是要背著『為何沒有前五名』的這種指責和要求，高中時還跟我爸互丟過菜刀，花了很大的力氣也很多年，從青春期的崩潰中走出來，小時候以為都是自己瘋狂，但是現在會發現其實是父母身上背著階級的痛苦，完完全全的讓我繼承到了，那種東西從來沒有消失過。每一次回看真的覺得又是一番新的風景、有很多新的理解。也會憐憫所有自以為有身份的人，覺得那種驕傲是建立在多虛幻的基礎上，遺忘歷史的人真的太可厭也可悲了。也會對於底層階級的人更有一種『本是一家人』的巨大的親密感。有了階級立場總覺得整個人踏實了起來。實踐得也更有力量耶，真的。雖然這所有的認識真的無比漫長或痛苦。但這就是人生阿。嘆。」(論壇後一位成員來信，2009.12.28)

9.1.2 碎片與重組～解殖的歷史「差／撞」¹⁶⁵

2005 年 1 月份，我們正推完「人民老大參選行動」(見第八章)。在夏林清老師的引介下有機會與來台灣參加文化研究學會舉辦「去國、汶化·華文祭」學術研討會的一群馬來西亞華人運動組織者對話，會上他們幾位分別從「華裔馬來西亞人的種族主義」、學生運動、女性主義等人民運動中談起置身種族主義強烈分明的馬來西亞政治環境中的反省與行動，會上我負責報告台灣的國族建構與政黨輪替等政治觀察，以我們「介入」的政治行動為對照經驗。

¹⁶⁵ 「差／撞」指的是不同世代間的差身相遇、撞擊出政治歷史的接合、重現。

這個會上我正值經驗強烈的政治歷史斷裂感。當時我是逃避進入的。

會上張永新先生（馬國人民運動的導師之一，他自稱是兵工廠的廠長，以出版思想性論述及帶年輕組織者為主）以身為馬國華人在種族主義分明的社會中如何以階級的運動觀進行跨種族間的串聯與合作，他觀察年輕一代的運動者身上能操持四種語言、敢反省種族主義對馬國造成的階級／性別／政治等壓迫，在不同領域做著鬆動壓迫體制的工作。他的界定引發夏林清老師的回饋，夏老師以她在美國留學時受到保釣運動的衝擊，回國後進入台灣工運中實踐成人教育的意識啓蒙工作，她與我們這群六〇年代出生的運動者走了十幾年，她的觀察是「我看到她們這一代身上的輕盈同時卻是政治歷史空白、斷裂的一代，…說起種族主義，馬國比台灣更嚴重，但台灣社會的眼界中有美國／日本／中國，不懂東南亞的殖民鬥爭歷史，沒有機會了解。」¹⁶⁶

無法從亞洲的區域政治解讀複雜的歷史敘事，運動者的實踐當然會有「懸空」的焦慮感。在這次的對話後，我循著邱依虹撰述的《生命如河流》—新、馬、泰 16 位女性游擊隊的生命故事一書，推了一個社群內部的讀書會，以《生命如河流》為文本，試圖接起亞洲人民反殖、反壓迫的運動歷史，尋找我的階級政治歷史感，在極度擠壓的運動中有機會¹⁶⁷重新梳理自身。之後在幾位資深女性運動者以「碎片與重組～我們在馬共女性游擊隊身上看見自己」為題，各自提出走在台灣運動中的探索歷程，回頭面對自己內心中的各種難堪與狼狽樣，十幾年來走台灣草根運動中與亞洲人民反殖、反壓迫鬥爭歷史有了連結，這個發表會上我從客家人意識到「被安上一種可辨識的樣貌」，透過社運的實踐讓社會看見或理解「我是誰？我們在幹嘛？」。

這個「階級主體性」的自我形構，是在廢票運動中被快速整編的，接上的是看到父親那一代人受日本殖民統治的底層受壓迫歷史，還有受者國共內戰及帝國侵略期間從大陸漂移來台安生立命的外省族群，如何反置重識省籍、族群等統治者詮釋的歷史敘事，從人民的角度解構政治符號的壓迫；「差／撞」一詞是夏林清老師定性的，我在這個認知中進行了另一次的政治歷史對話¹⁶⁸。2008 年延續著我的主體性探究，夏老師鼓勵我訪談顧伯伯¹⁶⁹，在此之前我已略知顧伯伯的生世背景，就我所認識或接觸過的外省人中，顧伯伯的顛沛流離或許並不是最特殊的，但訪談後我發現顧伯伯的政治理念與行動（人民性實踐）是左傾的，他對現實政治批判之強烈，超乎我對活過國共鬥爭、台灣政治恐懼年代、軍職退役再

¹⁶⁶ 這個對話是團體動力工作室主動邀請馬來西亞青年組織者對話。(2005.1.10 蘆荻社區大學)

¹⁶⁷ 見第二章(表 1)火盟論壇 2006 年 6 月 7 日我、我們與她們「《生命如河流》新、馬、泰 16 位女性游擊隊的生命故事新書發表」論壇。

¹⁶⁸ 參見第二章，(表 1)2008 年 3 月 9 日世代政治系列論壇（Ⅲ）二年級顧伯伯開講—在歷史差撞中的生命轉折紀事。

¹⁶⁹ 顧伯伯是火盟社群顧允岡的父親，1926 年出生在北京，十六歲時隻身來台依親、就學，進到高雄軍校就讀，之後唸研究所專研化工方面的知識，曾任職台灣的工研院、中科院，現已退休。

轉赴外國留學的外省人的認識。這個認識與我透過追溯父親—「人生回憶」的生命敘事找到屬於我的「主體性」的深層意義，我曾書寫著這個連結的意義：

當你看到、理解到自身政治歷史時，對於現實政治上更被簡化、族群操弄下的「台灣人」意識，就更反感而憤怒，不就是一次次的強者壓迫弱者的階級鬥爭，日據時期台灣人被日本統治、鎮壓，在中國的抗戰與國共爭戰中，人民被拉去當兵、參共反抗等，最後因為政治發展的現實，台灣做為軍政府避難之地、美國的冷戰防堵前線，在大陸、在台灣的人民不都歷經過戰死、餓死、逃跑的苦難，我父親在菲律賓的逃跑求生、顧伯伯一家的逃難求生；我父親的避走花蓮、怕再被徵兵；顧伯伯隻身被送到台灣，我父親尋覓日籍恩人；顧伯伯 30 年後找到他的母親；這種生命轉折中情感的隱忍與追憶，就是我所理解的共同命運，接上這種政治歷史的感知，不是用一種「族群」的代稱可以模糊掉的。（賴香伶，2008）

運動者的書寫就是實踐行動之一，此論文以「慢政治」定性我們的運動取徑，直接面對社會矛盾、影響群眾的政治認同，「慢政治」運動論述至今仍在進行中，希望透過我的文本，能引發更多人面對自身的實踐反思。

第二節 攻佔市民社會的陣地戰省思

從自主工運到人民老大的參政實踐，解嚴至今的「秋鬥」運動，一次次的在台灣藍綠政治結叢的社會中發出抵抗的怒吼，在勞動政策、公共性議題部份，採取了由下而上的工人立法運動，以勞工教育及集體行動揭露著資本主義的剝削本質，群眾在教育中理解了各式政策規約，在行動中掙脫了「順服」的宰制。以葛蘭西的攻佔一切陣地以進行文化領導權的轉移來檢視我們的實踐，有兩個重要的「理念」已被一般社會大眾所認知，亦在公共領域中發揮了一定的影響力。

9.2.1 勞動意識與分配正義

首先，台灣經濟長期依賴出口，中小型企業的雇傭勞動佔九成以上，每每在產業結構調整／轉型的過程，多數工人的勞動條件每下愈況、藍領底層的工人首先被犧牲，如何要求國家正視資源分配、貧富差距、社會安全網的問題，工委會在 90 年代協助關廠工人抗爭的反失業運動中直指問題的根源，在於世界依賴體系中的不等值交易，使得台灣的代工產業無法升級自主，進而提出「失業工人國家僱用」、「企業出走要留下買路錢」等先進的主張，在抗爭力道的壓力下，1999 年初李登輝政權決定開辦「失業給付」，疏解政治上的壓力；自此失業問題不再是工人努不努力的問題，而是勞動人權的政治問題。運動上或許「失業給付」的

開辦只治標不治本，但不可諱言的，台灣工人的集體力量還未大到以勞資間的政治談判來處理分配問題，自然把茅頭對準國家政權，從生存權、政治權上考思自身處境，在行動建立了階級的意識；當工運戳破資本家「好天要積雨來量」的量入為出、經營哲學，殊不知這雨不是從天下落下的，而是從工人的勞動中搶來的，看清這點工人自然敢要求資本家吐出利潤(稅收)，要求政府提供社會福利。

政黨輪替後我們介入公共政策的議題更為廣泛；從勞動三法、工作權、勞資關係，進入了社會福利的分配政策中，盯緊民進黨政府的福利國家路線走向，檢視其社會立法的過程與目的。就以勞工退休金改制及國民年金開辦來看，2001年「經發會」通過勞工退休金制度「三軌制」併行，最後是通過舊年資只保留不保障的「個人帳戶制」¹⁷⁰、2002年「全國社福會議」確立了國民年金採社會保險制開辦，但最後卻只有部份¹⁷¹國民為適用對象，民進黨政府確實對台灣社會安全網的不足進行了修補，但打著社會正義的口號，想的卻是如何保住政權。

在退休金改制的修法過程中，我們提出「結清舊年資」的主張，一度引發企業集團的反彈，逼得勞委會處長李來希出來表示「如以全體受雇者做為計算母數，初估舊制年資全數結清，雇主需支付兩兆六千億元年資結算金，目前企業已提撥的退休準備金僅三千四百億元，不足達兩兆二千六百億元，強制結清，對企業衝擊過大」(徐國淦，2004)，顯見一般企業未提撥退休金者占多數，勞委會不敢對違法企業動刀，反過來縮減勞工的集體社會分配權，民進黨政府喊出的福利國家藍圖，從勞工退休金修法過程來看，是一「反社會」的勞動政策(陳政亮，2008)，更是「反弱勢」的國家暴力。國民年金部份，在2002年社福會議決議的採社會保險制度辦理，並只針對「部份」國民為適用對象，對原本期待落實資源重分配、世代正義等制度性翻轉的弱勢族群而言更是一大退步，更勝於此的是，民進黨及泛綠社會團體不斷以公教18%優惠存款利率挑起社會內部的族群矛盾，立法過程充斥算計的政治操弄。

在洞析民進黨的拼經濟與拼政治策略後，我們鎖定上該二個與多數人相關的議題進行宣傳與教育，在論述上直指，一、勞工退休金制度、國民年金等不單是領不領得到退休金、領多少退休金，而是高齡化社會後老人安養的問題，政府不

¹⁷⁰2001年「全國經濟發展會議」，議決了攸關五百多萬勞工的退休金修法方向，確立以「三軌制」並行的方式修法。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主委陳菊挾其人權鬥士之名，與全國產業總工會等御用頭人的互利合作下，經發會的「三軌併行」是以勞委會主推的「個人帳戶制」為主軸，全產總的「附加年金制」為包裝，商業年金為釣餌，硬是把勞基法「看得到、少數人才吃得到」的退休制度，往下修到「看的到、領得到、卻吃不飽」的「確定提撥制」，而此制對老板來說更有「前帳一筆勾銷」之嫌，對其成本計算特別有利。

¹⁷¹政黨輪替後(2001年)我曾出席一場由內政部舉辦的社會保險年金化的研究發表會，主持人(內政部官員)、社會學者及經建會官員均提出以階段性整合各職域性保險的角度來定位國民年金的意義，最後結論以「統合工農公軍間的職域性退休保障，將公教保、勞保及國民年金保險並列為社會安全體系的共同基礎，對於未能享有公、勞、農保以外的三百多萬人口直接納入國民年金的適用對象」。

能把問題窄化；二、要走社會福利國家路線，就得在稅收上著墨，以財富重分配來解決貧富差距、建置社會安全網。這兩個論點在 2001 年經發會、2002 年的全國社福會議、2006 年經續會等國家級議政期間，成為工運圈、社福團體及輿論關注的攻防焦點。國民年金的立法與勞工退休金改制都歷時十年以上，也歷經國、民兩黨政權，我們在 1994 年針對全民健保修法時即已提出上該二法案的主張及修法版本，政黨輪替後社會貧富差距持續擴大，分配權的爭議、論戰成為社運的主軸，我們雖在政治上以人民的參政權為主，但實質介入社會性議題的運動亦未鬆懈¹⁷²。

2006 年 5 月扁政府召開「經濟永續發展會議」，社會各界代表名額十人，其中勞工及社福代表分別由全產總代理事長施朝賢、老人福利聯盟秘書長吳玉琴擔任，在 7 月底的總結會議場外，我們聯合了自主工運等團體就放寬企業赴大陸投資上限與派遣立法問題進行抗議；場內的社福界代表則以國民年金立法延宕為主題，否決了行政院版的「部份」國民年金保險草案，要求以「全民」為納保對象，我們公開支持社福界的論點，也進一步要求以稅收制來解決財源問題，要求開徵富人稅、擴大稅基等進，雖該兩項抗爭均未獲得具體回應，但在朝野上下一片「拚經濟」的氣氛中，我們硬是把分配權的議題搬上檯面，此分配權指的是社會弱勢階級的分配正義。

9.2.2 階級性公民權的開創與建置

從 1994 年的「以上皆非」到 2004 年的廢票運動，十年間這個論述從倡議性質進展到可以實質影響政權更替，開創了藍綠之外的「第三種」選擇，其積極性的意義是人民得以把被主流政黨剝奪、壟斷的權力拿回來，即使主流政黨灑大錢造勢吸票，動員基層掃街拜票、招待旅遊、辦募款餐會，打廣告、找名人站台等，已有許多的選民不受此影響，敢用投廢票表達自主意志，這是台灣社會民主的一大進步。

我們會介入選舉鼓吹投廢票或推人參選，主要是藉此過程接觸廣大的公民朋友，在選舉牽動的社會氣氛中，主動與人談政治、談生活、談社會壓迫，進而傳遞我們的政治理念、轉化群眾的認識。這個過程不是主觀上期待就會發生，得有相應的社會條件配合，就以 2004 年的廢票運動在藍綠選情緊繃的對決氣氛

¹⁷²勞委會的修法方向一直遭到工運團體的批判，我們在修法勞教中直指此「個人帳戶」對工會的集體性認同有瓦解的作用，更不用說對整體勞動力再生產成本上逆分配（羊毛出在羊身上），而藉由修法過程揭露民進黨政府傾資方的行徑更應在運動上批判與揭露。因此，2002 年 5 月份起工委會即成立退休金修法小組，結合學者、工會幹部及組織者共同研議相關法條，於 2003 年提出「工人版退休金條例」，並委請無黨聯盟立委高金素梅提案，在立法院中與其它十個版本競逐。

中，與一般人談廢票得先過強烈的「動機質疑論」這關，才能與「無用論」、「消極說」對話，最後還得回答「投完廢票要幹嘛？」；真要幹嘛才決定投廢票其實也是一種「交換說」，我們在 2004 年至 2008 年的參政運動期間一再經驗到這些循環式的論辯，也從中理出了幾項民主制度中的「假說迷思」，這個假說對一般主流政治團體或許不以爲意，因爲其本身就是主流政治的一員；而社運參政是從批判的立場提出新的、另類的主張，才能把假說背後的迷思一一牽引出來。就以「民主」來說，最直接的解釋是「人民當家作主」，但事實上，在台灣「投票當天是主人，投完票變下人」，這個事實多數人心知肚明，也會對此結果表達不滿，但現實比人強，那天需要政治人物幫忙，總會給自己留個退路，真要改革得先革這個「需強來助弱」的求情內化意識，一般人做不到，一個人也很難，得要有一群人、一個集體來推動。我們十幾年的運動就是在找這樣的一群人。

人民老大時我們推動「直接民權代議制」，提出另一種實質「民主」的範型，但其要「破」的關卡比投廢票還複雜，因爲第二個「假說迷思」——罷免，在現行選制下無龐大動員實力的社會團體、一般公民早被排除在外(罷免連署的高門檻)，「拿政治人物沒辦法」、「下次不選他」選民的無耐、冷漠是制度造成的；人民老大時我們提出「做不好，就下台」，要求候選人「先簽辭職書」以替代選制上的罷免機制，並要公民繳交「民主契約金」、負起實質監督的責任等，這套制度或許仍有缺陷，但在 2006 年紅衫軍運動時，施明德以一人一百元對群眾許下「不達目的絕不罷休」的承諾，應是與我們在第六屆立委選舉時曾帶一些選民請他簽署承諾的行動有關，顯示社運界提出的主張有相當的前瞻性。

人民老大運動的理念在現實政治上雖未成主流，但在我們的實踐中因爲二種模式的衝突，而更能辨識方法與作用的關係；在 2007 年基隆罷許行動後，因爲許財利市長病故必須進行市長補選，我們因爲決定在基隆成立政治性團體而參與市長選戰，該如何打選戰呢？2004 年的人民老大經驗，我們曾提出過「一對一」模式的檢討，在此不贅述；基隆市長補選對藍綠政黨是小戰區，但對我們要「插足」地方政治的新團體卻不可不慎，每一步都是新的開始。尤其，基隆已是台灣政治經濟資源分配相對邊緣的城市，我們得在選戰中進行二個「邊緣性」的翻轉論述¹⁷³，讓市（選）民看到我們，也願意提出他們的意見，在這樣的目標設定下，我們發展了人民老大進化版：一、客廳市議會（今天不談政治一家庭茶會）、二、街頭市政府（對話式肥皂箱行動）。三、港邊文化局（走唱港都鬱卒卡拉 OK 大賽）。四、雞籠故事館（1000 個「生活即政治」實驗）。五、人民財政局（投票保證金 1000 元）。凡加入上項行動之一者，即爲「基隆自主公民」，將可持有「工人市長辭職承諾書」一份。

¹⁷³一是社運參政的邊緣性得直接挑戰藍大綠小的基隆政治生態，讓一般市民看到我們；另一是對基隆邊緣性的反抗，必須提出改變的可能，要求中央回應具體政策。

其中「客廳市議會」是人民老大「一對一」模式的變形，選舉小組透過社會運動的人脈關係進入不同選民家中，與其家族成員對話，讓他們認識我們的選舉目的及方法，並邀請他們加入普通人參政的行列，對基隆市的未來負起公民共有的責任。相對於一般主流政黨的選舉操作，透過大樁腳的引介找出該社區的小樁腳（或稱支持者），灑文宣辦餐會送紀念品最常見的手法，但進到家戶與對方談政治、聊處境需要耗費時間精力，典型的拜票過程就是在樹立「代理人」的形像（個人能力）與品牌（政黨屬性），要你把權力讓渡（委託）出去，由候選人來完成所託。我們的把委託與讓渡的邏輯倒置，更接近「直接民主」的概念。（王醒之，2009）

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行動中我們累積了「民主」的改革知識，2007 年泛紫聯盟召集人簡錫堉曾主動提及推動「以上皆非」¹⁷⁴的選制修法；2009 年陳長文律師亦主張「絕對多數制」的選制改革，有關公民權建置的議題亦受到主流媒體及知識界的重視，顯見我們在市民社會所發動的公民參政行動，對政治制度的改革有一定的影響力，雖然離我們期待的「人民做主」還有一大段距離，但改革的種子已經播下，剩下的就是更努力的灌溉、翻土了。

¹⁷⁴2007 年立委選舉前，社運團體泛紫聯盟、全教會等召開記者會宣示將推動修改選罷法，要在選票上增列「以上各候選人皆不支持」的選項，讓選民跳脫藍綠綁架使中間的聲音得以發出。（楊宗興，2007）

後記：我與論文書寫

在參與了社會運動 16 年後，使用學院的環境爭得一個面對自身政治性與運動歷程回觀的梳理過程，在四年的研究所學習期間沒有停下運動線上的工作，當然也沒有卸下面對運動困境、尋找出路的壓力，特別在書寫論文的一年中，我與歷歷在目的運動歷程對話著，時而清晰、愉悅，時而陷入更深的焦慮、疑惑中，一再的檢視自身是否又重蹈覆轍。過程中經驗到推移社會結構的緩慢與龐大的阻力，在來回的內在思辨中，我體悟了自己身上承載如此多樣、複雜、不確定的感受與我所投身的實踐路徑有關，這個路徑訓練了行動者的覺察與省視自身能力，使我得以在面對週遭的環境變化時還能轉動自身，這是「實踐」對運動者的解放意涵，而這個轉動的能力，來自於運動前輩鄭村棋、夏林清二位老師以嚴謹、不輕放卻是關照不同個體的差異在運動社群中給予適時的提點與協助。

在一年多的論文書寫過程，夏林清老師以其對行動研究的深厚功力，協助了幾次反映對話，把我原先切割式談運動困境的敘事方式，拉回一個運動者在不同位置、處境的回探歷程，因為這樣我開始進入家庭、婚姻與社會發展變遷的探究，從真實且複雜的現實處遇中理解我所認定的運動困境，「政治性」的出土無非就是對內／外在自身的「面對」。在第三次的大綱修定後，我才認受這個論文對我的意義，不是只服務於左翼文化戰線的論述詮釋，而是我與運動的情感交織。

上到工委會後既要對內做組織又要撐起外部政治的工作推進，我清楚工委會及各運動社群在開拓上的辛苦，更覺得有責任得「撐住」一個集體，只是這個集體已發展成多樣、交疊的「類」群體，我的組織方法、能力已明顯不足；在這一年的書寫過程中，我對「撐」有更深入的理解，特別讀到社群中幾位資深運動者的論文，社群分立多樣的變化其實反映了過去工運的尖銳鬥爭，是有其脈絡根基的，從解嚴後的社會中硬闖出「不同於藍綠／統獨」的實踐路徑，我們是在那個政治社會氛圍下進到工運，過程中高度的擠壓、衝突必然的發生了；然而，政輪替後，面對工運組織得轉的壓力，我剛好在這個位置上，面對集體的分立、多樣性發展，又急於卡進快速變化的藍綠政治，我的外在身形與內在心境是分別安置的，工作中硬著頭皮操演政治上的角色，身體與情感承載、積累著社群間、同志間與家庭內的衝突。擱置、封存是必要的暫時作法，終究這些積存未解的部份還是得化開咀嚼，就像對父親的人生回憶文本，擺在心上十幾年還是得面對屬於我的小歷史，這個小歷史支撐了我的信念，八十歲的母親不時來電關切台北家中的一切，偶爾塞幾千塊紅包給孩子當學費，其實是擔心我們夫妻走在這條路上的「窮」。

重視這個「撐」，我提筆寫了百年茶園的消失、公婆的辛苦養家及我與運動

同志的衝突、經驗參照，以「慢政治」定性我們實踐路徑的自主性意涵，主體性、政治性的出土，廢票運動中我被族群政治狠狠的敲擊著，客家邊緣性反抗的意覺讓我敢再看父親那一代底層人民走過的台灣政治歷史，我在運動中十幾年對無數被壓迫的弱勢人民有強烈的情感，這個情感是一個階級屬性的自我認定，政治性的出土就是與自身相認的歷史感知。

口試時，陳光興老師認為經過二十年的運動實踐，台灣左翼運動陣營應該有條件進行路線、方法及對待關係方面的反省與檢討，第三世界的階級分析論述與戰後民族國家內部獨特的政治歷史糾結，運動者自己身在裡頭經驗了無法切割的牽引，也進入了這個歷史敘事，有什麼部份是可以提出來被檢討與面對的？我的想法是實踐中生產的知識，是非常入世的，得有條件「抽絲」才能重視其不足或缺失，當我們選擇以「參選」做為組織轉進的方法時，第一步與運動圈對話就已是一種面質的過程，我之所以記錄廢票運動、人民老大、基隆罷許經驗，就是認為運動得創造一種空間，我以「慢政治」稱之，可以置存差異與辨識自身的歷史質，透過批判性論述轉化一般人的藍綠認同，轉以公民的政治權力鬆解「統治與被統治者」的宰制順服。這些過程雖沒能化解統／獨、國家定位與階級矛盾的糾結，在此期間我看到自身的侷限性，也面對了整體社會糾結於此的歷史還未走盡，辨證來看就是我期待的解放政治與客觀歷史時空的「卡」，單以階級論述無法穿透其中亦不能置身事外，怎麼辦？至今我仍在想著這個問題。

文末要特別感謝 16 年來不斷以身教、言教改變我們的鄭村棋、夏林清二位前輩，他們三十年的自立拓荒讓我得以辨識這條實踐取徑的歷史意義；世新社發所黃德北教授，他鼓勵我反省工運的困境，並在第一線的運動中給予非常重要的論述子彈(從廢票選制改革、勞工退休金改制到人民老大等公民政治的階級論述)，四年的研究所費用也都是黃老師提供的，在此特別致謝。至於，我的家人在我論文書寫期間給予最大的支持，婆婆幫忙照顧小孩吃穿，親密愛人柯逸民更是經常在半夜與我討論，他善長政治觀察，對運動方法的反省直接又強烈，雖我們的意見經常相左，但他提出的論點是對我很重要的提醒。

在運動社群的協同探究中，我與燕堂、芳萍、阿賢及秋月、柏偉分別對話，就運動中發生過的衝突與各自狀態重新回顧，釐清了運動要轉進時不同位置、結構造成的個人有限性。與鄭老師訪談是為了解決我自己的困惑，廢票運動後鄭老師的實踐位置已進到能見度極高的主流媒體中，他批判性的階級觀點已發揮了意識形態的文化論辯空間，但當時我們的組織無法承擔他的速度，我在工委會的位置上明知難以追上還是粗糙的硬搞，引起部份同志關係的內爆，做為其運動同志及後輩，想知道他如何看待這個問題。訪談時部份問題已獲得解答，特別是他如何思考運動進程與使用的策略等，不過更重要的是我意識到自己一直帶著的急切感，不全然是與如何完成任務或集體已無能量承擔，而是在那個歷史當下做為一

運動者我有強烈的慾望，覺得對就做，有些事做不來又不甘心放掉，急了，就亂。回顧 16 年來的運動歷程，犯過許多的錯誤，走了不少「岔路」，但這些走過的路對我都十分重要，因為那是運動者必經的鍛練。

我的論文只寫到 2007 年 3 月火盟在基隆發動罷免許財利市長的行動，未再把 2007 年 5 月的基隆市長補選及 2008 年 1 月火盟與綠黨聯合參選立委的「政治還給普通人」運動記錄進來，主要是因為如此新而複雜的經驗在運動中還沒來得及沈澱，其涉及的層面較之前更廣，我期待其它運動同志可以接續完成。但令人振奮的是睽違 4 年的秋鬥、第 18 次的「秋鬥」、21 年沒有停歇的人民鬥陣傳統，在 2009 年 11 月 22 日舉辦了，這是我在一年多前開始寫論文時就掛念著的事，2008 年中我們協助了三鶯部落、撒烏瓦滋部落、崁津部落的都市原住民反迫遷運動，當時我就有要再發動秋鬥的念頭，只是政治上兩岸簽署 ECFA 的議題及之後的美國牛肉協議引發朝野及民間力量的政治變化，而又有所遲疑；但就是因為底層受壓迫的社會議題被高度邊緣化，運動組織者更應突破此困境，在火盟、河岸部落及世新大學社發所、新海工會等單位積極奔走下，「2009 秋鬥再起」眾多的弱勢者走上了街頭，在凱道的集會現場，我訴說著 20 年來秋鬥的運動歷史，有些走過修法抗爭、反失業的老戰友離開了人世、有的人還在不同的角落掙扎求生，社會運動需要更多人的投身實踐，為自己也为受壓迫的人！

賴 香 伶 謹識
2010.01.23

附錄一 回憶人生—香伶父親故事

(我父親於民國 84 年初過世，這份回憶日記是在他與癌症病魔相抗時寫的，父親過世後我有時會翻閱一下，但總無法壓抑難過的情緒，直到 2004 年廢票運動後，我帶著運動的挫折與困惑，思念著父親，某日深夜讀著他的人生經歷，我淚流不止…)

回憶人生

- 一、 讀書時代：余於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五月廿五巳時出生拐湖莊上湖，出世時為雙胞胎，兄江浪，余江河，命中八字欠水也，江浪出嗣雙潭連府號名集成，日後與宣妹成婚，兒女成器家庭美滿，余生於最赤貧人家，九歲由母親送上三叉公學校接受日本六年殖民教育，十五歲以中學成績公學校卒業（畢業），在當時的社會及赤貧如洗的家庭環境能得入學讀書實在夢般的可貴父母親之偉大，余永生不敢忘記大恩也。
- 二、 少年就業時代：公學校畢業由同鄉好友，謝黃東兄（早歿）帶到台北當日人小之僧（小店員工友）每月工資三元，十六歲中期五元，在台北繁華都市共住了約一年半，裁縫店小僧到影片帶配達，在台北從寸步難行到橫打直通大約花了將近一年時光，皆以腳踏車（自轉車）代步，月入五元時尚可節餘二-三元寄回家補貼家用，母親歡喜面淚矣。民國卅年故鄉成立養馬場係當時新竹畜產會成立創辦之牧場，飼養小馬後專供軍用馬之宗旨，父母親爲了親子朝暮相處方便起見將余召回故鄉，加入牧僮工作，那時已是支那事變（中日戰爭）進入激烈階段，台灣人民被強迫動員義務奉公強迫勞役，食物配給糧食控制最嚴格之時期，人民生活最困苦淒慘之時期也。
- 三、 青年軍訓得意時代：余十七歲，民國卅一年初被征集到花蓮銅瀧見「勤行報國青年隊」即一勞役集中營，受到最嚴格的管訓，精神體力之折磨實在以筆尖難以表露矣，受訓期間又患染赤痢症，在戰時醫葯缺乏下萬幸保全性命。三個月結訓，皮包骨的回到故鄉，人形已變，父母親都不敢相認的情景，但回家後健康很快得到復原，接著得到公學校長一細谷真一（日人）的徵召，進入學校當教員，名稱是特別講習所講師，專教育超齡兒童四年初級教育，可是戰事日益緊迫，而政府對以青年壯丁之集訓也隨之加緊起來，因此余爲被派專門組訓青年，訓練得有聲有色，成績優良，常代表帶隊參加郡（縣）、州級比賽，常得到冠軍，成爲全鄉模範青年、偶像，女青年幹部追求的對象，並被日本女老師號爲三叉美男子的美名，使幾位少女爭奪我的情感而粉拳交加，如今想起真是可笑啊！可惜那時的我

年紀尚輕、不解風情，加上家庭貧窮，又因時局緊張，所以對異性之感情無毛頭之念，那時日本人加緊對台灣青年之壓制，於昭和十七年中期對台灣發佈徵兵令，許多優秀青年被征兵到海外戰地參加作戰去了，余那時十八歲，離服兵役尚差二年，所以考慮逃避服役的計謀要緊也。

- 四、志願農人員技訓練，逃避正規軍人命運，海外死裡逃生復活回鄉：辭却教員回新竹州立農業試驗所報到，名稱爲「台灣總督府立熱地農業技術員鍛鍊所」，專招集農林優秀青年授予農業專技教育，然後派遣海外經營軍屬農場，指導現駐民作農業生產供給軍需之宗旨，本應訓練一年，但因戰爭緊迫，訓不到十個月奉命派赴菲律賓馬尼拉，一段時間後被轉派到離馬尼拉約三百多公里山上，碧瑤市盆地，以先峰隊接收西班牙人養雞場，開墾爲蔬菜農場，不到半年時光，好景不常，因馬尼拉前線戰事緊急失利，所有軍人軍屬紛紛撤退，原於馬尼拉不遠的海軍農場本部全體人員，由小山中隊長帶領撤退到碧瑤，接收了我們辛苦開墾的農場並岐視我們先技隊，百般侮辱毒打，有一次兆豐君，錦順君（戰死）站警衛夜勤時被小山隊長以警覺性不高爲由毒打一頓，使兆豐君（大湖人當過縣議員）頭面紅腫無法進食的悲痛慘情況後，我們新竹州出生的弟兄合議，決定逃離農場另謀生路，密擇農曆二月十九日觀音佛辰星夜二點脫走逃亡。余與湖口陳省三兄以分隊長身份當領導走上公路混合其他陸軍撤退部隊，趕快走路至天亮前，已走離農場十七公里之山坡松林地帶，爲了避免美軍飛機之空襲，弟兄們分散攢進岸下草叢，夜間爲了同生共生死表明團結，當天十八兄弟義結兄弟，長兄爲陳省三，其他如邱王昌、賴金現、邱來盛、湯慶坤、吳兆豐等，如今離世者多人，各散西東矣。

逃亡第三天夜間約八時左右繼續往北走路時，被日本海軍司令部派出之陸戰隊由小山帶領下，我們被捕了，我等領導者當場被毒打一番後，押上卡車解回農場成了囚犯，被關入雞舍，余與省三兄衣服被脫光、手被反綁，另派衛兵看管，嚴禁防止再脫逃，關了將近二個月。據聞待軍法官到碧瑤時召開軍法會議，小山隊長一再揚言，戰地持武器帶隊逃亡，領導者唯一死刑等，全等決心者破一切待那一刻之到來矣！幸得人間活菩薩之出現救了性命，其人就是軍需部上將所長一武間謙太郎也，其詳情如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七月廿七日武間隊員夫婦，由余透過各種管道尋獲並邀請光臨台灣寒舍。別離四十多年後能與救命恩人會面，做夢也沒想到，真是神之償賜也，並附當時民眾日報採訪報導下內容爲實情，恩情得報心願了矣。

五、 日本戰敗，無條件投降，一條老命順利回台灣：日軍於戰地作戰以決死隊為主，但節節失利，余帶了幾位戰友私下逃入菲島北部深山裡，風霜露宿幾個月，深受美國優勢的空中攻擊，白天避穩、夜間逃亡，走山期間連月、日、方向都不知，怪的是幾天來，飛機迫擊炮的攻擊都停止了，心理有點奇怪，三天後美軍小飛機在上空散傳單，撿來一看，知道日本天皇接受無條件投降，可是半信半疑，日本皇軍那有戰敗之理呢？原來台灣青年受日本軍國主義教育，中毒太深之緣故也；日本實際戰敗了，我們有救了，即束裝照原逃亡路線走下山，看到無數屍首散骨、死去的戰友慘慘慘，變成異國野鬼遊魂了。

走到美軍第一線營區只行十多小時。原來我們已被包圍，如不投降的話我們的生存機會也不過三、五天功夫呢？真險啲！被收容幾個月後，於民國卅五年二月平安的送回台灣高雄左營港，台灣已由中華民國接收，交通很亂無秩序，中國話一句也不通，乘火車從窗口出入，爭先恐後，與離台出去那時相比，天地之別，台灣已變成無政府狀態也。

火車到嘉義停駛，在火車站休息到次晨清早再出發，第二天中午前回到三叉火車站，一下車就被駐守茶場的中國軍隊叫去，百般刁難，甚致污說余等係與中國作戰之罪名，要送往新竹砍頭等，實在莫名其妙極了，所幸鄉親們大力的辯解，並送了幾件由美軍收容所帶回來的東西後，始能平安回家，父母親喜極而淚，這乃祖上之德幸也。從新竹鍛鍊所出去的戰友同學，四十六個之中，平安回來的有的只有廿一個，死去一半以上，投降下山中途，無意中食了人肝，到了收容所才知道，食到人肉的人不計其數，有的明知而食，有的半信半疑而食，總而言之，爲了保命不顧一切矣，戰死、病死、餓死者安息吧。

六、 就職台北松山煙廠又逢 228 事件：從海外回國，初初對以北京語，全然聽無，對以中文也無法了解，過去所受日本教育，說的一口流利日本話與日本人幾無差別，寫的一手標準的日本文，突然間受到這樣大的變化，英雄無用武之地也，但事實擺在眼前，非從頭學起不可矣。台灣光復初初的社會，由戰亂留下來的慘樣未除，鄉下仍然失業眾多，余眼看非向都市去尋頭路不可，所以連絡幾位海外歸來兄弟，知道黃河元、羅阿停、莊明通君三人，得到昔日活躍於馬尼拉的中國方面遊擊隊林作梅先生被派回台灣接收松山煙廠之便，他們三人被安置到煙廠服務，所以余與兆豐、錦堂等拜訪他們，並由他們之相助一同進入煙廠當守門衛之職了，那時廠裡駐有守軍，

外省人他們普遍素質很低，治安雖尚好，但小盜猖狂，廠內工人與外界裡應外合，防不勝防，當守衛只能順應環境得過且過，不敢與他們作正面衝突，實以求平安為上矣，在烟廠服務不到一年，於民國三十六年春在台北發生二二八事件變，社會頓時變亂，為了逃避災禍棄職回轉鄉下，但事變已漫延全省，黑道橫行，已多無故好人（外省籍）受到打殺，實在看不過去，余挺身而出，組織幾位有識之士出來將鄉內幾位外省同胞（茶場長沈達、山林管理所主任等）加以安全保護，所以我三義鄉沒發生打殺事件，對以後之政府清鄉工作得到良好之後果也。

- 七、 逃避兵役，流浪東部花蓮：不幸事件已平息，人們又忙於生計之際，突然風聞政府又要徵兵的可怕消息時，內心十分恐慌，尤其像我從海外撿到老命回來的人極度敏感矣，不管怎樣還是三十六計走為先，速即約好幾位昔日公學校同學彭慶曜、彭慶祥（走高雄）、余、吳貴泉、廖錦麟三人，由貴泉君提議決定走東部花蓮，投靠他堂兄吳鼎貴，帶了簡單包袱由北部轉蘇花公路二天時間一氣逃到花蓮吉野（吉安）吳府，鼎貴兄係一個大胖子，子女成群在一家（魚藤粉）工廠服務，在社會略有地位。到了吳家一天一天的過去，打聽之下政府並沒有徵兵，過了半月十日時光，貴泉、錦麟不耐思家念頭，相繼回轉前山去了，余因能做粗活被鼎貴兄夫婦看重被留下來並願與我介紹職業，一再慰留，在正式職業未決定前帶我到瑞穗鄉富源村（日人稱為白川）寄宿於劉榜文伯家，雇請阿美族人掘取魚藤，但到富源一直下雨一個多月無所事事，日常起居認識好多人，並由阿榜伯媳婦阿金姊（姓賴）介紹認識了細妹姑（姓賴）日後成了余的岳母。

東部人情味很濃，在富源期間又逢昔日老鄉炳興兄，老哥在瑞穗鄉公所擔當總務課長（現在的秘書），就此在富源村結了緣，進入鄉公所當了村里幹事，結了婚，新娘子為李宴妹小姐，當時她服務於瑞穗鄉農會富源辦事處當雇員，十八年華農家小姐，排行老大端莊美麗大方，平時叫余哥哥，那敢想做老婆，姻緣注定，並得雙方家長之同意，在女家舉行婚禮成家立業，夫婦上班成為佳話。時已廿三歲之初也，廿三歲年尾，妻初產生下一男，喜出望外，取名世忠，可嘆，不過五天夭折了。

岳母眼見妻喪子之悲戚，收養了一個女孩，他係鍾阿松兄之親生，因生了太多女孩不單不愛惜，連戶籍都不報，所以由余收養，並報為親生，取名勝英，成為吾生頭胎明珠也。在富源服務將二年，突然接到家書，因弟阿增志願兵入營，父母命余夫婦束裝帶子回了故鄉，日後才知道那時的征兵

傳聞並非，係篩選鄉內最優秀青年擔當新成立的兵役課長，據聞目標打在余身上真是失了好機會。

八、回轉老家，決心奮鬥改變貧窮環境：父母親之命令不可違背，爲了老弟當兵，余夫婦倆含淚咬緊牙根辭去公務員現職，帶了妻兒經過南回三天二夜，回轉故鄉。茅芦寒舍裡煤油灯火下，父母親、祖母等笑顏相迎，長女勝英即時成寶貝，從事薪水生活的我們回來故鄉一時無法適應，幸得余備兼武身，從事當時興起之香茅草栽種事業，接下父親經營之小規模草烟，與鄉親們換工處理工作外並與鄰人合建小形蒸溜工廠（土炉式），然後與同是雙胞兄弟的孫廷輝君，合股承包他人香茅之收刈製油，雖家庭生活略有改善，可憐賢妻受苦，勞累有加，大肚扁扁又要擔挑香茅草從未受過這樣的勞動工作，他暗中流過許多辛酸淚，但她耐力過人從未吐出半句惡言，余內心自感難過也。因此下定決心苦幹一番，必將赤貧的家境改觀過來之堅定目標。不久承包農林廳委託優良品種茶苗之繁植，十一萬株在民國卅七、八年的錢，賺了約壹萬元，父親一生盼望爲了確保糧食要緊，余即到鯉魚潭大河濱買了一份河川新開水田，經過許多苦境種了水稻，第一次收割時看到父親的歡心，余感到努力、妻子的辛勞得到相當的代價矣。接著將破漏草屋改建爲瓦房，新屋泥水由五湖張俊乾兄弟承包、木匠由陳細貴伯做，木材全係本山樟木，利用夜間暗夜以盜伐方式，砍取搬運，祇因家貧沒辦法採購市售建築材料，余因與弟等到四分保安林盜木材，因弟無力扛運，所發生斷棄樹木之衝擊，余被打得脫神失氣，險些失去生命矣。總而言之，千辛萬苦蓋了瓦房，這一年由花蓮肚中帶回來的老二勝清又出世，雖是雙喜臨門，可嘆新屋喜落成後幾天又過春節，家裡沒錢過年，就將新屋喜聯上吊的拾元卸下，分給妻及弟婦當作壓歲錢，一人伍元，以今想來實在寒酸極了。

弟退伍後不久仍在家做事，當時的村長傅鼎祿先生要余當本村幹事，余想弟退伍涉世尚淺，有須出社會歷練爲重，將此機會讓給賢弟，余仍與朋友營運香茅事業，但好景不常，香茅油銷路漸漸衰退，余見前途不堪樂觀，老三又將出世，有須覓一固定職業，經人介紹進入苗栗縣農會此間農場，當臨時雇員輔佐吳慶嚴伯管理橫跨龍騰、西湖二林六百四十二甲土地，當時全部已被開墾種植香茅葉、茶葉，農場以收取租金爲主，香茅油沒落後大部份改作造林，余那時薪水二四〇元，因無背景人事，淨幹臨時雇員就當了九年。當中蔡阿梅兄一直當縣農會理事、理事長，余又是他的忠實走狗，理當是他提余進昇爲正額職員應無問題，但一直無法如願，事後才明

白，要升職非靠人才實力，唯一有效的是金錢，可恨黑暗社會之惡毒，余生於貧窮人家孩子成群，一日三餐都成問題，那來金錢買職呢？不久那食人不見血的何允文總幹事，突發肝病死亡，接著由湯慶松先生出任總幹事，他第一次巡視農場業務，查看余之經手業務，並問余服務多久，了解余之處境後不久升職為正式雇員，並兼農場副主任輔佐徐鴻基主任。

好幾年相安無事，但家裡又起了變化，父親因胃病入院開刀不治過世那年，余得了男孩柁源已是第六胎了，上有五個女孩，父親雖然相當喜悅得了孫子，可惜命不長矣，母親傷心的以淚洗面，其悲情以筆無法形容，想起父親之身世，不時悲感交集，正要享天倫之際，沒想到胃部開刀就一命烏呼，余實在無法接受其事實好幾年時光，其臨終慘況無法消逝，怨人、怨天，可憐的父親，永遠活在余心中矣。

在縣農會服務到民國五十五年五月底，退職前二年莫名其妙的被派到大湖蠶絲廠當推廣員，那時兄弟分家不久，一個人遠在大湖，獨居工廠。人在外心在家，無法平靜，心想辭職，但想到成群的兒女嗷嗷待哺，加上欠了債務，又不敢讓老祖母煩慮，咬緊牙關，東走獅潭八掛力、三灣大河底，南走卓蘭白布凡等，皆徒步推廣蠶絲，半個月回家一趟，苦了賢妻，維持寅吃卯糧的家，其情其景真是一言難盡也，被調職之原因又是湯總幹事，競選省議員，沒出錢支助他有關，天哪？余當時家境，三餐都不繼何來金錢資助人家競選，政治就那麼無情，以今想來使人寒心矣。縣農會經營不善，經過理事會議決處分農場土地，一百五十甲，出售給台中財團永豐（何永）何頭家買土地後托中人葉昌海（沒）要余轉職到他公司專管理土地並開發農場，余喜出望外接受了，主因是辭職縣農會可領到互助費約三萬元，一來得還清兄弟分家帶來的債務二萬多元，二來天天可在家鄉上下班對以負責家庭責任、子女教育等方便有加，從此家境可能可改觀也。

九、進入永豐關係企業（永森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西湖農場服務，民國五十五年，六月一日，由葉昌海先生，以那時新流行的交通工具「機車」載往大甲（六分外埔）會見公司老幹部黃傳興先生，並約定時間到公司報到，及晉見董事長何永，余當年四十歲。次晨乘車到后里仍由葉先生以機車送往台中成功路卅七號永豐公司約於十時由董事長召見，談論農場管理職務及未來展望，在縣農會待遇等甚為詳細，後退出公司從此成為該公司正式職員，上班地點聖王坪山區，不久經過一個月領到薪水一，四〇〇元，與余報告縣農會待遇相同

也，心中暗想當時多報一點該多好，但已慢了。

上班約三個月後，公司派來一位比余年青短小精幹，名叫陳金石者，配合余策畫開發農場，陳君中興大學畢業，係何頭家妹夫之內姪為人精明幹練，充滿正義愛心，對公司建樹良多，開發鯉魚、西湖二處大型農場時向政府爭取水土保持設計工程，農道補助經費可觀，余主持農場開墾現場督導，半年後主要工作定案，要配合三興食品廠之需要，向政府立案自營農場栽植溫州蜜柑、無子桶柑，工作準備妥當，到獅潭採購桔苗之便由苗園主人楊先生介紹苗農畢業年青人林政夫君，此君對以柑桔營理略有心得，即於民國五十六年春天與余外甥溫上林同時進入公司服務農場，農場一日一日擴展，工人男女將近百人，柑桔種下後以担水灌淋，工資男卅五元，女廿五元，那時工業尚未發達，農事工人眾多，何頭家對以地方的經濟幫助是明顯的也，陳金石對以農場建設不遺餘力，建大型水庫，建築宿舍瞭望台，等不久又雇用大學畢業之農技人才，但何董事長始終對余信任重用，考驗再考驗，主任一職任何人也爭不走，使他們受過高等教育者，無法想通也。

余雖國小學歷，但受過高等熱帶農技、派出南洋擔當農技指導員，縣農會場副主任管理土地專精等，都受何頭家器重，腳踏實地之忠實中年者，對公司業務幹得有聲有色，對以樹木處分每木調查有高人一等的實際經驗，所以從鯉魚潭農場上百甲之樹木處分每木調查一手包辦，受到頭家的信任呢。在公司服務期間，新人續進退，初期又進駐農場居住年青人莊和正君，此君居心不良能言善舞，日後影響到余之職務。農場開發六年後，因是非帶來不愉快事百出，所以自請調職新成立永森食品工廠，當管理股長，那是民國六〇年之事也，到了工廠一切黑天，牛頭不對馬嘴，苦不堪言也，加上進入更年期腰酸背痛，自知前途暗淡，自請退位申請當上守衛算了，這一看雖對職份低落，但對家庭事業（洋菇栽培）幫助可大矣。以妻做人睦鄰人和，日益擴增菇舍至停飼乳牛後，將牛舍又改栽洋菇時共四棟，菇舍三百多坪也，栽培洋菇將近十三年，雖無莫大利益，但對余子女眾多的家庭帶來十分有利的工作環境，正在旺產期，夫婦從星夜十二點一直採洋菇至天亮，而讀國中以上的孩子們從早上四點全部叫起切洋菇，後六點多才各自上學去，以此對兒女們養成勤勞苦幹的好氣質，有十分難得的機會也。余早上又要載送洋菇到檢收站、又要上班又到中社看田水走個不停，但家境暫進入情況，而女兒一個個進入高中、高職就讀，老二又考上私立世界新聞專課學校，孩子們的學費負擔生活費等實在驚人矣，幸得有洋菇這個事

業在鼎助，女兒一個個畢業後出社會服務結婚生子，而余感到一年比一年擔頭漸輕了，但是余的人生過程在海外戰場到永森公司沒落成爲守衛受到人爲故害，病災人禍樣樣受過。四十五歲時胃十二指腸潰瘍於英外科開刀、五〇歲前後在銅鑼回程，於三義砂廠前被卡車車輪飛出打中機車，夫妻倆發生大車禍，又被送英外科入院急救，從死神手裡搶回生命，從此年起所謂大難不死必有後福，老頭家關心余住院期間二次探望，這是很不平凡的事，小小一個職員能得大頭家之關愛使其他高級職員感到意外。

余退院不久，得到陳經理金石轉達頭家命令，要余回到西湖農場上班，挽救將被人爲荒廢之農場回復昔日面貌。如此一來對那些專做表面，暗裡害人的小人之輩當頭一棒，所謂路遙知馬力，事久見真心矣。余從此將應得了主任職退讓給政夫，並全力扶助他不出三年將枯萎之柑樹管理回復產量打破歷年，得到十分優良的成績。從此家庭經濟一年一年好轉，回到西湖農場不到三年，金石經理舉家移民阿根廷，他是余之再生恩人，余有今天之環境，完全由他成全，當永遠感謝矣。

民國七十二年受蔡經理之命到枕頭山農場接代理主任又任，又將那荒蕪的農場下大功夫，挽回成爲美麗的農場了。

- 十、 穩定中建立家庭基礎：源兒從軍中與本鄉望族連玉龍先生第四千金月英小姐結婚，服役壹年拾個月退伍，本考上此間裕隆汽車新設廠電氣科，但源兒考慮後選擇自己創業的職途，當時雖係民間建築旺季，但水電業競爭機激烈，年輕小伙子一時想要混進市場非易之事，經過一番苦鬪以及親朋之相助，源兒自身之努力，誠實可靠爲做人之原則下，漸次進入狀況，於水美租屋設行，擴展業務。小孫女相如出生，小孫女眉清目秀發育良好，十分可愛，兒媳婦管理業務認真能幹，不久就進入狀況，夫唱婦隨，余感到欣慰並無顧慮。民國七十一年冬源兒提議改建洋房，當時雖經濟尚非許可，但利用民間互助會之鼎助，經過將近十個月時間落成了二樓半洋房，新居落成宴客四十多桌親朋。

余平生做夢都不敢盼望有洋房居住的日子，竟然實現了，想起父親您如健在，共享天倫該多好，爲了紀念父親之忠孝爲人，余將新建樓房號爲「忠賢樓」諒吾畢生苦難的父親在天之靈鑑納兒孫的敬意吧！新居花費約壹佰柒拾萬元，水電由源兒自理，住的問題解決後，買了一部喜美小汽車代步，上下班不受寒風細雨之苦，住的行的一一安穩解決，女兒各自成家立業，甚感所花勞苦沒白費，最大缺

憾就是吾兒是君之先天疾病無法治癒，這就是余的無可言論的缺德之報應罷了，所幸其兄嫂處處加以愛護發揮無上之愛心使余安慰有加矣。七十五年秋天第七女兒文妃出嫁台中王漢樞先生二公子振興君，夫婦同爲於裕隆上班但於七十六年春舉家遷居美國加州聖地牙哥去了，七十八年源兒於廣盛村八股路買了新店面，地點相當，屋內深間、地理相配，搬進新居以後事業進展，人丁平安鴻福，將來必有吉祥之兆也。

余服務公司廿五年，滿六十五歲，人生之過程曲折離奇，至此回憶人生，可說悲喜參半，爲人的心得，最重要的莫過以忠、孝，對家庭子女負責、對社會朋友愛心與忍耐，知足常樂，進入人生終點前只求人生健康，兒孫端莊發展則可含笑地天矣。

尪女香伶得天獨厚，加上天資聰敏，從出生至大學無憂無慮，她的腦海裡充滿了希望，可惜生以非富人家，父母兄姊雖也開明之輩，但可靠能力有限：希么兒應養成刻苦奮鬥自力更生的精神，向自己的理想目標邁進，受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預祝她的前途光明，得到最後成功也。回憶到此擱筆以後再作補充，淺讀詩書寫得不成文章如有錯字希請更正是盼。

一九九一年元旦 賴江河 筆

附錄二 社會變革取徑與有機知識份子的實踐論

有關本文的知識與方法論，在口試時幾位委員建議直接放在文末或以附錄方式處理，因為本文的探究核心是運動的實踐回觀，就書寫與閱讀的轉銜引流，產生斷裂、干擾的作用，因此關於文獻回顧部份以附錄方式呈現。

本文以「運動讓人有機」的意識轉化為主的探究，在我 16 年的社運實踐中，社會變革取徑的實踐觀對我的政治性出土及台灣左翼運動的發展有相當的影響，誠如夏林清所言：「運動是以認定或想成為運動取徑之工作者，不離不棄自己置身於其中的『結構性位／處境』，並在自己特定的那個位子裡，轉化社會壓迫，一路走去。他在實踐的過程中持續發生著對社會壓迫、人的痛苦與變革力量和自己作用關係的辨析，這是一個認定、想望與方向，亦因而想發展自己與他人之間的支持參看與互助學習的連結關係。」（夏林清, 2006a:232）

要奪取空間回觀自身，又在不斷的實踐中與運動挫折、困境同處，16 年來我因為工運局勢的變化而轉換過幾個位置，每一次的位置轉換(見第一章初分三個階段的歷程)都與運動發展的條件變化有關，隨著承擔責任的加重，沒有太多條件梳理自身經驗，就以 2003 年初我剛離開勞工局到工委會時，2003 年中起就展開了總統大選的百萬廢票運動，2005 年又再推出人民老大參選行動，一系列的運動目標都是對著藍綠政治鬥爭的歷史結叢，以社會運動的抵抗行動試圖鬆解、重構壓抑在不同個體身上的扭結，每個不同階段發動的議題反應了我們對社會變革的想望，只是這些運動對我一個尚未解開自身政治性的運動者而言如此沈重，時而因困惑不解而停滯，時而清澈意識到自身的斷裂、殘缺。

開始會辨識／理解「差異」的社會性，與在實踐中經驗到的挫折、沮喪有關，運動者帶著任務行動，對外面臨即存體制難以撼動的現實，對內又在組織能量、條件不足的限制下，我經驗了無力承載卻又不能逃開的身心擠壓，細讀夏林清以「不離不棄自己置身於其中的『結構性位／處境』，並在自己特定的那個位子裡，轉化社會壓迫，一路走去」提出“運動”的意義，在其投身台灣三十年的弱勢政治、社會心理、教育體制的變革等實踐經驗中，提出對於社會運動者企圖完成自身「個體性」的理論探究，理解「差異」就是辨析「社會壓迫、人的痛苦與變革力量」和自己的作用關係，在這個認定中我對個體政治性有了更深的理解。

第一節 文獻回顧與理論探討

1.1 脈絡化的解放之路—行動科學之實踐觀

辨識差異就是理解自身與認識他者的過程，而其基座¹⁷⁵就是來自於與弱勢者共同實踐的社會運動場域(夏林清,2009；王芳萍,2009)。夏林清在「實務取向到社會實踐」一書中，提出對行動研究的認識論，基本上行動研究是在實踐的過程中獲得(生產)知識，行動者以意識到自我的衝撞與碰觸到難以撼動的社會文化情境時，得以對自我及所處情境發展出有意義的理解。(夏林清,1993)

這既是行動研究的認識論中強調的於行動中的自我反映(self-reflection)，回顧我的16年運動歷程，每個階段都累積了行動者的自我覺知與辨明自身與生活世界關係的認識。本論文會使用行動科學的理論基礎，主要跟我所屬的運動陣營有關。解嚴後回台選擇側身學院負擔著運動資糧補給與人的轉化工作的社會實踐者夏林清(夏林清,2006；吳永毅,2009)，在其30年的運動實踐中，有意識的使用Donald A Schön的行動研究理論¹⁷⁶，從自主工運的參與開始，發展出有關工人意識轉化、勞工教育方法及團體動力實驗等實踐場域，同時協助運動者有能力轉進不同職域的弱勢運動中，展開社會變革取徑的社會運動實驗。在她與工運導師鄭村棋的影響下，我進入了台灣自主工運的歷史脈絡中，成為一個社會運動者，這篇論文即是以我從普通的知識份子因為進入運動而被改造、培養為階級運動中的「有機知識份子」的歷程探究。

而我得以在參與運動實踐的十六年後以工人運動的政治實踐過程進行探究，是在許多的運動同志們以超時勞動的共同實踐中，生產出對運動有用的實踐知識，「他們為什麼不行動——外籍勞工行動策略差別之研究」(李易昆,1994)、「生命從此轉向——工傷經驗、理解與行動」(常建國,1994)、「打造」藍領生涯——從一個勞資爭議過程看藍領工人生涯的限制與迷思(王醒之,1997)、「組織變革的一個案例研究——由行動理論觀點看管理顧問介入的作用」(蘇雅婷,1997)、這些與我共同投身在社會運動中的同志，是九〇年代末期受野百合學運思潮的影響卻選擇往下走¹⁷⁷的社運工作者，在不同的實踐位置中以行動者既研究者的行動理論，提出在組織方法及運動意義中的自我批判與運動知識。

¹⁷⁵ 夏林清投身社運30年，他與一群又一群的實務工作著，進行各種公共參與空間的開拓實踐，在他的〈在地人形：政治歷史皺摺中的心理教育工作者〉及〈走在解殖的路徑中——拮抗同行的社會習〉文中把這個社群實踐經驗稱之為「在地基座實踐小社群」。(夏林清,2006,2009)；陳光興在〈亞洲作為方法〉一文中則以“亞洲內部在地史多元基體”稱之(陳光興,2003:33)：我把他們定義的基座(體)概念進一步延伸為行動者在其中獲得了一參看自身變化的政治——公共空間。

¹⁷⁶ 行動研究理論係指Chris Argyris與Donald A Schön於1970~80年代中對實務工作者為訓練對象，協助他們認清自己實踐行動邏輯與作用後果的過程中，發展了「行動理論」。行動科學是進入社會實踐的一個探究，致力於生產為社會實踐服務的知識。同時，行動科學指向生產出能喚起實踐者批判反映的知識，實踐者能較自由的選擇是否及如何來轉化人們的實踐。(夏林清譯,2000)

¹⁷⁷ 野百合向下走，參考【普通人選立委對話記】——「草根冒出頭·平凡到出汁」訪談文章(郭明珠,2007)及「學運世代的另類抉擇——往上爬或向下走？」給第三社會黨的信，(何東洪,2007)

其中，身為女性運動者，對運動社群中的女性同志有特殊的情感，記得 1992 我以眷屬身份(當時只是柯逸民的女友)參加團體動力工作室的社群聚會，初次見到夏林清、周佳君(時任桃勤工會秘書)等人，就非常好奇她們為何會選擇運動作為志業，還問了夏林清是否做運動很辛苦之類的話，當時她笑笑未答；一晃眼 16 年過去，我與這批為數不少的女性運動者共同努力工作著，每個人的實踐取徑、身形樣貌也不同了，讀著「移動的疊影——我在低地蜿蜒前行的實踐歷程」——張育華(2005)的論文，讓我看到一個女性運動者選擇與工人結婚，把自己「卡進」階級運動的生命抉擇，期間歷經的婚姻、家庭、運動的拉扯辛酸，敬佩育華不離不棄的運動堅持，走在低地不停歇的開墾著堅硬荒蕪的田地；有些不捨是對女性之於承擔家庭的、教養的、生計的壓力，還要在運動中承擔與底層姐妹的集體看見，一連串的運動就是在解放自身。回想自己進入運動並與運動同志結婚、生子，對照育華的辛苦，我是幸運多了，有愛人同志的相互扶持及公婆的無怨協助，讓我在 16 年中可以運動為先、家庭其次的工作著。

另一個運動經驗對照就是日日春的王芳萍，在她初出版的論文——「女性運動者的政治性生成：台北市公娼抗爭和日日春運動紀實」(王芳萍，2009)中，清楚勾勒了一個女性運動者面對運動中的自身，如何與情感慾望相遇相知、回觀「家」的政治歷史及積極任事的運動性，對我回觀自身的運動性、政治性生成有極大的鼓舞作用，因為運動這一條路不只在認識自己，而在於改變自己，我們走的這十幾二十年的實踐之路，改變已經發生，只是不同運動者的自我改造歷程，有個別人的差異性，其政治性的生成也各有殊異。

參照他們的實踐知識與運動路徑，我的經驗在運動社群中略有不同，會著重在個體政治性與「慢政治」實踐的探究，與我 16 年的運動期間，自 2003 年後到工委會工作始，我清楚經歷了自主工運的弱化，這個弱化與我們這支工運陣營對峙政黨政治的路線選擇有關，尤其，工運發展又與台灣特殊的政治歷史、經濟發展造成社會劇烈變化相互影響，在此階段中我看著各式新興運動的出現，有些議題在新的政治結構下成為運動的主流，工運難以成為階級運動的火車頭，我以工委會轉型(／進)視框來理解我認為的工運弱化，身在工運實踐與階級政治行動的代表性位子上，此「脈絡化」的實踐探究(inquiry)拓印在我的政治性生成中。

1.2 工運的意識形態鬥爭脈絡

本文除以探究行動者在運動過程中的改造外，對應於解嚴前後台灣的政治民主化，台灣工運圈內部展開的路線區辨與鬥爭¹⁷⁸，即是反應出與既存政治社會中

¹⁷⁸ 工委會長期以不統不獨的運動主張與以統為前提的勞動黨及以獨為依歸的勞工陣線（新潮流

宰制意識的鬥爭。我所指的意識型態鬥爭脈絡，溯其源頭是以解嚴前「反威權統治」而形成一股反國民黨控制的社會能量，在五〇年代末台灣改以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模式後，人民的經濟狀況獲得改善，兩岸關係趨於開放，在都市中產階級及知識份子、工人、農民等走上街頭，要求政治改革及各種反污染、要求保障農產品價格及改善工人勞動條件的社會運動此起彼落，在此力量的推波助瀾下，1986年9月台灣的第一個公開的反對黨—民進黨成立、1987年7月15日國民黨中常會表決通過了解除戒嚴令。(何雪影，1992：40)

在政治解嚴的社會變動中，民進黨新潮流系的社運部門(如勞支會、勞工陣線)在組黨前即主導了不同議題的社會運動間的串聯或幕後協助¹⁷⁹，並以民族解放的「台灣人獨立建國」為共同政治理念，召喚著台灣中下階層人民，打拼出反對運動的街頭群眾與政治認同符碼(黃泰山，2005)。同時，因著1979年美麗島事件的政治逮捕後，部份政治人物因其政治受難者身份，被譽為台灣的民主鬥士，並在民進黨以議會路線取代街頭路線的選舉戰役中，這批政治菁英在九〇年代中快速成為本土力量的政治代表，取得地方政府、國會議員等參政權力，在2000年總統大選一役，號稱「台灣之子」的陳水扁贏得總統大位，本土政權的政治力量發展到最高點。

在號稱「不流血革命」的政權交替中，台灣被國際譽為亞洲民主燈塔。但回溯這個台灣人本土政權快速取得戰果的敘事，在我經驗到的工運力量分立與鬥爭過程中，本土政權所發展、主導的「台灣人」論述凌駕了各式草根人民的聲音，在政治社會中藍綠分化的主流意識擠壓與挾持了底層、弱勢、多元化的社會民主論述。二千年民進黨執政前，陳水扁總統曾以「新中間路線」¹⁸⁰的論述試圖擺脫統獨內耗，接續「快樂、希望」訴求，並加入總統層級的「國家安全」及新世代願景(孫慶餘，2003)；此乃民進黨佈局總統大選，爭取5%中間選民的策略之一，在當時國民黨與親民黨分裂的情況下，民進黨估計必須取得3成8的選票，方有勝選保障，而提出「新中間路線」不只是為爭取中間選民，亦是為說服美國接受

系脈)，就自主工運的政治路線爭鬥近廿年(林子文，2004：60-63)，2004年工委會提出總統投廢票的主張，邀請統獨傾向的運動團體再對話，並重申運動團體應跳脫藍綠政黨情結，因為過去的統獨爭議、國家定位問題，大大壓縮了台灣自主工運的空間。(2003秋鬥高峰會緣起，工委會，2003：3)

¹⁷⁹ 以工運為例，80年代末新潮流系尚未完全投入公職掛帥的選舉路線，他們採取「政治運動社會化」的路線吸納解嚴後新浮現出的工會幹部，新系的台灣獨立亦是他們高舉的「三面紅旗」之一，在統派運動團體勞動黨吸收不少工會幹部後，新系亦從少數知識份子組合的界限中轉向吸納工人，以爭奪工會領導者的支持。(何明修，2008：93)。

¹⁸⁰ 「新中間路線」是1999陳水扁赴英國訪問時的演說主題「臺灣新中間路線：一個全新的政治視野」，原先提出「第三條路」論點的英國社會學大師紀登斯是為了處理中左派政黨在福利國家的過分擴張問題而提出向資本主義修正的治國方針，在具有社會主義左派傳統的英國雖然往右傾斜，但在基本上還是保有左傾的社會主義色彩；隨著布萊爾的「新工黨」在一九九七年的選戰中大獲全勝，由他所構思的「第三條路」也就一時蔚為風潮，成為德國社會民主黨與法國社會黨所推行的「新中間路線」的參考藍本。(黃瑞明，2002)

陳水扁的理由¹⁸¹。

只是這個「新中間路線」在陳水扁上台後不久，即在拼選舉的政治考量下失去了社會輿論的關注，繼之上演的還是藍綠政黨間以選舉操弄族群、兩岸對立等議題，原本第三條路所揭示的社會民主改革根本上不了政治檯面。民進黨原本就非左傾政黨，其以少數選票取得國家的領導權，台灣人／本土政權的勝利是其與支持群眾間的主要結合點，因此，在民進黨政府上台後，更有資源在市民社會中進行其對國家主權、定位的方面的意識霸權，對基本盤進行更實質的影響，至於對社會結構調整的作為亦是以服務於取得政權的需要來衡量的，諸如對勞動體制的修惡(如勞工退休金改制)、促進資本流動(稅制鬆綁)等，與國民黨執政時的思維相去不遠，甚至變本加厲。

然而，政治上首次的政黨輪替，對台灣社會仍有其進步性，特別是對民主化進程的樂觀見解，一般評論都稱台灣已進入兩黨制衡的時代、政黨輪替是民主常態等論調，「做不好就下台」、「換人做做看」的說法，讓一般公民更認同選舉是落實民主、人民展現主人實力的工具，民進黨上台似乎標示了投票式民主的優質與深化，人民真的當家作主了。在此背景下，社運團體想要突破藍綠兩大政治集團所建構的政黨政治民主論述，揭露兩黨各自犧牲社會弱勢以維護或加速資產階級積累的政權本質，較之在過去國民黨一黨主政的年代更為困難。

1.2.1 陣地戰—工會自主化運動

如何在運動上以「不藍不綠」、「不統不獨」的階級優先論述，與國家統合主義或資產階級民主的宰制意識相抗衡，台灣在解嚴後的工會「自主化」運動中，工委會以實踐「人民民主」的路線¹⁸²，採取各種基進公民運動，以工人秋鬥遊行及批判公共政策到工人草根立法，以鬆動資產階級所形控的文化霸權控制。因此，本文的理論探究將以葛蘭西¹⁸³的文化領導權梳理我所參與的工運實踐，葛蘭西以 19 世紀末至 1930 年代的晚期資本主義時代的市民社會為分析對象，他認為市民社會早已受到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的侵蝕，成為統治階級的一部份，而市民社會內部還存在著壓迫性，只有把社會變革的力量建立在工人階級身上，以建立一個新的市民社會，如此才能真正擺脫資本主義國家的真正宰制(黃德北，2009)。

而以解嚴後形成的工會自主化風潮(何雪影，1992：49)來理解台灣工運進行

¹⁸¹ 1999 年 3 月，陳水扁提出新中間路線，民進黨亦配合於 5 月黨員代表大會中通過台灣前途決議文，承認國號為中華民國；11 月又提出中國政策白皮書，將兩岸政策進一步轉型。(中國時報，2000)

¹⁸² 根據 Laclau & Mouffe 基進民主理論發展的偏向古典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論。(吳永毅，2009)

¹⁸³ 安東尼奧·葛蘭西是義大利政治學、新馬克思主義學者。其政治思想形成受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與列寧主義的影響甚深，而其對於西歐工業化國家為何無法在十月革命成功後相繼獲得勝利，反而造成意大利法西斯政權上台、德、奧等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失敗，他，就意大利及西歐的歷史現狀做了全面的分析，而提出了領導權理論，並形成了對「市民社會」與「知識份子」等觀點的重新理解。

的攻佔市民社會及爭奪文化領導權的關係：所謂的工會自主化運動對抗的是自 1949 年起國民黨（兩蔣執政時期）以威權體制掌控黨、政、軍、特等正式與非正式組織，層層往下控制了政治社會及市民社會的政治與文化霸權。在五 0 年代起國民黨採取政治戒嚴箝制了人民的言論、結社等權力，並以國家統合主義¹⁸⁴、侍從主義(clientelism)等內部控制及派系利益交換的手段，在市民社會中達到在國家機器的內外部均得以被有效動員與掌控的效果(陳明通,2001)。

台灣的工會組織體系，亦是在此政權統合宰制下的產物。1987 年解嚴後，政治社會略已鬆動，政治民主轉型階段¹⁸⁵，台灣的自主工運以檢視勞動法及經濟利益的分配權，進行長達廿年的草根立法鬥爭，1988 年起以苗栗客運罷工引爆的工潮(何明修，2008：53)及 1992 年之後以勞工教育、工人立法及對抗藍綠政治的工人「秋鬥」，就是與統治集團搶奪文化領導權的陣地戰之一。1994 年起全台各縣市自主工會幹部相繼以籌組產業總工會來衝破工會法的限制，並在法令未鬆綁的違法狀態中，政府部門以行政權認定該等組織的正當性，但產業總工會的運動發展至今大部份是以取得合法性、政府補助款的利益為主，工人力量未必提升(林子文，2004:82-84)，亦未脫離政治上的統合主義，某些全國級工會組織甚至已淪為藍綠統治集團的馬前卒，甘於成為特權者的御用組織。

但我以自身 16 年的實踐理解葛蘭西所指的「市民社會的政權形式表現為“文化領導權”，是通過家庭、學校、教會、工會、媒體等社會團體，將符合資產階級利益需要的世界觀、價值觀灌輸給被統治者，使被統治者認同其統治的合法性和有效性」(Gramsci, 1976:507)。解嚴後台灣曾經歷過的工會自主化鬥爭即是對威權至後威權時期，國民黨統治之「恩庇—依隨」的二元聯盟所宰制的統治意識的重要對抗陣地，林子文所指的產業總工會運動，至今仍受到新的國家統合主義的控制，但亦有些例外，如長期受工委會路線影響的台灣倉儲運輸工會聯合會，其雖有向政府立案登記，但在 90 年代中期起已是歷年秋鬥的主力部隊，在挑戰私營化、財團化、反派遣勞動的運動中與統治集團力抗到底；而工委會在運動中拉出的對抗陣勢除了自主性工會外，更與其它運動組織進行合作，如：進步學術界、基層教師組織、社區大學、文化音樂等領域，在市民社會中進行聯合戰線的編織。

台灣政治解嚴後廿年，工會運動亦從分進合擊的工會自主化轉變到 2000 年政黨輪替後三足鼎立的工運期(林子文，2004:88)，改造工會的自主化階段若做

¹⁸⁴ 統合主義：指國家機器跨越傳統社會部門，以經濟產業的分際來垂直分割社會，把個人強編入法定職業團體，包括資方的產業組織與勞工的工會組織。國家機器透過給予這些社團壟斷的代表權，以換取該社團領導者挑選與利益要求的監控權，而獲得該團體的有效動員與支持。(Schmitter, 1974:13; Kaufman, 1977:111)

¹⁸⁵ 此部份的政治變遷歷史分期參考「派系政治與台灣政治變遷」的分期，在解嚴、強人過世至今，當時的政治特徵是政治自由化與民主化，反對黨成立、第一中央民意代表全部退職，過去的威權統治鬆動。(陳明通, 1995：12)

為葛蘭西所指的攻佔社民社會一切陣地的陣地之一，其在進入政黨輪替後的民主轉型階段時，工會除在經濟結構受到擠壓時勉強發聲外，面對兩大政黨用以鞏固其文化統治論述的民族／國族主義論述，台灣的工會體質現階段仍無法承擔、處理政治認同差異的陣地¹⁸⁶，必須發展出不同的陣地以持續戰鬥，思索與嘗試陣地的轉移與葛蘭西指出的“有機”知識份子的實踐行動有關¹⁸⁷。

我以葛蘭西的霸權轉變理論，就我所曾參與過的工會自主化、人民參政行動及勞動政策批判等視為是攻佔市民社會的陣地之一，16 年的運動歷程發生了知識份子有機性的自我改造與改造社會的文化與意識型態鬥爭。要能發動與領導霸權移轉的鬥爭，葛蘭西對知識分子的特殊社會職能有所考察，他指出知識份子並不構成獨立自主的階級，而是分別隸屬於不同階級，他們是政治社會與市民社會的活細胞，建構著本階級的意識型態，知識份子不僅掌握宣傳工具，還肩負著市民社會建立“意識型態結構”(如教會、教育體系、工會、政黨…等)的重任。

在我所參與的工運陣營，90 年代即已投入學生運動的知識份子，沒有選擇進入主流政治運動中等待接班，而是在實踐草根民主的工會自主化運動中進行自我改造與改造社會的低地工作著，至今長達二十年之久。知識份子的有機性在不間斷的運動洗鍊、政治行動中發揮著群眾的教育與組織作用。

1.2.2 工運與政治社會的鬥爭

工會自主化運動是奪取文化領導權的陣地戰，如何抵擋政治社會對市民團體的收編、整併是運動上得時時面對的挑戰，以我參與的運動陣營—工委會為例，面對政治轉型的社會動能，我們在不同時期採取了不同形式的文化鬥爭，藉選舉時機推動「人民作主」的政治教育；1994 年推出「以上皆非」選制改革運動、1996 年台灣首次民選總統，2000 年總統大選、2004 年政黨輪替後的總統大選，我們設計了「與總統有約」、「工人睹總統」、要求「四 0 工時」的訴求、百萬廢票運動等，這些行動背後的基本主張從「有奶便是娘」及「等距外交、等比結盟」，在 2000 年的政黨輪替及之後的政治局勢中，我們再以「不藍不綠」及「批藍批綠」的批判論述實踐「罷免藍綠、走自己的路」，2004 年的百萬廢票運動既是以左翼政治的主張與藍綠政黨對抗。

社運與政黨的關係有各式主張：「施壓論」、「交換說」、「反輔選」等，這些主張無非是對應著從國民黨執政時以推出勞工立委以進行政治收編，到民進黨上台後對工會組織的控制亦仿效國民黨的作為，扶植親執政黨的工運勢力(黃德北，2003)，對政治上支持民進黨的工運團體提供龐大資源。這些交換、施壓或

¹⁸⁶ 主要因素是受限於工會幹部的階級認識及在特殊政治歷史中工人群眾對藍綠認同的差異性，現階段的工會組織無法成為挑戰政治認同的承載者，但不代表個別工人群眾沒有清楚的階級意識。

¹⁸⁷ 參考火盟論壇—「學運世代的另類抉擇—往上爬或向下走？」(李易昆，2007)

許一時間可得到小恩小惠，但長期來看則是讓兩黨的政治酬庸、對頭人的分封、拉攏(如：在勞工立委(不分區)、勞委會主委、國策顧問等)等作法有效影響著運動力量的走向，對階級意識的覺醒相當不利。

1.3 社會性與歷史質：主體性探究分析

從行動科學的實踐理論探究行動者自我意識轉化的過程，再以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轉變的陣地戰檢視台灣自主工運於政治歷史脈絡下發生的弱化、轉進，此自主性力量在 2000 年政黨輪替後遇到的更嚴峻的挑戰：生產關係與產業結構變化、社會支配關係的逐漸穩定，體制內外運動關係的競爭、對立。更全面的社會文化論詰圍繞在民進黨政權以民族／國家主權的爭論替現了社會階級間的矛盾性；統獨／藍綠的認同再再擠壓著草根民主運動的開展，我以自身的反身性探究，進行主體性、政治性及階級關係的探究，提出「慢政治」運動的文化旨向，以突破多重複雜的政治結叢，為我所察知的運動困境找出路。

1.3.1 「另一種主體」概念

亞蘭·杜漢(Alain Touraine)從質問傳統社會學對社會系統的分析展開了其逆向性定義社會運動的視框，就衝突模式的三個面相：集體行動、鬥爭與社會性運動，重新置放社會情境對社會性運動的關係「社會情境是各社會性運動之為了爭取對文化模式、對歷史質做控制而爆發之衝突的產物」，界定了社會性運動非對情境之反應而是創造、變革情境之文化性對抗，此一逆向性分析是以替現社會學以傳統到現代、機械連帶到有機連帶到的進化論式而生的；在此逆向性分析中，杜漢進一步提出「另一種主體概念」的生成：「如果文化模式唯有透過相對立的社會運動之間的衝突，才能轉為社會作為，那麼他們也一定會為了投注模式和開創規範，而與這些作為脫離——這一切都意謂著反身性(reflexivity)、抽身(distanciation)——和採用西方文化傳統中根深柢固的詞彙——意識(consciousness)。」(Alain Touraine, 舒詩偉等譯, 2002: 202)

歸根究底，杜漢提出的社會性運動與主體間的關係，是從行動者對歷史質的社會形式發出質疑的行動來界定「主體」。從而，此主體的位置與階級觀念不能分開來看，行動者對歷史質的政治社會進行鬥爭，追求自由與責任，「公民自體性」(citizenship)在台灣民主生活中與名份政治逐漸脫離(丘延亮, 2008: 46)，既是一解殖的、人民性的主體建構過程。

以我的實踐歷程來看，從工運的鬥爭性行動到「公民自體性」的建構，試圖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人民與國家」的權力關係中拉開「人民與人民」間相互辨認、參看的距離，讓「主體性」得以被行動者自身辨認；在此，主體性代表著一種價值，一種追求集體解放的自由，掙脫政治經濟的壓迫或從宰制的意識

形態中鬆脫(吳維豐，2007：73)，我認為「慢政治」得以讓個人(或集體) 建立其「另一種主體」是與杜漢所指的一反身性、抽身(丘延亮，2008)及實踐取向哲學(P. Lather，1986)之「實踐」——「探究的民主化過程」¹⁸⁸所持有的立場相通的。

再以葛蘭西對於資本主義社會“國家”的定性¹⁸⁹來看，「慢政治」運動概念是在對峙國家一強制力量保障的霸權——以其統治順服所進行的社會秩序既存體制中，進行反抗、抵制的社會性運動，並以行動者意識其歷史質的位置完成其自身「主體性」、「政治性」的探究民主化過程。

因此，不論是在工會、民間組織、社區等市民社會中所進行的各式文化性鬥爭，我們從對抗資本主義生產資關係中，進一步以勞動公民、社區居民或深嵌入不同地方派系關係中等既複雜又真實的政治身份，進行改變政治認同的嚐試，如：投廢票、推工人參選市長、抗議選制不公等政治行動，雖然行動本身的表現形式略有不同，但均是對抗上層建築對人們產生「順服」的虛假意識，試圖在搶奪文化領導權以進行社會變革與行動者主體性的建構。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是以我參與工運的十六年歷程中，經由回顧不同階段的實踐經驗透過回觀談話（back-talk）的「敘述探究」（narrative inquiry）材料中，梳理自身意識轉化的過程，而此過程得以發生或在運動既有條件的擠壓下以論文的形式開啓探究的行動，這個書寫的行動本身就是一種實踐，透過研究者即行動者與介入者的行動研究方法，有關從工運實踐經驗到探究「慢政治」運動的發展過程，才得以在對抗既存政治社會的現實世界中被「辨認」成形。

我從辨識差異並知覺到自我改造的轉化歷程中，個體政治性生成的特殊意義，這個過程即是 Schön 所稱的「與情境的反映對談」（Schön,1983：163）。實踐取向的研究與批判民族誌或實證主義的客觀現象分析最大的不同在於其社會變

¹⁸⁸ 實踐取向的行動研究，此研究路線是建立在以下兩個假設之上：1. 人類科學已由實證主義時期(a positivist period)向後實證主義時期(a post positivist period)發展；在向後實證主義時期中，我們企圖尋找一種「解放的科學」(an emancipatory social science)。解放的社會科學可以協助我們不僅是去了解社會權力與資源是如何分配的，它同時也要能協助人們為了創造一個更公平的世界而去改變那些不公正的分配。2. 研究者及他的研究行動明擺著是指向建立一更公正的社會，因為他對既存社會現況的批判及致力於建立一公正社會的立場，不但不避諱，而且抱持一投入承諾的姿態。其特徵有三：協商(negotiation)、互動(reciprocity)、啓動力量(empowerment)。(夏林清，1993)

¹⁸⁹ 葛蘭西在《獄中札記》中指出：「我們目前可以確定兩上層建築“階層”：一個可稱作“市民社會”即稱作“私人的”組織的總和，另一個是“政治社會”或“國家”。這兩個階層一方面相當於統治集團通過社會行使的“霸權”職能，另一個相當於通過國家和“司法”政府所行使的直接統治或管轄職能。這些組織都是有組織的、相互連繫的。」(Gramsci, 1976:507；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7)；葛蘭西認為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包括了政治社會和市民社會兩個層面，國家不僅是政府機構，而且是“民間的”領導權機構，“可以說國家=政治社會+市民社會，即強制力量保障的霸權”。(任潔,2008)

革的積極性是以社會轉化與社會運動為主題，同時其研究者非以中立的立場進場，而是以選擇面對與介入變革的姿態行動著，在實務工作者學習自我批判與探究現實問題的研究之際，也推動著專業形式與內容的變革(夏林清,1993)。

以實踐取向研究進行社會運動者探究自身意識轉化的行動，就是與各種社會主流價值對話、被影響的對抗過程，對特定現象的了解分析(理論)與探究(研究策略的實施)兩者間來回的修正與確認，在具體運動推展中發展出具社會變革的政治行動與學習歷程，從實踐中建立出「解放的知識」。

2.1 行動研究的基本立場

本研究採取行動研究方法，主要關切「變革」的取向，並在根本上對專業主義採取了一種反思的觀點與立場。由 Chris Argyris 與 Donald A Schön 致力發展的行動科學(Action science)，一個描述與分析隱含在人們行動中的規則與邏輯的理論，其中 Schön 特別致力於反映思考的發展¹⁹⁰。Schön 認為從實務脈絡外所發展出來的統一知識是無法適用於實務工作，而實務工作者本身正是需要也能夠進行研究的關鍵人物。

此種反映理性摒除了「科技理性」¹⁹¹對於知識生產的階層關係，在 Donald Schön 有關「反映實踐」的幾個專業實踐的分析中，他陳述了專業知識和專業行動間的幾種不同的關係，並提出三種行動類型：1. 行動中的內隱認識 (tacit knowing-in-action)：指實踐者簡易、例行事務中，是依循著內隱的知識，這些知識是不該被排除在專業行動外的。2. 行動中反映 (reflection-in-action)：當面臨新與複雜的情境或例行行動被令人困擾問題所干擾時，行動者與現實結合做成可轉化成行動的實驗，在行動中推進對事務的探究。3. 對行動反映 (reflection-on-action)：當我們有需要明白地用口語化來建構或形成知識時，我們便會在某些時刻對自己抽離出行動並且對行動進行反映。(Altrichter, Posch & Somekh, 夏林清等譯，1997)

¹⁹⁰反映思考基於反映理性(reflective rationality)，其基本假設如下：

1. 複雜的實務問題需要特定的解決之道。2. 這些解決之道只能在特定的脈絡中發展出來，因為問題是在該脈絡中發生與形成的，實務工作者更是其中關鍵且決定性的因素。3. 這些解決之道並不能任意的用到其他脈絡中去，但是他們可以被其他實務者視為工作假設，並在他們自己的環境中進行檢驗。

¹⁹¹以科技理性 (technical rationality) 的觀點，「研究」是為了教育的創新而生產一些理論，其結果是一種信譽 (credibility) 的階層制，此一信譽的階層制對實務工作者極度不信任。科技理性中，實務工作者是在理論知識低層工作的人，他們只不過是運用了由權力高於他們的人預先界定的知識。

2.2 自我敘說(self-narrative)／故事¹⁹²回溯

本研究的自我敘說(self-narrative)／故事回溯是一「對行動反映」¹⁹³的探究，對我過去十六年來參與的運動歷程反思，聚焦於行動者對於台灣政治歷史的斷裂與接合的感知，以自己的敘說的文本對行動進行回觀的審視。Schön 所稱之為「行動中反映」的回視行動即是自我敘說的探究歷程（self-narrative inquiry）。

故事敘說與故事分析能夠催化一種反映的進行，因為他涉及了一種引導實踐的隱藏性建構。故事指出了深層的信念與假設，而這是人們常無法以命題或概述形式來訴說但卻引導他們行動的實踐理論及深刻而特有的意象（Schon, 1991. P. 263）。

藉由整理過去所累積的不同階段／目標運動實踐經驗，探究行動者在實踐中的「內隱知識」，同時在不同階段經驗到新與複雜的情境時，行動者如何與現實結合朝向發展出得以脫困或轉化的行動，而此時的探究目標是以朝向建構或形成對實踐有用的知識。對運動的實踐者而言，要把運動場域中複雜且變動的感知轉化為得以辨稱的知識或方法，本身就需要一個反映的過程，而故事敘說與分析的方式正是得以一種催化出實踐者的隱藏性建構知識，在故事性的思考過程中，有關實踐經驗中的細節得以被安置與協調出有意義的整體。

2.3 協同探究(collaborative inquiry)

本文是行動者的回觀探究，從集體的實踐中提取行動者自身之「主體性」、「政治性」生成的行動研究，在工運實踐反映在對既存政治社會的「抗爭脈絡」中，個體政治性與運動社群的「慢政治」運動有密切關聯，不同的行動者面對既有社會環境、政治結構的相互影響，行動者在結構中各自發展了不同的反映能力，此亦是「慢政治」運動所指稱的意識轉化概念之一，在集體踐行的認知下朝向「社會變革」力量的凝聚才得以接起、互生。

因此，從實踐中生產有用的知識，行動者就是研究者，行動研究是在真實的社會場域中進行的，與一般知識生產的方式不同，研究者即是行動者二者不可分

¹⁹²故事／敘說，基於故事性的思考(narrative thinking)，簡言之就是在理解或創作故事時所用到的思考歷程(Bruner, 1986)，故事性思考運作時，會主觀地選取細節，並將這些細節結合成一個彼此協調且有意義的整體(Wong, 1994)。

¹⁹³「反映」是使我們和活動發展一定的距離，抽離出行動專注在行動的資料上，這些資料以一種行動的客體化形式出現。本研究特別著重在「行動中反映」，因為其對研究者有二重作用：1. 它增進了我們分析和重組知識的能力：有意識地進行反映，減緩了行動的速度，干擾了例行性行為的流暢性，但它催化了對行動的細微分析，而這使得我們得以規劃變革。2. 它增加知識的可溝通性：在專業行動下的知識是可被看見的和得以和他人(如同事、當事人及其他團體)溝通的。(Altrichter 等， 1997)

割，行動者依靠自己的實務經驗與研究對象間就如何有效的行動進行協同，而不是把研究對象視為觀察的客體在對待。本文的協同探究既是實踐者與服務的對方共同投入的研究關係¹⁹⁴；此研究關係的歷程，Lather(1986)提出嚴謹的研究程序來提示初學者如何進行協同探究的歷程：1. 要以一種互動、對話的態度進行訪談；研究者自我開放的目的，在於和研究對象協同地尋求更深刻的互相了解。2. 爲了催化協同了解的關係以及對研究議題的深入探測，進行多次系列的個別與小團體訪談是必要的。3. 對研究資料及現象所指涉之意義的協商。

對我而言，本論文研究亦是行動者的實踐場域之一，以回溯敘事的自我探究爲引線點，協同探究行動爲軸射面，在此二者相輔接合的探究過程中，梳理出「慢政治」實踐中的豐厚社會學習。

2.3.1 協同探究過程的設計與程序

行動研究透過兩個方面進行，一是行動者的回觀敘事探究，從我的生命敘事中看見自身政治性出土的階段變化；二則是以運動社群的集體實踐經驗，從工運到公民政治的運動轉進歷程中提取「慢政治」與人的意識轉化之協同研究。本文之協同探究對象以資深的運動者爲主，就我們在不同階段經歷的運動進行協同關係、運動方法及人的意識轉化的對話與經驗參看。

在夏林清老師的行動研究論述與方法的指導下，我邀請不同運動位置的工作者共同進行自我反映、對話的過程，過程中有何燕堂(前工委會執行長)、柯逸民(前南山人壽工會總幹事、人民火大行動聯盟發起人)、張通賢(台北縣聯結車職業工會常務理事)、王秋月(台灣倉運聯總幹事)、陳柏偉(工人樂團—黑手那卡西團長)、王芳萍(日日春關懷協會秘書長)等，並在論文文本完成後與我的運動導師鄭村棋就其運動實踐經驗進行對話。

對話論壇之行動研究

邀請在不同實踐位子的運動者，透過學習性論壇的設計，將其實踐中所累積的知識或遇到的困惑與其它參與者分享，此論壇的設計本身即是「慢政治」運動的行動之一，於 2006 年起我們即以此形式進行運動經驗的對照與對話，嘗試從個人感知的政治歷史及與運動實踐的關係，勾勒行動者「主體意識」的政治性及

¹⁹⁴協同研究是讓研究對象在與研究者的對話關係中，通過對自己過去習而不察或視為理所當然的信念，獲得對自我更深一層的認識。夏林清指出研究者要能將自己的描述與發現做成結論對研究對象報告，並與之討論他們的感受，進一步的作法是研究對象和研究者一起參與在理論建構的工作中。(夏林清，1993)

差異性的對話，本次論文行動亦舉辦過二次¹⁹⁵的社群討論會。

表6 2006-2008 火盟舉辦之世代系列論壇

時間／主題	內容	對話軸線
2006年6月7日 我、我們與她們 —《生命如河流》 新、馬、泰16位女 性游擊隊的生命故 事	主持人：夏林清教授 與談人：邱依虹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亞洲女性口述 史博士研究生) 顧玉玲(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秘書 長)、張育華(輔仁大學心理所碩 士)、賴香伶(女工團結生產線總幹 事)	運動者循線接起亞洲人民 反抗殖民的政治歷史，透過 《生命如河流》一書，六0 年代出生的台灣女性運動 者以生命碎片的重組來理 解自身的運動性，透過反殖 人民運動中重新認識自身 與社會運動的關係。
2007年11月16日 「學運世代的另類 抉擇—往上爬或向 下走？」	李易昆(蘆荻社區大學主任—野百 合廣場庶務組組員) 來賓：何東洪(輔仁大學應心系助 理教授)、孫窮理(苦勞網負責 人)、王芳萍(日日春關懷互助協 會秘書長)、柯逸民(人民火大行 動聯盟發起人／勞教協會理事長)	野百合世代在90年代中期 似乎成為晉升高位的運動 光環，我們這群在大學後選 擇以工會、弱勢運動為實踐 場域的運動者，經過20年 的運動洗鍊，得以在政治上 清楚拉開向下走的運動取 徑，不離不棄的與政治社會 對抗，讓年青世代得以參對 其與運動的關係。
2008年2月22日 世代政治論壇Ⅰ： 五年級的政治社會 實踐經驗	主持人：何東洪(輔仁大學心理系 助理教授) 與談人：潘翰聲(綠黨秘書長)、 林恕暉(資深社會記者)、顧玉玲 (國際勞工協會(TIWA)秘書長)	回觀野百合運動世代在不 同取徑的實踐中，重新認定 其實踐意義對社會變革的 關係，在工運、環運及弱勢 政治的出路中，這批人持續 戰鬥著。
2008年3月1日 世代政治系列論壇 Ⅱ—六七年級政 治!? 社會!? 實 踐!? 經驗—年輕 人十全大補丸!?	主持人：李玉菁(日日春協會秘 書)、鄭小塔(台北紀錄片職業工 會秘書) ◎與談人：林碗茹(世新社發所學 生、日日春協會義工)、潘祺欽(金 融保險業上班族、日日春協會義 工) 張力元(嘿咻綜藝團團長) 李丹鳳(台灣國際家庭互助協會秘 書)、小火車(anti university 高材生)、黃立慧(國北師藝術教 育所學生、日日春義工)、張迪皓 (台大政研所學生、日日春義 工)、余郡蓉(輔大心研所學生、 北市康復之友協會秘書)、李慈湄 (清大哲研所學生、志願是當個作 家)	不同世代間因著政治、社 會、文化等符碼的認同差 異，運動中如何相互理解、 交融，六七年級生與五年級 世代的運動對話，以主體性 與政治性的差異進行對話。 運動需要年輕世代有機的 投入，卻非以單一、統一的 形式進入，六七年級使用其 自身的條件、能奈與動力， 使用的文化媒介如戲劇、紀 錄片、文學等不同界面進行 運動與自身的實踐。

¹⁹⁵ 第一場次是與資深運動者對話(2009.12.07)；第二場次是火盟社群成員(2009.12.19)

2008 年 3 月 9 日 世代政治系列論壇 （Ⅲ）二年級顧伯伯開講—在歷史差 撞中的生命轉折紀 事	開講人：顧伯伯（前中科院、工研 院工作及研究員／一位十六歲隻 身顛沛來台的少年） ◎主持人：賴香伶（人民火大行動 聯盟發起人／工委會總幹事）	以台灣殖民政治歷史的探 究，由二年級世代處於逃 離、生存、抵抗的生命敘事 中，推動人民之間的對話以 對峙台灣族群政治的社會 性壓迫，拉開生命皺折處， 「家」的政治歷史烙印在不 同個體身上。
---	--	---

製表／賴香伶 2009.11

資料來源／火大行動網 www.nobnog.org.tw、苦勞網

在不同世代經驗與對應軸線的編織中，對話過程讓參與者得以參照他人或面對自身，透過經驗對照、處境差異使其辨識「主體性、政治性」得以參照。「慢政治」運動，是行動者意欲探究自身並原意投入社會變革的一種實踐歷程，於壓迫的社會結構中，透過反身性探究，開展個體與集體階級意識間力量增生的行動，本研究將接續上揭論壇行動的基礎，筆者將以自身的敘事探究及對「慢政治」的初步論點，邀請運動者回應，以生產出對運動實踐有用的知識。

參考文獻

- Argyris, Chris, Robert Putnam & Diana McLain Smith (2000), *Action Science*. 夏林清譯，《行動科學》，台北：遠流。
- Schön, Donald A.(2004), *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夏林清譯，《反映的實踐者》，台北：遠流。
- Schön, Donald A.(2003), *The Reflective Turn*. 夏林清譯，《回觀反映—教育實踐的個案研究》，台北：遠流。
- Argyris, Chris & Donald A Schön(2006),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Theory, Method, and Practice*. 夏林清、鄭村棋譯，《組織學習理論、方法與實踐》，台北：遠流。
- Fanon, Frantz (2005), *Peau Noire Masques Blancs*. 陳瑞樺譯，《黑皮膚、白面具》，台北：心靈工坊。
- Gramsci, Antonio (1976),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獄中札記》（譯者不詳）台北：谷風
- Gramsci, Antonio (1976), *LETTERE DAL CARCERE*. 田時綱譯，《獄中書簡》，中國：人民出版社
- Ho, Shuet Ying (1990), *Taiwan-After A Long Silence, The emerging new union of Taiwan*. 鄭村棋、舒詩偉譯，《台灣自主工會運動史》，台北：勞工教育資訊發展中心。
- Said, Edward W.(1997),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單德興譯，《知識份子論》，台北：麥田。
- Touraine, Alain(2002), *Le retour de l'acteur*. 舒詩偉、許甘霖、蔡宜剛譯，《行動者的歸來》，台北：麥田出版社。
- Wallerstein, Immanuel(1991), *The Construction of Peoplehood: Racism, Nationalism, Ethnicity*. 黃燕堃譯，《族群身份的建構：種族主義、國族主義、族裔身份》，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 王振寰（1992），《資本、勞工與國家機器》，台北：唐山。
- 王振寰(1998)，《誰統治台灣？轉型中的國家器與權力結構》，台北：巨流。
- 丘延亮（2008），《實質民主—人民性的覺知踐行之對話》，台北：唐山。
- 邱依虹（2006），《生命如河流》，台北：巨流。
- 何明修（2008），《四海仗義—曾茂興的工運傳奇》，台北：台灣工陣線。
- 林書揚（1993），《從二二八到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台北：時報出版。
- 哈伯瑪斯（2005），《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台北：聯經。
- 陳明通（2001），《派系政治與台灣政治變遷》，台北：新自然主義。
- 許寶強、羅力生(2004)，《解殖與民族主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 陳光興（2006），《去帝國—亞洲做為方法》，台北：行人出版社。
- 楊祖珺（2005），《我在凱達格蘭等你，2004年320-520抗爭紀實》，台北：桂冠。

論文、期刊

- 王醒之(2009)，〈社區心理學的政治實驗室-「普通人參政」中的認識論轉化〉，國際理

- 論心理學會（ISTP）年會研討會；中國南京。
- 王芳萍(2009)，《女性運動者的政治性生成—台北市公娼抗爭和日日春運動紀實》，輔大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尤怡文（2005），《從後威權到多元民主—試析 2004 總統大選工委會「百萬廢票運動」》，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班。（未發表論文）
-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006），《自主公民進場：對百萬人民倒扁運動的觀察與展望》，台北：唐山。
- 台灣工運雜誌（1993）第 3、4 期，〈工人鬥陣節〉，《台灣工運雜誌》，台北：工委會。
- 台灣工運雜誌（1996），〈專題：關、失業—政府提出的政策真能解決關廠問題嗎？〉，第 15 期，《台灣工運雜誌》，台北：工委會。
- 李丁讚（2007），〈解嚴以來：二十年目睹之台灣—社運與民主篇〉，《思想》，第 7 期。
- 林惠官(2003)，〈對工委會「百萬廢票」主張的回應〉，《2003 秋鬥勞工高峰會》台北：廢票聯盟。
- 林子文（2004），《秋鬥—台灣勞工運動的儀式性集體行動》，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 吳永毅(2009)，《運動在他方：一個基進知識份子的工運自傳》，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研究所(Department of Applied Social Science)博士論文。
- 吳永毅、陳素香（1996），〈以上皆非工人不分區立委〉，《台灣工運雜誌》，第 13.14 期，頁 30。
- 吳永毅（1995），〈工人、政黨、工運路線〉，《台灣工運雜誌》，第 9 期，頁 26。
- 吳永毅(2003)，〈工人投廢票、走己的路〉，《2003 秋鬥勞工高峰會》台北：廢票聯盟。
- 吳維豐(2007)，〈思想第四期—何謂主體性？〉，《思想》，第 7 期，頁 73。
- 夏林清(2008)，〈角落、暗處與陰影～發展文明空間的拮抗力量〉，2008 年中國人民大學、輔仁大學“文化、社會與心理”學術論壇。
- 夏林清（2006），〈在地人形～政治歷史皺摺中的心理教育工作者〉，《應用心理研究》，第 31 期，頁 201-239。
- 夏林清（2004），〈一盞夠用的燈～ 辨試發現的路徑〉，《應用心理研究》，第 23 期，頁 131-156。
- 夏林清（1999），〈制度變革中教育實踐的空間：一個行動研究的實例與概念〉，《應用心理研究》，第 1 期，頁 33-68。
- 葉俊榮（2004），〈行政院組織再造的目的與影響〉，《新世紀智庫論壇》，第 27 期，頁 110-114。
- 郭明珠（1996），〈1995 秋鬥工人鏘聲大遊行〉，《台灣工運雜誌》，第 13.14 期，頁 2。
- 陳政亮（2008），〈社會保險的失敗：從勞基法到勞工退休金條例〉，世新大學勞工研究研討會：台灣勞工研究匯聚再出發大會手冊。
- 孫窮理（2004），〈社運政治行動—泛紫與廢票〉，《工運年鑑》，台北：苦勞網、世新社發所。
- 張育華(2006)，《移動的疊影—我在低地蜿蜒前行的實踐歷程》，輔大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通賢(2006)，〈倉運聯工會組織的歷史發展與困境〉，台灣倉儲運輸工會聯合會 95 年度會員勞教手冊。

董榮福(1994)，〈機場營運，工人衝在老板前面〉，《台灣工運雜誌》，第 8 期，頁 22。

黃德北(2003)，〈政黨輪替後民進黨政府與勞工關係變化之研究〉，台灣政治學會主辦，《台灣政治學會 2003 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論文，東吳大學，2003 年 12 月 14 日。

黃德北(2007)，〈不平衡的發展：中國大陸社會組織的發展與公民社會的前景〉，中國政治學會主辦，《中國政治學會 2007 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論文，義守大學，2007 年 9 月 29 日。

黃華新、唐禮勇(2003)，〈社會科學知識的“反身性”兼與自然科學知識反身性的比較〉，《浙江大學學報》，第 35 卷第 2 期，<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黃泰山(2005)，〈中國是台灣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台灣政治論述分析〉，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賴香伶(1995)，〈民營化 B O T-機場貨運站民營化案例〉，《台灣工運雜誌》，第 12 期，頁 67。

顧玉玲(1994)，〈全民健保立委投票記錄大公開〉，《台灣工運雜誌》，第 8 期，頁 74。

鄭村棋、吳永毅、顧玉玲等(1995)，〈工人、政黨、工運路線〉，《台灣工運雜誌》，第 9 期，頁 9-22。

鄭村棋(1993)，〈統獨跟工人什麼關係？〉，台灣工運雙月刊，台北：工委會。

媒體文章

丁勻婷(2004)，〈站鬥陣、戰同線〉勞工陣線二十週年，勞動者電子報，<http://labor.ngo.org.tw/weekly>。

王芳萍(2007)，〈性工作者要除罪，民主制度要改革座談會〉，智邦公益電子報，<http://enews.url.com.tw/enews/44960>

司徒洪彬(2007)，〈第三勢力的新政治能新到哪裡去？〉，苦勞網，公共論壇，<http://www.coolcloud.org.tw/node/12156>。

丘延亮(2006)，【新國際】辦公室「公民不服從」對談座談會會議實錄，http://intermargins.net/Headline/graft/Activity_03.htm。

任潔(2008)，〈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思想研究〉，烏有之鄉，www.wyzxsx.com。

朱嘉英(2009)，〈給臺北市勞工權益基金委員的一封信〉，苦勞網，<http://www.coolcloud.org.tw/node/49156>

何東洪(2007)，〈給第三社會黨的信〉，苦勞網，<http://www.coolcloud.org.tw/node/12130>。

何燕堂(2004)，〈階級運動不是插旗子比賽—回應楊偉中〉，苦勞網。

何俊輝(1999)，〈亞太營運中心計畫正在影響著我們的下一代—寫在跨入廿一世紀之前〉，<http://theme.cepd.gov.tw/aproc/html/links1/ch/21c.doc>

李易昆(2007)，〈學運世代的另類抉擇—往上爬或向下走？〉，www.nobnog.org.tw。

李筱峰(2000), <http://www.jimlee.org.tw/article>。

房怡諒(2008),〈臺灣社會運動向馬共取經我國多元文化有參照意義〉,馬來西亞獨立新聞在線, <http://www.merdeka-review.com>

徐國淦(2004),〈勞退金條例舊制,年資保留不保證領得到〉,聯合報/A6版,2004/5/28。

陳長文(2009),〈端正選風,改為絕對多數決制〉,聯合報/A15版,2009/11/02。

陳長文(2009),〈觀念平台—樂見深度思辯的選制改革討論〉,中國時報/A14版,2009/11/10。

孫慶餘(2003),〈回歸「新中間路線」〉,台灣日報。

孫慶餘(2003),〈被遺忘的中間選民〉,中國時報。

孫窮理(2005),〈社運政治行動—泛紫與廢票〉,《工運年鑑(2003.06-2004.05)》,台北:苦勞網、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頁213-219。

郭明珠(2007),〈普通人選立委對話記〉, www.nobnog.org.tw。

楊偉中(1996),〈國公營工人鬥陣行,專訪徐慶國、曾銘恩的秋鬥感想〉,《台灣工運雜誌》,第13.14期,頁17。

楊宗興(2007),〈改革選制,社運團體推「以上皆非」選項〉,苦勞網, <http://www.cooloud.org.tw/node/8054>

黃瑞明(2002.4.15),〈前來埋葬台灣「新中間路線」的紀登斯〉,中國時報

簡錫堦(2003),〈重回體制外改革〉,《勞工運動與政治參與》,高雄市政府勞工局,頁90。

賴香伶(2006),〈民主運動的接班人〉,中國時報,2006/9/8。

賴香伶(2006),〈政客大贏,人民大輸〉,蘋果日報,2006/10/12。

鄭村棋(2003),〈講座三:左與右?—國家政黨與勞工〉,「執政,不滿及焦慮」台灣沙龍系列座談, <http://labor.org.tw/news/2003-4-left-right-forum.htm>。

新聞、文宣

工委會(2003),〈工人鬥總統,走出咱的路〉,《百萬廢票》台北:廢票聯盟。

中國時報,〈政見悖離環保,彰縣環盟籲投廢票〉,2009/12/03C1/中部都會。

工委會(2003),〈工委會無力獨自承擔組黨大任,但別廢了「百萬廢票」工人走自己的路的機會〉苦勞網。